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两位研究苏联事务的美国人合写的揭露苏修对拉丁美洲进行渗透和扩张活动的一本著作。作者援引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波诺马廖夫,以及苏修“拉丁美洲问题专家”沃尔斯基(苏联科学院拉美研究所所长)、A·I·索波列夫(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史室主任)等人的言论观点,参照苏修方面连篇累牍刊发的理论文章,就苏修渗透拉丁美洲的目的、策略和手段进行了综合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概括了苏美争夺拉丁美洲的轮廓。第二章论述了苏古关系问题。它涉及苏古之间的矛盾,苏古军事关系的形成;苏修对古美改善关系的看法;古巴经济被纳入苏修的轨道;还谈到苏修加紧控制古巴党、政、军、工会、青年、妇女等组织的情况。第三章着重分析了苏修对拉丁美洲军人政权原来的看法及其变化。第四章论述了苏修对智利阿连德政权的关系问题,分析了苏修对阿连德政权的看法。另外,还列举了苏修和智利“民主力量”为反对皮诺切特军人政权所进行的活动。第五章论述了苏修和东欧国家对拉丁美洲各国(除古巴外)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进行渗透的情况。第六章作者就本书脱稿前(1975年)拉丁美洲出现的一些重大事态,苏修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前景作了推测。

本书作者:利昂·古雷是美国迈阿密大学高级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研究苏联问题负责人，著有《苏联民防》《1969—1970年苏联民防》等书，与人合编过《苏联军事战略》；莫利斯·罗森堡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过苏联与东欧情报科科长、联合国政治事务科科长等职，并在美国驻莫斯科、墨西哥城等使馆任职。目前两人都在迈阿密大学任教。

本书虽然给我们了解和研究苏修对拉丁美洲的渗透和扩张提供了不少材料，但作者都是资产阶级学者，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是有问题的，有时甚至是反动的，阅读时请注意分析和批判。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江南造船厂工人业余学校和沪东造船厂“七·二一”工大部分同志。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1977年8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概论	5
第二章 古巴的新阶段	32
共处与革命的问题	37
军事关系	48
莫斯科与美古关系	54
古巴正在日益纳入苏联集团的经济一体化	65
古巴的苏联化	98
卫星化的“喜悦”	107
前途	116
第三章 “进步”的军人政权	123
第四章 阿连德政权及其结局	145
军事政变的结局	161
为智利作进一步的斗争	179
第五章 苏联在拉丁美洲加紧活动	188
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外交关系	191
苏联经济援助的扩大	197
同拉丁美洲的贸易	225
文化交流	241

	军事援助·····	245
	共产党集团的宣传活动·····	251
第六章	问题与前景 ·····	264

序 言

北美人长期以来认为，拉丁美洲天然应归美国照管，而且美国对它负有特别责任。该地区确实被看成是美国不用费多大劲就能确保安全的“后院”。这主要是因为别国还不能真正地侵入该地区而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今天，这个本可放心的后院正日益具有新的国际性，这一情况加上固有的发展，正愈演愈烈地损害着本地区同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使美国重要的全球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受到影响。

虽然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承认，它同拉丁美洲的“特殊”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美国试图寻求新的政策和方案，以确保该地区不受外来的不利因素和国内动乱的影响。但历届总统所宣布的各种政策，如“争取进步联盟”、“西半球伙伴关系”、“新的对话”等，哪一种政策都不能使拉丁美洲稳定下来，也不能维护美国在那里的利益和影响。正象尼克松总统曾有一次指出的那样，美国无论官方或公众对拉丁美洲的注意力，“看来忽而增强，忽而减弱”。当左派政权兴起的时候，注意力便随之达到了高峰；而当左派政权消失或者左派政权已经和美国对拉丁美洲总的看法相一致的时候，注意力也便下降了。

在较近时期里，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正象两个半球里许多人所描绘的“颇怀好意地不闻不问”。与此同时，苏联对该

地区愈益感到兴趣,并一直在加紧努力,来影响该地区的事务和命运,这一事实也是很清楚的。

当然,在拉丁美洲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在拉丁美洲同美国和外界的关系中所出现的变化,一般说来确实出于许多方面的原因,并且还有它自己的动态。但在该地区的领导人和人民中间出现了一种坚持本国权利和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民族主义的新情绪,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反美的表现和政策,不过,这种新情绪现已高涨并在不断发展中,那是不以莫斯科的活动为转移的。同样,“拉丁美洲”也确非清一色的地区,而是由具有不同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等问题的各个独特的国家所组成,它们的发展和变化的速度不同,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政权以及种种国内关系、对外关系和政策。而且从苏联的观点来看,该地区是地理上最远地区之一,也是最难渗透的地区之一。

然而,拉丁美洲之所以对莫斯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恰恰因为该地区是美国的后院,或者象苏联人所描绘的,是美国的“战略后方”;其次,因为该地区从苏联的观点来看,在很大程度上而且又比第三世界的任何别的地区,更具有一些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共产党人认为这些因素是适合于产生一种革命的反帝进程的。

苏联的领导并不讳言他们在拉丁美洲活动的首要目标,至少在目前来说,并不在于取得新附庸(古巴卫星国的关系主要是由于古巴而非苏联采取主动的结果)。眼下,苏联政策的目标是要破坏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和影响。一言以蔽之,莫斯科把拉丁美洲看成是全球性的反帝斗争的一个特别重要的

活动场所,克里姆林宫谋求进行这一斗争来反对美国,一般地说来,也就是反对西方。在苏联看来,旨在侵蚀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在投资和自然资源方面),来加剧拉丁美洲“民族解放”的进程,这是能够大大促进“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之有利于莫斯科,并同时为在该地区造成一种愈来愈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奠定基础,从而为最后建立左派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铺平道路。同样重要的是,莫斯科认为苏联在美国的“战略后方”具有愈来愈活跃的能力,表明苏联的力量日益加强并已伸展到全球。这不仅有利地反映在苏联拥有力量这一形象上,而且还进一步推进苏联的目标。关于这一目标,勃列日涅夫在1970年3月首先作了说明,即“世界上任何重大的问题,没有我国参加,又不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那是得不到解决的。”最后,而且也许莫斯科还没有估计到的是,拉丁美洲的政治形势的发展(特别是那里的革命斗争所采取的形式,以及从斗争成败上所取得的教训),已给第三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欧的左派和共产党力量采取的战略战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世界其他部分出现了重大危机和战争这一背景下,当前莫斯科在拉丁美洲发动的“攻势”,仍然多半没有受到美国的注意。由于眼下缺乏古巴导弹危机和短暂的阿连德试验那样引人注目的事态,也没有出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许多人是把这些革命同苏联竭力进行实际扩张相提并论的),莫斯科最近在南半球的活动并没有在美国公众当中引起多大的注意。美苏关系的“缓和”,以及随之而在美国产生的一种期待两个大国为了维持国际局势稳定现正进行合作的心情(这种期待的心情苏联人是否否认的),还有广泛认为莫斯科由于需

要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将使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趋于缓和，——所有以上情况也必然会使美国对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活动麻木不仁。然而，苏联当局并没有竭力加以掩盖，而实际上却表明他们企图通过各种可能的办法来破坏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的利益。因此，举例说，莫斯科一直支持巴拿马运河的国有化，它对没收美国财团资产总是给予鼓励，它赞扬拉丁美洲石油生产国全都使用石油武器来反对美国和西方，它力促石油生产国的政策大规模延伸到其他自然资源方面，并发起一场群众运动来支持反美情绪和反美行动，等等。

迄今为止，除了古巴（由于苏联加强控制，古巴正日益变为苏联在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的代理人）以外，苏联还没有给自己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较大的势力范围。然而，作为新来该地区的一个起点很低的国家，苏联近年来所获得的进展还是引人注目的，而且显然大有希望进一步取得进展。

本书的目的在于阐明苏联对拉丁美洲的观点、政策和它在该地区的活动。作者意识到本书只不过是当前拉丁美洲舞台变化发展殊多的特点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尽管如此，重要的是承认以下这个事实，即该地区（由于开放了门户，它日益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独立因素，并在第三世界的活动中起着愈益重要的作用）现已成为吸引苏联竭力进行渗透并影响其发展方向的一个目标，虽说该地区多半仍然是不乐意成为这种目标的。只要国际舞台仍受美苏争霸所控制，苏联在拉丁美洲的这些政策和活动所具有的含义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对这个重要地区和对美国的利益来说，很可能会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值得深思并加以密切注意。

第一章

概论

拉丁美洲，在苏联领导人一直认为是“帝国主义力量”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全球性斗争中，已成为苏联极为关注的一个目标。这不仅从讲话和文章里表现出来，而且也从苏联在这个地区与日俱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表现出来。苏联讨论的一个突出的重点，即放在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关系恶化，以及这个地区社会和政治关系中所孕育的因素上面。显然，莫斯科已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些事态发展可以使东西方均势受到很大影响，并有利于苏联。因此，有迹象表明，苏联正投入愈来愈多的物力来扩大它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并使有损于美国利益的各种倾向得到增强。

苏联以拉丁美洲作为注意的中心，是从较近时期开始的。六十年代以前，拉丁美洲看来还不是苏联优先考虑和感到兴趣的地区。斯大林死后，在重新估价第三世界的机会时，首先注意到的是亚洲和非洲。赫鲁晓夫在五十年代提出在第三世界建立一个“和平地区”的方案里，并不包括拉丁美洲。莫斯科在那个时期为第三世界设立的一个主要阵线组织——亚非人民团结组织，顾名思义，并不包括拉丁美洲。关于拉丁美洲该不该算入第三世界这个问题，苏联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因为，就象他们当中一个学者所说的那样，这样一种“理论的产

物势必要把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经验机械地搬到拉丁美洲的情况中去”^①。

不过，苏联在制订政策时，首先还是考虑到实际情况。简单的事实是：苏联在成立以来的大部分岁月里，由于缺乏物力，要对离它如此遥远的一个拉丁美洲地区采取一种积极战略，当时苏联是无力支持的，而且，可供苏联利用的机会也不多。最重要的是，莫斯科深信拉丁美洲是处于美国牢固控制之下，对于任何左派政权或任何重大的苏联影响，华盛顿想必都不会容忍的。这种被称为“地理宿命论”的看法，看来已被1954年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干涉所证实，这次干涉的结果使苏联支持的阿本斯政权终于垮台了。每当左派力量——比如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1965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博什、1971年玻利维亚的托雷斯，以及1973年智利的阿连德——遭到失败时，就重新出现过类似的情绪，但苏联六十年代以来对拉丁美洲的看法所具有的基本乐观主义的精神日益超过了这种情绪。

古巴革命，尤其是没想到卡斯特罗政权能幸存下来，大大地影响了莫斯科对以下所有三种因素的看法（这三种因素即：可供苏联利用的机会，苏联利用这些机会的能力，以及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控制），这种看法迄今一直使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受到限制。

卡斯特罗的胜利，以及他既敢藐视美国，又能使古巴加入

^① A·F·舒尔戈夫斯基：“列宁主义与拉丁美洲革命进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原载《列宁主义与拉丁美洲》（莫斯科，苏联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1972年版），第1卷，第70页。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并成为正式成员，——根据莫斯科的看法，这就是在美国所控制的拉丁美洲打开了一大缺口，看来还为在这个大陆上兴起一个要求进行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高潮而开辟了道路。从1960年以来莫斯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纲领性讲话和文件的语调中，都反映出莫斯科的信心已在不断增强。1960年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声明断言：“古巴革命的胜利有力地激励了拉丁美洲人民为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并在这个地区开辟了“一条对帝国主义进行积极斗争的阵线”^①。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上，“特别提到”拉丁美洲英勇的解放斗争，并宣称：“今天，在这个大陆上的每一个国家里，人民正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进行斗争”，他说这种斗争正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②。随着左派政权的不断兴起，共产党在某些国家里搞成联合阵线，以及美国同拉丁美洲各国的关系日益遇到困难，苏联的预测便愈来愈肯定了。1969年6月17日国际共产党会议通过的主要文件宣称：不仅是古巴在美洲大陆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战斗的、民主的、反帝运动和革命的进程也正在世界这一地区发展着，为走向社会主义铺平了道路。”^③

1970年9月智利的阿连德当选后，苏联的希望达到了新

① 丹·N·雅各布主编：《新共产党宣言》（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62年版），第30—31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

③ 塔斯社，1969年6月17日讯。

的高峰。在苏联的拉丁美洲问题研究工作者召开的一次全苏大会上曾经断定说，“为了使列宁关于从土地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开花结果，正如在古巴和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情况那样”^①，拉丁美洲已具备“客观和主观条件”。苏共中央书记 B·N·波诺马廖夫在苏联共产党主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上撰文，断言：

当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工作者的注意力，愈来愈集中于拉丁美洲大陆的革命者的最新经验上。智利的民族联盟集团^②的胜利，秘鲁发生的进步的变化，以及乌拉圭等国革命斗争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都使我们相信那里的革命进程正在继续发展着，其速度比非社会主义世界的其他地区还要快。这确实是一个“动荡中的大陆”。^③

苏联之所以相信在拉丁美洲的机会确实在增多，原因在于莫斯科日益深信自己有能力把苏联的力量和影响投向远离苏联国境以外的地方去。在卡斯特罗的古巴，苏联的地位之得到巩固，就是形成这种信心的一个主要原因。苏联在1973年出版的一本给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小册子声称：“古巴的例子

① A·F·舒尔戈夫斯基：“拉丁美洲研究中的紧迫问题”，原载《科学通报》，1971年8月（第8期），第108页。

② 原文如此。1970年总统选举过程中，由社会党、激进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和独立人民行动等六个党派组成“人民联盟”，竞选获胜。——译者。

③ B·N·波诺马廖夫：“当前革命进程理论中诸问题”，原载《共产党人》，1971年10月（第15期），第59页。

极其清楚地显示出世界上各种力量之间的新关系”^①。按照作者的说法，这表明了：一个国家尽管靠近美国而离苏联却很远，也能够在苏联及其盟国的支持和帮助下，“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实现一次深刻的群众革命”。古巴被看成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日益增长，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日益失去地位”的一种结果，又是一种促成因素。^②

苏联1962年企图在古巴设置进攻性导弹，这就是莫斯科要把它的力量投向西半球所作出的最大胆的一种努力。莫斯科在这次危机中遭到挫败之后，就通过其他手段来达到同一目的。这种努力的核心就是，加紧增强苏联战略力量。苏联海军和商船实力的增长，同苏联的拉丁美洲政策是特别有关联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说下面这段话时——

苏联人民在经济领域，在科学、技术和文化上，在提高生活水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不断加强苏联防务力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一切使苏联外交政策对世界事态进程产生的影响变得更广和更深了。^③

① V·G·布舒耶夫：《拉丁美洲——不可逆转的过程》（莫斯科，知识出版社，1973年版），第19—20页。

② 同上，第13页；并参阅L·I·谢列兹涅夫：《当代民族解放革命》（列宁格勒大学，1972年版），第23页。

③ 《真理报》，1969年7月11日，转引自F·D·科勒，M·L·哈维，L·古雷，以及R·索尔合著的《苏联七十年代的战略：从冷战到和平共处》（佛罗里达，科拉尔盖布尔斯，迈阿密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73年版），第228页。

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就是象拉丁美洲那样的一些地区。就在这同一个讲话里，葛罗米柯声称：“苏联作为一个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的世界大国，对于虽然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但关系到我国安全和我们朋友的安全的一些事件，可不能消极旁观。”

在估计苏联更多地卷入拉丁美洲会冒怎样的风险时，苏联领导人声称，美国象过去那样把它的意志强加给这个地区，并同那里日益加强的“反帝”斗争相对抗的力量已在衰落。卡斯特罗政权之能持久下去，拉丁美洲其他左派政府的不断出现，以及美国无法使美国企业不被外国收归国有，——这些实例都说明美国力量在衰落。苏联的论点是把这种趋势部分说成是东西方均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苏联的存在和它的力量日益增强，据说已迫使美国受到愈来愈多的约束。有一篇文章解释说：“帝国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已“被迫”不对这些国家的事务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而是以非常受欢迎的条件给他们信贷和设备，从而促使某些国家的工业和国营企业的发展，因为帝国主义“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对第三世界的垄断地位已彻底垮台”^①。

莫斯科认为缓和也是限制美国行动自由的一个因素。苏联的基本观点就是，缓和或即“和平共处”并不适用于第三世界的反帝斗争，但是，“帝国主义者”则不得“输出反革命”，即不得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② 所以，苏联的宣传虽然指控说智利阿连德之死是美国插

^① B·加菲罗夫：“苏联与民族解放运动”，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1年7月（第7期），第20页。

^② 参看科勒等人的前引书，第53—54页。

手的缘故,但也认为,如果没有缓和的话,那么美国干涉也许会更赤裸裸,规模也会更大。阿连德死后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说:由于“新的力量对比”和“缓和的气氛”的关系,“帝国主义集团不能从事行之有效的干涉活动”,而不得不依靠颠覆了。“智利的实例正是这样”^①。

有一本论述尼克松主义的苏联著作^②,提出了约束美国干涉拉丁美洲的另外一些具体因素。按照该书作者的看法,拉丁美洲对美关系中最近出现的趋势,“严厉地”限制了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比如说,由于智利政权具有宪法赋予的合法性,美国的干涉势必遭到整个拉丁美洲的“积极抵抗”。美国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愈来愈可能在泛美体系中引起更大的紧张气氛。作者还看到越南战争已使美国财力相当紧蹙,并且美国害怕发生新的越战,说什么:“在美国,他们担心会在拉丁美洲陷入正如在印度支那发生过的某种窘境。”据说美国财力的紧张状况将使美国帮助拉丁美洲“搞资本主义发展”的意愿和能力有所缩减。作者断言说,有鉴于此,美国近年来已“被迫”大量减少它对争取进步联盟所作出的承诺,并将接受美援的条件规定得更为苛刻了。

苏联利益的重点,以及苏联对现阶段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主攻目标和活动,倒不一定在于扩大苏联的控制,或建立彻

^① V·G·布舒耶夫:“拉丁美洲的革命与反革命”,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4年5月(第5期),第34页。

^② Y·P·达维多夫, V·V·茹尔金及 V·S·鲁德涅夫合著:《尼克松主义》(莫斯科,苏联科学院美国问题研究所,科学出版社,1972年版),见联合出版研究处(美商务部)书目编号第58417号(1973年2月26日),第192—193页。

底的共产党政权，而是培植对美国的敌对情绪，培植对拉丁美洲社会中那些与美国有联系，或赞成走传统民主道路的人们的敌对情绪。因此，拉丁美洲之作为苏联的渗透对象，不仅表明了苏联利用那个地区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有利发展这种机会主义做法和苏联卷入遥远地区的能力与日俱增，而且也表明莫斯科认为拉丁美洲在东西方均势中多么重要。波诺马廖夫说得很透彻：“这些[在拉丁美洲]的变化对有利于国际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世界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变化，正在起着，而且无疑地将继续起到一种强有力的冲击作用。”^①

同样，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之子——他是一个美国事务的专家——在1973年9月智利政变前夕，对美国七十年代的外交政策进行分析时指出，过去美国对它在拉丁美洲的利益和地位是感到放心的，然而，

古巴革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向积极反帝方面的转化都表明这个大陆上的社会经济进程是能够使美国在那里的地位受到削弱、甚至破坏的。^②

作为苏联渗透的一个目标和作为“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场所，拉丁美洲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由于莫斯科把拉丁美洲说成是美国的“战略后方”（这样的说法在世界上其他

^① 波诺马廖夫，前引文。

^② 安纳托利·A·葛罗米柯，A·科科申：“美国七十年代的外交策略”，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3年10月（第10期），第71页。

地区都是绝无仅有的),而使这种重要性更加突出了。“削弱甚至破坏美国在那里的地位”,就是说要使美国的实力地位不仅在这个地区而且在全世界受到严重破坏,从而促进“世界力量的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化。在这个方面,《共产党人》有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工业从那里[即拉丁美洲]取得它所需要的相当多的原料,包括它进口的各种战略物资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一百。”^① 1972年苏联研究美国和拉丁美洲的一篇具有权威性的论文,把这种依赖性更确切地同美国的军需联系起来。作者写道,美国的防务经济“存在着一些非常具体的缺点”,美国在“导弹、通讯、原子工业和电子工业等所使用的,拉丁美洲能供应的新型原料”的需求方面存在着愈益“尖锐的问题”^②。因此,美国就会遇到这样的风险,即它不仅会失去它的大量投资,而且还会失去它对拉丁美洲这个至关重要的原料产地的控制和剥削,甚至也许无法进入这个产地,这就是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在美国能源危机和其他原料匮乏的情况下,已变得更加严重了。所以,随着这个地区反美的民族主义高潮的来到,按照一位苏联分析家的说法,拉丁美洲已变成了“美国后方最易受到攻击的部分之一”^③。

莫斯科之所以敢大胆利用古巴和利用苏美均势的变化,是由拉丁美洲的两大倾向促成的:(1)带有浓厚的反美色彩

① A·阿列克辛:“平静的干涉”,原载《共产党人》,1970年7月(第10期),第93页。

② K·S·塔拉索夫:《美国与拉丁美洲》(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③ V·瓦西利耶夫:“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新探讨’”,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1年6月(第6期),第49页。

的、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2)各国政府和社会运动中日益发展的激进主义。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这些发展的重要性就在于拉丁美洲日益卷入“世界革命进程”中“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这个阶段中去，力图破坏以美国为首的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体系。莫斯科从前是把拉丁美洲同其他地区割裂开来的，而现在却认为：拉丁美洲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应该是基本上相同的。现在苏联分析家都强调指出，根本不存在把拉丁美洲同别的革命地区截然分开的“特点”。他们认为，古巴政权之得到巩固，就是对美国的优势可阻止拉丁美洲卷入“世界革命进程”这种看法的一种驳斥。苏联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既不承认激进的左派组织团体所提出的下述主张（即企图普及古巴的革命理论和游击战，并使之成为独特的、和苏联革命截然不同的东西），也不承认非共产党意识形态专家们对各种军人政权和改良派组织团体所作出的断言（即他们争辩说，他们通过不同的道路可以建成富有特色的、亦即独一无二的拉丁美洲型社会主义）^①。波诺马廖夫提到全世界关注拉丁美洲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和别的地区都有着共同性的问题，从而进一步缩小了拉丁美洲独特性这种概念的影响。现在拉丁美洲据说甚至对西欧来说都具有教训，但苏联的注意力主要还是侧重于作为不发达世界一部分的拉丁美洲的。无论在分析问题也好，或者谈到组织体系也好，拉丁美洲总是同亚洲和非洲加在一起的。苏联是把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日益发展的世界革命活动

^① 例如，见 V·特卡钦科：“北京的拉丁美洲战略”，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4年10月（第10期），第60—78页。

的中心而进行探讨的，但现在还必须同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所进行的全面探讨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观察。

苏联的教条早就给第三世界规定了任务，要它在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起决定性的作用。列宁为了说明在以农业为主的俄国进行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是合乎情理的，就把马克思主义弄颠倒了，但是却发展了他的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具有连锁性，以及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一环”可能发生革命的理论。列宁提出上述理论是根据他以下这一概念的，那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和最后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是非依赖剥削不断扩大的国外市场不可的。控制不了那些所依赖的地区，势必使有关的资本主义国家受到影响，它们的经济和战略力量及其生存能力就会削弱，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剥削第三世界所得的利益没有了，经济上就有了压力，反过来就使那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冲突加剧了，而且使这些国家竞相控制日益缩小的世界市场的这个冲突也加剧了。这一进程将使“世界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及其盟国的方向不断转化，最后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最强大的美国在内——走上共产主义，或者孤注一掷地诉诸战争，以求生存，而这一战争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最后毁灭。当时列宁认为俄国、中国和印度形势的发展就是说明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已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而“从这个意义来说”，“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①。

^①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13年版）第9卷，第400页。（参阅《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710页。——译者）

对各种可能性进行了多年试验之后,苏联从1928年起至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长期以来它的教条和实践就是以下面的前提为依据的:那就是“殖民地国家”只有通过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型的革命,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通过民族主义型式的斗争,使一个国家的状况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即使这个斗争是由广泛的工农联盟指挥的;但是确切地说,这种变化仍将是一种骗局,它只能欺世惑众。

随着三十年代后期日本与德国对苏联和世界和平的威胁日益严重,更由于战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莫斯科放宽了“赞同我们,或则反对我们”的清规戒律,最明显的就是对待中国国民党的例子。苏联之所以能作出这种改变,是因为当时的问题是要使战争打赢,而不是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但是,战争一过去——而且,尽管惊人地加快的非殖民化过程,已使苏联有机会在牺牲西方的情况下从一些新的国家那里获得好处——莫斯科又把门砰地关上了。1947年9月,在新的共产国际(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幕的那次会议上,斯大林的发言人安德烈(莱)·日丹诺夫提出了一幅硬是把世界划分为两极的图景。斯大林在1953年3月他逝世前最后一个富于理论性的声明中^①,把两极这个概念扩大到几乎整个世界地区;社会主义大家庭已自成一个实体,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则组成一个与之对立的资本主义实体。斯大林展望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得到发展,资本主义阵营进一步得到缩小,但这是以这样一场新的战争为背景的,这场战争将在帝国主义国家

^① 约瑟夫·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52年版)。

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从而兴起一个革命的新高潮。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立场完全颠倒过来了。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第二十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说，苏联不再把世界硬是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因为这样划分，就使每一个国家不属于这个阵营，势必属于另一个阵营。有一些国家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主要都是一些新独立的不发达的国家，他们正在力图脱离同帝国主义阵营的联盟，组成一个“和平地区”。^①

实际上，赫鲁晓夫给代表大会的咨文概括起来就是：（1）承认在新的国家的领导人中间有许多人在国际上采取“反帝”方针，因此在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中是直接有利于苏联这一方的；（2）估计到这些领导人在考虑实现国内目标时愈来愈把力量集中在国营部分而不是私营部分，这一情况将使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很有可能无需通过暴力革命，便通向苏联型的社会制度，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3）就各国共产党的作用这个问题来说，他们乐意在原则上接受妥协，甚至对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可以熟视无睹；（4）有迹象表明，苏联在争取不发达地区的这个斗争中，宁可采取一种竞争手段，这样就把核战争的可能性减少到最小限度。

这些变化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由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活动和非共产党运动经常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结果可能成为摧毁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的步骤。这给苏联积极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正当的理论根据。这么一来，苏联外交政策就可以充分利用莫斯科日益发展的军事和经济能力以及各国激

^① 《真理报》，1956年2月15日。

进的民族主义力量的兴起，而莫斯科就能够同后者采取反对西方的共同立场。这也给一些没有实力掌权或则不能领导左派运动的共产党，提供更大的活动范围。特别是由于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了一些类似共产党国家的国内措施（诸如国有化，限制私人企业和外国投资，以及土地改革），这样莫斯科便发展了新的类型，以提高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意义。这既适应了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也符合其强调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的需要。

整个进程中最突出的几个具体步骤，首先是在一些国家里要有一支由各派组成的联合力量和一套政策，并使他们同“反帝”，亦即反美的模式适应起来。这种战略实质上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把戏，旨在消除美国在那些地区的势力影响。这种战略要求充分利用第三世界人民中间的民族主义，不管那里的人民是不是处在“保守的”或“进步的”政权之下，办法就是把他们的“民族解放斗争”纳入反对西方的“反帝”斗争中去，这样一来，莫斯科就可以指使它的代理人向美国利益发动进攻，并使苏联将遇到的风险不越出它可接受的限度，而且在战术上还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说得更具体些，确定反帝的倾向时至少要考虑到以下情况：有利于苏联的积极的中立主义；对西方重大的政策持敌视的态度；支持苏联在诸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重大立场；通过把西方的重要企业收归国有和限制西方投资等措施，从西方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样，按照苏联的看法，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力量”不仅已成为“世界反帝运动的主要因素之一”^①，而且在“共同反对帝国主

^① “世界爱好和平力量莫斯科会议决议”，原载《真理报》，1973年11月3日。

义和资本主义、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①，还是共产党国家的盟友。在拉丁美洲，对待古巴的态度也成了衡量反帝倾向的一种尺度。按照苏联的意识形态范畴来看，在这个阶段甚至民族资产阶级也能起到重要作用。

至于更高阶段，那就包括：在反对国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的斗争中，以及对社会经济制度“循序渐进的”改造（即扩大国营经济和限制私人经济，外贸、银行和公共事业国有化，土地改革，“群众”参与政治活动日益增多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那些国家处在“反对资本主义”阶段时还往往同苏联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对于这个阶段，苏联授意炮制诸如“民族民主”、“革命民主”、“非资本主义道路”等等的名称，旨在标明介于正规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这是苏联阵营中二等国家的名称）之间的某一个阶段。

要标明这些阶段以及制定这个名单，应根据具体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定。这里援引刊于1974年6月的《共产党人》上的一篇文章，作为苏联确定这些阶段的类型的一种实例。这篇文章提出发展中国家就有“三种基本类型”：

……一些国家已选定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另一些国家在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正在力图加强他们的独立地位，并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化经济；最后还有一些国家，已被剥削阶级中的反动分子夺取了政权，他们同帝国主义有着紧密联系，不

^① V·贾贡年科：“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革命”，原载《共产党人》，1973年5月（第8期），第52页。

顾民族利益，维护在半殖民地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发展。^①

决定苏联对某个特定政权采取什么态度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同当地共产党在这个政权中所起的作用有关。这个问题就是莫斯科进行大量推理的依据。第三世界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大多数共产党相对地说都是比较弱的，或者无力接管政权，尽管他们在那里也许还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共产党就有两种选择，要么作为保持早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的反对党，要么同其他“民主”力量一起加入各种联合组织（包括那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性质的组织），对于这些联合组织，他们不得不暂时承认对方的领导权。这里，首先涉及到的例证就是军人政权。莫斯科承认有几种可能性：共产党在统一的全国性的政党范围内参加政府的活动，或者作为支持军人统治政权的势力。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斯科赞同当地的共产党在结构上或至少在开展活动时应当保持某种形式的独立性。^②

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莫斯科强调认为，在共产党掌握领导权以前，所有这些阶段都决不能看作是直接引向社会主义，而仅仅是为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有利条件和铺平道路而已。按照迄今仍坚持的正统看法来说，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在里面起到领导的作用，否则共产主义革命和社

^① S·莫尔科弗尼科夫：“世界社会主义——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的支持者”，原载《共产党人》，1974年6月（第9期），第105页。

^② 参看，例如，B·莱勃宗：“为团结民主力量而斗争的共产党人”，原载《共产党人》，1974年11月（第16期），第109—113页。

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1964年，赫鲁晓夫背离了这一教条原则，提出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也可以逐渐发展到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或走上“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可是，他的继承人都拒绝了他的这种观点，认为这是同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相反他们更进一步强调指出：低级阶段（比如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然会进入反对资本主义的较高阶段，两者都是推动历史走向社会主义。因此，用共产党的术语来说，争取“民主”的斗争也可以看作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样，莫斯科实际上已发展了它自己的继续革命的看法，从而反对了更为激进的永恒革命的看法，并根据更高深的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替苏联给予各种政权的广泛支持进行辩解。

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这些过渡阶段都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特点将会同时并存，并且经常处于相互斗争之中。随着压力增大，而从这—个社会阶段进入另一个社会阶段，这时莫斯科指望在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分子和“进步的”民主力量之间出现分裂，前者仅仅谋求有限的改革，抵制进一步的变革，而后者则在不同程度上着眼于激烈地改革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包括逐步取消上层和中层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何况，在这些阶段里也还可能会出现倒退性的反政变。

这些理论应用于拉丁美洲时，某些方面正好适合，而某些地方却会遇到麻烦。不象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那样，拉丁美洲国家长期以来享有政治上的独立。此外，它们大部分国家已发展了资本主义制度，尽管程度上有所不同，而且有

时还同封建的农业结构(大庄园制)混杂在一起。拉丁美洲国家已越过了在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间进行选择的阶段。不过,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据说具有依附于工业大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这些工业大国不但向它们提供必要的投资和技术,而且反过来成为该地区出口商品的主要市场。拉丁美洲表现了正如一个分析家称之为“依附性资本主义”的特点和倾向,这一点也说明了为什么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主要是采取反对外国经济控制的形式,这样的斗争不仅左派而且资产阶级也都参加的。^①

苏联分析家都意识到拉丁美洲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发展很不平衡”,各个国家的政治条件和结盟情况都不相同,因而引起革命的机会也不同^②。“拉丁美洲向世界提供了种种新发展的有趣范例,并在探索新的革命道路”^③。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来说,拉丁美洲各国政权即包括了苏联所划分的三种基本类型,这就是:危地马拉、巴拉圭和巴西等国亲帝国主义的反动政府,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国民族主义改良派的资产阶级政权,以及象阿连德的智利,或者在不同程度上由秘鲁、巴拿马和厄瓜多尔的军人政权所代表的“进步的”民主的甚至是

① K·麦丹尼克:“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危机及其解决之前景”,原载《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之二,1974年7月号,第52页。

② M·F·库达奇金:“站在反帝斗争前哨的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原载《近代史和现代史》,1971年5月(第5期),转引自联合出版研究处(美商务部)书目编号拉丁美洲第634号,1971年12月13日,第4页。

③ S·米科伊安:“变化中的拉丁美洲大陆外貌”,原载《在国外》,1971年5月14—20日(第20期),第15页。同时见G·卡尔特萨格:“关于拉丁美洲革命进程的发展”,原载《拉丁美洲》,1972年1—2月(第1期),第7页。

“革命民主”制度。^①这样,鉴于拉丁美洲情况变化殊异,社会政治性又很强,莫斯科在政策上就必须保持最大的灵活性,以便准备应付各个国家“出人意料的”事态变化和“异乎寻常的力量”的集结”,并同形形色色的“反帝”和“进步的”政权打交道。

苏联分析家都承认,当前拉丁美洲的基本政治力量是民族主义,由于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原因,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比远离美国的第三世界各地区更加突出地反对美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利益和规模,固然各个国家都是不同的,但据说有一条线把他们全都拴在一起了,那就是存在着一个敌人,即“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②只要用这块试金石一衡量,莫斯科看待古巴的卡斯特罗、秘鲁的贝拉斯科、智利的阿连德,或者阿根廷的庇隆那样截然不同的政府就顺眼了,而且同他们打交道也不难了。

苏联领导人历来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不仅具有政治形式,而且还卷入反对美国经济利益的斗争中去。由于这一经济因素,莫斯科相信,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的反帝斗争不可避免地将发展成为一种引起社会经济急剧变革的斗争,这就为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目标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根据苏联关于第三世界的革命可能性的理论,拉丁美洲早已一跃超过了亚洲和非洲,因为拉丁美洲在社会经济上已发展到比较先进的阶段,为使反帝斗争过渡到革命斗争这一高级阶段创造了更好的先决条件。即便如此,由于拉丁美洲

^① 谢列兹涅夫,前引书,第110—111页。

^② 布舒耶夫:《拉丁美洲:不可逆转的进程》(莫斯科,知识出版社,1973年版),第19—20页。

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混杂的特点，按照苏联分析家的看法，是不容许迅速地过渡到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的。例如，苏联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 V·沃尔斯基曾直截了当地说过下面一段话：

在这些国家里，社会经济落后，加上农村里大庄园占统治地位并存在强大的前资本主义关系，以及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以下事实，即拉丁美洲首先要通过人民民主革命，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①

按照这一看法，民主革命政权首先必须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和打下基础，而且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预计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诚然，按照苏联的模式来看，在第三世界“少数”国家里，拉丁美洲只有五个国家（即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乌拉圭）存在着“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不过，目前这些国家没有一个被莫斯科列为人民民主政权，更不用说革命民主政权了）^②。因此，莫斯科一面审慎地瞩目于拉丁美洲即将出现的崭新的苏联型国家，一面对已达到“更高”过渡阶段的一些国家的前景也持乐

^① V·沃尔斯基：“解放斗争的问题”，原载《真理报》，1970年6月27日。同时见韦恩·史密斯：“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及意识形态纲要”，原载《环球》杂志1972年冬季（第25期），第1129—1133页；同时见谢列兹涅夫，前引书，第149页。

^② V·柳西诺夫：“关于发展中国家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形式”，原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73年2月（第2期），第18页；同时见谢列兹涅夫，前引书，第149页。

观态度。

资本主义已达到成熟这个重要阶段，出现一个颇有政治和社会经验的资产阶级，以及存在着一个人数众多的、组织起来的和具有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所有这些决定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具有很高水平。这些情况构成了拉丁美洲革命进程的特点：那里运动的民主主义任务，在更大程度上来说，是同具有社会性质的口号交织在一起，这在亚非国家是没有的，因为亚非国家在整个殖民时期实际上根本不知道有象拉丁美洲国家所获得的那种正式的独立，哪怕这是几经削减和残缺不全的独立。^①

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断言，拉丁美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智利马克思主义政权的上台，证明了列宁以下预言，即从民族解放斗争开始，附属国将继续对剥削制度的基础展开斗争。勃列日涅夫下结论说，这就是对于“作为一种世界社会制度的整个资本主义阵地的一种最沉重的打击”。^②

波诺马廖夫就“世界革命进程”问题所写的重要文章（刊于《共产党人》1971年10月号上），更具体地阐明了莫斯科认为可促进它在拉丁美洲的活动的一些有利因素。按照波诺马廖夫的说法，这些因素就是：

首先，拉丁美洲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确切地说，就是农

① 布舒耶夫：《拉丁美洲——不可逆转的过程》，第13页。

② 《真理报》，1971年3月31日。

民同盛行于农村地区的封建和半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与日俱增；以及民族利益同外国剥削、控制之间发生冲突，而“美帝国主义者就是通过这种剥削、控制的手段厚颜无耻地继续对拉丁美洲进行掠夺”。波诺马廖夫断言，所有这些矛盾“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客观上来说多少带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倾向的、强大的群众运动”。

其次，根据波诺马廖夫的观点，“长期以来”拉丁美洲已发展了一支“颇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有共产党，同时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很强大并且有影响”。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在拉丁美洲劳工运动中根子不深，影响不大”。

第三，“拉丁美洲革命的解放运动由于继承了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的斗争时期的传统，所以在拉丁美洲影响很大”。这些传统不仅有利于个别国家里不断发展的革命活动，也有利于为实现古巴和智利这样的革命事业而使整个拉丁美洲团结起来。^①

虽然承认拉丁美洲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以争取实现“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斗争可以采取各种多样的形式，但古巴的模式却不被看作是重要的实例，相反，苏联分析家竟把“进步”力量和民族主义改良派的军人政权结成的广泛的民众联盟看成是“最为有效”的一种形式。^② 不过也承认通过

① 波诺马廖夫，前引文，第59页。

② V·特卡钦科：“拉丁美洲解放斗争诸问题”，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2年5月5日（第5期），第10页。

民主选举的方式使左派联盟掌握了政权（如同智利的情况那样），是“极为少见的”。

莫斯科承认，由于拉丁美洲共产党力量较弱，如果不同其他“进步”力量和党派结成联盟，企图一举夺取政权，或则赢得重大影响，那是极不可能的。因此，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和苏联都声称，他们愿意同其他党派“合作并对这些党派的代表给予支持”，“只要这些党派掌握政权并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各种改革措施”。^① 这些联盟的性质及其活动的重点，大概将随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

类似这样的联盟都是以民族主义而不是以直接革命作为目的的，他们还坚持认为苏联和亲苏共产党提出的通过和平道路取得政权的原则是有效的。要推翻现今“反对帝国主义的”或则“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府，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这种教条理论给公开亲苏的共产党势力在国内树立了崇高的地位，特别同激进的左派政党的地位和纲领一对照，更是如此；这种崇高的地位还促使苏联直接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不遗余力地扩大它同该国政府的联系。

然而，莫斯科面临着来自左派的攻击，首先来自中国人，接着是古巴人的攻击。莫斯科一直谨慎小心地重申：从实质上来讲并不是反对暴力，选择革命战略和战术需要根据当时存在的具体形势，并且必须按照每一个具体情况来确定的。一

^① 库达奇金，前引文，第6页。同时见拉丁美洲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讨论会专题文章“拉丁美洲：意识形态战线”，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2年4月（第4期），第45—62页；豪尔赫·德尔·普拉多：“革命在继续”，原载同上杂志，1973年1月（第1期），第65页。

一切都依资产阶级和反动力量作出反抗的程度为转移。这样一来,据说各种民主组织机构就可当作一种“武器”和一个“革命的桥头堡”来使用^①,尊重“法制”也未必成为一种“迷信”^②,而且,即使“进步”政权在通过民主选举后上了台,那里的共产党还得通过国会和“国会外”的方式,为本国社会政治改造更加“深入”而准备进行斗争。

一般说来,苏联领导仍然公开地承担对武装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给予支持的义务。例如,柯西金总理在1972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议后不久发表的讲话中宣言,美苏关系中的“和平共处”,“决不意味着各国人民将放弃拿起武器来反对侵略,或者为摆脱外国压迫而进行斗争的权利”,并且答应苏联将“源源不断地”给“已经奋起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以援助。^③

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于1973年9月11日声称,“我们可不许‘禁止’内战或者民族解放战争”亦即起义。^④根据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的说法,智利阿连德垮台的教训之一,就是:“当时应准备立即改变斗争形式(采取和平的和非和平的斗争形式),并善于用革命的暴力来击退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

① I·N·佐里纳:“人民的团结和资产阶级民主”,原载《拉丁美洲》,1972年3—4月(第2期),第42页。

② V·特卡钦科:“智利的教训”,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4年11月(第11期),第135页。

③ 《真理报》,1972年7月4日。

④ A·鲍文:“和平与社会进步”,原载《消息报》1973年9月11日。同时见“世界爱好和平力量莫斯科会议决议”,原载《真理报》1973年11月3日。

力。这两点具有极大的重要性。”^①再说，苏联分析家一面把激进左派坚信革命暴力是夺取政权的唯一可靠的方法称之为“冒险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一面却承认在“反革命力量”阻碍“革命的创造性任务得以实现”的地方，这样的暴力还是必要的；而且，“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人感到：通过武装斗争，反人民的寡头统治将被工人推翻”，就象这样取得政权的道路，将是“最有可能的一条道路”^②。诚然，许多共产党代言人就危地马拉、海地、尼加拉瓜、巴拉圭这类国家，最近还加上智利和乌拉圭的情况为例，都提到有必要用革命的暴力去推翻反革命政权。可是，莫斯科并不公开鼓吹在巴西举行武装斗争，也许是因为在目前进行武装斗争不仅毫无希望，而且还会干扰它为了同军人统治政权扩大联系所作出的努力。而且，一个“进步”政权被推翻了，并不妨碍苏联在国家关系方面同该国保守的或“反动的”继承者打交道，这种情况可以古拉特政府垮台后的巴西，托雷斯将军被推翻后的玻利维亚，或者在1973年军事政变后的乌拉圭为例，表现得极为明显。不过，就智利来说，由于苏联以前对阿连德政权作出过承诺，智利共产党受到残酷的镇压，以及该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的被捕，苏联就没法同智利军人政权取得和解。

① B·N·波诺马廖夫：“世界形势与革命进程”，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6月（第6期），第10页。

② 佐里纳，前引文，第43页；I·雷巴尔金：“智利的经验：革命进程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原载《共产党人》，1972年5月（第8期），第121页；V·季赫迈涅夫：“列宁主义与拉丁美洲革命进程”，原载《共产党人》，1971年2月（第3期），第117页；“拉丁美洲：意识形态战线”，原载前引杂志，第50、54页；“乌拉圭共产党人的勇敢”，原载《在国外》，1974年12月（第49期），第7页。

莫斯科在估计拉丁美洲总的形势及其前景时，预见到拉丁美洲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进程中会有此起彼伏的现象。继胜利（比如古巴建立了卡斯特罗政权）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六十年代的种种挫折。美国有迹象表明公开干涉拉丁美洲国家内政的能力已大为收敛，并且“愈来愈被迫处于守势”；但苏联分析家却认为这一情况不能说明华盛顿对拉丁美洲的兴趣减少了，而是美国已变换了手法，因为过去美国力图维持它在南半球的地位和利益所使用的手法是比较间接，而且并不那么公开。苏联分析家告诫说，美国对拉丁美洲表现冷淡，这是虚假的表面现象，因为拉丁美洲“仍然是美帝国主义利益集中的主要地区之一”，因此美国“总是睁大眼睛盯着它”。^① 现今苏联的看法是：尽管在玻利维亚、乌拉圭和智利遭到了挫折，拉丁美洲的反帝潮流是“无法逆转的”，而且事实上已重整旗鼓，在继续发展中。按照苏联的观点即使象智利阿连德政权垮台这样最严重的挫折，也并不意味着拉丁美洲就没有革命的前景了。比如，《共产党人》1974年1月号上，就有一篇文章继续坚持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尽管出现个别的失利、挫折和低落现象”，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②。同样，另一个苏联分析家，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报1974年7月那一期上撰文提醒读者时写道，1967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死后只有一年便“开始了拉丁美洲的第二个革命高

① S·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为争取‘第二个解放者’而斗争”，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2年11月（第11期），第38页。

② A·特列佩托夫：“拉丁美洲：革命进程和武装力量”，原载《共产党人》，1974年1月（第2期），第125页。

潮”。他接下去断言：“毫无疑问，七十年代拉丁美洲将出现一个革命的新时代。”^①

苏联之所以继续持乐观主义态度，是由于以下三种重大事态发展的结果：(1)莫斯科同古巴的争执已得到解决，莫斯科在古巴的地位得到巩固，卡斯特罗日益被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所承认；(2)“进步”军人政权(秘鲁、巴拿马，以及最近列入苏联名单的厄瓜多尔和洪都拉斯)的兴起和继续发展；(3)某些国家“民主派获胜”和反美活动，包括当地共产党参加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在这方面，阿连德政权尽管已被推翻，但它至今还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个政权幸存过三年，而且从它给未来提供的教训来说，意义就更为深长了。

^① 麦丹尼克，前引文，第62页。

第二章

古巴的新阶段

苏联对它在拉丁美洲的前景增强了信心，其突出表现就是在过去五年内，苏古关系出现了一个新阶段。十年的激烈分歧已按照苏联提出的条件得到了解决，结果是苏联对古巴的控制更紧了，并对古巴政权的命运承担了更大的义务。莫斯科所作出的新的努力，表明了苏联的如下估计：即一个共产党政权就这样在古巴呆下去了；美国得准备不仅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而且还得承认古巴和苏联的这种关系。莫斯科进一步加强控制古巴，企图永远立足在拉丁美洲。

苏联相当谨慎地进入了古巴。莫斯科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承认是迟缓的。苏联最初作出教条式阐述的重点，是卡斯特罗的反美斗争，而不是他的国内措施，也不是他的意识形态的凭证。卡斯特罗同美国疏远，正好与美苏关系冷淡同时发生的，由于他迅速疏远美国，使苏联这方面加快了介入的步伐。1960年2月米高扬的古巴之行，标志着古巴经济开始大幅度地从美国转向苏联。接着就是：苏古恢复外交关系；卡斯特罗同美国决裂；苏古开始建立军事上的联系；卡斯特罗宣布他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后升级到1962年的导弹危机。

这次导弹危机已成为莫斯科想从它同古巴的新关系中攫取全球性军事利益的这一尝试的顶点。苏联失败后就集中力

量来维护卡斯特罗政权，并从它对拉丁美洲的地区性影响中获得好处。但是，莫斯科同卡斯特罗的不稳定关系，已使它无法获取这些好处。十年来苏古关系充满许多误会和互不信任。卡斯特罗在意识形态上的暧昧立场和非正统的革命学说，他坚持要古巴共产党服从他个人的领导，他竭力要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而不受苏联摆布，他企图以拉丁美洲革命运动领袖自居，他的自以为是的经济规划，随心所欲的经营管理方式，他滥用苏联和古巴的物力财力，以及企图破坏苏美关系，——在莫斯科看来，所有这些都使他成为一个难以相处的、无法预料的伙伴，一个经常给苏联政策制造麻烦的根源。从卡斯特罗这方面来说，原来指望苏联会不附带条件地向他的革命无限制地提供无偿的援助的，这时他已经感到失望了；对于莫斯科不愿支持在拉丁美洲采取具有非常好斗的革命策略，他也感到失望。再者，莫斯科在导弹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已使他更加忧心忡忡，即美苏有可能达成一笔交易，为了苏联政策的更大目标，很可能牺牲他的利益。在这次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在按照美国的要求作出有关涉及古巴主权问题的让步时，卡斯特罗是被排除在美苏谈判之外的。^①

十年来，莫斯科谋求同卡斯特罗和解，但这种和解总是短暂的。最后，卡斯特罗已没有玩弄政治花招的余地，只好根据

^① 见 J·苏奇利基编：《古巴、卡斯特罗与革命》（佛罗里达，科拉尔盖布尔斯：迈阿密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E·冈萨雷斯：《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74年版）；D·B·杰克逊：《卡斯特罗、克里姆林宫及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1969年版）；A·苏亚雷斯：《古巴：卡斯特罗主义与共产主义》（坎布里奇，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出版社，1967年版）。

苏联提出的条件同莫斯科言归于好。他一次又一次地被事态的发展或苏联的压力所逼迫，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立场。头十年里，他设法使自己的让步同苏联的让步保持平衡，或者同他在另外一些领域里还有的独立性保持平衡（虽然某一时候他在一些领域作出过让步）。在1963年到1964年间，他在中苏争吵中不再袖手旁观而去支持苏联。但是，他在中国问题上满足了莫斯科以后，就大力推进古巴关于拉丁美洲革命的学说。这时他才发现这个大陆上一些正统的共产党既不愿意接受他的领导，也不愿容忍他的革命的游击战策略。1967年切·格瓦拉死后，卡斯特罗不再努力去扶植那些对他而不对苏联感恩的拉美革命政权，这样就使自己十分孤立并且愈来愈容易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因此，他支持苏联在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虽然这种支持是有保留的。在1969年6月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古巴代表团团长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发言时承认，苏古关系显然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分歧，而且在某些场合已呈尖锐化”，但是，他坚称：“古巴将站在苏联一边，这是不可改变的。”^①不过，古巴人拒绝在苏联主办的这次会议决议上签字。此外，他们还不顾苏联的劝告，在争取1970年产糖一千万吨而开展的一个运动时宣布，在国内重新强调精神鼓励，而不是强调物质刺激。卡斯特罗希望借此解决他的一些经济问题，并重新改善古巴的社会主义形象。古巴这个唯一的政党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改组以后，接着两次（在1962年和1968年）清洗了老资格的共产

① 拉丁美洲通讯社1969年6月12日哈瓦那电。

党人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

1970年未能获得一千万吨糖的收获，这标志了卡斯特罗对莫斯科闹独立的政治姿态的努力已告结束。这样一来，卡斯特罗不仅大失威望，而且由此造成的经济失调正好有力地说明：古巴应依赖苏联的援助以及有必要进行合理的经济计划与管理。于是，卡斯特罗在早先使他同苏联人发生冲突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也只好跟着苏联亦步亦趋。到了1972年，勃列日涅夫感到这时苏联能定调子了，于是就古巴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明确地位这个问题讲了话，他的这次讲话超出了苏联先前所发表的一切有关声明的范围。1972年6月，当卡斯特罗于八年中首次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宣称：

社会主义的古巴并不孤立，它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强大的组成部分。捍卫古巴的国际地位，以及古巴的利益和安全的，不仅有古巴共产党的坚定的政策和古巴革命人民的英雄主义，而且有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的支持和政治力量。

勃列日涅夫为了强调这并不是寻常的表态，接着又说：

这一点我们以前曾声明过多次，现在再次以完全负责的态度予以重申。^①

两个星期以后，古巴被正式接纳进入华沙条约军事联盟

^① 《真理报》，1972年6月28日。

在经济上的对等物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这是吸收一个在地理上同苏联集团不接壤的共产党国家的头一个例子。六个月以后,即在1972年12月,勃列日涅夫和卡斯特罗签订了五项基本经济协定,使苏古关系置于一个长远的固定基础之上。1974年1月,勃列日涅夫进行了苏联党的首脑对拉丁美洲的首次访问,并最后批准了古巴整个国内外政策。

为了使这些发展和它们所包含的义务有可能实现,苏联已在好几个方面进行工作,以保证古巴的政策会同它自己的政策密切地配合起来。首先,在苏联对缓和的看法和定义方面,苏联取得了卡斯特罗的默认。其次,苏联(以及事态的发展)诱使卡斯特罗调整了他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以便使之不那么可能引起美国对古巴采取报复行动,也不那么可能使这个大陆上亲莫斯科的拉丁美洲共产党感到为难。最后,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目的,即苏联一面使卡斯特罗集中力量整顿自己的家园,一面设法使他不再在国际上瞎胡闹,就象过去那样同苏联的政策和利益发生冲突。

莫斯科为了使它同卡斯特罗的和解不致象过去那样失灵,已加紧努力来保证卡斯特罗循规蹈矩。莫斯科向古巴经济成就押的赌注增加了,而且作为交换代价,已从卡斯特罗那里索取到更大的经济控制权和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统观念。勃列日涅夫在哈瓦那的讲话中以显然满意的心情特别提到,现在“〔古巴的〕党、国家和经济发展,在一个久经锻炼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正满怀信心地展开着。”^①古巴人也认识到,作为

^① 《真理报》,1974年1月31日。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还必须具备其他条件，即不仅在观点上，而且在结构和实践上都必须向莫斯科和正统的共产党看齐。这一切都要求苏联和古巴调整党的路线和学说，以便充分利用这种新的关系。由于在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的各种会议上，卡斯特罗日益成为苏联政策和立场的代言人，苏古关系出现了一种协调的形象。

共处与革命的问题

卡斯特罗在古巴掌权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他看来，他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保住他的政权，而其关键在于苏联和美国之间要长期存在对抗。因而，在卡斯特罗统治的头十年里，古巴迸发出来的革命热情，部分是要使苏联谋求同美国和解所作的努力遇到麻烦。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和其他古巴领导人一直坚持优先考虑的重点是“反帝”斗争，而不是“演变为调和的立场”，亦即在苏联同美国和拉丁美洲非共产党政权的关系中实现缓和。再说，卡斯特罗赞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他坚持各国共产党应全面支持越南事业的主张，都被用来作为理论根据，说明苏联即便冒着同美国作战的危险，也应坚决地承担起保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义务。卡斯特罗的样板是北朝鲜和北越，而不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这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好斗的共产党国家有权受到苏联的保护和支持，但又可以自由地推行它们的好斗的政策，而苏联方面却要使自己的利益服从于推进旨在“打败和消灭帝国主义”的全球性革命这一进程。

在莫斯科和哈瓦那较早的妥协中，后者仅仅在口头上同意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另一方面却坚决主张优先考虑“被压迫人民”诉诸武装斗争以及向美国“帝国主义”进行全面斗争的权利。但是，对于古巴同苏联在政策上进行密切合作，近年来，卡斯特罗有了不同的看法。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6月所作的关于古巴是苏联阵营的组成部分的这个声明，以及他认为世界革命变革是“不可逆转的”，并受到“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威力的保证的这一论断，都是向卡斯特罗提供了显然他过去从未得到过的更大保证；即美苏是不会牺牲他来做交易的，苏联将对共产党古巴的生存和发展积极承担义务。因此，在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的前夕宣布卡斯特罗的苏联之行，同时苏联广播又以相当大的注意力来报道美洲国家组织不准同古巴贸易和建交的禁令即将失败的消息，就都不是偶然的巧合了。

然而，1972年6月卡斯特罗对苏联的访问和1974年勃列日涅夫的回访，两者的对比表明卡斯特罗倒向苏联的观点是相当勉强的。勃列日涅夫在卡斯特罗访苏期间所作的一次关键性讲话中宣称，苏美最高级会谈“反映了世界的现状”，并且符合“所有国家的”人民的利益。勃列日涅夫一面强调和平共处这一主题，一面又向卡斯特罗保证这决不意味着有“削弱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①卡斯特罗特别挑出这一段话来表示赞同，不过他接着又说帝国主义“只有在它走投无路时”才

^① 《真理报》，1972年6月28日。

会交出它的阵地，“可是一有可能它就要试着进行打击”^①。柯西金在1972年7月3日为卡斯特罗举行的招待会上宣称，共处政策的“出发点是不容许用武力来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否认各国人民有手执武器反抗侵略或争取摆脱外国控制的权利”^②。在最后的联合公报中，古巴人赞扬了苏联外交政策“有原则性”，说苏联已“把为实现共处原则的斗争同坚决回击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侵略阴谋结合起来”。公报说，国际形势的特点是“革命进程进一步深化，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革命和反帝力量的变化”，还提到了在古巴国内提高“反帝觉悟”的重要性。^③

在勃列日涅夫1974年访问古巴期间以及随后所发表的一些讲话和声明，说明卡斯特罗在这个问题上已走了有多远。卡斯特罗在1974年1月29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宣称，“我们的党和人民坚决支持你们”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停止军备竞赛”所作的斗争。他说，资本主义世界的混乱“使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纲领和你自己为国际缓和所作的坚决努力显得特别重要”。^④而在1972年，卡斯特罗是回避提到这个“和平纲领”的。就在同一次的群众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一面重申“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一面大谈特谈缓和的成就。^⑤

① 《真理报》，1972年6月28日。

② 《真理报》，1972年7月4日。

③ 《真理报》，1972年7月6日。

④ 哈瓦那电台，1974年1月29日。

⑤ 《真理报》，1974年1月30日。

在勃列日涅夫结束对哈瓦那的访问时所发表的那个联合声明，就是仿效他关于缓和的提法的。声明欢迎这个“事实”：由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国际形势已从冷战转为缓和，进一步表明国际关系要建立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之上”。据说古巴人强调了“成功地贯彻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和平纲领”的“伟大的国际意义”。这个声明在高潮性的结尾中声明：

苏联共产党与古巴共产党，苏联与古巴共和国决心同其他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一起，为争取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并使之不可逆转而共同努力。缓和应该通过发展各国之间和平互利合作等具体措施来加以巩固，这才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①

同时，这个声明断言，“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侵略势力和反动势力仍在世界上进行活动”，而且，这些势力正在“反对国际缓和”。尤其是，在美国，反对缓和的人据说正在竭力破坏苏美关系正常化，而“这种正常化是消除战争危险和发展各国之间和平平等合作的整个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1974年的声明不同于1972年的文件，没有点名谴责美国。

必须解决的下一个问题，以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就是以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为重点。苏联的政策曾特别试图说服卡斯特罗同意苏联关于拉丁美洲革命的观点，从而使卡斯特罗有可能同这个大陆正统的共产党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并

^① 《真理报》，1974年2月5日。

使之同莫斯科对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所作的努力比较服帖地协调起来。不仅如此，莫斯科还要把古巴的行动纳入那些活动方式中去，这些方式将会减少美古冲突的机会，从而减少美苏冲突的可能性。

各种事态都是为了莫斯科凑合在一起了。格瓦拉之死和其他游击战在拉丁美洲的失败，使古巴样板极不可能在该地区有重现的机会。阿连德的胜利表明可以有另一种更接近于苏联的处方的样板——即自从阿连德垮台以来莫斯科还没有予以否认的一条道路。拉丁美洲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给古巴和苏联都提供了新的机会。

卡斯特罗从未放弃他先前的革命理论。他只不过是不再谈论这些理论，并表示他正在用通向革命的其他道路可能也行的看法加以补充。因此，1970年他在纪念列宁诞辰日的讲话中宣称，革命成功的“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方式正在诞生”^①。或者就象三年后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接见智利《今日报》记者时所说的：切·格瓦拉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一切革命进程都必需通过象切所提倡的那种游击战来完成的”。当他被问到古巴是拉丁美洲社会主义的陈列柜还是触发器时，多尔蒂科斯仅仅回答说，只有通过“它的革命意志的榜样”才能起到这种作用。^②

当古巴人不再教条式地谈论拉丁美洲正在到来的一些革命的性质和以古巴革命为代表的样板时，苏联的理论家们就说原来的古巴接管实际上是传统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另一变

① 哈瓦那电台，1970年4月23日。

②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3年6月7日电。

种，借以贬低古巴的形象。比如，《共产党人》1974年1月号上有一篇文章就说过，卡斯特罗的革命驳倒了卡斯特罗主义。^①据这篇文章讲，卡斯特罗并没有造成一派革命形势，而是激发了一个“早已在发展的过程”罢了。作者一面承认正统的共产主义的人民社会党没有起到列宁主义所规定的作用，一面又说这是由于该党深受巴蒂斯塔政府迫害，才使卡斯特罗及其运动得以发挥带头作用。但是，作者又说，古巴确实是于1961年，“在人民社会党最积极的参与下”，亦即卡斯特罗把人民社会党合并过来时，进入社会主义的。作者还使用了种种论点来“证明”，是工人阶级领导了这场革命，从而缩小了卡斯特罗的游击队的作用。

拉丁美洲的各式各样游击活动的失败，也使卡斯特罗改变了他对现存各国政府的态度。几年前，他严厉地指责苏联同一些拉丁美洲政府建立关系。^②然而，在1969年和1970年，他不仅宣称准备同那些对美国采取独立姿态的政府建立关系，而且认为这样一些政府可以走它们自己独特的通向革命的道路。因而，他在1970年纪念列宁诞辰日的讲话中说：

谈到对革命运动的支持时，我们必需说明这不一定是专对游击运动而言。它可以是指支持任何一个政府，只要这个政府真心实意地采取一种发展经济和社会的政策，并力求本国从美帝国主

^① O·吉洪诺夫：“古巴革命经验的某些方面”，原载《共产党人》，1974年1月（第2期），第95—106页。

^② 例如，哈瓦那电台1967年8月10日广播，转引自苏奇利基前引书，第151页。

义枷锁下解放出来。不管这个政府是怎么取得政权的，古巴都将支持它。^①

在当时和以后卡斯特罗想到的是那些左派军人政权，诸如秘鲁、巴拿马的军人政权，还曾一度想到玻利维亚。他还给阿根廷的庇隆政权表示类似的祝愿。在1972年厄瓜多尔被军人接管后，他有时也在那个国家看到过有这样的可能性。

阿连德在智利的胜利，已成为古巴政策中发生的所有这些变化的一个焦点。卡斯特罗甚至在1970年智利大选以前，就曾宣称，“通过投票选举有可能到达社会主义”。^② 1971年底卡斯特罗在访问智利期间改变了他以前对武装斗争的立场。他在指出1960年和1961年^③的那两个哈瓦那宣言强调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时宣称：“当时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能这样来谈及或考虑智利或乌拉圭的问题，不可能援引那些确属少数罕见的例子”。^④ 他说每一场革命都是不同的，但是，他接着用一种更加正统的调子说，在古巴和智利，“工人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

阿连德的胜利，促使卡斯特罗富于戏剧性地改善了同拉丁美洲各正统共产党的关系。这些党在1971年派往哈瓦那的代表团还是寥若涓滴，但此后则是川流不息了。1972年，阿

① 哈瓦那电台，1970年4月29日。

② 冈萨雷斯：“苏联和古巴对拉丁美洲态度的对比”，原载《对比较共产主义的研究》，1972年春。

③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发表于1962年2月。——译者

④ 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对智利工人统一工会理事会的讲话，拉丁美洲通讯社1971年11月25日电。

根廷、厄瓜多尔、乌拉圭、智利、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共产党首脑都来过古巴。1973年和1974年访问古巴的各国共产党首脑，就有乌拉圭、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联合王国、秘鲁、巴拿马、阿根廷、西班牙和葡萄牙。十五个拉丁美洲的党派出重要代表团去哈瓦那参加1972年7月26日庆祝活动。这些党和其他一些党的许多级别较低的代表团也访问了古巴。

1973年11月委内瑞拉共产党吉列尔莫·加西亚·庞塞和佩德罗·奥尔特加两党员的那次古巴之行，是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访问古巴活动之一。在古巴革命活动高涨的美好日子里，卡斯特罗同委内瑞拉党的争吵，曾经成为他力图制定拉丁美洲的革命策略的一个焦点。1973年的那次访问，据说就是两党达成一项协议的结果。委内瑞拉人受到了卡斯特罗和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布拉斯·罗加的接见，据报道，他们正式拜会了政治局委员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和中央委员会委员曼努埃尔·皮涅罗，当时他们讨论了“拉丁美洲的形势等问题，其中包括”两党“今后关系的发展问题”。^①古巴对这个代表团所作的报道相当少，这意味着情况复杂。1974年5月，当加西亚·庞塞（还有另外四人）暂停委内瑞拉共产党政治局内的职务时，情况就更复杂了。主要的问题是有关委内瑞拉大选的政策，但是，这个起诉书还追溯到有关武装斗争的争论，并且指控加西亚·庞塞未经领导正式批准曾到“别的国家”旅行。^②人们不禁怀疑卡斯特罗莫非又在共产党里浑水摸鱼了。

① 哈瓦那国内电视，1973年11月9日。

②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4年5月6日电。

阿连德政权同古巴复交，进一步推动了莫斯科早就认为值得向往的一种进程，即结束古巴在外交和经济上的孤立。实际上，卡斯特罗早已越出了他在1970年纪念列宁诞辰日的那次讲话中所作的教条式的创见，那次讲话表明他会有选择地决定古巴同谁建立关系。其实，他一向乐意同任何愿意与他建立关系的人建立关系。可以想象他会说，这种乐意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进步的反美步骤。1972年，有十二个国家同古巴建立了关系；五个在拉丁美洲，五个在非洲，一个在中东，一个在亚洲。1974年，有一个近东国家和另外八个非洲国家同古巴建立了关系。

对于哈瓦那和莫斯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在拉丁美洲得到承认。当智利的弗雷政权在阿连德之前，于1970年2月宣布同古巴重新建立经济联系时，由美国发起的对古巴的经济禁运早已开始中断了。古巴同智利（1970年9月）、秘鲁（1972年7月）、阿根廷（1973年5月）、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巴多斯、圭亚那（1972年12月）分别恢复外交关系，全都博得莫斯科的大声喝采。美洲国家组织从1970年以来关于同古巴恢复经济和外交联系的一些建议也是如此。1974年8月，巴拿马宣布它正在同古巴恢复关系。1975年1月委内瑞拉紧紧跟上，而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看来也将这样做。

苏联对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每一个进展都发表了评论，指出美国又遭到了失败。这种做法不仅对苏联的全球利益有好处，而且也向卡斯特罗表明，除了鼓励革命以外还有别的办法来打击美国。正如许多苏联评论所指出的，正在拉丁美洲兴

起的民族主义使许多国家在他们对古巴的政策中看到了一条坚持独立,摆脱美国羁绊的途径。在苏联看来,古巴的孤立一结束,这意味着美国提出的任何敌视古巴的行动都可能导致美国同拉丁美洲的一些重要政府发生对抗,这样就使美国的行动自由进一步受到约束。

从以民族解放为中心到以国与国的关系为中心的这个转变,反映在1972年和1974年卡斯特罗和勃列日涅夫互访时发表的文件中的提法就有所不同。1972年的公报用了更多篇幅谈到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当地反动势力的斗争”。1974年强调的则是诸如拉丁美洲国家和集团国家之间加强联系的重要性,以及对智利事态发展的抗议等问题。最后这一点也许就是这两个文件中不同点的关键所在。在1972年,苏联和卡斯特罗都看到了左派更有希望在拉丁美洲即将获得好处。但是,阿连德的垮台给政治气候带来了变化。

阿连德政权在它执政期间给予苏古关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尽管智利共产党攫取政权的途径得到苏联赞同,但是,莫斯科却一面把智利作为拉丁美洲革命的主要样板来加以利用,一面又怀疑智利能否存在下去,又不愿把它在理论上列入古巴一类,莫斯科总是在上述两者之间动摇不定的。在阿连德政权存在期间,古巴和智利各被认为是对方的支柱。各方都提防对方在拉丁美洲被孤立,而且两方都被看作是使拉丁美洲更为激进化的动力。

与此同时,有迹象表明两者竞相争取苏联的支持。1971年国际共产主义阵线组织开始在哈瓦那首次集会;在随后的两年中,这种集会中断了,而在圣地亚哥却举行了好几次这样

的会议。虽然卡斯特罗在1971年访问智利期间曾对苏联的援助大唱赞歌,但是,他是否指这种援助,特别是在牺牲他的情况下化为苏联在智利的行动,却是值得怀疑的。然而,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对卡斯特罗来说很可能形成另一种压力,迫使他在1972年作出必要的让步来取得有保证的苏联的援助。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72年卡斯特罗非洲、东欧之行以后所通过的决议,尽管没有具体地提到智利,还是反映出哈瓦那对于争夺苏联援助是极度敏感的:

……中央委员会热烈赞同第一书记的如下论点,即以前受新老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为了国家的发展而得到的协作和援助,如果有选择地优先考虑到那些正在真正进行革命变革的国家的话,那么效果就会更好。

那些正处在解放自己的过程中的国家,在革命中并没有从道义上取得社会主义国家和他们的兄弟们给予协作的权利。他们要以革命实践表明自己完全有决心行使他们的权利,来收回本国的财富和资源,使之为本国人民服务,防止倒退到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并推进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这个过程,只有做到这样,他们才有权要求给予协作和援助。^①

卡斯特罗争辩说,智利变革的深度还没有确定的结果,这是可以理解的。紧接着阿连德访问苏联之后,苏联和古巴于1972年12月23日签订了苏古基本经济协定,这很可能不是一次偶然的巧合。这些协定如果签订在先,那么就会同苏联

^① 哈瓦那电台,1972年7月20日。

与阿连德签订的那个较有节制的经济协定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协定之签订在后就表明，卡斯特罗因向苏联的要求让步而获得的报偿是不会有变化的。

军事关系

卡斯特罗政权的头十年，他同苏联关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一直是确保古巴安全、使之不被美国可能或明或暗地颠覆掉的这个问题。开始时，卡斯特罗不仅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来建立他的武装力量，而且还要求苏联正式承担在美国采取敌对行动时保卫古巴的义务。尽管赫鲁晓夫在1960年年中曾威胁说苏联可以使用它的战略导弹来保卫古巴使之免受美国袭击^①，但在1962年的导弹危机期间，苏联在美国压力下的退缩，表明苏联在军事上处于相对劣势，使人对它保卫古巴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1963年，苏联领导试图消除卡斯特罗对这一问题的疑虑，保证万一美国袭击古巴，“苏联将出现在那些前来支援者的最前列”^②，但是，无论赫鲁晓夫也好，他的继承者也好，不管卡斯特罗向他们施加压力，都一直不同意同古巴订立就象苏联同东欧共产党国家所签订的那样正式的双边防务条约。很清楚，只要莫斯科对卡斯特罗的行动还没有牢

① 《真理报》，1960年7月10日和21日。

② 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声明，原载《真理报》，1963年2月23日；卡斯特罗访问莫斯科的联合公报，原载《真理报》，1963年5月23日；L·古雷和J·魏因克尔合著：“苏联—古巴关系：发展中的一体化”，转引自苏奇利基前引书《古巴、卡斯特罗与革命》，第180—183页。

牢控制住的话，苏联是不愿意送给他一张“空白支票”，使他也或许能借此把苏联拖入同美国进行危险的对抗中去；而迟迟不作出这一许诺，克里姆林宫就能够把卡斯特罗拴住，使他不能从事那种可能引起美国报复的活动。卡斯特罗在1968年8月赞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那篇讲话中，生动地表现出他对万一美国发动袭击时，苏联能否前来支援这一点是有疑问的。他在那篇讲话里问道：“如果美国佬帝国主义者袭击我们的国家，或者甚至一旦威胁着要袭击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国家提出请求的话，他们会不会派遣华沙条约的几个师到古巴来呢？”^①

然而，就苏联给予军援的问题而言，苏联原来是比较乐于提供的。从1959年到1962年9月，莫斯科对这种援助竭力加以掩盖，也许深恐引起美国就象1954年在危地马拉那样的进行报复。但菲德尔的兄弟、古巴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后来还是断言：“从1959年到1970年，我们的武装部队同苏联军队有过最密切的联系。是他们最先帮助我们进行现代化的军事训练活动。是他们最先帮助我们武装部队组织起来，并给予发展和加以培养。”^②卡斯特罗在1970年4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声称，直到1969年止，苏联给予古巴的军事援助已达十五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无偿的。^③在随后的几年里，苏联另外给古巴提供的军事武器装备，累计总值在二十亿至三十亿美元之间，使古巴的武装部队成为拉丁美洲最强大

① 《格拉玛报》，1968年8月25日。

② 莫斯科电台，1970年5月8日。

③ 《格拉玛报》，1970年5月8日。

和配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1974年1月29日，正当勃列日涅夫访问哈瓦那期间，卡斯特罗在这一天的讲话中说：

现在，我们的祖国有了配备精良的武装部队，并且所使用的军事装备都是来自苏联的。尽管这些武器价格十分昂贵，但鉴于古巴的特殊的经济情况，那个伟大的国家还是无偿地给了我们。此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勇战斗中积累了无与伦比的作战经验的苏联专家们，他们向我们传授了军事技术知识，使我们人民所创造的革命部队，成为这个大陆上的一个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堡垒。^①

苏联给古巴的军事援助，并不总是包括最新、最尖端的武器，如同莫斯科被迫向它的阿拉伯仆从国所提供的武器那样，目的是使阿拉伯的军备相当于或优于以色列。不过，近年来古巴武装部队还是成为苏联军事装备的一个陈列柜，即使莫斯科在该地区竭力销售它的武器，愈来愈多的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代表团仍然都去古巴进行考察和估价。

大概由于古巴的好斗性减弱、美苏的缓和，以及苏联已在战略上同美国取得均势的结果，莫斯科和哈瓦那之间出现了一种与日俱增与愈益明显的军事关系。勃列日涅夫宣称古巴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古巴已在1972年进入经互会，这两件事暗示苏联的承诺已扩大了，之所以可能这样，是因为苏联估计到考验这一承诺的可能性正变得愈来愈

^① 莫斯科电台，1974年1月29日。

愈小了。尽管美国要求以解除古苏军事联系作为取消贸易禁运和美古复交的先决条件，美国对古苏军事关系确是表示愈来愈容忍了。而重要的是，近年来企图考验美国容忍程度的，不是卡斯特罗而是苏联自己。

这种大事张扬的军事关系，是在1969年苏联宣布苏联已经重新装备了古巴武装部队^①时开始出现的。接着便是1969年7月苏联海军舰队首次访问古巴，这不仅表明苏联已拥有为了支持盟国而将它的军事影响伸展到遥远的地区的新能力，而且后来还被《红星报》说成是“苏联和古巴两国武装部队之间的战斗团结的生动例证”。^②1969年11月，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访问了这个岛国，劳尔·卡斯特罗则于1970年4月和10月去莫斯科作了回访。卡斯特罗在1970年4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公开地藐视美国，说：

我们永远也不会断绝我们同苏联的政治联系，或者甚至断绝他们所谓的军事联系。恰恰相反！就我们来说，我们总是准备着加强我们同苏联的军事联系的。^③

当时，莫斯科继续试探美国的反应的方法，就是进一步派遣海军访问古巴，舰队中包括更为先进型号的潜水艇，借以逐步增加这些访问的重要性。显然是出于华盛顿对这些访问的反应消极，1970年9月到达的第三支舰队就包括了一艘潜水

① 《红星报》，1969年1月1日。

② 《红星报》，1969年12月2日。

③ 《格拉玛报》，1970年5月3日〔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艇的补给船和三艘驳船，给停泊在古巴西恩富戈斯港的核潜艇服务。到9月底，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苏联正在那里发展核潜艇的基地设施，导致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敏锐地进行交锋，其顶点是在10月13日苏联否认它正在古巴建造“它的”基地，并保证说苏联将继续遵守1962年同美国订立的协议，即禁止苏联把“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并引伸开来，就不能给载有导弹的潜水艇提供服务，以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①

这样，在确定了美国对苏联海军活动的容忍程度以后，莫斯科一面决心消除也许本来会酿成一场危险的对抗的情况，一面还保留着继续派遣它的海军舰队和远程侦察机访问古巴的权利。到1974年底，苏联舰队访问古巴已有十二次，从而使苏联海上力量的存在成为加勒比海上一个日益正常和持久的特点。

苏联从加强它在古巴的军事存在中获得了一些好处。它给卡斯特罗提供了保证，尽管还有一些限制。它加强了苏联在整个东西方关系中所拥有的威力这一形象。它加强了苏联有力量在拉丁美洲同美国进行抗衡的这种印象，并为苏联进入这个大陆的其他地区提供了物质力量。这种策略，对苏联来说，既可以加强它的军事存在，又可以证明它并没有给美国和拉丁美洲带来威胁。

所以，勃列日涅夫在他访问古巴期间，显然煞费苦心要使美国对苏联在古巴的意图不再存在疑虑。1974年1月29日，勃列日涅夫在哈瓦那的讲话中宣称，对于苏联来说，古巴

^① 详见苏奇利基，前引书，第185—186页。

“不是一个战略基地，或者一个所谓的势力范围”。后来他又说：

众所周知，苏联正在帮助古巴加强它的防卫力量。我们很了解，别人显然也很了解，古巴人手里的苏联武器不是用来进攻任何人的武器，不是用来恶化国际局势的手段。它们是为保卫你们国家的革命成果这一正义事业服务的，是为和平与安宁的事业服务的。^①

勃列日涅夫在他访问期间并没有表示苏联正在考虑同古巴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或让古巴参加华沙条约。可是，苏联愈是坚持古巴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并在加勒比海上保持海军的存在，愈是说明苏联对古巴承担着一项军事义务。卡斯特罗对苏联在西恩富戈斯建立海军设施无疑就是这样看待的。此外，东欧高级军事人员的访问古巴，即有迹象说明古巴与华沙条约之间的一种关系。例如，波兰空军首领和保加利亚国防部副部长于1973年3月访问了古巴，匈牙利国防部长于1974年4月来到古巴访问。在稍后的一个时候，人们可以设想古巴将以观察员身份出现于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也可能到某一个时候苏联将与古巴缔结一项友好条约，无异于苏联同印度或埃及所缔结的那种条约。

美古一旦复交，莫斯科可能采取这些步骤。尽管华盛顿

^① 《真理报》，1974年1月31日。

要求解除古苏军事联系，莫斯科在美洲国家组织为研究撤销该组织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制裁而举行的外长会议前夕，还是派遣了一支由五艘舰艇组成的舰队，包括两艘潜水艇，访问了古巴（1974年9月24日到29日）。看来这说明苏联是深信古巴在该半球日益增强的地位和美国对缓和所承担的义务。

莫斯科与美古关系

自从1973年2月美古签订了关于飞机劫持问题的条约以来，莫斯科突出地报道了美国国内要求政府改变对古巴的政策压力日增。从报道众议员麦克洛斯基和另外十一个共和党国会议员在1973年2月提出呼吁改变开始，苏联宣传工具报道了特别是在美国国会内“一些庄重的意见”，敦促对美国的政策进行重新估价，并同古巴关系正常化。

苏联在1973年和1974年的评论文章指出，这种压力就是对美苏缓和，以及对美国力图在经济上、外交上孤立古巴遭到挫败的一种反应。苏联关于飞机劫持问题协定最有权威的评论，就是《真理报》1973年2月1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平合作政策的成就，生动地说明了，不承认古巴的政策，对美国本身来说，是没有希望的，也是没有好处的。”^①另一篇发表在1973年6月号的苏联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某杂志的文章，谈到美国国内愈来愈认识到：

^① V·鲍勒沙科夫：“一项积极的改进”，原载《真理报》，1973年2月17日。

“在国际气候普遍得到改善的背景下，美国的不承认政策是荒谬的”。^①《真理报》1974年2月8日的一篇社论报道说：“美国国会内赞同美古关系正常化的态度正在强硬起来。”《消息报》1974年3月8日谈到“对于同古巴共和国建立关系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美国各界人士更加关心了”。^②

K·哈沙图罗夫在1973年3月15日的《消息报》上对促使美国作出重新估价这个原因进行了也许最全面的分析。^③首先，他承认力量对比已转变为不利于美国，共产主义在古巴已是不可逆转。因此，他就把赞成在“现实的”基础上与古巴建立关系的那些美国人的论点，说成是承认共产主义将在古巴呆下去了。这样，他说不仅是，古巴在苏联的支持下冲破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封锁”而得以幸存下来，而且“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这种不可逆转性也已普遍被人们所理解”。《真理报》在1974年2月3日就美国的“庄重的意见”所作的评论中把这一点讲得甚至更为明确：“这样，我们从我们思想意识的对立面的嘴里听到，他们实际上承认马克思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对一切国家与人民都有同样效力。”^④

美国作出重新估价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按哈沙图罗夫的看法，就是拉丁美洲不断发展的政治变化这个进程是有利于古巴的。苏联的宣传工具最直接抓到的证据，就是同古巴进

① Ju·V·罗曼佐夫：“美国与古巴：一次新对话的开端？”原载《美国：经济、政治、思想意识》，1973年6月（第6期），第59页。

② V·马特维叶夫：“明智的呼吁”，原载《消息报》，1974年3月8日。

③ K·哈沙图罗夫：“自食其果”，原载《消息报》，1974年3月15日。

④ S·维尔涅夫斯基：“国际评论”，原载《真理报》，1974年2月3日。

行贸易的国家正在增多的这张单子，以及秘鲁、阿根廷、阿连德领导下的智利、巴拿马和四个加勒比海国家同古巴都已经恢复了邦交。此外，还举出其他国家和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所表示的较为友好的态度，来证明这个同一论点。《红星报》在1974年8月31日断言说：“美国也不得不承认，古巴在拉丁美洲国家中的权威正在增强。”^①

有趣的是苏联的评论员们竭力否认古巴在对美关系的态度上有过任何变化。哈沙图罗夫宣称，“有人在华盛顿正试图散播谬论，说古巴的政策，特别对西半球范围的政策，本身已经有了改变”。他把这一点和二十年代初认为苏俄政策有了改变才承认苏俄的那些“荒谬”论点相比较。

莫斯科一直公开地鼓励并热情地赞扬拉丁美洲国家为同古巴恢复经济和外交关系所采取的一切行动，认为这些行动进一步表明了美国在这个西半球的影响和威望已经垮台。但苏联对古美复交问题公开采取的立场，虽然明显地表示了赞同，但总的说来调门还是比较低的。就后一问题来说，苏联无疑希望不要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苏联或古巴对此心情过切，苏联向哈瓦那施加过任何压力，以便同美国复交。再说，鉴于卡斯特罗有向美国提出强硬要求的迹象，苏联对美古复交谈判的结果很可能是没有把握的；而且，从华盛顿不愿同古巴打交道到拉丁美洲国家赞同取消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的制裁这一日益高涨的运动等事件中，莫斯科还取得了明显的宣传上的好处。

^① V·维诺格拉多夫：“古巴的权威正在提高”，原载《红星报》，1974年8月3日。

勃列日涅夫在访问哈瓦那期间，并没有公开提到美古复交的可能性，但是，他确实赞扬了苏联的缓和政策，他在结束访问时和卡斯特罗共同签署的那个联合声明，表明两国都赞成“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的基础上的国际关系”^①。那个声明还断言：苏联“高度”地赞赏了古巴为达到“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给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所制订的共同目标”而作出的贡献，苏联“坚决要求结束对社会主义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封锁以及其他敌对行动”。苏联的一些评论文章，以不那么正式的口吻，一面说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如有任何改变，都将是被迫作出的，一面还是赞扬了美国国内正在呼吁复交的那些代言人。《真理报》关于美古飞机劫持问题的协议所发表的那篇文章，题名就是“一项积极的改进”，论述美古关系的其他一些文章的题目，也都倾向于反映出一种类似积极的调子。《消息报》1974年3月8日题为“明智的呼吁”的那篇文章，在谈到古巴试图向在加拿大的一家美国子公司购买二十五台机车时，直截了当地断言，“发展互利、平等的贸易，是有利于促进相互之间的正常的政治关系，有利于使正在感到紧张的那些地区的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缓和”。这篇文章接下去谈到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是“一个彻底的时代错误”^②。苏联对1974年4月美洲国家组织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会议所写的一些评论文章，充分反映了拉丁美洲国家愈益要求检查古巴问题的愿望，以及美国报刊批评华盛顿拒不改变政策的有关评论。这些评论一面指出来自下面的对那项政策的压力正在

① 莫斯科电台，1974年2月4日。

② V·马特维叶夫：“明智的呼吁”，原载《消息报》，1974年3月8日。

增大，一面谨小慎微地避免预言这一压力会成功地改变尼克松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紧接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帕特·霍尔特访问古巴以后，七月间苏联的一些评论文章的调子就变得多少更为乐观了。莫斯科电台报道他承认“美国孤立古巴的政策已告失败”，并说就象“客观因素”给美苏关系带来变化那样，类似的因素使得美古关系的正常化已成为不可避免。^①苏联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权威性刊物《拉丁美洲》也指出：不管愿意不愿意，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正在改变之中，并声称美国通过准许美国在国外（如在阿根廷）的一些子公司向古巴销售产品的做法，正在修改自己的立场。^②这篇文章又断言，出席1974年2月特拉特洛尔科外长会议的一些拉丁美洲代表曾提出过一项建议（即邀请古巴参加定于1975年3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拉丁美洲外长会议），对于这项建议，国务卿基辛格虽然并没有表示反对，但文章也强调指出，他要求应对这一邀请作进一步的磋商，正在拖延时日。不管怎样，这篇文章宣称“谁都不能排除美国对古巴的外交关系的立场可能发生变化”，这一点是最明显的。

苏联关于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和克莱本·佩尔在1974年9月访问古巴的报道，虽然也是低调的，但重点突出了他们两人赞成改善美古关系的发言。《真理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对于过时的和违反时代精神的美国对古巴共和国的政

^① 莫斯科电台，1974年8月3日和9日。

^② A·M·阿尔森宁：“‘新对话’的两个回合”，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9月—10月（第5期），第21—23页。

策，最近在美国，人们愈来愈频繁地和持续地要求进行检查。”^①这篇文章还报道，根据美国报刊的看法，推动华盛顿检查它对古巴的政策的主要因素，是由于“拉丁美洲国家对美国的发号施令做法日益不满”。

苏联宣传工具仅仅提到福特总统在8月29日记者招待会上的那个声明，这个声明把美国政策上作出的任何改变同卡斯特罗作出相应的改变，及美洲国家组织采取的行动联系起来。1974年11月在厄瓜多尔基多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外长会议上提出了取消该组织对古巴的制裁问题时，从苏联评论中清楚地看出，不管这个决定怎么样，莫斯科总是得到好处的。就在这次会议前夕，有一个苏联评论员指出，要求作出这一改变的提议者能否得到必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尚在未定之天^②；但是，当赞成取消禁运的建议仅仅以两票之差不到必要的十四票时，苏联宣传工具却表示相当满意了。《真理报》事后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宣称这次投票是标志着古巴的对手失败的一个“里程碑”，并强调指出“拉丁美洲占压倒多数的国家已拒绝追随美国反对古巴的政策”。^③苏联在一次向拉丁美洲的广播中说，美国因为“害怕这个大陆反美情绪恶化起来”所以没有敢使用武力，而是“采取保持沉默的策略，这实质上就是对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愿望加以嘲弄的一种策略”。^④《真

① N·库尔季诺夫：“孤立政策的失败”，原载《真理报》，1974年9月30日。

② 莫斯科电台西班牙语广播，1974年11月5日。

③ V·利斯托夫：“封锁正在瓦解中”，原载《真理报》，1974年11月4日。

④ 莫斯科电台西班牙语广播，1974年11月14日。

理报》于11月17日引用了一些拉丁美洲外长在基多向苏联记者所发表的那些声明。这些声明要求美洲国家组织进行改组,并宣布古巴是基多会议的真正胜利者。^①看来莫斯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十二个投票赞成改变政策的国家,在投票后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预言十二个国家中至少有五个国家将同古巴恢复邦交,不管美洲国家组织继续采取反对古巴的行动。1975年初,一家专门研究美国事务的杂志上有一篇文章,着重地报道了美国刊物上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说取消美国的经济限制措施并同古巴商谈复交事宜,正“变得不可避免”了。^②

也许可以提一下,古巴实际上并没有理会基多会议的结果。古巴没有发表权威性的评论,一直到两星期以后卡斯特罗才把这个会议斥之为“没人注意”的玩意。卡斯特罗表示欢迎那些反对禁运的投票者,嘲弄那些赞成继续禁运的投票者,并且引人发笑地说美国之所以弃权,“只不过是还想当法利赛人^③和伪君子”^④罢了。关于基多会议对美古复交的可能性所产生的延误影响,莫斯科和哈瓦那都没有进行过评论。

在这乱七八糟的讨论中,很少谈到有关美国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讨论到是重新恢复“对话”还是实际上恢复邦

① V·利斯托夫和S·库德利亚夫斯基:“一次重要的胜利”,原载《真理报》,1974年11月17日。

② Iu·V·罗曼佐夫:“美国与古巴:对缓和的预测”,原载《美国:经济、政治、思想意识》,1975年1月(第1期),第66页。

③ 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基督教《圣经》中称他们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译者

④ 哈瓦那电台,1974年11月30日。

交的这个问题时，也许故意表示模棱两可。至于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先于还是后于恢复邦交，这一点从苏联人文章的阐述中也看不清楚。

有一篇发表于1973年6月的苏联人写的文章，把古巴要求的条件作了如下的叙述：

1960年初，当这些关系开始急剧恶化时——美方对此应受到谴责——，古巴政府已向美国建议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协商来解决有争执的问题。此后，古巴曾一再提出过类似的建议。然而，华盛顿却顽固地坚持敌视古巴的政策。这样就决定了哈瓦那现在所采取的立场，使对话政策能否实行，需由以下条件直接决定，即美国终止对古巴的封锁、颠覆和挑衅活动，并不再企图向古巴授意同谁保持关系，以及在拉丁美洲如何“行事”。^①

换言之，如果美国结束了封锁并完全放弃了它同古巴复交的条件，哈瓦那就会降格以求，与美国会谈两国关系问题。

近年来，古巴对这个问题的表态，远不是前后一致的。到1972年为止，卡斯特罗所提出的同美国复交的三项条件，一般说来，就是：取消贸易“封锁”作为举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国将关塔那摩归还古巴；以及停止对古巴的“颠覆”活动。1972年6月到7月，卡斯特罗在访问东欧各国期间宣称，对于美国要求古巴改变它同苏联的关系和它对世界革命运动的支持这些条件，他是“永远不会”同意的。他在1972年7月26

^① 罗曼佐夫：“美国与古巴：一次新对话的开端？”，原载《美国：经济、政治、思想意识》，1973年6月（第6期），第79页。

日发表的讲话中，给美古议事日程又加上了一项：“当他们决心和我们谈判时，古巴将不是谈判的主题；主题将是拉丁美洲”，因为“只要美国自以为有权在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只要美国自以为有权对拉丁美洲进行干预和颠覆的话，古美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①

在随后的这个时期里，古巴的发言人只是着重提到这些条件中的这一项或另一项，却不说明没有提到的那几项是值得注意的，还是权宜之计而已。例如，在1972年12月阿连德访问古巴期间，卡斯特罗只是提到结束贸易禁运。1973年3月25日，劳尔·罗亚加上了有关拉丁美洲和关塔那摩这些条件，但是没有提到颠覆问题。卡斯特罗在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宣称：“他们如要进行对话，首先必需无条件地结束封锁”，然后又说，“只要我们认真进行谈判的话，我们不会先谈古巴的问题，而是要把拉丁美洲的问题放在首位。”^②他否认这意味着古巴在关塔那摩问题上的立场已经软下来，他说“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古巴这一立场强硬起来了。”因为古巴要求美国改变它对整个拉丁美洲的态度，而不是仅仅改变对古巴的态度。

事情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1974年1月7日，古巴驻墨西哥大使对新闻记者说：“我们并没有向美国发起一场圣战。只要这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条件——即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我们就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③四天之后，紧接着外国

① 哈瓦那电台，1973年7月26日。

② 哈瓦那电台，1973年5月1日。

③ 《纽约时报》，1974年1月8日。

报刊进行推测之后，古巴外长重申古巴的立场：在美国取消禁运之前决不可能开始谈判，而且议事日程上首要的一项将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作用问题。他在声明时还肯定说，关塔那摩问题“必须作为两国之间双边对话的主要内容”，“古巴不会允许在讨论时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即侵犯我们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权利，以致我们不能在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推行它的政策，或者指导它的国际关系”，就是说，不可能讨论美国提出的有关复交的那些条件。^①

勃列日涅夫在访问古巴结束时所发表的苏古声明，尽管没有直接提到古巴同美国恢复邦交的问题，但还是重申了苏联支持古巴所提出的条件。苏联在这个声明里公开表示“坚决地”要求取消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的制裁，并宣称“它重申它认为古巴共和国提出的无条件地撤除在它境内的美国海军基地的要求是合法的、正义的，并且完全支持这一要求。”^②

莫斯科总的观点看来就是这样：尽管美古复交的确切时间不可能加以预测，但拉丁美洲事态的发展以及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将使它最终成为不可避免。当时，苏联方面的宣传竭力加以利用的，就是它所描绘的美国因为对古巴关系这个问题已在西半球日益孤立。与此同时，苏联方面的宣传通过指出这个事实以及据说其他西方国家从对古贸易所取得的经济利益，并且坚认美国如果继续敌视古巴将违反“时代精神”等手法，强烈要求对美国的立场进行检查。然而，进行谈判的具体条件，显然是由卡斯特罗拟定的，特别是由于后者似乎一

^① 《拉美新闻报》，1974年1月10日。

^② 莫斯科电台，1974年2月4日。

心要使这些谈判看作美国的一大挫败，从这些谈判中尽可能捞取在政治上、心理上和实际上的最大利益。西方有一些人认为美古恢复邦交就是一种机会，可以借此削弱哈瓦那与莫斯科的联系，并对卡斯特罗政权起到缓和作用，而苏联恰好相反，似乎并没有看到类似这样的风险。古巴之进入经互会以及勃列日涅夫的哈瓦那之行，都反映出苏联如下的这种估计，即：使古巴作为一个同苏联集团拴在一起的共产党国家而继续存在下去，就是最安稳的赌注。克里姆林宫大概认为，卡斯特罗并非出于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考虑，而是害怕冒这样的风险，即失去苏联的支持和保护，使他不得不同这个大陆上的强邻正面对话。莫斯科唯恐他忘记了，就象勃列日涅夫在哈瓦那时所做的那样，正在不断地提醒他“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并且，正象智利阿连德政权之垮台所表明的那样，“凡是在帝国主义及其仆从们陷入困境的地方，资产阶级完全忘掉它鼓吹的‘民主’和‘自由世界’的那一套宣传货色，而不惜采取一切暴力、一切残酷行径。”^①

看来苏联之所以赞成美古恢复邦交，其主要原因是：美古复交不仅表示华盛顿正式承认了古巴共产党政权的存在是“不可逆转的”，而且还说明美国默认苏联的势力范围可以长期延伸到那里，即延伸到所谓美国的“战略后方”。通过古巴，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成为一个拉丁美洲强国了，就象苏联企图通过它的阿拉伯附庸国和在东地中海保持一支海军而成为一个中东强国那样。

^① 《真理报》，1974年1月31日。

对莫斯科来说，同样还会得到其他一些好处。如果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投票赞成撤销美洲国家组织的制裁而美国仍然表示反对，或者不愿照办的话，苏联就能够加剧这一刺激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因素，并且还能利用这一点来进一步证明美国已无力对该地区国家的政策施加影响。如果美国先是取消了贸易禁运，然后同古巴恢复邦交的话，那就会被莫斯科说成是向华盛顿施加压力的结果，从而表明：有了苏联的支持，不论哪一个小国家都可以平安无事地藐视美国。此外，由于古巴越来越多地参加这个半球性的组织和会议的活动，苏联也许还会看到各种可能带来的好处，特别是有利于加强这个地区反美的民族主义倾向。因此，《拉丁美洲》就预言说：“古巴参加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即预定于1975年3月举行的拉丁美洲外长会议〕将加强拉丁美洲国家阵营里的独立反美的倾向。”^①

古巴正在日益纳入苏联集团的经济一体化

1962年2月美古经济关系一断绝，古巴为维持它的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要依赖苏联。取得古巴这样一个遥远地区的附属国，对莫斯科来说，固然要付出很高代价，但是，苏联援助的质和量问题，以及古巴如何利用苏联援助的问题，一直是两国之间长期恼火和争执的根源。与此同时，由于无法单独控制古巴共产党，又不能以苏联部队直接干涉相威胁，来对卡斯特

^① 阿尔森宁，前引文“‘新对话’的两个回合”，第23页。阿根廷于1975年1月27日宣布取消这次会议，对新的美国外贸法案中的种种限制表示抗议。

罗施加压力，莫斯科控制哈瓦那的主要手法就是要使古巴继续依赖苏联在经济上所给予的支援。

在美国曾有过许多推测：据说卡斯特罗要想减少他对苏联的依赖并另找重要的进口物资和技术来源，而苏联则希望削减古巴对苏联物力财力方面的需求。因此，有时就可以作这样假设，即恢复美古贸易就能导致两国经济关系得到不断扩大，其结果使苏联对古巴的控制受到削弱，从而可能影响卡斯特罗的政策愈来愈朝着温和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在政治上获得相当大的好处。不过，这种推测看来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古巴外贸的真正性质以及它在经济上被纳入苏联集团已达到何种程度。要是认为哈瓦那或莫斯科之所以关心取消美洲国家组织的贸易禁运这个问题，或者关心恢复美古关系这个问题，是由于经济上的考虑起了很大作用的话，那么，这样的看法确实是非常可疑的。

1959年，当美国是古巴的主要贸易伙伴并占古巴全部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六十八时，苏联集团仅仅占百分之二，而拉丁美洲仅为百分之三左右。随着卡斯特罗政权的上台和美古关系的恶化，古巴的贸易方针迅速发生激变。这样，到1961年，共产党国家在古巴的全部贸易中已占百分之七十一·六，而美国则下降到百分之四·三；在1962年，共产党国家的贸易比重在古巴全部贸易中已增至百分之八十二·九，而同美国已没有贸易往来了。^①从1962年以来，古巴同共产党世界贸易的百分比就下降了，但在1972年仍占古巴贸易的三分之

^① 详见苏奇利基的前引书《古巴、卡斯特罗与革命》，第157—158页。

二,而苏联在古巴全部贸易中则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九。1973年

表一 古巴对外贸易

年 份	数额(百万美元为单位)				百 分 比		
	总额	出口	进口	差额	共产党 国 家	其中苏 联所占 百分比	非共产党 国家所占 百 分 比
1960	1198	618	580	+38			
1961	1263	625	639	-14	75.9	44.6	24.1
1962	1280	521	759	-238	82.9	49.4	17.1
1963	1411	544	867	-323	74.4	44.3	21.6
1964	1733	714	1019	-305	63.1	39.5	36.9
1965	1552	686	866	-180	69.9	48.4	30.1
1966	1518	592	926	-334	80.4	52.4	19.6
1967	1709	711	998	-287	75.8	54.1	24.2
1968	1740	651	1089	-438	76.5	51.5	23.5
1969	1832	664	1168	-504	72.1	46.7	27.9
1970	2357	1046	1311	-265	71.6	49.2	28.4
1971	2244	859	1385	-526	70.7	44.1	29.3
1972	1928	739	1189	-450	67.9①	47.9①	32.1①
1973②	2906	1256	1650	-394	69.8	51.6	30.2

1960年到1966年的数字,引自阿·德·别卡列维奇所著《古巴:对外经济关系》一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70页。

1966年以后的数字,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1974年3月号,第122页。

① 经互会1972年统计年鉴提供了下列古巴贸易量的百分比:共产党国家占69.2%;经互会成员国占61.2%;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占25.1%;欠发达国家占5.7%。转引自《经互会会员国1973年统计年鉴》,莫斯科,1974年版,第353页。

② 《纽约时报》,1974年10月6日。《1973年苏联对外贸易》,第306页;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出版的《1969—1973贸易指南》,第374页。

莫斯科占古巴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一·六(表一)。这个百分比的下降又是会使人发生误解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世界(特别是苏联)购买的古巴糖的数量的百分比相对下降(表二、七)所致。事实上,苏联对古巴的出口表明有稳定的增长。尽管古巴达成的新的交易,例如同墨西哥和阿根廷的交易,使古巴同非共产党世界的贸易有了进一步增加,但是,古巴在1973年的对苏贸易还是达到了十一亿一千万卢布(或约十五亿美元)的新高峰,并计划在1974年增至十三亿卢布(十八亿美元),在1975年则增至二十亿卢布(二十七亿美元)(表二)。近年来,古巴在苏联的贸易伙伴中占第六或第七位。

古巴至今仍然完全依赖苏联提供石油,苏联每年供应的石油和石油产品达七百万公吨以上。^① 机器和设备占苏联对古巴的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用苏联对外贸易部长N·帕托利切夫的话说:

由于古巴产品缺乏或不充裕,苏联提供的工业原料、食物和消费品,对古巴经济来说是非常之重要……基本项目就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木材、矿肥、石油及石油产品、谷物、油脂、罐头水果、电视机、无线电收音机、自行车等商品。古巴所需要的这些商品,其中有许多就基本上是通过向苏联购买得到满足的。^②

苏联是古巴所需农业机械的主要供应者(包括自1962年

① 《1973年苏联对外贸易》,第304页。

② 帕托利切夫:“兄弟般的合作”,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2月(第2期),第96页。

表二 古巴的对苏贸易量

(以百万卢布为单位)①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总 额	645.9	689.2	812.2	811.8	770.3	1045.0	891.0	821.7	1109.7	1300.0**	2000.0**
进 口	337.9	431.9	506.7	561.8	561.6	580.0	602.0	616.2	679.2		
出 口	308.0	257.3	335.3	250.0	208.5	465.0	281.0	205.0	430.5		
差 额	-29.9	-174.6	-171.2	-311.8	-353.1	-115.0	-313.0	-410.7	-248.7		
古巴在苏联的贸易总 额中所占的百分比	4.4	4.5	5.1	4.5	3.9	4.7	3.7	3.2	3.5		
苏联在古巴的进口所 占的百分比	49.5	56.3	56.8	51.7	53.4	49.2	46.8	57.5			
苏联在古巴的出口所 占的百分比	47.0	46.2	52.4	45.6	34.9	49.4	37.3	32.4			

来源：《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概览》(年刊)，转引自莫斯科《国际关系》(1960年—1973年)。

① 1966—1970年 1卢布=1美元

1971年 0.9卢布=1美元

1972年 0.829卢布=1美元

1973年 0.736卢布=1美元

* 根据1974年1月苏古贸易议定书推算所得(莫斯科电台, 1974年1月25日)。

** 根据1975年2月苏古贸易议定书推算所得(哈瓦那电台, 1975年2月5日)。

以来所供应的五万台拖拉机),并且每年供应二十五万到二十九万公吨化肥。古巴进口的粮食绝大部分也从苏联得到的。例如,在1971年,苏联交付了五十七万四千公吨谷物。1972年,苏联在国内遭受严重歉收,不得不向美国购买大量谷物时,还是向古巴交付了五十五万二千吨谷物,并在1973年交付了五十三万九千吨谷物^①。此外,1973年苏联所交付的其他食品,就有炼乳(五千一百万听)、罐头肉(六千一百九十万听)、鱼类(包括新鲜的和冷冻的,共有三万五千四百吨)、罐头鱼(三百五十万听)、面粉(三十三万六千吨)、植物油(四万八千一百吨)以及蔬菜。^② 备件是苏联交付货物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苏联权威刊物《对外贸易》,“每年向古巴出口的备件总值超过四千万卢布”,而且这还包括给“古巴的制镍、炼油、制糖和水泥工业中使用的美国设备”提供的苏制备件。^③ (见表三)

苏联从古巴的进口主要是原糖,其次是镍矿石和精镍。1973年,苏联还从古巴首次进口了十一万四千三百公吨汽油,这一着显然是利用古巴的炼油能力,并给返航的苏联油船提供载货。^④ 下面将进行更详细的讨论,说明这一发展在财经上是有利于苏联的。

古巴在对苏贸易中一直有逆差(表二)。

① 《1971年苏联对外贸易》,第309页;《1973年苏联对外贸易》,第306页。

② 《1973年苏联对外贸易》,第306—307页。

③ V·弗拉季米尔斯基:“苏联—古巴贸易和经济关系”,原载《对外贸易》(莫斯科),1972年10月(第10期),第15页。

④ 《1973年苏联对外贸易》,第307页。

表三 苏联向古巴的主要出口
(以百万卢布为单位)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机器、设备、运输工具	205.2	214.0	205.2	176.0	164.4	177.8
其中:						
发电设备	3.3	2.5	7.9	5.3	4.5	8.1
起重机器	7.4	8.2	9.0	10.1	7.0	10.0
筑路设备	10.3	12.0	12.6	13.8	9.9	9.5
拖拉机、农业机械	24.4	37.9	31.0	31.3	29.8	37.2
卡车及零件	36.8	31.7	30.2	33.9	32.3	34.8
飞机	13.0	5.7	10.2	7.0	7.9	4.3
石油及石油产品	62.6	66.7	69.2	73.5	92.2	114.2
轧黑色金属	13.1	11.3	17.5	15.9	15.1	16.7
轧有色金属	9.9	8.8	9.3	8.9	8.2	7.6
化学产品	9.6	7.8	9.4	13.6	11.9	11.0
氮肥	9.2	6.9	6.1	4.9	4.6	5.0
锯木	11.3	10.4	13.1	17.3	12.2	13.3
棉纤维	11.7	8.0	10.2	12.0	10.1	10.6
谷物(燕麦除外)	26.9	28.1	28.4	31.9	30.1	30.0
罐头肉	14.7	11.8	12.6	15.4	13.6	15.6
乳品	6.8	6.3	6.6	6.4	7.8	9.7
鱼及鱼产品	8.2	8.7	9.2	10.4	11.3	17.5
面粉	27.1	25.9	22.4	24.8	26.0	24.4
植物油(食用)	9.9	10.2	12.2	15.8	20.3	11.8
消费品	6.9	8.1	12.4	15.6	22.8	27.5
总额(包括其他项目)						
百万卢布	561.8	561.6	580.0	602.0	616.2	679.2
百万美元*	624.2	624.0	644.4	668.9	743.3	922.8

资料来源: 1970年, 1972年, 1974年的《苏联对外贸易》。

* 1971年: 0.9卢布 = 1美元; 1972年: 0.829卢布 = 1美元;
1973年: 0.736卢布 = 1美元。

1960年到1973年期间,古巴贸易赤字的总额达二十四亿八千万卢布,或即二十六亿八千七百万美元左右。^①

如上所述,古巴同其他共产党国家也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贸易,近年来,这种贸易已占古巴贸易量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共产党中国是古巴所需的大米的主要供应者,它以此来换取古巴糖。根据非官方资料来源,古巴同中国的贸易量在1972年达到一亿二千万美元(古巴出口五千万美元;进口七千万美元)。^②古巴同经互会的东欧成员国(不包括苏联)的贸易,已从1960年三千一百六十万美元的总额增至1973年的三亿七千三百万美元左右。

表四 古巴同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不包括苏联)

(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贸易总额	196.2	229.6	232.2	247.6	253.1	297.8	290.7	291.9	373 ^①
出口额	100.2	110.9	115.1	125.1	120.4	162.5	164.2	132.6	
进口额	96.0	118.7	117.1	122.5	132.7	135.3	126.5	159.3	
贸易差额	+4.2	-7.8	-2.0	+2.6	-12.3	+27.2	+37.7	-26.7	

资料来源: C·保罗·罗伯茨主编,《1968年的古巴,拉丁美洲统计摘要增刊》(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拉丁美洲中心,1970年版)第168—169页;经济情报所出版的《经济评论季刊:古巴及其他国家,年度增刊》(伦敦)1974年,第14—15页;《经互会成员国1973年统计年鉴》,第353页。

① N·帕托利切夫:“经互会成员国:日益增进的外贸合作”,原载《对外贸易》(莫斯科),1974年5月(第5期),第3页。

正如苏联的情况那样,古巴向这些国家主要出口糖,进口机

① 苏奇利基,前引书,第166页,及表二。

② 《纽约时报》,1974年10月6日。

器、原料、食品和消费品。尽管古巴同东欧国家(不包括苏联)的贸易差额时有波动,古巴同其中一些国家的贸易还有过顺差(见表五),但古巴在1960年到1972年期间同他们的贸易逆差累计达一亿四千八百五十万美元。此外,古巴还与非经互会成员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如阿尔巴尼亚、北朝鲜及北越进行贸易。1972年,此项贸易,包括中国在内,总额达一亿四千万卢布,或即为一亿六千九百万美元左右。由于不得不同共产党国家进行大量贸易,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则进一步受到国际食糖协定的约束,而且又无力大规模扩大食糖生产,古巴同非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大约只占它的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表一),这一贸易额一直受到世界市场糖价波动的影响。除了共产党国家以外,古巴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日本、加拿大、西班牙、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叙利亚和瑞典(表六)。尽管古巴对其中一些国家,特别是对日本、叙利亚和近年来对西班牙的贸易是顺差的,但是,在1968年到1973年期间的逆差累计已达六亿六千万美元左右。这是继前些年大约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逆差后的另一个赤字。尽管古巴由于糖价升高而使1974年的贸易平衡无疑有所改善,但这一笔收益是远远弥补不了以前同非共产党国家的贸易中的累计赤字的,并且已被进口价格上涨所抵销了。正如评论员罗维尔托·阿尔瓦罗·基诺内斯在1974年12月古巴官方报纸《格拉玛报》上所写的那样:“糖价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已由于我们必须从资本主义世界取得的所有货物和设备的价格普遍上涨而被抵销掉了。”^①

^① 哈瓦那电台,1974年12月13日。

表五 古巴同经互会各成员国(不包括苏联)的贸易

(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①
对东德总额	71.1	75.5	114.3	97.6	80.0
出口	35.1	35.4	52.5	48.5	35.0
进口	36.0	40.1	61.8	49.1	45.0
差额	-0.1	-4.7	-9.3	-0.6	-10.0
对捷克斯洛伐克总额	87.4	70.5	73.7	77.6	70.0
出口	44.6	37.2	56.6	45.5	35.0
进口	42.8	33.3	27.1	32.1	35.0
差额	+1.8	+3.9	+29.5	+13.4	0
对保加利亚总额	48.7	48.3	54.9	55.0	55.0
出口	27.9	25.6	31.2	31.0	25.0
进口	20.8	22.7	23.7	24.0	30.0
差额	+7.1	+2.9	+7.5	+7.0	-5.0
对罗马尼亚总额	23.0	39.2	27.7	25.4	
出口	7.4	9.8	13.0	14.8	
进口	15.6	29.4	14.7	10.6	
差额	-8.2	-19.6	-1.7	+4.2	
对波兰总额	10.4	11.4	6.6	10.7	
出口	6.2	7.8	3.6	8.8	
进口	4.2	3.6	3.0	1.9	
差额	+2.0	+4.2	+0.6	+6.9	
对匈牙利总额	7.0	8.2	10.6	24.4	
出口	3.9	4.6	5.6	15.6	
进口	3.1	3.6	5.0	8.8	
差额	+0.8	+1.0	+0.6	+6.8	

资料来源：经济情报所，《经济评论季刊，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波多黎各，年度增刊》，(伦敦)，1974年，第14—15页。

① 《纽约时报》，1974年10月6日。

表六 古巴同非共产党世界的贸易

(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贸易总额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日 本	32.90	72.60	143.49	175.70	187.29	283.41
加 拿 大	50.90	48.90	71.52	71.84	72.37	106.70
西 班 牙	57.25	81.79	72.19	56.75	65.67	91.71
联合王国	47.80	46.80	66.64	82.60	57.87	77.35
法 国	74.80	65.20	78.60	57.42	39.82	42.51
意 大 利	40.50	57.10	75.70	59.23	30.30	41.92
德 国	15.20	28.40	32.61	22.77	25.54	39.76
瑞 典	7.11	21.87	9.94	21.43	20.36	23.82
拉丁美洲	41.86	1.48	8.82	24.55	30.82	23.33
叙 利 亚	3.90	7.08	10.92	20.14	19.03	13.95

出 口

日 本	30.30	61.80	100.39	116.41	130.26	165.22
加 拿 大	4.70	7.20	9.15	10.14	11.32	16.59
西 班 牙	36.84	38.60	31.93	25.17	45.20	49.83
联合王国	15.00	11.80	12.41	12.31	11.45	30.14
法 国	13.40	13.40	14.50	12.21	10.67	10.79
意 大 利	6.60	7.50	10.80	10.04	13.03	17.93
德 国	2.10	2.40	3.24	4.51	3.87	3.78
瑞 典	5.27	1.92	4.09	7.86	10.93	9.94
拉丁美洲	0.46	1.45	0.05	12.49	9.07	6.19
叙 利 亚	2.91	4.81	8.00	17.93	18.19	13.95

(续表)

贸易总额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进 口						
日 本	2.60	10.80	43.10	59.29	57.03	118.19
加 拿 大	46.20	41.70	62.37	61.71	61.05	90.11
西 班 牙	20.41	43.19	40.26	31.68	20.47	41.88
联合王国	32.80	35.00	54.23	70.29	46.42	47.21
法 国	61.40	51.80	64.10	45.21	29.15	31.72
意 大 利	33.90	49.60	64.90	49.17	17.27	23.99
德 国	13.10	26.00	29.37	18.26	21.67	35.98
瑞 典	1.87	19.97	5.85	15.57	9.43	13.88
拉丁美洲	4.40	0.03	8.77	12.06	21.75	17.19
叙 利 亚	0.99	2.27	2.92	2.21	0.84

差 额

日 本	+27.70	+51.10	+57.29	+57.12	+73.23	+47.03
加 拿 大	-41.50	-34.50	-53.22	-51.57	-49.73	-73.52
西 班 牙	+16.43	-6.59	-8.33	-6.41	+24.73	+7.95
联合王国	-17.30	-23.20	-41.82	-67.98	-34.97	-17.07
法 国	-48.00	-38.40	-49.60	-33.00	-18.48	-20.93
意 大 利	-27.30	-42.10	-54.10	-39.13	-4.24	-6.06
德 国	-11.00	23.60	-26.11	-13.75	-17.80	-32.30
瑞 典	+4.50	-18.07	-1.76	-5.81	+1.50	-3.94
拉丁美洲	-0.94	+1.42	-8.72	-3.82	-7.67	-11.00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68年至1972年贸易趋向》，第355页；《1969年至1973年贸易趋向》，第374页。

迄今为止，食糖一直是古巴对共产党国家，同样也是对非共产党国家的主要出口物。苏联甚至在卡斯特罗掌权之前就进口了较为少量的古巴食糖（1957年为三十五万吨，1958年为十九万七千吨，1959年为十三万二千五百吨）。但是此后，随着古巴食糖的销售对象从美国转向共产党国家后，苏联的采购量急剧地增加了。1960年苏联购买了一百四十万吨，而1961年购买了三百四十万吨（占古巴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九点四），其购价为每磅四美分，百分之八十用苏联的货物支付，百分之二十则以可兑换的通货支付。1962年，苏联进口了二百三十万吨食糖（占古巴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四）。

在这一时期，古巴正在苏联及其他共产党国家的信贷帮助下从事一项迅速工业化的计划，因而忽视了糖的生产，以致糖的产量从1961年的六百七十万吨下降到1963年的三百八十万吨。这样一来，虽然苏联对古巴的出口继续增加，而古巴售与苏联的食糖却下跌到九十九万六千吨，为此苏联“主动”答应以每磅六美分的价格买进。古巴工业化运动的明显失败和所付出的极其高昂的代价，导致莫斯科对它同哈瓦那的经济关系进行了检查。由于卡斯特罗安然经受住猪湾入侵事件和导弹危机，看来显然还能继续掌权，苏联再也不能把这些关系看成为一项经济上的权宜之计，好让古巴弥补由于得不到同美国的经济联系所造成的损失，而是相反，应将苏古的经济关系置于长期的基础上来加以考虑。1964年1月，卡斯特罗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领导曾劝说他把古巴的工业化速度放慢，并以糖作为古巴出口的基础，这样就可以弥补古巴的贸易逆差，而且，随着糖的生产增加，使得哈瓦那有可能为古巴逐

步实现工业化拥有支付能力。1964年1月21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一项长期协定，规定1965年到1970年期间古巴将以每磅六美分的固定价格向苏联交付二千四百万吨糖。苏联是全部用货物来支付的，这样一来，古巴就得生产超过它向共产党国家所承担的出口任务的食糖，目的是要在世界市场上得到硬通货。尽管计划要求糖的生产从1965年的六百万吨增加到1970年的一千万吨，苏联应接受其中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实际上，古巴接连不断地没有完成它的生产指标，结果苏联得到的糖远远少于预定的数量(表一)。由于苏联无法供应古巴所需的全部东西，不得不从议定要装运给它的糖中放弃一部分，让哈瓦那能够同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这样一来，古巴对苏联的交货量同原定数量相差甚至更大了。据1968年国际协定，古巴向世界市场出售的糖为二百十五万吨，1971年，已增至二百四十万吨。

卡斯特罗大搞1970年产糖一千万吨的这个运动——他宣称这关系到他的政权的“荣誉”问题，为此目的，他不惜牺牲其他经济部门，把古巴的人力和物力都动员起来了——其部分意图是要向苏联证明：古巴是能够完成它的生产和交货义务的。在谈到改进古巴农业的计划措施时，卡斯特罗于1970年初对一个苏联记者说：

这些措施将使苏联对我们的经济计划增加信心。以前，我们有许多保证没有兑现，因此，——非常自然地 and 极有理由地——对我们的经济计划产生了某种怀疑。①

① 《星火》，1970年6月(第21期)，第3页。

不过，古巴1970年糖的产量并没有完成指标，虽然达到了创纪录的八百五十万吨，但这一大力开展的运动的结果，却使全国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致显然已支撑不了。在随后的几年里，古巴糖的生产果真再一次下降到大大低于每年六百万吨的水平。

1970年蔗糖收获以后，苏联的进口方面看来出现过一些调整，可能是决定让古巴利用世界市场上正在上涨的糖价的结果。这样，1970年苏联在古巴糖的出口量中约占百分之四十五，但在1971年已降至百分之二十八点七，1972年又降至百分之二十六点九。与此同时，古巴向其他共产党国家出口糖的份额，则从1970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六增至1971年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一，而1972年则为百分之二十九点七。不过，增加得更为显著的却是非共产党国家在古巴出口糖中所占的份额，即从1970年的百分之三十点四（二百一十零四万吨）增至1971年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二（二百一十六万吨），1972年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四（一百八十一万二万吨）。

苏联购糖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价格问题。如上所述，莫斯科于1960年同意每磅糖价固定为四美分，这是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的。它争辩说确定了这样一个固定的价格，古巴的食糖经济便摆脱了世界糖价飘忽不定的影响。在1963年到1964年，糖价曾提高到六美分一磅，这是由于世界糖价急剧上升的缘故，苏联还趁机增加出口精制糖（表七）。多年来，这一价格原来就是苏联给予古巴糖的一种补贴，比如，在1964年到1970年间，世界市场糖价一直在下降，1968年低到每磅

一点一二美分。世界价格于1971年再次开始回升，很快就突破每磅六美分的价格，结果，苏古在1972年12月签订了一项新的协定，把苏联的买价确定为每磅十一美分。这一较高的价格在1973年苏联贸易数字(表七)中得到了反映。但是，1974年世界市场糖价大大超过了苏联标定的价格，达到每磅四十美分以上，因而再一次提出了苏联的价格可能向上调整的问题。当然，苏联一再声称为进口古巴糖早已确定了非常慷慨大方的价格，这分明是虚有其表的。苏古贸易是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进行的，苏联可以给它向古巴出口的货物自行定价。例如，苏联曾一再提高它向古巴出售的石油的价格，把每吨价值从1961年到1967年的平均十点一卢布提高到1973年的十五点四卢布。^①再说，莫斯科要是在世界市场糖价低落时对古巴糖的价格不给予补贴，那就会失去一次宣传自己宽宏大量的机会，使古巴贸易出现甚至更大的赤字，债务日增，当然毫无希望及早偿还。

1972年的一个有意思的发展，就是苏联实际上已停止出口糖。随着世界市场糖价高于苏联的买价，这种形势看来就是准备让苏联通过出口去赚取一笔大钱似的。可以想象，由于古巴表现良好，莫斯科正在奖赏古巴的办法，就是让古巴利用国外市场去获利。也可以想象，这里还涉及到苏联国内的考虑：1970年到1971年期间，糖的产量下降了大约一百万吨，1972年甚至下降到更低的水平。因此，也是在1972年到1973年期间，苏联多年来第一次向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古巴

^① 见1960—1973年的《苏联对外贸易》。

表七 古巴和苏联的糖贸易

年份	古巴产糖总额 (以百万吨为单位)*	向苏联的出口量 (以百万吨为单位)	苏联在古巴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 (百分比)	所支付的价格 (每磅以美分计)	苏联的进口总值 (以百万卢布为单位)	苏联糖的出口量 (以百万吨为单位)	苏联的出口值 (以百万卢布为单位)
1960	5.862	1.467	25.0	3.21	93.4	0.243	22.8
1961	6.767	3.345	49.4	4.00	270.4	0.414	33.2
1962	4.815	2.233	46.4	4.13	183.5	0.792	56.4
1963	3.821	0.996	26.1	6.22	123.2	0.802	94.1
1964	4.589	1.859	40.5	6.00	222.6	0.348	50.2
1965	6.082	2.330	38.3	6.00	273.3	0.604	43.9
1966	4.866	1.841	37.8	6.11	225.7	1.070	59.8
1967	6.236	2.479	39.9	6.11	302.3	1.106	58.8
1968	5.315	1.749	32.9	6.11	212.7	1.374	79.5
1969	4.700	1.332	30.0	6.11	161.9	1.081	85.6
1970	8.520	3.003	35.2	6.11	364.3	1.079	93.4
1971	4.500	1.536	34.1	6.11	185.6	1.002	98.9
1972	5.300	1.101	20.8	6.55	131.5	0.050	5.2
1973	5.500	1.603	29.1	12.83	323.1	0.043	4.6

资料来源：《1918—1966年苏联对外贸易统计附刊》(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66年)；1968、1970、1972、1973年《苏联对外贸易》。

* 关于1960—1968年的数字见：国际糖业组织出版的《1969年糖年鉴》(伦敦)1970年，第52页；关于1969年的数字见：美国农业部出版的《国外农业通报，糖》，1970年12月，第11页；关于1970年的数字见：《对外贸易》第9期(莫斯科)，1971年，第54—55页；关于1971年和1972年的数字见：《党的生活》，1974年1月(第1期)，第74页；关于1973年的数字见：《纽约时报》，1974年10月6日。

除外)买糖。1972年，苏联从六个国家购买了价值四千七百万卢布的四十万零一万吨(其中几乎有三十万吨来自巴西)。

1973年，苏联向八个国家的购买量增至七十八万三千二百吨（四十四万三千吨来自巴西，十万吨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九万七千吨来自秘鲁，六万一千吨来自哥伦比亚），价值一亿二千一百万卢布。苏联向古巴购糖的价格是每吨二十卢布，但从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购糖每吨只要花十五个卢布左右。

莫斯科在六十年代就发现，单是古巴的外贸方向的转变，即从美国转向苏联集团，远不能给苏联提供控制卡斯特罗的可靠手段。鉴于卡斯特罗在经济管理和计划工作上随心所欲的作风，以及缺乏受过训练的古巴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大量的苏联经济援助也无法保证古巴在经济上取得满意的成就。1968年初，苏联同哈瓦那在政治上的不和日益增多，1968年1月卡斯特罗逮捕了三十五名亲苏的古巴共产党人之后，苏联便利用停运石油这一招，使古巴经济上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并借此机会使卡斯特罗就范。但是，类似这样的措施不能经常使用，不然就会冒以下风险，即引起一些新的政治问题，并使作为共产党和“进步”国家的“可靠”的朋友及支持者的莫斯科这一形象受到损害。同时，苏联还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它必须保护它在古巴的投资，并保证好不容易从苏联经济挣来的卢布不被白白地浪费掉。除了1961年以来古巴在对苏贸易中约有二十六亿美元的赤字以外，苏联曾向古巴提供现金贷款、长期信贷和各种形式的技术援助，以致古巴欠莫斯科的全部债务大概超过四十亿美元，或许高达五十亿美元之多。这样，古巴六十年代在经济上弄得那么差劲，不仅浪费了苏联的物力财力，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很难堪的。正如《真理报》在1966年9月所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的榜

样,不仅对世界上正在进行中的革命过程产生着影响,而且它们的失败、困难和错误也同样产生着影响。”^①

很清楚,七十年代达成了一项重大的交易,作为苏联对古巴经济进行甚至更大的投资的交换条件,苏联要求——并已达到了——古巴经济朝着苏联体系来一个比以前都深刻得多的转向。对外来说,这意味着古巴对外贸易和经济计划要与经互会的苏联和东欧成员国在长期的基础上结合起来。任何转向西方或转向拉丁美洲的权宜之计都将是有目的性,而且只有在尽到共产党世界内必须履行的职责之后才能进行。对内来说,这意味着古巴经济要按照苏联的正统方针组织起来。

古巴被纳入苏联经济体系的第一阶段,是在1970年12月建立苏古政府间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时开始的。当时,苏联塔斯社评论说,这个新的委员会将考虑制订出有关“各计划机构、各工业和各部门之间组织合作的建议草案”。^②在古巴人的心目中认为这就是一种代价,为了得到苏联对古巴工业化所作出的承诺,他们是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的。到那一年为止,苏联已承担的义务,新建、扩建一百六十五个工业企业,或则把这些工业企业实现现代化。^③在这个政府间委员会成立时,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认为这一机构不仅是联合进行长期计划和“更好地利用经济资源”的工具,而且也是将在这个十年的后半期推行的古巴“宏伟的工业化计划”

① 见杰克逊,前引书,第141页。

② 莫斯科电台,1970年12月9日。

③ 《社会主义工业》,1970年8月25日。

的一个准备步骤。^①

这个委员会成立以来曾召开过五次会议。1971年9月4日到10日在哈瓦那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在发展古巴镍工业、电力、水利和制药方面进一步协作的问题，还探讨了建设甘蔗收割机制造厂和输电线路工程的可能性。双方还讨论了“国家干部的培训”问题。在召开第二次会议以前，罗德里格斯对《真理报》说：

关于苏联的协作对发展古巴国民经济的巨大重要性问题，可以说，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多少占有重要地位的部门里，没有一个部门不是早已存在这种协作，那就是已计划进行这种协作。^②

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会议(1972年4月10日到15日)上，与会者提到过下面一些新的协作领域：渔业、古巴港口的重建和现代化、水上工程建设、民航的发展、古巴经济部门中采用电子计算机等等。在引进多少带有试验性质的KTP-1型甘蔗收割机方面似乎有了一些进展，因为这些收割机已取代了六十年代交付的那些较早型号的机器，卡斯特罗把后者描述为“一大破坏者，它一到哪里，那里好长时间就长不出东西来”。^③关于干部培训的问题，进行过更多的讨论。^④

① 莫斯科电台，1970年12月9日。

② 《真理报》，1972年3月11日。

③ K·S·卡罗尔：《掌了权的游击队》(纽约，希尔与王书店出版，1970年版)，第483页。

④ 弗拉季米尔斯基，前引书，第17页。

由于古巴在头两次会议上的态度表现和古巴经济有了改善,莫斯科可能受到了鼓励,就在这个委员会的第二次到第三次会议之间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新步骤。1972年7月,苏联把古巴拉进经济互助委员会;12月,勃列日涅夫和卡斯特罗签订了几个长期的经济协定。

有一些迹象暗示:邀请古巴参加经互会,是苏联而不是古巴主动提出的。卡斯特罗在经互会会议前访苏期间所作的杂乱无章的演说中,并没有暗示过古巴即将进入经互会。卡斯特罗虽然在1972年的7月26日周年纪念日讲话中有很大一部分谈到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优点,但是并没有提到古巴刚刚进入经互会。古巴的宣传工具并没有评论这件事,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也没有评论卡斯特的这次访苏之行。

罗德里格斯在接受邀请参加〔经互会〕的讲话中,曾表明过,古巴人对他们参加该组织后可能在拉丁美洲产生的影响这个问题是敏感的。罗德里格斯就是这样说的:

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他最近访问〔莫斯科〕期间一再强调的那样,由于古巴的历史发展和地理位置的关系,古巴属于拉丁美洲的一员,我们从未放弃过,并且将永远不放弃这些联系。^①

罗德里格斯对古巴进入经互会一事进行解释时说,只有在拉丁美洲出现了“一些新的古巴”的条件下,古巴同拉丁美洲才能结合成为一体。卡斯特罗在7月26日也发表过同样看法:

^① C·R·罗德里格斯:“古巴和经互会”,原载《拉丁美洲》,1972年11—12月(第6期),第47页。

同拉丁美洲结合成为一体还须等待新的革命，而这可能需要十年到三十年时间。^① 为了进一步作出辩解，罗德里格斯引用了卡斯特罗的话，其大意是：“古巴自认为是社会主义一体化（其中心在欧洲）的一个部分，打算成为这样一种起连接作用的因素，即把在欧洲和亚洲已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和拉丁美洲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连接起来。而我们由于历史赋予的特殊的荣幸，早已成为拉丁美洲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核心。”^② 经互会执行委员会考虑到这一敏感性，在接纳古巴为成员国时，曾保证在作出有关古巴入会的细节时，将“适当照顾到古巴共和国的经济和地理位置的特点”。^③

另外一点，这也是古巴在入会时和入会以来对经互会所作的评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古巴对经互会可能作出的贡献是有限的。莫斯科所考虑到的问题，已由柯西金在入会式会议结束时提出来了，其大意是：古巴的入会将有助于解决古巴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和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④ 古巴发言人提到了经互会将提供帮助，开采古巴的镍矿藏、利用甘蔗废料造纸，并为所有经互会国家生产柑橘一类的水果。但是，在回答1973年12月3日莫斯科电台所提出的古巴加入经互会后有何好处这个问题时，古巴对外贸易部部长丰特说：“我们正在不断取得经验。”^⑤ 然而，古巴是一直参加经互会的一些机构

① 哈瓦那电台，1973年7月26日。

② 见罗德里格斯，前引文，第48页。

③ 莫斯科电台，1972年7月11日。

④ 莫斯科电台，1972年7月12日。

⑤ 莫斯科电台，1973年12月3日。

(比如经互会投资银行)活动的，古巴代表愈来愈多地参加这一组织的会议。

苏联在迫使古巴的经济计划首先同苏联、然后同经互会拴在一起之后，这才认为报偿古巴的时刻已到了。1972年12月23日，勃列日涅夫和卡斯特罗签订了五个协定，目的就在于解决苏古经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那些问题。卡斯特罗前往苏联，参加苏维埃联盟成立五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五年前为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这个更为盛大的节日时只派去了一个低级的代表团，那时他所怀有的轻蔑心理，这一次总算一扫而光了。

卡斯特罗回国后，在1973年1月4日向古巴人民所作的一次讲话中，曾对〔古苏〕这种新关系表示满意。他在这次讲话中把那些协定讲得特别详细。^①首先，苏联已同意为古巴的债务再提供新的贷款。那些截至1973年的债务，可以延长到1986年归还，而且到时以无息方式在二十五年中等额还清。第二个协定规定提供一笔信贷以弥补从1973年到1975年的贸易逆差，后者也是从1986年开始偿还。第三个协定包括1973年到1975年的贸易，是古苏两国之间第一个长期贸易协定。根据苏联官方负责对古贸易的重要专家的说法，这个协定是进行了两年工作后所达到的顶点，并且以后还将达成更多的协定：

就在建立苏古政府间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1970年

^① 哈瓦那电台，1973年1月4日。

12月)的同时,苏古两国计划机关就对1971年到1975年期间以及更长时期中发展经济合作和对外贸易等问题开始磋商。作为这些磋商的结果,第一个两国相互交付货物的长期协定,已于1972年12月签订了,这个协定使在这一领域的苏古关系更加具有了计划性。^①

第四个协定涉及1973年到1975年期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问题。苏联将给予古巴一笔三亿三千万美元的信贷,1976年后以“低”息偿还,用于下列项目:^②

新建两座和重建七座原有的纺织厂	八千一百万卢布
整修毛泽东和尼卡罗镍厂	五千二百万卢布
铁路修建和改进	三千五百万卢布
汽车修理厂	一千万卢布
电力工程	五千万卢布
石油工业	一千五百万卢布
港口改进	一千二百万卢布
灌溉和排水工程	一千万卢布
地质调查	一千五百万卢布
戈尔达角镍联合企业	一千五百万卢布
甘蔗收割机械化	一千万卢布

加起来总计有三亿零五百万卢布,尚不包括几个月后达成协议的用于建造一家电视机—收音机装配厂的一笔款项。这也

^① 《经济报》,1973年1月21日。

^② 哈瓦那电台,1973年1月4日。

不包括早先已给予信贷的建于马里埃尔的三套新的十万千瓦发电装置的费用，或两个四百到五百兆瓦的核动力反应堆最后需付的费用，根据 1974 年 12 月初所宣布的消息，这两个反应堆就是苏联计划为古巴建造的。

第五个协定把糖的售价定为每磅十一美分，镍为每吨五千美元。在这个协定签订的时候，世界市场糖价约为九美分，国际糖业协定规定的价格为七点六美分。镍价约为每吨四千美元。这样，在这两笔账上，看来苏联给了古巴很多便宜。

于是勃列日涅夫和卡斯特罗没有办完的事，就由政府间委员会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接办了。在哈瓦那举行的第三次会议（1973 年 2 月 26 日到 3 月 6 日）上，双方就修建一家生产 KTP-1 型甘蔗收割机的工厂问题达成了协议。甘蔗收割的机械化，对古巴当然会有相当大的好处。苏联人和古巴人现在似乎感到，他们研制成功的这种机器，已能解决由于甘蔗切割工人不断减少和收割工作的季节性所产生的这个问题。第三次会议还同意在 1974 年建成一家制造运输设备的工厂，并讨论了执行 1972 年关于发展电力事业的那个协定的问题。为新辟一条从哈瓦那到东柏林的航空线作好了准备。^①

苏联的谈判人员 V·N·诺维科夫还透露，为古巴制订一项“完整的教育方案”的准备工作正在最后“完成”中。^②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真理报》于 1972 年 3 月 11 日刊载的罗德里格斯的访问记就可以说明：

① 《拉丁美洲报》，1973 年 3 月 6 日。

② 哈瓦那电台，1973 年 3 月 6 日。

有计划要达到如下水平，就是要把非技术工人提高到合格工人的标准，把合格工人提高到中级专家的标准，并把技术员提高到助理工程师的标准。这一宏伟的计划，将在苏联专家和苏联设备的帮助下，在第一流的专家顾问的参加下加以执行。^①

诺维科夫说，有四个由苏联帮助建立起来的教育中心已开始活动：一个渔业学校，一个在哈瓦那的机械制造训练中心，一个在埃尔克里斯托的采矿中心，以及在奥尔金的一个农业机械化中心。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继续说：

我们的古巴同志计划为制糖工业、甘蔗收割机械化和其他行业建立几十个职工技术训练的教育中心。与此同时，他们正在拟议中的，就是为最重要的工农业部门建立培养干部的中等技术和高等教育机构。^②

当时，从1963年到1973年，古巴已派出一万七千名以上学生到苏联去接受各方面的训练。^③因此，苏联将在今后一个时期中渗透到古巴教育系统的各级机构中去。

这个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会议（1973年12月12日到14日），是最短的一次会议，可能是为了不要在勃列日涅夫即将访问古巴之前抢先发表新闻报道，也因为可能本来

① 《真理报》，1972年3月11日。

② 《新时代》，1974年1月（第1期），第13页。

③ 达鲁先科夫：“共同斗争中的伙伴们”，原载《国际生活》，1974年1月（第1期），第26页。

就没有什么新的重大课题可供讨论。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对苏联《新时代》杂志说：“我们主要分析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和 L·I·勃列日涅夫同志在 1972 年底所签订的那些协定执行得怎样了。会议结束时所签订的那个议定书，要求在发展古巴的电力、冶金和制糖工业方面进一步保持合作”。^① 据罗德里格斯说，一项预定到 1980 年为止的重新装备古巴各糖厂的计划已经开始。此外，“还将在苏联专家的参与下，开始制订一项发展古巴制糖工业的长期计划，时间将延长到 1990 年为止。”他还声称，“古巴中央计划委员会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之间已经开始协商关于协调 1976 年至 1980 年期间的计划问题”，从而表明了古苏两国正在对他们的下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协调工作。^②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古巴必须制订（而且首次制订）一个五年计划，同时还要拥有和五年计划相适应的稳定的经济。1971 年 4 月到 5 月，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头目尼可拉·巴伊巴科夫访问古巴，目的显然是了解这一赌注中所存在的问题。1972 年“五一”节，卡斯特罗首次透露说，从 1976 年到 1980 年的计划已在开始研究。B·戈尔巴切夫和奥·达鲁先科夫（后者在另一场合被证明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拉丁美洲问题专家），在《共产党人》1973 年 1 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清楚地阐述了苏联对古巴朝着这个方向所作出

① 《新时代》，1974 年 1 月（第 1 期），第 13 页。

② 同上。中央计划委员会是古巴中央经济计划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是苏联的中央经济计划机构。1976 年到 1980 年这个时期相当于苏联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

的努力的看法。作者们写道，直到最后才执行了各部门的计划和短期的年度计划。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的制订工作，现在已经完成，目前正准备制订 1976 年到 1980 年的五年计划……这个任务就是要求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经验，更深刻地和全面地依靠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一个比较现实和比较科学的基础上编制计划。^①

这个政府间委员会的第五次会议，于 1974 年 12 月在哈瓦那召开。哈瓦那电台在 12 月 4 日宣布，就有关未来协作的“重要协定”已签订了一个议定书。^② 跟以前历次会议不同，这次会议并没有提到这些协定的主题，虽然苏联的谈判人员诺维科夫参观奥尔金甘蔗联合收割机制造厂建筑工地一事暗示出讨论的一个范围。除了有关诺维科夫回国的一则简讯以外，苏联报刊并没有发表关于这次会议的消息，这是一种暗示，要么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然就说这是一次例会，不值得给予多大注意。甚至连这次会议的确切日期莫斯科或哈瓦那都没有加以宣布。

鉴于古巴的糖产量及其向苏联的交货量一再完不成计划，以及世界市场糖价涨落不定，莫斯科和哈瓦那已考虑安排能够改善古巴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地位及其偿付外债的能力的其他出口物。由于这个岛国蕴藏着大量镍矿和世界上对这

① B·戈尔巴切夫和奥·达鲁先科夫：“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古巴”，原载《共产党人》，1973 年 1 月（第 2 期），第 89 页。

② 哈瓦那电台，1974 年 12 月 4 日。

一极其重要的原料需求日益增长，苏联特别对发展古巴镍的生产表示日益关注。看来当前的计划是打算使古巴镍的年产量从大约三万六千吨增加到 1980 年的九万吨（或甚至十二万吨），这就可以给古巴出口年收入增加大约三亿美元或更多一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扩建现有的采矿和加工设施（这些设施以建立于古巴革命之前的、现已收归国有的美国企业为主），而且还要建造另外一些矿和加工厂。1974 年 9 月 1 日，莫斯科电台宣布说：

根据苏古政府间技术和经济合作协定，已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关于镍工业的议定书。这个协作规划拟改建目前在古巴进行生产的镍企业，并在戈尔达角建造一座新的大型采矿联合企业。

要达到镍的计划产量，最后也许需要六亿美元左右的投资，大部分须由苏联提供，还可能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进行合作。

苏联对进口镍（以补进口古巴糖之不足）的关注，看来从矿石购买量不断增加这一点上已反映出来。1970 年以前，苏联的镍矿石和精镍的进口总值起落于二千四百万到三千万卢布之间；1970 年已超过九千万卢布，而 1971 年达到了九千八百九十万卢布。在随后的两年内，镍的进口略有下降，1972 年降至六千六百九十万卢布，而 1973 年尽管苏联出的新买价是每吨五千美元，进口值还是下降到八千六百七十万卢布。不过，按照莫斯科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概念看来，随着古巴镍生产的扩大，镍很可能成为古巴对经互会作出贡献中（除糖以外）的一个主要项目。当然，由于经互会国家为扩大古巴的

镍产量而提供的信贷和设备，古巴又欠了经互会国家的债，这些债务必须通过交付矿石来加以偿还。

苏古贸易于1973年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做法：向苏联再出口十一万四千三百吨汽油，价值一百四十八万五千卢布。^①这一发展使莫斯科能利用古巴的炼油能力并为苏联油船提供一些载货，就在这一年，这些油船向古巴输送了约有七百四十万吨原油和石油产品。这种安排是否继续下去，如果继续下去的话，规模又有多大，尚不清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一事实，即：1973年古巴向苏联进口原油时以每吨平均十五点四卢布（二十点九美元）的价格支付的，而莫斯科则以每吨十二点九卢布（十七点五美元）的价格向古巴赊销了汽油，当时苏联汽油的平均出口价格为每吨二八点九卢布（三九点二美元）。苏联向比利时、丹麦和荷兰一些欧洲国家销售石油和石油产品时，每吨的要价则在四十一卢布到五十一卢布（或五五点七美元到六九点三美元）之间。^②

美洲国家组织取消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将对这个岛国贸易和苏古经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尚不清楚。目前，古巴的糖产量几乎全部交付给共产党国家和各非共产党买主，而古巴仍需向其中许多国家偿还相当多的债务。仅有的不交付的糖大约在七十五万吨到一百万吨左右，古巴留作贮备，大部分用于国内消费。古巴就是从这一宗储备中，于1971年、1972年提取十二万吨交给智利，作为换取智利的农产品的那个换货协定的一部分。1973年，古巴为了换取大米，向委内瑞拉出售了

① 《1973年苏联对外贸易》，第307页。

② 同上，第27, 70—71, 307页。

大约一万吨糖。

因此，可以设想，古巴也许能从它的国内储备中拨出数量有限的糖，向拉丁美洲或美国购买石油或其他商品，不必削减它对其他买主的糖的出口量，并减少它的硬通货收入。看来这个政权所干的，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老百姓尽可能进行压榨。1974年年底，哈瓦那利用世界市场糖价上涨，坚决地发起了一个运动。11月，古巴的宣传工具报道说，全国“热烈”响应曼萨尼略的民族英雄们提出的建议，为了利用世界市场糖价上涨，这个建议要求每人从本人的定量中每月献出一磅糖交给政府。1974年12月27日的《格拉玛报》宣布：由于群众的要求，国内贸易部已决定在1975年内每人每月糖的配给量将减少一磅。^①卡斯特罗在11月底向古巴妇女联合会讲话时作过这样推测，说按照当前的价格，这样做会给钱柜额外增加四千万到五千万美元。^②古巴1974年的总产量中有多少能按最近的1974年价格出售，尚不能肯定。总产量显然已达到六百万吨左右，但比该政权所指望的要少得多。正如卡斯特罗本人在1975年初向墨西哥记者们所透露的，“两年来遍及全国的大旱，使糖的生产减少八十万吨。”^③至于卡斯特罗政权怎样花钱，也没有任何清晰的迹象可资说明。

① 哈瓦那电台，1974年12月27日。

② 哈瓦那电台，1974年11月30日。

③ 《迈阿密论坛报》，1975年1月24日；古巴始终没有透露过1973年或1974年的生产数字，但在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资料来源中，有大约为六百万吨的数字（此项数字见于戈尔巴切夫：“古巴：管理的改进”，原载《经济报》，1974年12月，第52期）。

如果糖价仍然高涨，石油生产国把石油不是卖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赚取硬通货，而是愿意换取古巴糖以货易货的话，那么，古巴向西半球石油输出国，尤其是委内瑞拉，出售一、二十万吨糖，就可以使古巴对苏联石油的需求多少有所减低。但是即使如此，这些销售量看来也是不够的，而古巴的大部分石油需求仍须继续仰赖苏联。目前古巴本国生产的石油只能满足国内需要的百分之五；除非有重大的石油发现，本国石油的自给率，就是在苏联技术援助下，至多也只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再说，古巴至今仍然赊购苏联石油，其价格比委内瑞拉和其他拉丁美洲产油国的要价低得多。那么，在苏联、委内瑞拉和古巴之间是否有可能订立某种三角贸易协定，以便为古巴进口石油提供资金，这仍然是推测而已，因为目前苏联同委内瑞拉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拉丁美洲产油国中大概谁都不需要进口那么多的古巴糖，这笔钱足以使哈瓦那清偿目前它向苏联所购买的石油。从拉丁美洲对镍的有限需求来看，古巴向拉丁美洲产油国出售镍来交付石油的款项，在最近的将来大概也是不可能的。

美古开展大规模贸易，看来也呈现暗淡的前景。美国再也不会进口古巴糖，因为从古巴进口糖势必牺牲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影响他们糖的销售数量，对于这种发展趋势，这些国家可能会提出强烈的反对。美国对进口古巴镍可能有兴趣，但是，这种可能性，取决于古巴在不远的将来能否扩大它的产量，以及哈瓦那在完成了它对苏联集团所承担的义务后还有多少镍可供出售。古巴对开展同美国特别是以现金为基础的重要贸易，究竟有多大兴趣，这也是非常不清楚的。有时据说

古巴需要美国为它的工业、卡车等等提供备件,但是,应当记住,古巴的经济主要是用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机器重新装备起来的,并且,除了上面所说苏联为古巴特制的那些备件以外,不管怎样,古巴都可以从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采购此类备件。再说,哈瓦那看来不会把硬通货滥用在大大过了时的美制汽车、起卸机等一类备件上。至于消费品,古巴既然可向它的西方和日本的长期贸易伙伴取得同类商品,就没有特别需要去接近美国市场了。

虽说古巴因出口糖和镍增加了收益,古巴同拉丁美洲和美国最可能的贸易形式,有如1974年古巴阿根廷贸易协定所揭示那样,即是以给予古巴大量长期贷款为基础的。(就阿根廷而言,这样的贷款总额可达十二亿,在八年半以内偿还。)^①鉴于古巴应从1986年起开始偿还所欠苏联的巨额债务,古巴有没有能力偿还拉丁美洲国家或则美国的其他大量贷款,那是令人怀疑的。

因此,看来古巴和拉丁美洲或美国之间可能进行一些有限的贸易。但是,除非美国愿意提供(并且古巴愿意接受)大量援助和信贷,其规模足以替代苏联成为古巴经济的支柱,并且,美国如同苏联那样,准备把清偿债务推迟到无限期和不确定的未来,——这类贸易极不可能达到这样大的规模,足以大大减少古巴对苏联的依赖,或者使古巴经济之纳入苏联集团受到严重削弱。

^① 《纽约时报》,1974年2月26日。

古巴的苏联化

在莫斯科看来，古巴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一个主要条件就是古巴要有一个按照苏联路线建立起来的正统的共产党。这不仅就教条的理由来说是重要的——对这些教条的理由不应低估——而且，就提供这样一种机构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那种机构莫斯科认为最适合于苏联施加影响，并保证共产主义体系在古巴得以继续下去。在这个问题上，卡斯特罗过去至少有三次总是竭力满足莫斯科的要求：第一次是在1961年，成立了古巴革命统一组织；其次是在1962年，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取代上述组织；最后是在1965年，建立了古巴共产党。可是，就莫斯科而言，这些都不过是冒失的开端，因为卡斯特罗总是把这些组织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并一再地清洗那些被他怀疑为效忠于苏联的老资格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次，莫斯科正在采取更直接和更坚定的手段，认为事情会处理妥当的。

这时古巴人在苏联的热情赞许下，着手迅速扩大古巴共产党，以便使它能起到作为古巴社会领导力量的这一指定的作用。这一过程令人想起东欧共产党统治的头几年中所使用过的方法。直到1969年，估计古巴共产党只有五万五千党员。^①根据1973年4月的资料来源，党员人数为十五万三千人，据说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十四。^②后来1974年1月的一

^① 冈萨雷斯，前引书，第164页和脚注④。

^② I·佩特连科：“古巴人民的先锋”，原载《党的生活》1973年4月（第8期），第75页。

项苏联资料宣称“今天古巴共产党已有十七万党员。”^① 这表示在1973年内又增长了百分之十。有趣的是，卡斯特罗在1973年7月26日鼓吹“人要死而党不朽”这个口号的那次演说中宣布：“今天我们已有一个党员人数超过十万的党。”他把上述数字同革命前那些年代相比较，但他本人显然无法揭示这种对比实际上究竟有多大。有一项苏联的资料报道说：1974年底，该党党员已超过十八万人。^②

根据苏联一家杂志的记载，古巴共产党在1973年有一万四千三百六十个基层组织，四百零一个市级或与之相当的分支机构，六十个地区级和六个省级的组织。^③ 政府各部和各中央部门的党的基层组织，都由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直接监督。《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在1974年3月提供的最新数字是：1973年年底，该党有一万六千个以上的基层组织和四百六十个市级（或部门）的委员会。^④ 它所提供的地区级组织的数字不是六十个，而是五十九个。它透露说，党员中有百分之四十五年龄不到三十五岁，百分之二十五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教育，百分之五十五在物质生产各领域内工作。1973年2月古巴共产党书记处增加了四名新的成员，这反映出该党原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莫斯科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根据苏联共产党刊

① 吉洪诺夫前引文，第104页；“古巴共产党”，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3月（第3期），第138页。

② 前引戈尔巴切夫在《经济报》上的文章。

③ 佩特连科，前引文，第76页。

④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3月（第3期），第138页。

物《党的生活》记载,在1972年和1973年期间,苏联党和古巴党就工农业中有关党的组织、思想工作、党务工作,以及有关训练党的领导骨干等方面互派了各种代表团。^①从来自苏联和东欧的这类代表团的数目和级别来看,也反映出莫斯科正在作出坚定的努力。

在这两年中,苏联中央委员会主管党的组织部的三名副部长级领导人(佩伦、莫拉列夫、拉祖莫夫)和主管宣传部的两名代表(斯克利亚罗夫、麦德维捷夫),曾率领代表团到过古巴。东德党派过四个类似的代表团(两个由党的组织部门,一个由建设部门,一个由教育部门所组成)。波兰党从它的宣传部门派出过两个代表团,保加利亚党从它的建设、建筑和运输部门派出过一个代表团。此外,还有一些苏联高级代表团来到哈瓦那,目的是指导古巴各机构改组工作。在这些代表团中,有苏联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苏联教育部长普罗科菲耶夫,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主席沃尔科夫,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领导人谢尔盖·拉平(他同古巴签订了一个四年协定),以及苏联动力和电气化部长涅波罗伍伊。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代表团,都是分别由下列人员所率领:摩尔达维亚第一书记鲍季乌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多尔基赫,苏联文化部长福尔采娃,以及政治局委员、工会主席谢列平。此外,根据苏联的资料来源,“一大批古巴党务工作者正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高级党校学习。”^②

① O·加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古巴共产党人”,原载《党的生活》,1974年1月(第1期),第74页。

② 加米,前引文,第75页。

党的组织正在有条不紊和始终不懈地进行巩固工作。佩特连科在《党的生活》上提到：“吸收党员不是强迫的，而是根据党组织对可以入党的先进工作者加以训练，因而是有条不紊地完成的。”对党员资格来说，经济标准正在取代政治标准。“过去对新加入的党员提出的问题”是，例如“在猪湾事件期间你在哪里？”现在还要“补充”的，就是有关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和所取得的成就，帮助收割和训练等等问题。正如在其他共产党国家中一样，特别注意吸收工人入党。“例如，在哈瓦那省，将近三万人正在各种企业中培养成为党员。”佩特连科承认吸收小农入党有过一些问题：“在农民方面，今天有一点不同之处，那就是有私人田地，所以，他们入党就有很大的困难。正如古巴同志指出的，实际上要判断哪一个拥有私人田地的农民是一个值得吸收入党的先进工作者，那是相当复杂的。”^①

如果按照东欧的方式实行的话，党将继续得到迅速发展，接着就来一次清洗，然后再以稳定的步子来重新发展党的组织。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党员人数，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到八。古巴党至今仍占百分之二。

当时，苏联党的刊物对古巴党的发展表示十分满意。《党的生活》宣称：“一个监督所有社会改革的、公认的古巴人民的先锋队正在出现。这个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每年都在加强它的队伍，并对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重要领域加强影响。”^②《共产党人》甚至走得更远，说：古巴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所有领域里，已作为一种指导力量，作为社会的一个先锋队和

① 佩特连科，前引文，第76页。

② 同上，第75页。

政治领袖而把自己的形象树立起来了”。^①这种由古巴共产党介入甚至可设想为渗透的形式，已扩大到所有其他重要的古巴机构中去了。

苏联对古巴的军事政策，就是注意到古巴国内有一支强大的组织力量。古巴军人在国内事务中所起的那种重要作用，使得苏联通过它同古巴军人的联系，可以获得举足轻重的力量。正如爱德华·冈萨雷斯所指出：“革命武装部既是作为一支最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也是作为今日古巴受过专业训练的、有组织能力的人才的主要储备部而出现的。因此，在〔1970年〕收成失败后，革命武装部提供了大量人员以填补政府中的高级职位。”^②苏联在这种专业训练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使这个不断上升的军官阶级的思想定型过程中，苏联可能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而这个军官阶级是注定要替代马德里山街^③的那些开国元勋的。也许可以作为这一事态的象征的，那就是在1973年12月宣布古巴武装力量实行军衔制，使古巴军队同“友好”国家，亦即苏联集团更加划齐、协调一致起来。卡斯特罗在解释这一行动时也指出古巴武装部队具有很多复杂性，以此作为这个改革的一种理由。^④

目前，革命武装部的一些最高职位，仍然是在卡斯特罗及其最初的追随者手中。在这方面，莫斯科一直悉心培养身为

① 吉洪诺夫，前引文，第220页。

② 冈萨雷斯，前引书，第220页。

③ 1956年卡斯特罗一伙流亡墨西哥，曾在此地设立营地，后转移他处设立训练中心。——译者

④ 哈瓦那电台，1973年12月4日。

古巴共产党第二书记和革命武装部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他在1970年对苏联的两次访问，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1974年，他偕同妻子前往苏联，又作了一次时间很长的访问。那是被宣布为非正式的一次访问，总共花去了二月份的大半个月和三月份，其中包括顺道访问了东欧。他的这次访苏活动是这样紧接着勃列日涅夫访问古巴之后，这可能就是苏联为了维持良好关系所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当时，他曾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接见，但对他这次访苏之行没有发表特别公报。

从1970年以来，古巴人在苏联指导之下，按照苏联方针一直在改造其他一些政治和经济机构同习惯做法。特别注意建立古巴各种群众组织，以便使它们将起到同苏联相应的各组织一样的传动作用。

苏联评论文章把工会运动放在第一位。有一位苏联作者宣称：古巴人迄今还在“低估”工会的重要性，相反依赖个别的突击手来刺激生产。^①在工人事务中给工会以真正发言权呢，还是让工会发挥刺激生产那种苏联式的传统作用，古巴人显然对此感到苦恼。原定在1972年召开的古巴工会代表会议，直到1973年11月才举行。苏联政治局委员、苏联工会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出席了这次会议，这表示苏联对在古巴所进行的指导工作是满意的。^②

事实上，在1970年和1973年之间，古巴人果真采取了一些为苏联工人所熟悉的步骤。1970年9月，古巴重新采用了

① 佩特连科，前引文，第78页。

② B·戈尔巴切夫：“古巴：革命和经济”，原载《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74年3月（第3期），第10页。

在1965年强调精神刺激而废除了的工作定额制度。大约在同一个时候，古巴人采用了一种劳动卡片制度，借以考察工人的劳动表现。1971年3月，他们通过了一项“反对寄生者的法令”，违者将受到处罚，借以加强劳动纪律。有一篇权威性的苏联文章在党刊《共产党人》上援引上述两事时曾经相当满意地指出：

古巴就在进行精神刺激的同时，更加广泛地采用了物质刺激的办法，特别是对先进工人优先分配公寓房子和耐用物品。因而使如何衡量劳动量和消费的这一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运用得更加充分了。^①

对余下的私有的农民采取了新的控制措施。1971年底召开的全国小农协会第二次代表会议，竭力说服这些小农，使他们同意合并到国家部门中去。第二个决议就是要设法限制私人出售剩余农产品，还有其他一些措施，看来就是要迫使一批农民在国有土地上劳动。^②由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伊凡·I·鲍季乌尔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于1973年3月到达古巴，此行暗示着将会发生更多的事情。鲍季乌尔在摩尔达维亚的经历可以一直追溯到战后初期，因为，在将私有农业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方面，大概他被认为是一位专家。

青年、知识分子和妇女，也都是要在组织工作上作出新的

① 戈尔巴切夫和达鲁森科：前引书，第88页。

② 卡米洛·梅萨-拉格：“卡斯特罗的国内方针”，原载《共产主义问题》，1973年9—10月号，第32—33页。

努力的一些目标。1972年4月，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竭尽全力要使这个组织活跃起来；因为在二百万潜在的总人口中，当时这个组织已拥有十二万人。按照最近苏联的一些文章所引用的数字，1974年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成员是十三万二千人，由此可见，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特别的成功。1971年4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文化代表会议，紧接着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帕迪利亚被捕之后，对待知识分子公开采取了较前更为强硬的办法。1974年11月召开了古巴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这个独特组织系统，在意识形态上给苏联人带来了麻烦。苏联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指出，保卫革命委员会已深入到古巴人的生活中去，并且有点不太热情地说：“毫无疑问，保卫革命委员会在古巴的建立和开展活动中所取得的经验，就是古巴人民对革命运动实践的一种有价值的贡献。”^①另一个刊物仅仅说，那是“毫无疑问地具有重要意义的”。^②有时，苏联的评论文章这样说，这些保卫革命委员会在苏联人心目中即相当于苏联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即苏维埃），大概苏联的意向，就是要加强其他传统的群众组织，以减少这些保卫革命委员会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1974年1月访问哈瓦那，表示苏联对古巴国内事务的发展大大加以认可。他在1月29日的那次讲话中，宣称古巴革命现已达到了成熟阶段：

① 戈尔巴切夫和达鲁森科，前引书，第85页。

② 佩特连科，前引书，第78页。

正当打破旧形式、探索新形式这个不可避免和必不可少的时期，逐步过渡到一个积极地进行有计划建设的时期，你们的社会现在已达到了一个发展的阶段了。党、国家和经济发展，在一个久经锻炼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正满怀信心地展开着。①

勃列日涅夫强调在 1975 年召开的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性。在他访问期间所发表的那个联合声明写道：

目前要改善古巴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加强党的队伍，准备党的代表大会，提高社会主义国家地位，集中计划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精神教育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一工作的完成，将具有伟大的意义。②

这个联合声明说，新近的发展表明“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苏联发言人在发表评论时指出，这个联合声明“记录了两党完全相互谅解”和“目的一致性”，以及“两党坚定不移地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并且进而断言：“苏联共产党和古巴共产党一直保持着紧密的相互联系并定期交流经验，它们在发展和加强苏古友谊与合作方面起着主导作用。”③

① 《真理报》，1974 年 1 月 31 日。

② 莫斯科电台，1974 年 2 月 4 日。

③ B·格沃兹达尔耶夫：“苏联—古巴：立场和观点的一致性”，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4 年 4 月（第 4 期），第 3, 6 页。

卫星化的“喜悦”

撇开有形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不谈，莫斯科已经认识到，首先必须向卡斯特罗说明加入苏联集团是有助于改善他的国际地位，其次必须减轻他因成了卫星国而感到的不安和反对情绪，最后必须向他指明他在苏联集团之外可以照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来自东欧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大批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高级来访者来到了古巴。在1973年期间，这些来访者中包括东德外交部长文策尔和蒙古党的首领泽登巴尔。1973年到过古巴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人胡萨克，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斯基，罗马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以及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托多罗夫。1974年来访的名单中，则包括东德党和国家首脑昂纳克和辛德曼，以及北越总理范文同。波兰党的领导人盖莱克于1975年1月访问古巴；人们可以预料，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75年召开时，会有外国共产党庞大的高级代表团莅临大会。

古巴已日益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集团和阵线的开会地点。1973年3月，经互会成员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会议在哈瓦那召开，这是经互会第一次在古巴首都开会。4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古巴召开首次执行局会议。6月，社会主义国家公共卫生部长在哈瓦那召开了他们的第十四次秘密会议，这是破天荒头一遭。8月，决定在1975年首次在哈瓦那召开苏联集团的各国交通部长年会。1974年3月宣布苏联集团的作家

年会在 1975 年也将首次在哈瓦那召开。5 月还有两个头一次在哈瓦那召开的会议，即经互会的第一个附属机构即标准化委员会，以及“友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所召开的两个会议。1974 年年内还召开过苏联集团公安人员，高等教育部部长，海关总监和商会会长等各种会议。此外，来自苏联集团所有国家的外交部代表于 1974 年 8 月 22 日至 29 日在哈瓦那开会，为即将召开的这一届联合国大会商定一致的立场。

卡斯特罗还得到过莫斯科的同意，才闯入东欧、北越、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苏联欢迎他在不结盟国家运动中所扮演的这一积极角色。苏联的宣传在评论这一活动时即以此为证据极力强调以下论点：由于古巴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联系，古巴的国际威望提高了。这一观点已逐渐写进苏联所有的官方声明中去。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在 1971 年 12 月 31 日打给古巴的周年贺电中声称：

古巴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革命坚定性和勇气，已赢得整个进步人类的承认，并使古巴共和国的国际威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①

这三个领导人在 1972 年 12 月的贺电中声称，古巴的经济成就“有助于加强它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地位”^②，这一句话就是要把哈瓦那对古巴加入经互会的疑惧一笔勾销。1973 年 12 月的贺电强调独创一格的古巴革命推动了各国人民为争

^① 莫斯科电台，1971 年 12 月 31 日。

^② 莫斯科电台，1972 年 12 月 31 日。

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并声称“古巴的富于建设性的外交政策已具有国际声誉”^①。《真理报》在勃列日涅夫访问古巴前夕声称：“古巴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来说是可贵的，因为古巴是这个大陆踏上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第一个国家。”^②

勃列日涅夫在访问古巴期间还是喋喋不休地说：

亲爱的朋友们，古巴就幅员和人口来说不属于大国之列。但在当前国际生活中，古巴占有一种重要的地位，甚至我要说是一种卓越的地位。今日古巴已举世闻名。朋友热爱它，而敌人则憎恨它；亿万人民怀着一种同情和休戚相关的感情注视着它的发展。

这里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古巴是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使命就在于此。^③

联合声明表达了苏联对卡斯特罗在外交政策方面所作的努力深为欣赏：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高度赞赏这一事实，即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古巴共和国革命政府，通过他们的积极外交政策，为了完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在国际舞台上所承担的共同任务而作出了贡献。^④

① 莫斯科电台，1973年12月31日。

② 《真理报》，1974年1月22日。

③ 《真理报》，1974年1月31日。

④ 莫斯科电台，1974年2月4日。

苏联的评论文章已在着手抬高古巴革命的重要意义，为的是进一步讨好卡斯特罗。只要卡斯特罗一谈到古巴革命的独特性，苏联就贬低他的革命的国际意义。但他一接近正统观念，莫斯科就乐于给他以更多的荣誉。

K·L·麦达尼克和M·I·波利阿科夫在《拉丁美洲》1973年7—8月号上撰文，对古巴革命的国际意义表达了苏联几年来所给予的很大赞扬。^①他们把古巴革命列入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少数革命之内。他们写道：首先古巴表明共产主义革命在热核时代是可能的，而且并不是作为一种战争的结果；其次，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现阶段所发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远离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区域上和政治上的主要基地，而且从地理上来说是在孤立在这个基地以外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被帝国主义世界老是看成坚不可摧的阵地”——西半球，发展起来的。这两个作者将这一点归功于日益增强的苏联力量，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阵营已能在离它边界九千公里而离帝国主义主要堡垒只有九十英里的古巴建立一个强大的保护地区了”。

麦达尼克和波利阿科夫进而提出了古巴革命的一条主要经验就是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左翼集团可以搞共产主义革命，他们这样的说法几乎近于异端邪说：“自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出现共产党以来，一个独立的、广泛的革命民主（或

^① K·L·麦达尼克和M·I·波利阿科夫：“古巴人民的胜利和世界革命进程”，原载《拉丁美洲》，1973年7—8月（第4期），第39—50页。

民族革命)类型政治运动,首次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而这种政治运动是与共产党并行而存在的(并不依赖于共产党的)。”按照这两个作者的说法,这个“古巴经验已给‘南部’大陆,主要是在那些革命民主分子已经掌权或者可能掌权的国家进行反帝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新道路。”

他们认为古巴的感染力已越出拉丁美洲。古巴给“西方的民主知识分子和青年留下一种特别强烈的印象”,所谓西方,在作者看来,就是美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加拿大和日本。古巴也正在影响亚洲和非洲的反帝运动。古巴是把民族主义同社会主义和反帝运动等量齐观的,据说古巴对“世界革命解放进程”只是起到某种影响,而苏联分析家则认为应归功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古巴已把自己同苏联和苏联正统观念拴在一起的缘故。

莫斯科也正在把卡斯特罗从一个民族英雄转化为一个共产主义的英雄。例如,在《共产党人》1974年1月号上,有一篇文章对卡斯特罗特别有力地加以赞扬,说卡斯特罗的领导作风表明“主观因素在现代革命进程中正日益发挥作用”。关于这一点,这篇文章在结尾时写道:

古巴是广大人民群众极其有力地参加革命的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古巴革命之所以获得胜利,首先正是由于上述情况的缘故。但即使如此,古巴革命的经验却再一次强调了领袖在这个革命斗争中的突出重要性,他能够正确地估计历史环境,觉察到支配革命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动向,并把它们同劳苦大众的需要和可能联系起来。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当提出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

一个问题时，阶级斗争发展的逻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治才干和科学预见同样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菲德尔·卡斯特罗清楚地看到，不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能完成的。他决定同共产党人联合，而共产党人也表现了政治敏感和勇气，他对这个国家革命力量的团结统一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①

当然，说卡斯特罗之所以成为一个英雄，就是因为他联合共产党人，这样的赞扬未免有所冲淡了。尽管如此，这仍意味着是一种高度的赞扬。同样，卡斯特罗在1972年访问非洲、东欧和苏联期间所发表的讲话，苏联到1973年才迟迟出版了一个集子，接着给予很好的评论。又是高度赞扬了一番，但鉴于讲话的主要部分是卡斯特罗对苏联大唱颂歌，苏联显然不会不感兴趣的。

就卡斯特罗来说，他过去曾想在改造本国经济、中苏争端以及同非共产党政府关系方面成为一个革命的模式，后来证明他在哪一个领域都不能脱离苏联而超然独立，那时，他只好假惺惺地把他这种仰人鼻息的地位说成是独立的一种更高形式。卡斯特罗及其同伙唠叨不休的，无非是说不能把古巴看作是苏联的卫星国，因为苏联是无私的，不剥削人的，对小国的态度堪称楷模。在卡斯特罗看来，同苏联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也不意味着丢掉革命热忱，因为苏联是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最最伟大的和地地道道的革命力量。因此，在1972年7

^① 吉洪诺夫：前引文，第103页。

月和1974年2月所发表的苏古文件中，卡斯特罗对苏联坚持“阶级性”和“原则性”的外交政策都是大加赞扬的。

关于这方面，也许莫斯科从1973年9月阿尔及尔不结盟国家会议上捞了一大把。卡斯特罗在这次会议上开始发言时就斩钉截铁地说：“古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共产主义。”^①谈到不结盟的总概念时，他声称：“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分成“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政府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府”。从这个论点出发，卡斯特罗攻击那些臆断出来的美苏两个帝国主义理论的人，一头如中国，另一头为利比亚的卡扎菲，不结盟国家应该同他们划清界限。

有些人显然不公道，历史上就是忘恩负义，他们忘掉了事态真相，忘掉了帝国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所存在的深而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企图抹杀苏联人民对人类所作出的光荣的、英勇的特殊贡献。……怎能将苏联列为帝国主义？请问它的垄断企业在哪里？它加入了多国公司？它在不发达世界占有哪些工业，哪些油田？请问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哪一个国家，有哪一个工人受到苏联资本的剥削？

接着他说：苏联经济援助并不是来自对别国人民所进行的剥削，“而是来自苏联工人的流汗劳动”。他干脆照搬了苏联的一大段话：“要是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

^①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3年9月9日电。

大战和战后重建中的不朽业绩，那就不可能结束殖民主义的统治，也不可能使世界力量发生新的变化，因此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民为求自身解放而去进行英勇的斗争。”

卡斯特罗于是提醒与会者，说他们的不结盟过去是攻击美国的，现在也应该继续这样做。在这方面，苏联可起作用。他号召“世界上所有进步力量最紧密地团结起来”，以便取得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挫败至今仍然强大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势力所必需”）。他还声称，资本主义国家和发达国家“为了维持他们所建立的不合理的消费性社会”，他们对能源和原料的需要正在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异乎寻常的遏制力量”才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新战争，并使组成不结盟运动的“许多独立国家”免遭风险。所以，卡斯特罗争辩说：“要使我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疏远起来，那就会削弱我们的地位，听凭至今仍然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任意摆布。”无怪乎苏联的宣传工具捡取这篇演说中的一些片断，编入苏联的评论文章。

作为莫斯科的一员斗士，卡斯特罗继续跳出来强烈反对北京，特别是反对北京关于苏联帝国主义或者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责难。说他正在把这—个帝国主义换成另一个帝国主义，他的自尊心可受不了呀。于是，就象他在1973年7月26日所作的那次演说中那样，他时常嘲弄有关两个假定的帝国主义的奇谈怪论，而这种奇谈怪论正是自命为第三世界一部分的某些领导人肆意加以发挥的。因此，1974年2月的联合声明宣称：“两党同右倾和‘左倾’修正主义，同霸权主义和沙文主义倾向，都是不可调和的，因为这些倾向是同共产党和工

人党共同制定的国际方针发生矛盾的”（卡斯特罗的代表在1969年那次会议上弃权）。同时，必须指出卡斯特罗在对华关系这个问题上是有所克制的。他没有指名攻击中国。那时虽然有机会，但他并没有附和勃列日涅夫要求召开一次加深同北京的分裂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不过，劳尔·卡斯特罗在随后访问保加利亚时却同意联合公报中这么一段话，大意是“关于可否召开一次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及有没有必要性这个问题，双方交换了意见进行研究，这个新的会议将提出共同的指导方针，以适应国际形势中正在发生的变化。”^①

事实上，古巴—中国关系多时以来再也见不到六十年代初期那股火热的劲儿。北京虽然毫不犹豫地攻击过苏联在东欧的帝国主义行径，但并没有直接提到过日益密切的苏联同古巴的关系。古中贸易在多年下降以后，现已开始保持平衡。

当时，卡斯特罗竭力赞扬苏联的另一个要素，乃是把这种赞扬扩大了，包括赞扬勃列日涅夫在内。在某个特定时期对苏联第一号领导人的个人吹捧，看来就是卡斯特罗个人风格的一大特点。卡斯特罗在1963年同苏联妥协之后，就把赫鲁晓夫叫做“我所知道的最有才华的人物之一”，一个“帝国主义要认真对付的敌手”，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人”，一个“非常纯朴的人”和“古巴的伟大朋友”。^②十一年以后，他也是用那么多的相同的词汇来形容勃列日涅夫的。卡斯特罗除了竭力

① 《格拉玛周报》，1974年3月13日。

② 引自A·休阿列兹：“介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卡斯特罗”，原载《共产主义问题》，1963年9—10月号，第25页。

赞扬勃列日涅夫访问古巴的重要性以外，对勃列日涅夫个人的重要性和品质的称颂更是不遗余力。正如他对《消息报》所说的那样：勃列日涅夫“本来就是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整个政策的化身”。

他〔勃列日涅夫〕一踏上古巴土地，由于他的举止风度，诚挚谦逊，和蔼可亲，以及他对人民的尊重和同志式的态度，立即赢得了全体古巴人毫无例外的个人好感。凡是一个普通人和一个领导人的应有品质，他兼而有之。^①

卡斯特罗在接见《文学报》通讯员时使用的几乎也是同样的那套词汇。^②

前 途

随着阿连德的垮台，作为苏联在拉丁美洲活动的基地——古巴，对苏联来说甚至更为重要了。勃列日涅夫的古巴之行是在阿连德身死之前就已着手计划的，古巴接待勃列日涅夫时恭维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其动机可能就是古巴要想使莫斯科认清这一点。古苏关系看来已走上正轨。莫斯科要努力搞好它显然认为非常满意的同卡斯特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

① “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一次谈话”，原载《消息报》，1974年2月9日。

② G·鲍罗耶克和 Iu·戈洛菲亚钦科：“与非德尔同志的谈话”，原载《文学报》，1974年2月20日。

所进行的交易。反过来说，卡斯特罗也乐意集中力量来搞经济发展，并按照苏联的方针来组织他的社会。再说，这一点看来已在改善古巴经济方面得到了报偿，卡斯特罗可以利用它来证明他在国内的让步是有道理的，同时他和莫斯科也都可以利用它作为在拉丁美洲进行辩解的理由。

在外交政策方面，卡斯特罗正在干着莫斯科要他干的许多事。用1974年4月的苏联一篇评论文章的话来说：“哈瓦那最高级会议表明，苏联和古巴对所有一切紧迫的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①甚至在阿连德死去之前，卡斯特罗就在积极地扶植左派军人政权。例如，自从1972年同秘鲁建立邦交以来，秘鲁内阁差不多每一个阁员都访问古巴，秘鲁总统贝拉斯科的妻子和兄弟也到过古巴。劳尔·卡斯特罗于1974年7月至8月访问了秘鲁。贝拉斯科的访问古巴也许为期不远了。1974年，古巴和苏联都向庇隆夫妇这两个政权作出过坚决的主动表示。哈瓦那和莫斯科的电文所强调的就是阿根廷必须做到不依靠美国。

古巴利用它在拉丁美洲的新关系，力图在联合国和诸如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这一类机构中组成一些反美集团。正如苏联一篇评论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古巴代表团在这些机构中“揭露帝国主义大国旨在侵犯发展中国家权利的政策”^②。卡斯特罗强烈主张组织一个排除美国在外的拉丁美洲组织。其目的显然是要搞垮美洲国家组织，破坏里约热内卢条约，这正是苏联心向往之所在。因此，苏联预料它和古巴在拉丁美

^① 格沃兹达尔耶夫，前引文，第5页。

^② 同上，第6页。

洲的共同目的有朝一日将相互得到加强。接受了古巴，接受苏联就不难了。承认共产党古巴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哪怕仅仅是默认也好，就意味着在拉丁美洲事务中有了一个永久的苏联代言人。

可是，莫斯科在看待卡斯特罗的作用时却有一个内在矛盾。当前苏联的教条所强调的，是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经济成就的重大革命意义。这一点大概也是适用于古巴的。这种经济成就的目的，更直截了当地说，苏联和古巴在政治上所作的努力，目的就是要产生反美情绪并使拉丁美洲激进化，但是又要在不引起美国强烈的反应的情况下做到这样的地步。讨好现有政府比煽动革命风险要少些，但是莫斯科心中很清楚：要对付美国这个目标，可得谨小慎微。

当时，苏联从它同古巴的新关系中还看到其他一些好处。卡斯特罗是许多新左派分子的英雄。莫斯科一定希望它能够把卡斯特罗最初取得政权时所享有的一些革命光荣，硬是归于己有。因此，莫斯科对卡斯特罗在共产党人和不结盟国家的听众面前赞扬苏联确实感到特别高兴。因此，莫斯科也不是不乐意看到卡斯特罗一面充满革命词藻，一面又小心地定了调子大放厥词。但是这里，同样有一个内在矛盾。卡斯特罗把自己同苏联紧拴在一起，这样一来，他就使得苏联正在试图分配的那些非常革命的证书黯然失色。他对拉丁美洲激进分子的最大魅力一直在于：他仿佛对老派共产党那一套令人厌烦的词藻提供了新的玩意儿。不管他怎样文过饰非，他向莫斯科一投降，他的听众也就失去了很多。

不过，要扮演严守苏联纪律的追随者那种角色，看来卡斯

特罗很不适合。他过去曾试图迫使莫斯科在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采取行动。人们能想象到它们之间有许多问题可能导致误解，或者导致莫斯科或哈瓦那会提出新的要求。

对待美国采取适当的政策这个问题，确实使苏古关系不断遇到困难。卡斯特罗对和平共处或缓和从未感到轻松自在。也许他感到最最得意的，就是1973年9月他访问北越时（或者范文同在1974年3月访问古巴时）所签署的那一类公报。这一类公报既不提和平共处也不提缓和。1974年3月的那公报声称：“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还在继续玩弄侵略的罪恶阴谋，反对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事业。”^①公报中有一段话大约是古巴人起草的，那就是谴责了硬说是美国在拉丁美洲各地的活动，并“坚决地”支持“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合理愿望”。

随他们的便吧，古巴人对缓和是有自己的特别好斗的说法。例如，《格拉玛报》赞扬勃列日涅夫在1973年访问美国的这篇社论说，这次华盛顿会晤“并不是两股各自进行活动的和平力量汇合在一起了”，而是“一种政策即社会主义政策的胜利和另一种政策即帝国主义政策的失败”^②。《格拉玛报》进一步写道：“虽然我们能促使那些和平道路变得更为宽广、坚实和可靠，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同帝国主义进行战斗。”

对于美国，莫斯科和哈瓦那将继续会有不同的看法。莫斯科有它另外一些利益要考虑。莫斯科也许比古巴人更倾向于赞成美古复交，古巴人可能由于种种国内原因而踌躇不前。

^① 河内电台，1974年3月30日。

^②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3年7月2日电。

即使美国大使驻在哈瓦那，也不能完全排斥美国不被当作替罪羊来加以利用，不过，这样一来，就会引起一些问题。古巴政权也许比其他共产党国家甚至更加担心的是，它的社会向美国一开放，即使在有控制的基础上开放的话，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卡斯特罗从表面价值上接受了主张改变东西方均势的要求，就可以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要求苏联在安全方面作出更为正式的保证。卡斯特罗在1973年12月31日的一次演说中声称，苏联提供了“一支基本威慑力量，以反对美国佬帝国主义直接发动的侵略”^①。听到这次演说的有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的七个拉丁美洲国家和来自东欧的军事代表团。意味深长的是他作出这个声明，是在他重申古巴一贯立场（那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姊妹国家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并需要古巴部队”的话，古巴就向那里派出军队）之后。卡斯特罗也许一开始就可以找到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更为公开的、从而获得苏联正式保护的革命角色。卡斯特罗并没有（本来他有可能这样做的）向莫斯科讲一讲阿连德的教训，因为阿连德的失败证明和平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对这次政变作出最早的反应时就特别强调武装斗争，从而表明他早已看到了这一个教训。一次右翼政变，例如秘鲁的那次政变，可能使卡斯特罗相信需要更大的战斗精神。或者说那里还可能有一些新的革命形势，对此他就不能撒手不管。即使没有得到正式的防御保证，卡斯特罗也能断定：苏联所承担的义务，事实上已发展到这

① 哈瓦那电台，1973年12月31日。

样的程度，即莫斯科不能抛弃他，这就使他大有施展之余地了。

同苏联拥抱，原来还可以使卡斯特罗在国内受到很大限制。1974年勃列日涅夫—卡斯特罗声明中所强调的思想意识上颠覆的危险性，看来指的就是在古巴国内可能对苏古关系有所不满。1972年6月，劳尔·卡斯特罗辱骂“革命的敌人”，说这些人“居心叵测地把我们的困难同试图帮助我们摆脱不发达状况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专家所作出的努力联系起来”^①。他强烈要求起草一项新的法令，以便“对犯有反对其他工人国家的罪行加以惩处”。1972年11月13日哈瓦那电视报道，比那尔—德里奥省曾对“破坏从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得到的机器和其他工具”的一些“反革命分子”判刑，剥夺人身自由，从八年到三十年不等。劳尔在1972年12月22日讲话时警告过那些给“联结”莫斯科和哈瓦那“这一纽带投下阴影或则加以削弱的人”，说他们“将会发现自己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或者被他们难以逃脱的命运所粉碎”^②。坚持强调思想意识上有颠覆的危险性这个主题，说明这是至今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

当然，所有这些可能性，莫斯科都是知道的，但相比之下，莫斯科却认为取得苏联的全球威望和获得拉丁美洲都向苏联的开放这种可能性更为重要得多。莫斯科在苏古交往历时十五年之后，不仅积累了同卡斯特罗打交道的经验，并且还积累了相当大的资产。它仍然保持着在经济上施加影响的强大作

^① 《绿橄榄树》，1972年7月23日。

^② 哈瓦那电台，1972年12月22日。

用。古巴在安全上和军事援助上都依靠它。而现在古巴人正在给予苏联一个机会，以便按照苏联的方针来塑造古巴社会。

莫斯科的企图不仅是改造古巴社会，而且要在以苏联马首是瞻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也许是莫斯科耍弄的最复杂的一套把戏。莫斯科先前企图依靠老资格共产党人，但是，这些人活动得太快了，一下子被卡斯特罗所挫败。苏联的新策略更狡猾，企图在古巴社会扎下更深的根子。莫斯科正在试图在经济部门和军队中受过苏联训练的技术人员中间，以及在古巴这个唯一的政党内，建立一个为苏联的“院外活动集团”；对这个集团，当前领导可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当前领导一旦过去了，就由他们来接替。所以，莫斯科总是小心翼翼，不向当前领导进行挑战。事实上，莫斯科孜孜不倦地栽培了现在的领导人，特别是多尔蒂科斯、罗德里格斯、劳尔·卡斯特罗和菲德尔本人。但是，苏联之所以下大力是在于约束他们。

莫斯科的努力将在1975年受到一次关键性的考验，那时要安排古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两者都得采取重大的措施，这些措施将表明莫斯科在用它古巴的傀儡去取代卡斯特的个人统治方面究竟走得有多远。莫斯科打击这个权力中心的手法，可能同当前的古巴领导发生一次冲突。莫斯科对古巴的控制也可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章

“进步”的军人政权

古巴革命的样板不适用于拉丁美洲大陆是有许多因素的，其中之一就是军人在该地区的政治发展中扮演了主宰者的角色。在古巴，卡斯特罗的革命斗争，终于导致古巴军队的解体。然而，这种方式在其他地方并没有重复出现过。相反，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随着拉丁美洲以及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所出现的军人政权与日俱增，屡见不鲜的军事政变有了急剧增长。《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0年10月这一期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这样写道：“过去从来没有同时发生过这么多的政变，而且军人也从来没有作为这么严密组织起来的一支政治力量来采取行动的。”^①《消息报》的一篇文章对军人的与日俱增的政治作用也有类似的论述：

他们或明或暗地控制着政府的政策，担任国家生活的主宰者角色。军人在拉丁美洲各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连续不断的军事政变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②

^① 江·普拉斯基：“反对人民的军队和同人民在一起的军队”，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10期），第54页。

^② S·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与智利悲剧”，原载《消息报》，1973年12月3日。

其实，苏联共产党书记波诺马廖夫在《共产党人》1970年10月这一期上撰文评述拉丁美洲军人的作用时也指出，经验证明，军队所采取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就可决定某一个政权能否继续掌权。^①

到六十年代后期为止，苏联分析家们认为拉丁美洲军人仅仅是寡头统治者和美国的工具，利用他们，就可以为资产阶级和外国垄断资本家对这个大陆继续不断地进行剥削。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共产党专题讨论会曾经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武装力量主要是反动的高压政治和阶级统治的工具。”^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流行的观点是，“帝国主义”认为第三世界各国军队只不过是“他们”在冷战中的“战争机器的附属品”，而那些由美国训练和装备起来的拉丁美洲军队，基本上被视为“五角大楼的禁卫军”。^③而且，按照苏联的分析，有社会经济特权的拉丁美洲军官，大半是地主家庭或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出身，有了他们，就可以确保军队在该地区政治发展中历来所充当的反动角色。^④由于拉丁美洲温和的或者“进步的”政权屡被军人所推翻，这些观点看

① 波诺马廖夫：“关于革命进程理论的目前几个问题”，原载《共产党人》，1971年10月（第15期），第62页。

② “军队为谁服务？”，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4月（第4期），第48页。

③ V·科里奥诺夫：“在尖锐的斗争中”，原载《真理报》，1971年9月25日。

④ K·S·塔拉索夫：《美国和拉丁美洲》（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2年版），第148页。

来已经得到了证实。例如，1964年巴西古拉特政权的被推翻，若干年来一直被苏联作为一个典型，用来表明它对这个地区军人的总看法。由于军人在镇压拉丁美洲大陆各游击运动——尤其是在六十年代中期中所起的作用，莫斯科对军人所持的否定态度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因此，莫斯科对1968年秘鲁和巴拿马的军人夺权，正如对待1954年纳赛尔在埃及所搞的政变一样，最初也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苏联评论员为秘鲁立宪政府被推翻而表示哀叹，竟把秘鲁的将军们描绘为“在国内建立残暴的军事独裁统治的暴徒”^①，而巴拿马托里霍斯政变则被说成是又一次叛乱。从苏联当时的观点来看，华盛顿正在改变手法，即从过去依赖“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改为依赖在美国防暴学校受过训练的那些军人所掌握的政权。一个评论员写道：“五角大楼正在扶植一些新型的军事独裁者，并怂恿他们去夺权。”^②

可是，这些政权以及1969年9月上台的玻利维亚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将军的政府，开始采取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时制定了旨在削弱传统的寡头权力的改革方案，而且秘鲁和玻利维亚还扩大了他们同苏联集团的联系，这时，苏联原先的观点，也就从根本上重新进行了估价。特别是，秘鲁和玻利维亚将美国所有的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以及1969年初秘鲁撵走了美国军事代表团，使得莫斯科大为高兴。这些发展改变了苏联早先对拉丁美洲军人的看法，从而承认民族

① 莫斯科电台，1968年10月4日。

② Kh·科鲍：“暴徒的活动：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人起事；原因和结果”，原载《文学报》，1968年12月11日。

主义的军人政权能够采取“进步的”政策，并在拉丁美洲社会政治改革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因此，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决议中写道：“爱国的民主倾向正在一些国家军队中占优势。”^① 苏联一些评论文章指出，他们看到了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军队有可能仿效秘鲁和玻利维亚，而且不管怎样，在该大陆的武装部队中，已经出现了政治力量两极分化的新倾向。^② 1970年10月由胡安·何塞·托雷斯将军发动的那次有学生和工人参与的政变，使玻利维亚军人政权向左转的倾向更加明显了。^③

1970年秋，智利阿连德政权上台之后，“进步的”军人政权的重要性对莫斯科来说更加提高了，莫斯科认为这些军人政权就是正在席卷拉丁美洲的新的反帝和民族解放浪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3月30日苏共二十四大的发言中正式指出：“秘鲁和玻利维亚政府为了反对美国垄断资本家枷锁而正在进行斗争。”^④ 1971年8月，由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陆军上校领导的玻利维亚武装部队中的保守分子推翻了托雷斯政权，这使莫斯科多少有所泄气，但并没有改变它对“进步”军人的好感。波诺马廖夫在他1971年10月所写的那篇文章中简直把他们看成是拉丁美洲“革命进程”一

① 《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69年版），第49页。

② “秘鲁树立了一个样板”，原载《新时代》，1969年10月22日，第6页；莫斯科电台，1969年10月21日。

③ 详见C·D·科贝特：《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拉丁美洲军人》，国际事务专题论文集（佛罗里达，科拉尔盖布尔斯，迈阿密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72年版），第55—62页。

④ 《真理报》，1971年3月31日。

样，因此苏联对他们表示非常赞赏。波诺马廖夫特别引用了秘鲁“军方爱国分子”夺取政权的例子，断言：

因此，革命发展的进程证明了，新的国家形式可能会出现，它的特征就是有在逐渐发展中的武装部队的参加。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它的社会本质和原因，需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观点进行全面研究。我们应当记住，全部历史经验业已证实，这种革命发展的形式多半是由军队所采取的立场决定的，这种全面研究就更为重要了。……

革命民主主义情绪在武装部队（包括军官团在内）的出现和加强，可以加快革命发展的进程。^①

鉴于贝拉斯科政权的国内外政策，莫斯科对秘鲁样板特别感到兴趣。秘鲁老早就受到高度好评，因为它面对美国可能援用希肯卢珀修正案而将国际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华盛顿之所以未能对秘鲁的国有化政策采取报复性制裁，是表明“〔美国〕即便在美帝国主义者看作是自己后院的那部分世界，实际上也是阻挡不了世界的革命力量。”^②据说，美国再也不能用诉诸军事干涉的办法来镇压新的左派政权了。^③ 秘鲁还进一步得到苏联的嘉奖，因为它首先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接着又同古巴增进了友谊，而且也因为它对美洲国家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性的或美洲国家之间的会议采取独立的姿态，它

① 波诺马廖夫，前引文，第62页。

② 莫斯科电台，1971年4月19日。

③ 莫斯科电台，1971年2月26日。

的代表经常猛烈批评美国的缘故。在苏联人看来，所有这一切使秘鲁的“反帝”方针都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此外，莫斯科认为，秘鲁的一些国内政策措施意味着贝拉斯科政权也在采取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的姿态。虽然秘鲁官方规定国内不得存在任何政党，但秘鲁军人委员会却容许本国亲莫斯科的共产党活动，对此，苏联公开表示欢迎。秘鲁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具有“革命内容”的“激进的民主改革”也使莫斯科倍加振奋，例如，以牺牲私人企业来扩大国家经济成分，限制外国投资和外国公司，工人参加管理工业和农业合作社，席卷全国的土地改革和征收大批私人占有的土地（包括外国人所有的大农场），以及注重工业化等。^①因而，据说工人和秘鲁人民中的其他“进步”人士，都支持“政府的爱国立场”及其旨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克服经济落后”的各种政策，同时“秘鲁共产党人和总工会已动员广大群众支持正在进行中的改革”。^②苏联对贝拉斯科政权的支持，已从苏共中央致秘鲁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电中反映出来，这个贺电表示“深信”：秘共代表大会的决议将对“加强秘鲁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寡头政治力量的团结，支持由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总统领导的革命的武装部队政府的爱国事业”作出贡献。^③

① 例如，见 V·布舒耶夫：“拉丁美洲：新的十年中的第一年”，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2年8月（第3期），第43—44页；布舒耶夫：“拉美新见”，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3年5月（第5期），第36—37页；豪尔赫·德尔普拉多：“秘鲁的革命进程和共产党的立场”，原载《共产党人》，1973年9月（第13期），第104—115页。

② 布舒耶夫：《国际生活》（莫斯科），1973年5月（第5期），第37页。

③ 《真理报》，1973年11月4日。

莫斯科还日益感到，拉丁美洲军人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样板：秘鲁和巴西。他们一面承认，秘鲁样板不能“原封不动地搬到”其他国家去，一面又辩解说，由于这些国家面临着同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并且面临着共同的敌人——美国佬帝国主义，所以整个大陆的军人都特别注视着秘鲁的发展。^①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宣传总是竭力贬低巴西的“经济奇迹”。苏联的评论文章预言，巴西的经济成就——他们并不否认这一点——注定是短命的，而且，巴西军人政权今后还将碰到无法解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②鉴于在拉丁美洲军人控制的国家愈来愈多，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日益重要。虽然巴西的经济成就对这个大陆的军队中的许多人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可是，大多数国家都缺乏巴西所具有的那些优越条件，去吸引大规模的外国投资而同时又能保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与此同时，秘鲁经济的停滞不前，能否作为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样板，这是令人怀疑的。

巴拿马是莫斯科认为有机可乘的另一个国家，特别是由于它的长期以来棘手的巴拿马运河问题。象秘鲁的情况一样，苏联最初对托里霍斯政变的反应是否定的。在政变的那些日子里，莫斯科电台广播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为了华盛顿利益的政变”。1974年年中，巴拿马人民党（即共产党）回

① 莫斯科电台，1973年3月13日。

② 例如，见路易斯·里比埃罗：“在巴西‘奇迹’外表的后面”，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3年11月，第55页；A·P·彼得罗夫：“关于经济发展中的‘巴西样板’”，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7—8月（第4期），第24—38页；Iu·A·安东诺夫：《巴西，军队和政治》（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44页。

顾说：“必须记住，在政变问题上党是有分歧的。”并承认“把政变说成暴乱是错误的”，最后，转而宣称：“现在党能坚持说，1968年10月11日推翻阿努尔福·阿里亚斯的政变，是在国家危急时刻所采取的一种革命行动。”^①

巴拿马运河区争端，是苏联和巴拿马共产党人对托里霍斯采取更加赞赏态度的关键所在。他废除了从前同美国所签订的协议，被看成是“军人采取了爱国立场的标志，而这样的立场在当时还只有工人、农民和学生组织的代表们才有”，只有巴拿马共产党人才有。^②在苏联人看来，巴拿马不顾它依附美国的漫长历史而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权，这证明“拉丁美洲的政治气候真的改变了”。^③

苏联评论文章一再表明，莫斯科承认巴拿马运河在军事战略上对美国所具有的重要性。诚然，苏联《拉丁美洲》杂志刊载过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巴拿马共产党的领导人宣称：“共产党人相信，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准备为巴拿马运河而战。”^④

① “巴拿马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原载《情况通报》，第13—14期(多伦多，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出版社，进步丛书，1974年7月30日)，第86页。

② 鲁文·达赖厄·索萨：“巴拿马：斗争的新前景”，原载《拉丁美洲》，1973年1—2月(第1期)，第21页。实际上，1968年10月11日政变之后，新政府采取了许多步骤来镇压包括巴拿马人民党在内的左翼团体；这些左翼团体的最高领导人于1969年11月被流放至南美洲。只是在1970年中以后，政府对左翼分子的强硬态度才缓和下来。

③ 哥尼昂斯基，前引文，莫斯科电台，1973年1月10日；V·波罗夫斯基：“他们为什么因循苟且？”，原载《真理报》，1973年2月2日。

④ 索萨，前引文，第25页。

苏联在1973年3月在巴拿马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上所使用的手法表明，苏联意识到它一面表示同巴拿马站在同一立场，一面还必须适当注意到美国的敏感性。因此，在宣布苏联支持巴拿马立场之前，苏联代表雅各布·马立克在他向联合国所作的主要发言中，谈到了苏联对有争议问题的总看法。不过，很清楚，莫斯科对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同巴拿马站在一起反对美国是十分满意的。这次安理会会议还使苏联有机会表明它是支持拉丁美洲经济民族主义倾向的，即一切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拥有绝对主权。马立克在发言中向拉丁美洲国家保证，“苏联对他们的主权和自然资源是支持的”，而且在提到华盛顿对美国企业被拉丁美洲国家无偿地收归国有而威胁着要进行经济制裁作为报复时指出，对他们“施加直接或间接压力的任何企图”，苏联政府都是“反对”的。^①

会议之后，苏联在一个官方分析中得出结论说，会议“表明了西半球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那里，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更有利的条件正在形成，加强了拉丁美洲大陆争取独立发展的斗争。”^②同时，莫斯科企图把安理会会议在巴拿马举行，使国际注意力集中于巴拿马运河争端的这一功劳据为己有。例如，莫斯科电台援引了秘鲁共产党总书记的声明：

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际政策，帮助巴拿马政府就它的领土问题举行了一次安理会会议，从而有可能使威胁世

① 巴拿马城电台，1973年3月19日。

② M·V·阿尔京申科夫：“在巴拿马的对抗”，《美国：经济、政治、思想》杂志，1973年9月（第9期），第50页。

界这一地区安全的巴拿马运河问题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公众的注意。^①

苏联在公开声明中继续表示无条件地支持巴拿马的要求,并对美国反对巴拿马的要求,意欲在巴拿马运河区保持一个“军事桥头堡”进行了批评。他们断言说,这个“军事桥头堡”不是为了保护巴拿马运河,而是为了支持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政策,以及便于美国在那里进行军事干涉。^②

巴拿马共产党人采取了这种立场,即认为目前争端不在巴拿马运河本身,而在于巴拿马运河区。用巴拿马人民党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懂得,对美国来说,巴拿马运河命运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原则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一个对他们至关重要的地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提出巴拿马运河国有化的问题。^③

巴拿马共产党人和莫斯科一面继续批评美国的立场,一面对1974年2月美国同巴拿马达成的原则协议,采取了相当温和的态度。一个苏联评论员宣称:“这毫无疑问是向前跨出了一

① 莫斯科电台,1973年11月3日。

② 例如,见Ye·鲁萨科夫:“巴拿马运河将会是巴拿马的吗?”原载《真理报》,1974年1月11日;A·札哈罗夫和V·维诺格拉德:“为了消灭这个‘殖民地的国中之国’”,原载《红星报》,1974年3月24日;Iu·加维洛夫少校和V·别列津,“为了消除不平等关系”,原载《红星报》,1974年10月27日。

③ 索萨,前引文,第21页。(着重号是后加的)

步。”^①巴拿马人民党同意这一点，但警告说“这是暂时的胜利”。巴拿马人民党特别对协议中包含的这些原则表示不满，即关于运河的防务以及将来扩大防务能力问题，他们断言，这表现了美国决心“通过新殖民主义的手段”^②来保持它对巴拿马的统治。

苏联想在巴拿马事件中看到其他的“进步性”发展。巴拿马虽然还没有同苏联建交，但同包括古巴在内的几乎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都有了外交关系。巴拿马的许多国内措施，特别是有关将外国人所有的公用事业和电话公司收归国有，和在农业和工会方面的那些措施，以及巴拿马竭力提高美资企业的香蕉出口税都得到了莫斯科的赞许。^③尽管巴拿马人民党支持托里霍斯的政策，然而它同政府的关系仍然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1973年间，巴拿马人民党失去了它对巴拿马学生联盟的控制，同样对几个大学的学生组织也失去了控制。共产党人还在担心，只要政府决定取缔所有的政党，他们的活动说不定就会受到不利的影晌。

1972年，吉列尔莫·罗德里格斯·拉腊将军领导的政变推翻了何塞·马利亚·贝拉斯科总统的政权之后，厄瓜多尔也被列入了苏联认为的“进步”军人政权的名单。厄瓜多尔军事领导虽然并没有对苏联表示任何特别的热情，但他们的行

① A·鲍文：“关于强权与公理”，原载《新时代》，1974年3月（第10期），第20页。

② “巴拿马人民党政治局公报”，原载《情况通报》，第5—6期（多伦多，和平社会主义问题出版社，进步丛书，1974年5月23日），第47页。

③ 例如，见莫斯科电台V·伊凡诺夫的评论：“美国垄断资本家的香蕉战”，1974年8月4日；“巴拿马为加强民族经济而斗争”，1974年11月10日。

动却被说成“具有反帝的民族主义的性质”，并且，按照厄瓜多尔共产党的说法，“武装部队中大部分成员是站在民族主义的进步立场，即捍卫民族主权的立场。”^①在莫斯科心目中，这个政权由于采取了“旨在限制寡头和外国垄断资本家的经济统治”的种种措施，早已赢得了“进步”政权的称号。得到苏联特别赞赏的就是以下措施：土地改革；国家工业发展计划；“有利于工人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共产党的合法化；旨在限制外国石油公司的活动并与厄瓜多尔合营的“反帝政策”；取消原先给予外国的石油租让权；向外国公司征收更高的矿区使用费和税收等。^②结果，厄瓜多尔共产党一般来说是支持政府的，并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工作，以支持政府的“反帝”和改良主义的政策。

另一个被莫斯科视为“进步”的军人政权，看来就是洪都拉斯，据说这个国家的政府掌握在“爱国”军官手中。^③虽然军人在奥斯瓦尔多·洛佩斯·阿雷利亚诺将军的领导下于1972年12月4日掌了权，但直到1974年1月洪都拉斯共产党才出来支持政府的国家发展计划中所反映的“进步措施”。这项计划包括了据说是“直接反对大庄园主寡头”的土地改革。^④

① 厄瓜多尔共产党总书记佩德罗·萨德的声明，莫斯科电台，1972年12月29日。

② 布舒耶夫：《国际生活》（莫斯科），1973年5月（第5期），第37页。

③ S·M·亨金：书评“И·А·安托诺夫的巴西：军队与政治”，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第6期），第200页。

④ 洪都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里戈维托·帕迪利亚·鲁斯：“为了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原载《党的生活》，1974年11月（第21期），第78—79页。

“进步”军人政权的出现，以及拉丁美洲军人在政治上日益积极的活动，给苏联在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上提出了许多问题。正如波诺马廖夫所说，这一“新现象”不仅需要作出解释，而且需要阐明在“进步”军人和革命进程之间有联系的理论，以及对苏联支持这些政权和当地共产党在同这些政权的关系中所起作用等方面提出正当的理由来。

当然，这种现象并不象波诺马廖夫在1971年发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么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一些激进的军官曾经搞过短命的政变，最有名的是1932年激进军官在智利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非洲、中东和亚洲，也出现过“进步”的军人政权。可是，拉丁美洲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即在大多数情况下，后者是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缺少已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按照苏联的分析，在这样一些国家中，军人往往代表了最强大的、最开明的和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由于卷入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而日益变得政治化。^①然而，拉丁美洲却被看成是正在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按照标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那里的军人是作为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美国大企业利益的工具。因此，波诺马廖夫把那些执行了广泛的社会经济改革计划的拉丁美洲军人政权的出现，说成是一个“新”的发展，是有点道理的。同时，正如他所指出的，有必要对这个事实找到一种解释，即就这个大陆的军人的观点和政策来说，为什么有一些人

^① Y·茹科夫等：“第三世界：问题与前景”（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0年版），第193—195页。

是“进步的”，而另一些人仍然是“反动的”。

苏联分析家们对以下两种观点是有争论的：其一是，否认军人有任何进步作用；其二是，把第三世界的军人看成是当今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和在欠发达国家中实现彻底的社会经济改革的最卓越的力量。^①他们认为，这些观点不是反映了“过分简单化的反军国主义”，就是夸大了军人的作用，因为两者都没有考虑到军队的阶级本质。苏联的观点是，“军队既不是凌驾于各阶级之上，也不是在各阶级之外”，所以，它是“社会的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因而是反映出社会政治发展，又是同社会政治发展相应的。^②

苏联对拉丁美洲军人态度之所以转变，重新作出了一种解释，据说这是由于他们的社会成分已经发生了变化。原先，军官团都是寡头和上层资产阶级出身，现在来自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军士则征自城乡无产者。^③反过来，这就使得军人同广大人民的关注和愿望更加紧密地一致起来。特别是有些人，由于身受美国企业和上层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竞争，因而怀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感情，竭力谋求社会改革。结果是，军人变得不怎么愿意维护现状了，为了保卫国家的民族主权和利益，他们日益倾向于采取一种“反帝观点”，并

① 茹科夫等，前引文；并参照莫斯科电台广播，1973年7月15日。

② S·米高扬：“变化中的大陆面貌”，原载《在国外》，1971年5月14—20日。

③ 布舒耶夫：“拉丁美洲军队的新倾向”，原载《红星报》，1972年10月3日；塔拉索夫，前引文，第151页；Kh·科鲍和G·I·米尔斯基：“关于拉丁美洲大陆军队发展的特点”，原载《拉丁美洲》，1971年7月（第4期），第47—51页；莫斯科电台，1974年3月26日。

对“深刻的社会变革”表示赞同。^①

据说使得军人采取“进步”立场并积极卷入政治进程的另—因素是，他们要求国家的机构和经济讲究效率和现代化，以及他们作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愈来愈多地参与经济活动。关于这种发展，苏联有一个分析：

这样，在高级军官行列中，形成了一种军人专家政治。这个阶层感兴趣的是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铲除陈旧的社会经济结构摆在发展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另一方面，这个阶层自然是千方百计地反对社会革命的。^②

应当承认，军人要转变成为一种反帝的进步力量，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准备“实行重大的改革”，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不能仅仅根据武装部队的社会成分和阶级根源来解释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就象任何其他社会机构一样，在政治上不可能都是清一色的。其中势必会有右翼力量，他们以同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作斗争为借口，准备把祖国祭献给帝国主义的圣坛。然而，在每一支军队中还有一群爱国军官，他们相信自己的任务就是保卫祖国和人民的神圣利益。^③

① L·帕迪里拉等：“拉丁美洲：反帝斗争和军队”，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1年3月，第89—90页；布舒耶夫，《红星报》，1972年10月3日。

② 科鲍和米尔斯基，前引文，第52页。

③ 莫斯科电台，1973年7月15日。并参阅“军队为谁服务？”，前引文，第53页。

诚然，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在一个特定国家中阶级斗争的阶段和特点，要看寡头和外国财团收买军官团到了什么程度，而且要看训练高级军官所采取的形式和政治内容。因而，他们指出，就秘鲁来说，军官们进了高等军事学校，特别是在高等军事研究中心，进修“最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理论，同时一些持有进步观点的专家则被请来作为他们的教员。”^①这就在秘鲁军人中产生了一种进步的态度，“使他们更好地懂得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掠夺拉丁美洲的手段”，以及“保持现状将使这个大陆遭到多么严重的损害。”这就使他们掌握一种“对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们不会陷入极端主义，使国家招致无可挽回的损害。”^②

据说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自己在无意中促成这种进程的，因为它曾经强调过民众工作应作为军队的首要任务。苏联分析家们显然相信，这个政策已使拉丁美洲军人在社会上和政治上觉悟起来并在拉丁美洲产生了反美的民族主义倾向，美国由此自食其果。再说，苏联评论家们还在进行推测，六十年代中期的反游击战活动，至少使一些军人变得激进起来，结果使坏事变成了好事。而且，美国由于对拉丁美洲武装部队训练和装备的任务加以限制，包括不给他们更加尖端的武器和装备，这样已同拉丁美洲军队专业化的要求发生了冲突。因而，据称“军队专业化的问题正在成为拉丁美洲〔制度〕危机更为深刻的表现之一”，同时，

① 科鲍和米尔斯基，前引文，第49页。

② 同上。

客观上,美国所采取的这样一种军事政策,同这个大陆军队的专业化兴趣日益发生冲突,因为后者就是对获得各种类型的现代武器,发展他们自己的军火工业,以及建立多种类型军事学校网感到兴趣。”^①

他们进而断言,“专业化和政治化并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概念,而是出现在军队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②

“进步”军人政权兴起与拉丁美洲革命进程的关系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问题。显然,莫斯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有助于使“世界力量的对比”朝着有利于莫斯科方向发展。可是,同时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苏联能够指望这些政权把它们“进步”政策贯彻到什么程度呢?这同苏联支持它们应该有多大密切的关系?当地共产党在同它们的关系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莫斯科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无疑必须考虑到种种因素和先后次序,其中有:对于各个拉丁美洲国家出现共产党领导的或左派的联合政府的前景;关心当地共产党的活动,不致于损害苏联对加强同该地区的关系及其在该地区影响的全面努力,也不致于对苏美关系产生重大的相反的效果;拉丁美洲共产党显然希望对军人政权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给自己争取达到有影响

^① A·F·舒尔戈夫斯基:“拉丁美洲:军队和政治”,原载《拉丁美洲》,1971年7月(第4期),第8-9页。

^② 同上,第13页。

和有权势的地位；同时需要反击来自激进左翼分子及政党的批评，这些左翼分子和政党通常对于所有的军人政权都是加以反对的，并认为共产党同军人政权的合作，就是“背叛”革命。

苏联和共产党分析家们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进步”军人政权的出现，是“反帝斗争的一种趋势”，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仍然薄弱而不足以“领导群众开展夺权斗争”的那些地方。^① 这样一些政权之所以发挥了一种积极的作用，就是因为它们不仅能改善人民的命运，而且还“为发展开辟道路，清除积聚在不正常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上的弊端，消灭落后和依赖”，^② 即对美国的依赖，从而为革命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是，这些分析家同时告诫说，有必要考虑到军人的阶级特征及其目标之局限性。他们指出：“新式军人”自以为“从客观上来说就是革命进程中唯一可取的力量”；^③ 他们往往缺乏一种发展得很好的思想认识，企图“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并且声称要使“革命的共产党没有必要存在下去”^④。因此，不能把“进步”军人看成是一个“先锋党”（即用以替代革命的共产党），“也不能指望由于有了他们就使最后的社会主义革命

① 豪尔赫·特克西尔：“解放进程的概貌与特点”，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2年4月，第109页。

② 米高扬，前引文；并参阅V·特卡钦科：“拉丁美洲：解放斗争的问题”，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2年5月（第5期），第10页。

③ 米高扬，前引文。

④ 同上；特克西尔，前引文，第109页；茹科夫，前引文，第196页。

成为毫无必要了。”^①

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表明，具有民族主义的进步的军人分子能够为革命的转化铺平道路……但在军人的主持下，是不可能把革命顺利地向前推进的。^②

最后，为了把“进步”军人同那些为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寡头效劳的“反动”军人区别开来，苏联分析家们把“进步”军人称之为“具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民主的”，或者是“进步力量的同盟者”，但并没有把他们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力量。

当地共产党和“进步”政权的关系，据说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并证明为合理的。其一就是如下论点，即这些政权只要谋求人民群众以及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社会上“最先进的”分子的支持，就能顺利地推行他们的改良主义政策。因此，他们断言，“军队中的爱国分子只要同人民建立联系，并与左派及其他爱国力量一起工作，就能够从事进步的复兴工作”，^③得不到这样一些力量的支持，这些政权“既不能维持政权，也不能前进一步”。^④因此，1971年玻利维亚托雷斯政权之所以垮台，据说就是由于没有得到群众和军人的“可靠”支持。^⑤

^① V·季赫迈涅夫：“列宁主义和拉丁美洲革命进程”，原载《共产党人》，1971年2月（第3期），第118页。并参阅G·卡尔特萨格：“关于拉美革命进程的发展”，原载《拉丁美洲》，1973年9—10月（第5期），第62—67页。

^② “军队为谁服务？”，前引文，第48—49页。

^③ 同上。

^④ 卡尔特萨格，前引文，第19页。

^⑤ A·斯克列尔尼克：“革命一定能够捍卫自己”，原载《苏联军事评论》，1973年10月（第10期），第6页；波诺马廖夫，前引文，第62页。

另一个因素是,由于同“进步”军人政权进行合作,共产党可以得到合法化,至少也得到宽容,这样一来,就有机会去扩大他们的活动并加强他们在民众中的地位。因而他们就能够对这些政权的政策施加积极的影响,同时为最终的革命作好准备,这一革命将把军人取而代之或则加以推翻使共产党取得政权。因此,据说左翼力量的任务就在于把政策统一起来并加以推进,那就是“使他们能够利用这些政府提供的机会,把斗争推向前进”^①。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反映在秘鲁共产党总书记的声明中。他就是这样写道:

正如我们所知,在秘鲁,我们亲眼看到了带有反对资本主义色彩的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寡头政治的革命。它是拉丁美洲革命进程的一部分,即使从水平上和阶级力量对比上来说,和古巴、智利都是不尽相同的。共产党人正积极投入这一革命,并正加紧工作使之深化。我们支持军人政府的进步措施,力图把赞同社会主义的观点告诉群众。^②

随后,他将发展政府同“进步的革命力量”之间“愈益密切的友好关系”列为党的任务,并“加紧进行政治思想活动,为完成秘鲁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并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③

^① 特克西尔,前引文,第109页。并参阅塔拉索夫,前引文,第175页。

^② 豪尔赫·德尔普拉多:“革命在继续”,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3年1月(第1期),第65页。

^③ 豪尔赫·德尔普拉多:“秘鲁革命的进程和共产党的立场”,原载《共产党人》,1973年9月(第13期),第115页。

共产党一面准备为过渡到革命进程的“社会主义”阶段而斗争，一面支持“进步”军人政权，力图使后者放心。因而，据说“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反帝人民大众统一战线，对各国进步的军人政府来说就是一个可靠的支持。”^①可是，同时又暗示说，只要军人坚持他们的“进步”事业，共产党人将继续给予支持并同意军人掌权。

就是这些军人，如果他们确实能够理解客观发展的要求，并从“超阶级”的立场移到革命阶级的立场上来，那么他们照样可以当领导人。^②

这种态度反映出苏联分析家们和各国的共产党对军人都是一直有怀疑的，甚至在阿连德垮台之前也都是这样。他们敏锐地指出，“如果认为政治化仅仅指军人中进步态度有了发展，那是不正确的”，^③而且“说到拉丁美洲军队的革命化，尚为时过早”^④。有一个分析家一面在赞扬“进步”军人政权，一面又告诫说，“不应过高估计军队在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而且“不能相信，在拉丁美洲就永远不会再发生反动的军事政变了。”^⑤军人的看法“也可能堕落到不折不扣的改良主义”，即反对共产党人谋求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各种变革。

① 卡尔特萨格，前引文，第20页。

② 同上。

③ 舒尔戈夫斯基，《拉丁美洲》，1971年（第4期），第13页。

④ 布舒耶夫，《红星报》，1972年10月3日。

⑤ 卡尔特萨格，前引文，第21页。

再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给予军官们强有力的影响”，而且有可能象巴西和班塞尔总统统治下的玻利维亚的情况那样，采取一种反苏和反共的形式。^①最后，军队不是铁板一块的，“应该记住，爱国军官政权的基础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并由各种不同成分所组成的，它的社会倾向性会发生动摇不定和激烈的变化。”^②因此，基于这一分析，莫斯科至少在理论上对智利所发生的反阿连德军事政变总是有所准备的。

可是，就莫斯科的观点而言，它对当地共产党同“进步”军人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远不如它对拉丁美洲“反帝”即反美斗争的继续和激化来得关切。苏联不仅给予这一斗争以最优先的考虑，并以此作为确定它应该支持哪个政权的主要因素。如果对拉丁美洲军队在决定国家所选择的政策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作出评价的话，它认为，作为一种战略来说，“为了深化反帝的解放进程，军人内部态度之激进化是极端重要的，”^③即便在阿连德被覆灭以前也是如此。

① “军队为谁服务？”，前引文，第48—49页。

② 同上，第53页。

③ 舒尔戈夫斯基，《拉丁美洲》，1971年7月（第4期），第40页。

第四章

阿连德政权及其结局

莫斯科认为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人民联盟政权于1970年上台执政是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据说这个“胜利”，“作为对拉丁美洲帝国主义体系的一种革命打击来说，其重要意义仅次于古巴革命的胜利”。^①它表明拉丁美洲的革命进程愈来愈迅猛，^②从而使这个地区成为“反帝斗争的主要前线之一”^③。阿连德成功地当选为总统被说成是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战略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策略的有效性的明证。在同北京的论战中，莫斯科急忙指出，在智利，“不是枪杆子而是革命阶级的行动，使人民接管了政权”^④。智利不仅成为拉丁美洲革命斗争的榜样，而且也是西欧的样板。在莫斯科的敦促下，拉丁美洲其他各国的共产党，谋求以智利为榜样，试图组成一个“进步”政党的统一战线，但

① V·G·斯皮林：“美帝国主义和拉丁美洲现实”，原载《美国：经济、政治、思想意识》，1971年8月（第8期），第33页。

② B·波诺马廖夫：“关于革命进程理论的目前几个问题”，原载《共产党人》，1971年10月（第15期），第15页。

③ V·特卡钦科：“拉丁美洲：解放斗争的问题”，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2年5月（第5期），第10页。又见1971年11月6日V·V·格里申的讲话，莫斯科电台，1971年11月6日。

④ 莫斯科电台，1971年1月8日。

是都没有造成一种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或者取得政权。^①

莫斯科未曾同以前的爱德华多·弗雷总统的基督教民主党政权发生过不愉快,也确实没有预计到阿连德能组成政府。在苏联看来,弗雷所采取的一些立场,已使他的拉丁美洲政策方针迎合了苏联的观点。弗雷将铜矿收归国有,并同共产党国家(特别是同苏联和古巴)改善关系的行动,使它进入了莫斯科投以青睐的那类政权的行列。^②

因此,1967年苏联曾与弗雷政府签署一项协定,向智利提供大约四千万美元的一般贷款和一千五百万美元购买苏联机器的贷款。考虑了很多项目,包括建造一家轧铜厂以及生产润滑油和房屋预制部件的工厂。此外,也商讨过在瓦尔帕来索建造一个渔港的可能性。但是,在弗雷总统执政期间,这些项目中没有一项实现过。

1970年选举前夕,苏联评论文章丝毫没有料到阿连德会获胜。直到智利国民议会批准阿连德为当选总统时,苏联的宣传工具在大量的评论中还犹豫不前。而且,特别在人民联盟政府上台之初,莫斯科对于联盟成员能否保持团结和联盟政府能否存在下去依然相当的紧张不安。不过,尽管在联盟政府存在的整个过程中,莫斯科始终保持这种紧张不安的状态,但它还是竭尽全力去利用阿连德政府。

① M·F·库达奇金：“站在反帝斗争前哨的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原载《近代史和现代史》，1971年5月（第5期）；V·科里奥诺夫：“重要的变革”，原载《真理报》，1972年5月11日；特卡钦科，前引文，第12—13页。

② 关于苏联对弗雷和阿连德政权初期的态度的更全面的讨论，见L·古雷和J·苏奇利兹：“阿连德政权：行动和反应”，原载《共产主义问题》，1971年5—6月，第55—58页。

尽管莫斯科对弗雷比较有好感，但它对他被阿连德取代感到更为满意。因为对莫斯科来说，这件事表明，通过形成一支改良主义势力以压倒拉丁美洲的左的或右的极端势力的这种最有希望的尝试已经失败了。莫斯科关于拉丁美洲问题，特别是智利问题的主要专家之一 I·N·佐林娜，写了一本纯属这个问题的书，名为《拉丁美洲的革命或改良》。她在结论部分声称：“弗雷在 1964 年—1970 年期间的‘社会试验’，是拉丁美洲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即执政的中坚分子所能作出的最重大的努力，要在一个总的改良主义计划（即‘争取进步联盟’）实施其独特的、自上而下的预防性‘和平革命’，从而实行旨在把智利从死胡同中拯救出来的改革，而最重要的是要阻止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反帝民主革命的发展。”^①她断言，基督教民主党人不能继续执政，“确定了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不再希望，也不能自行解决这个洲正在成熟的问题”，由于回避革命，改良主义者已在智利遭到失败。她主张，唯一的出路是革命。^②

阿连德政权的存在愈久，莫斯科认为从它那里得到的政治利益就愈多。当然，莫斯科对这个政权初期采取的国内政策（特别是把美国公司收归国有的措施）非常满意。在苏联看来，阿连德政权与古巴恢复关系是一个关键性的行动，导致美洲国家组织对卡斯特罗制裁的最终崩溃。由于出现一个比卡斯特罗的观点更加遵循苏联路线的阿连德政权，又因为向卡

^① I·N·佐林娜：《拉丁美洲的革命或改良》，原载《拉丁美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46—247页。

^② 同上，第251页。

斯特罗在拉丁美洲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而这个盟友却不必对哈瓦拉表示感恩的，这样一来，阿连德政权的存在已使莫斯科同卡斯特罗之间的问题得到缓和了。

由于阿连德政权显示出它能存在下去，苏联对它和对它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以至整个世界力量对比的影响，似乎增强了信心。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3月30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宣称：

智利人民联盟力量的胜利是一件最重要的大事。因为在这个洲的历史上，人民第一次得到了用宪法的方法建立一个他们所需要和信任的政府。^①

然而，勃列日涅夫告诫说，“这已激怒了智利国内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他们力图夺取智利人民的胜利成果。”对于最终的结果，他没有下结论。苏共二十四大的最后决议，对智利问题未作专门论述，而是仅仅提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正在日益猛烈地发展中。”^②

看来莫斯科以为阿连德政权渐渐巩固，再加上拉丁美洲的其他一些发展，使得苏联展望智利和整个拉丁美洲的言论似乎逐渐乐观起来。至少，拉丁美洲被说成是正处在“反帝斗争新阶段”^③。在这个新阶段中，美国已遭到古巴，以及智

^①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71年版），第25页。

^② 《真理报》，1971年4月10日。

^③ 豪尔赫·特克西尔：“解放运动的一般特征和与众不同的特征”，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2年4月，第104页。

利、秘鲁和巴拿马的各进步党派、进步运动和进步政府的反对。

苏联的言论日益表明它把这些发展不仅看作是“反帝”斗争的高涨，而且看作是它在反对资本主义总斗争方面的连锁反应。早在1971年头几个月，苏联的一些文章就引用过乌拉圭共产党第一书记罗德内·阿里斯门迪的话，说拉丁美洲存在着“具有普遍性的革命形势”^①。1971年10月发表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的共产党联合声明中断言：“解放斗争的汹涌澎湃和群众的明显转向左派，是本洲形势的最主要特点。”^②

苏联领导如此热衷于智利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和前景，其长远目的也许可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诺马廖夫发表在《共产党人》1971年10月号上的文章中看出。波诺马廖夫从智利的经验中得出六条“基本教训”。^③

第一，他强调智利“确认”苏联关于“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和指导力量”这一革命的正统模式。诚如波诺马廖夫所表明的那样，这对于要驳斥未被指名的，特别是卡斯特罗和中国人的支持者所持的理论，即关于知识分子、学生或其他社会集团也能起这种作用的“机会主义说法”，具有头等重要性。这也支持了苏联的论断，即拉丁美洲不是一个“特殊世界”，那

① 弗·季赫麦涅夫：“列宁主义与拉丁美洲的革命进程”，原载《共产党人》，1971年2月（第3期），第118页。又见M·F·库达奇金：“站在反帝斗争前哨的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原载《近代史和现代史》，1971年5月（第5期）。

② V·布舒耶夫：“拉丁美洲：新十年中的一年”，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2年3月（第3期），第43页。

③ 波诺马廖夫，前引文，第61—62页。

里的革命进程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采取独特形式，而是它也得服从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其他资本主义地区发展的这个共同“规律”。

波诺马廖夫得出的第二条教训是，智利的经验已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团结，特别是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团结的价值。他说，这条教训“不仅超越国的范围，而且超越洲的范围。”很明显，他暗示的是西欧。西欧是莫斯科始终在谋求撮合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起来组成共产党—社会党统一战线的地方。

他的第三条教训是与第二条教训有联系的，即人民联盟的胜利证明“一个一贯民主的政府，可以和平地夺取政权”。为了替自己打掩护，波诺马廖夫否认这就是等于改良主义，因为，选举活动已经与议会外的群众活动相结合。

他的第四条教训是，智利显示出正确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这一条中含蓄地对阿连德政权执政第一年在在这方面干得好，下了评语。

他的第五个结论是关于“拉丁美洲国家工人阶级的团结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进步力量在道义上的支持”对智利取得成功的重要性。他断言，这个因素已经阻止了美国直接的干涉。除了苏联在道义上支持阿连德外，唯一的暗示是他宣称，由于面临着美国进一步力图对智利搞阴谋，“苏共将一如既往，对智利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实际的支持。”

最后他说，智利表明革命“必须懂得如何进行自卫”。在阿连德死后，当讨论到应采取何种适当的政策来对待智利军人时，议论中引用了列宁主义的这一格言，而波诺马廖夫在1971年则完全是用政治上的措辞，特别是用动员和加强人民群众

与“进步”力量的团结这类措辞。但同时，他又并不提醒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的危险，指出在1970年，“军队的中立态度是人民联盟制胜的主要因素之一”。更能表明当时苏联的信心的，还在于他似乎在劝说智利共产党人进一步推进革命。他引用了当时智利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决议中的一段话，说智利变革的进程如不深入，反革命就会获胜。波诺马廖夫还给阿连德政府推荐一种更加强硬的政策，他的言语中似乎暗示了“保守派在国家机构中把持着职位与各派力量的真正崩溃不相适应”，还暗示“在国家体制中作出重大变革的问题……尖锐地出现了。”他唯一小心谨慎的意见是，既然共产党人正在宪法机构中进行活动，他正在建议中的重大改革必须逐步地实现。然而，他的疏忽在于直言不讳他的信心。对于用以获得中产阶级合作的让步，他没有建议什么，甚至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波诺马廖夫文章之妙，就是把智利与拉丁美洲联系起来，又把两者同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他断定，智利已和古巴结合在一起，成为指导“革命运动已进入新阶段”的拉丁美洲的“另一支自由的火炬”。这个新阶段“对世界革命进程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并对有利于苏联的世界力量对比产生“强大的影响”。

这些乐观的调子，在阿连德执政期间一再唱过。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12月21日庆祝苏联建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广泛的反帝民主变革”已使苏联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大大地向前推进”了^①。在1973年4月墨

^① 莫斯科电台，1972年12月21日。

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访问苏联期间，苏共政治局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大胆地断言：

现在，拉丁美洲已经进入它的发展中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今天，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风暴正在席卷这一个洲的广大地区。拉丁美洲人民发扬十九世纪初叶解放战争的光荣传统，正在越来越坚决地投入维护民族尊严、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这个斗争已经导致社会经济的大大改善和重大的进步变革。^①

波德戈尔内在赞扬了古巴并指出古巴革命对“世界解放运动”的意义之后，继续说道：

具有根本意义的是，在智利，由于人民联盟政府当权，那个国家的劳动人民正在力求取得更大的成就。在秘鲁、墨西哥以及其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正在实行的重大的社会经济改革，越来越积极地主张加强经济上的自力更生、维护民族主权、反对外国垄断集团的统治。这个洲有更多的人民正在投入解放运动的洪流中去，加强团结，在共同的反帝斗争中，协力合作。

波德戈尔内的讲话充分反映了苏联对智利 1973 年 3 月议会选举的结果感到满意，与阿连德在 1970 年曾获得百分之三十六点三的选票相比，这次人民联盟的候选人获得了百分

① 莫斯科电台，1973 年 4 月 12 日。

之四十三点三九。左翼各政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也从五十六个增加到六十三，在参议院中的席位则从十八个增加到二十个。人民联盟得票的百分比引人注目地低于左翼各政党在1971年4月的地方选举中所得票数约百分之五十，但是，鉴于正在产生的一些问题已经冲击着阿连德政权，所以莫斯科认为上述选举结果是个“重要的胜利”^①。

在阿连德倒台前夕，一位苏联的拉丁美洲问题专家实际上暗示过拉丁美洲正处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边缘。他写道，拉丁美洲

……是资本主义世界中革命进程发展得最快的地带，是革命与反革命力量激烈斗争的地带，是帝国主义制度体系中环节最脆弱的地带。目前拉丁美洲的形势与二十世纪初的十几年中的俄国形势有其历史上的相似之处。^②

这位独特的分析家虽然反映了一种苏联的观点，但未免热心过分。苏联领导人和学者们在评价和预言有关智利形势的时候，即使有乐观的言论，一般都是极为谨慎的，他们的正面评价是转弯抹角的，并且还告诫说，智利革命尚未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种种因素促成这种判断。首先是担心智利军人可能会阻挠确立阿连德政权，美国也可能或明或暗地进

^① M·库达奇金：“智利：重要的胜利”，原载《新时代》，1973年3月（第11期），第4—5页。

^② 克·麦达尼克：“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危机及其克服的前景”，原载《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73年7月（第7期），第27页。

行干涉。其次还存在着人民联盟控制不了议会或是在试图实行其纲领时遭到死硬反对这样一个现实问题。例如，在《共产党人》1971年10月号上，波诺马廖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预言，阿连德政权仍然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因为“人民政府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已经完全掌权”。^①另一个问题，则如佐林娜在她的分析中指出的，是要不断维护组成执政的联盟的各个不同党派之间的团结一致。

在这个集团〔即人民联盟〕的伙伴中，对于民主的理解，对于〔国家〕改革必需的轻重缓急的估计，以及对反帝斗争的策略，都存在着分歧。在现行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由于有大量新的成员参加进去，引起了无政府主义的加剧和冒险主义口号和行动的出现。所有这些都使维护团结的问题复杂化了。^②

确实，对于搞那种谋求加速革命进程和采取诸如领导农民没收种植园和大农场等非法行动的激进的米尔^③问题，智利共产党人和莫斯科之间很快就发生了激烈的公开论战，而在政策问题上则同社会党的激进派却较少发生公开争论。最后，莫斯科的基础思想是始终认为，实行智利人民联盟的纲领，如同实行所有左派纲领一样，势必激起保守和“反动”分子的强烈反抗，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密谋推翻政府。的确，在这个政权

① 波诺马廖夫，前引文，第62页。

② I·N·佐林娜：“智利革命进程的性质和展望”，原载《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71年12月（第12期），第63页。

③ 米尔是沙皇俄国时代一种农村公社组织。——译者

存在的三年期间，以1970年10月议会开会前夕暗杀智利武装部队总司令R·施奈德将军作为开始它所发现的所谓“反动阴谋”是不少的。^①

苏联领导虽然注意到智利右派分子的活动和日益加剧的动乱，看来在军事政变确实出现之前不久，并未对可能发生一次军事政变加以非常的关心。虽然波诺马廖夫在1971年10月的文章中曾提到，有必要动员群众以防止“玻利维亚事件重演”（即推翻托雷斯政权），卡斯特罗的意识形态专家雷吉斯·德布雷^②（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进行一次倒霉的游击战冒险中的伙伴）也曾于1971年1月报告说，智利“许多同志”担心可能发生一次军事政变，^③但莫斯科却很快就因为智利武装部队不过问政治的态度和捍卫宪法的坚定诺言而感到放心。确实，军人已被阿连德政权看作同盟者，用以对付既来自极左派又来自极右派的暴力威胁。因此，有一个分析家在1972年4月指出：

武装部队在变革中起重要作用，已在智利得到体现。他们支持人民政府的政策，准备对付国内外的反动派以捍卫宪法秩序。^④

^① 《消息报》，1970年10月24日；又见图奇宁：“智利：团结与警惕”，《消息报》，1972年9月19日；尤·扎科夫：“对抗”，《真理报》，1973年5月4日；弗·切里舍夫：“煽动分子的一次突然袭击”，《真理报》，1973年6月8日。

^② 系法国新闻记者，是“游击中心论”的积极鼓吹者，1967年曾到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所建的游击战营地进行活动，著有《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上海人民出版社已出中译本）。——译者

^③ 伦敦《拉丁美洲》，1971年1月8日。

^④ 豪尔赫·特克西尔：“解放运动的一般特征和与众不同的特征”，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2年4月，第106页。

结果是，智利共产党人抱怨“极左分子拒绝承认目前武装部队在保卫我们民族权利和支持政府为加速经济发展而制订的措施方面所起的作用。”^①佐林娜在苏联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1972年3—4月出版的杂志上所写的文章中，表示担心“在实行智利的革命变革中”，阿连德政权仍有待于“取得武装部队的积极参与”，^②但在同一期杂志中，另一个分析家的文章却争辩说，智利青年投票表决方式表明士兵将不会支持任何反政府的军事行动。文章写道：

可以颇有信心地断言，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智利青年支持人民联盟领导的反帝革命力量。人们如果认为智利军队也和世界上所有军队一样，其大多数士兵都是由那些刚满选举年龄的青年人所组成，这就更为重要了。没有根本的理由可以假定，年轻士兵的思想意识和政治信仰会同他们的平民同胞有巨大的差别。^③

1972年9月，莫斯科电台赞扬了智利陆军总司令K·普拉茨将军在智利参议院所作的忠于宪法的保证^④以及为平息罢工浪潮而任命包括K·普拉茨将军在内的军人领袖担任部

① “拉丁美洲：思想战线”，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2年4月，第55页。

② I·N·佐林娜：“人民联盟与资产阶级民主”，原载《拉丁美洲》，1972年3—4月（第2期），第51页。

③ Iu·N·科罗列夫：“人民联盟的社会基础”，原载《拉丁美洲》，1972年3—4月（第2期），第64页。

④ 莫斯科电台，1972年9月23日。

长职务的决定。^①诚然,阿连德和莫斯科双方都把军人看作是挫败任何反政府政变的最有效力量。^②1973年初,阿连德在一次接见记者的谈话中宣称,智利武装部队“正参与解决对我们国家极其重要的问题”,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领域的问题,体现在参加政府以及“管理国有化的铜矿和经济体系中有战略意义的部门”。^③军人领导进入阿连德内阁,在当时看来,对阿连德来说,是极其成功的战略,可使他们参与制订政策,并保证他们忠于宪法确认的总统。因而,莫斯科电台于1973年2月发表评论说,“智利武装部队的立场是坚定不移地保卫宪法,因而也是支持人民联盟政府及其进步政策的。”^④

据说,阿连德总统对普拉茨将军的忠诚有着高度的信任,这种信任看来已在1973年6月镇压一支部队的叛变而得到了证明。毫无疑问,莫斯科对军人的作用也有这种积极的评价。因此,1973年7月1日《真理报》指出,叛乱分子和反动分子“遭到了坚定地维护法律和尊重人民愿望的武装部队指挥部的决定性打击”。^⑤直到7月下旬,特别是在8月中,莫斯科开始对智利武装部队的态度表示关心,注意到右派分子力图“分裂智利武装部队”和煽动其“反动”军官发动一次政变。由

① 莫斯科电台,1972年11月3日、6日、7日。

② 贝弗·特卡钦科:“智利的教训”,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4年11月(第11期),第134页。

③ L·科西切夫访问萨·阿连德总统,原载《拉丁美洲》,1973年3—4月(第2期),第8—9页。

④ 莫斯科电台,1973年2月8日。

⑤ V·鲍罗夫斯基:“破产者”,原载《真理报》,1973年7月1日。

于国防部长普拉茨将军在其他军官的逼迫下于8月辞职退休,阿连德政权失去其在军队中的主要支柱,他那摇摇欲坠的地位已经十分明显了。^①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智利共产党人显然还指望着“部分军队”仍将效忠于政府。^②接踵而至的政变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阿连德政权未能彻底改组军队或者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控制,说明了9月11日发生政变时,不管智利青年的投票表决方式是怎样,大多数士兵都按照他们长官的命令行事。

尽管莫斯科赞扬智利并增加经济援助,但并不想搞那种标志它同卡斯特罗开始建立关系的救济行动。正如波诺马廖夫因不太了解智利经济发展情况所提出的那样,在头一年,莫斯科可能认为苏联没有必要提供重大的援助。可以肯定,波诺马廖夫在1971年10月谈到的莫斯科的“实际支持”,暗示着苏联的某种承诺,他后来的言论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苏联对智利的需要可能作出了反应。因此,1972年2月苏联《消息报》上有下面的一段话:

苏联完全支持智利人民联盟政府的这一进步事业,他们为使国家的经济从北美垄断集团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正在进行斗争。苏—智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具有尽一切可能支持阿连德政府反帝政策的任务。^③

① L·列卡钦科的评论文章:“考察事实”,莫斯科电台,1973年8月12日;特卡钦科,前引文。

② V·特脱尔鲍姆:“胜利的序幕”,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3月(第3期),第86页。

③ V·库德里雅夫采夫:“朋友的可靠之手”,原载《消息报》,1972年2月15日。

然而这里有一种暗示，即仍属低水平的苏联援助，对阿连德已经是足够的支持了。

诚然，苏联的一种事后剖析，认为莫斯科未曾设想过古巴事例的重演。在讨论智利在经济上的教训时，E·A·科萨列夫表示赞赏地指出，阿连德政府愿意继续同美国贸易，并且不仅对社会主义世界，而且还同西欧、日本和不发达国家扩大经济关系。不仅如此，科萨列夫还从中引出如下的结论说，智利经验表明，不发达国家通过和平道路的革命进程，必须特别注意到地理条件和国际市场情况。在面临着可能受到经济制裁的情况下，“这方面主要的事情已不是要十分引人注目地改变对外联系的方向，比如扩大这些对外联系的布局，关心国际经济关系情况的根本改善，”^①正如他认为阿连德政权所已经做过的那样。〔苏—智经济关系，见第五章〕

苏联的小心谨慎反映在其理论评论中，把智利正在“世界革命进程”中产生影响的概念，同它正在树立一个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样板的概念区别开来。前者的意思是，智利政权的行动及其在智利外部的反响，既直接地限制了美国的影响，又通过为社会革命发展的布局，从根本上打击这种影响，正如莫斯科所看到的那样。同时，在整个阿连德政权执政期间，尤其是在这个时期以后，苏联发言人小心谨慎地避免提到它是正统的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或者已经着手从事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1971年波诺马廖夫对智利问题的讨论，集中在

^① 科萨列夫：“经济与革命的和平道路”，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9—10月（第5期），第106页。

“革命的发展”问题上,从来不提智利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波诺马廖夫把智利政府说成是“一贯民主的”,是一个“坚决反帝和致力于彻底变革社会制度”的政府。他在结论中说,“对拉丁美洲人民来说,智利就是一个榜样,因为智利正在朝着摆脱美帝国主义压迫的方向奋勇前进,解决一些时机业已成熟并有利于劳动人民的问题。”^① 1972年12月阿连德访问莫斯科时,波德戈尔内称赞智利是一个“已经走上建设新生活道路”,正在实行一种“彻底改造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整顿”并“向建立民主和取得社会进步”迈进的国家。^② 最后的公报中包含了关于苏联对人民联盟努力建设社会主义表示赞赏的措辞,但字里行间却暗示,这是一个最后目标而不是眼前的进程。^③ 有些评论文章在其他方面还用了各种不同的惯用词句。有的说,智利已经构成反帝、反寡头政治的民主革命,它“将打开”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④ 有趣的是,就在出现波诺马廖夫文章的同一期《共产党人》杂志中,登载了苏联意识形态专家P·N·费多谢耶夫的文章,这篇文章翻来复去地大力鼓吹什么“共产党人必须在任何运动和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才能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正统学说,并把那种认为在共产党国家中可以实行多党制的理论斥为“修正主义理论”。^⑤

① 波诺马廖夫:前引文,第60—71页。

② 《真理报》,1972年12月7日。

③ 《真理报》,1972年12月10日。

④ M·F·库达奇金:“智利共产党为左派力量的团结和革命过渡而斗争的经验”,原载《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1974年5月(第5期),转引自联合出版调查处第63179号,《苏联政治和社会事务译丛》,第74页。

⑤ P·费多谢耶夫:“党的作用的提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法则”,原载《共产党人》,1971年10月(第15期),第72—91页。

军事政变的结局

尽管军人一般说来不可信靠都已有了种种的前兆（特别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说明阿连德会失去智利军人的支持），但阿连德的垮台，尤其是其速度之快和易如反掌，却使莫斯科为之震惊。苏联宣传机器报道了智利政变前数星期内与日俱增的骚乱，显然认为它只是阿连德政府要渡过的许多危机中的最近一次而已。政变前的一周内，莫斯科和智利签订了一项新的科学文化协定。政变后的一个短时期内，对于苏联和皮诺切特政权的关系，还把握不定是断绝还仅仅是中止。^①

苏联和拉丁美洲共产党人在一段时间内全神贯注于弥合创伤和谋求补救，不能迅即对阿连德政权的意义进行事后的剖析。1974年内这些剖析逐渐增多和深入，并且影响到苏联对战略和策略上关键问题的观点，这些问题不仅是有关拉丁美洲，而且还涉及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欧。

第一篇论述智利教训的文章，是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属马列主义学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副主任 A·I·索波列夫所写，发表在1974年3—4月那期《工人阶级和当代世界》上（索波列夫为该刊主编），这篇文章在许多方面仍是最全面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篇重要文章，是苏共中央委员会拉丁美洲问题专家 M·F·库达奇金写的，刊登在1974年5月号的《联

^① 莫斯科电台，1973年9月21日。苏联政府声明的原文实际上是说，苏联“……认为苏联驻智利大使馆不可能继续存在，并声明它同智利断绝外交关系……。”

共党史问题》上。直到1974年秋，苏联专门研究拉丁美洲的主要期刊《拉丁美洲》9—10月号第一次发表了有关阿连德垮台一周年的一系列文章。1974年夏秋期间，索波列夫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份详细的阿连德政权年表，还插进些简短的解释性概要，据称其目的是便于作进一步分析。该刊在11月—12月号上概述了1974年7月它和世界劳工运动协会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智利共产党人（值得注意的是智共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博洛迪亚·特脱尔鲍姆）所写的几篇简短的事后剖析文章，发表在国际共产主义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和其他各种苏联杂志上。然而，莫斯科的主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虽曾发表过几篇宣传文章，但至1974年年底，未曾登载过分析智利教训的重要文章。苏联高级领导人对此也只谈到过一次，那是波诺马廖夫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6月号发表的文章的一节。所以，到1974年年底，苏联没有发表过关于阿连德政权和智利共产党活动情况的明确的官方评论。而发表出来的各种文章和分析，实质上只是这样一种论述，旨在阐明阿连德试验的教训并指出其失败的原因。

阿连德死后，报刊发表的文章，对几个一般性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于过去本来应该做些什么和将来怎么办等许多具体问题则意见不一。大家认为，智利的失败并不否定和平夺取政权道路的可能性这个普遍定理。智利共产党人特脱尔鲍姆在三篇事后剖析的文章（1973年11月以及1974年3月和5月）中^①，强调“我们毫不怀疑非武装革命的道路在原

^① 特脱尔鲍姆：“为了胜利的革命”，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3年11月（第11期）；“胜利的序幕”，同上刊物，1974年3月（第3期）；“失败的教训——将来胜利的条件”，原载《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74年5月（第5期）。

则是正确的”。^①他争辩说,这一政策是正确的,但未正确贯彻。同样,苏联和正统派共产党人的事后剖析都再次肯定智利共产党所遵循的基本政策路线是正确的,那就是同其他左派建立统一战线和反对极左派。

事后的剖析着重指出,智利共产党人深悔“对中间阶层策略的了解少得可怜”,也对激进左派集团的活动感到遗憾,这些都促使“工人阶级脱离其同盟者”,即中产阶级。^②至于和平革命的这一普遍教条,苏联的分析宣称,对中间阶层的策略是“正确制定的”,但“并不总是有效地得到实行的”。^③换句话说,有些苏联评论员承认阿连德政权失去了一大部分智利人民的信任。苏联的分析家同意,阿连德政府及其支持者脱离社会“中间阶层”是其垮台的关键性因素。

一再肯定和平道路和温和政策是为好几个目的服务的。苏联显然需要证明1956年首次公布的苏共基本路线是正确的,而智利事件却使这条路线更易遭受来自北京和莫斯科左派方面的一些人的抨击。苏联也需要让那些还在遵循同样路线的其他共产党,尤其是西欧那些共产党确信莫斯科要它们继续沿着这一道路走。正如苏联一名分析家联系到智利党1970年所面临的形势时说,莫斯科承认,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权力受到限制的形势下,面临着一个根本的抉择:要么继续和

^① 特脱尔鲍姆,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3年11月(第11期),第12页。

^② 特脱尔鲍姆,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3月(第3期),第85页。

^③ A·I·索波列夫:“革命与反革命:智利的经验和阶级斗争问题”,原载《工人阶级和当代世界》,1974年3—4月(第2期),第14页。

执政党对立并准备将来进行一次更正统的革命，要么参加某种共同执政，^①这种共同执政反过来要求充分节制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使那部分必不可少的中间力量来支持左派联盟。

1974年7月专题讨论会，把这个问题同西欧联系起来，就格外清楚了。世界劳工运动协会会员A·A·加尔金在他的通篇报告中，清晰地专门描述西欧危机的迹象和人们迫切要求改革，甚至右翼分子也是如此。据说他不仅特别注意到这些倾向在法国、联合王国和德国的表现形式，并且还特别注意到在葡萄牙发生的事件。加尔金概括他的报告要点，作出结论说，“在人人都真正力求改革的情况下，实现改革的方法问题便成为主要问题了。”他指出右翼力图用极左派的过火行为来吓唬人民，声称，“据此，危险显然在于，把智利经验看成是对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根本的社会问题这一可能性的否定。”^②同一协会的Iu·F·卡里亚金补充说，智利经验并不排斥和平途径，只是表明了需要加以改进。对这一点，卡里亚金反问道，“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都认为革命的和平途径对他们的国家是最为可取的”，难道这都是偶然巧合吗？^③

最后，反复说明和平革命的政策是同苏联持续执行缓和政策的外交政策标准相适应的。对于这一点，卡里亚金说得

① K·L·麦达尼克：“智利的教训”，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9—10月（第5期），第126页。

② M·O·卡拉马诺夫：“智利的经验和革命的进程”，原载《工人阶级和当代世界》，1974年11—12月（第6期），第133页。

③ 同上，第137页。

毫不含糊：

正如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国际上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和平而非武装的革命途径也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①

然而，除了这些重新肯定的说法，对和平革命的范围和问题方面还有一个颇为接近的看法。正如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指出的，智利事件“提示了需要从正确的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来探讨通过和平的非武装道路达到革命胜利的问题”。^② 这就要：第一，更着重强调需要为非和平途径作好准备；第二，更细致地调查各种困难，包括寻求和平途径的困难，特别是在共产党人没有取得决定性发言权以及存在各种各样复杂势力的地方，寻找同盟军和采取灵活策略的问题。

苏联的一切事后剖析一致同意的一个反复提出的问题，是共产党人应该准备从事于各种形式的斗争，因为敌人可能不会，实际上也未必会遵循和平斗争的规则。波诺马廖夫表示：

当代的教训再次证实了列宁的结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革命的阶级必须始终准备去击退反革命的各种进攻，以保卫它的成果，准备迅速改变它的斗争方式，并用革命的暴力回击资产阶级的反

① 卡拉马诺夫，前引文。

② B·N·波诺马廖夫：“世界形势和革命进程”，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6月（第6期），第11页。

动暴力。^①

阿连德在职期间，这个问题并没有被忽视。例如，1972年5月号《共产党人》杂志中，有一篇文章以赞许的口吻引用过智利共产党领袖路易斯·科尔巴兰的一段话，即“在一定的条件下，要是反对派硬要阻挡革命的道路，那么，就可能有必要采取武装斗争。”^②

至于在智利过去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将来还需要做些什么，这还很不明确。苏联研究拉丁美洲问题的专家K·L·麦达尼克告诫说，“要准备相应的手段，使积极分子和群众对各种形式的斗争做好心理上的准备，能够迅速随机应变，这在实践中要比过去想象的难得多。”^③

苏联的评论员们从两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怎样接管一支难以驾驭的军队，或者怎样才能最好地对付它。按照波诺马廖夫的说法，“甚至在革命沿着和平的道路前进的时候，剥夺旧政权的诸如军队这样的重要的权力工具，也是极其重要的。”^④至于怎样完成这一任务，则还远远没有搞清楚。至少，这意味着共产党人必须作出更坚定的努力渗透到拉丁美洲的军队中去，使它们“民主化”。特脱尔鲍姆写道：“从惨痛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应该记得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如果

① B·N·波诺马廖夫：“V·I·列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原载《共产党人》，1974年1月（第2期），第17页。

② I·里巴尔金：“智利经验：革命进程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共产党人》，1972年5月（第8期），第121页。

③ 麦达尼克，前引文，第130页。

④ 波诺马廖夫，前引文，1974年6月，第11页。

人民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就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为武装部队极其必需的民主化而努力。”^①

与此观点显然相反的是，应该使军队中或整个社会中的非左派或反左派分子警悟。索波列夫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宣称，“认为在最复杂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在军队中实现民主影响的经验，这是不正确的。”^②除了布尔什维克的先例外，他还指出法国共产党正在力求确立“进步的”民族传统和旨在影响武装部队的“国防民主原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举办的一次关于拉丁美洲军队的专题讨论会中谈到，这个洲的共产党正在做许多工作以争取军队中的拥护者。^③

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另一种形式是力图使士兵反对军官。据说，1972年阿根廷的“军士—共产主义者”颇有意于组织军士反对军官。但是，这种意见被否定掉，因为军官也可能是共产党员，而军士也可能是反动分子。^④

苏联的评论文章特别回顾了智利的情况，对于智利当时应该做些什么，意见相当分歧，甚至有冲突。有些人责怪阿连德政府做得还不够。根据佐林娜和卡里亚金的说法，人民联盟没有把“倾向民主”的军队纳入社会改革的计划。“在军队

① 特脱尔鲍姆，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3年11月（第11期），第12页。

② 索波列夫，前引文，第20页。

③ “军队为谁服务？”，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4月（第4期），第57页。

④ 同上。

中没有做什么工作，或者做得极差。”^①共产党人周旋于贬低军队作用的左派极端分子和那些相信军队不干涉政治的人们之间，无所作为。索波列夫倾向于同意这种观点，不过承认，在究竟能做些什么的的问题上，他还没有明确的见解。^②

A·F·舒尔戈夫斯基在《拉丁美洲》杂志上写文章，对这个题目直接提出了争论点。^③他说，人民联盟政府为了争取军队，做过大量的工作，包括给予他们政府职位。他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军队本身，而在于组成军队的社会基础的“中间阶层”这个普遍性问题。阿连德政府不能扩大这个社会基础，也就意味着不能争取到军队中的足够力量。对此，他特别归咎于那些极左派，他们这些人不肯向中间阶层或军队让步。如前所述，在整个阿连德执政期间，苏联的评论文章在告诫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的同时，也认为有军队效忠和军队中存在“民主”观点的这种有希望的迹象。佐林娜和卡里亚金指出，军队支持阿连德政权在施政方面所采取的若干步骤。^④苏联和智利军事代表团的反复互访，表明了莫斯科为它自己和阿连德政府在智利军官集团之中进行疏通活动作出了直接的贡献，苏联为智利购买军事装备提供贷款，也是如此。

根据苏联书评，^⑤阿连德最亲密的顾问之一、现已逃到西

① I·N·佐林娜和 Iu·F·卡里亚金：“智利革命政事记”，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9—10月（第5期），第53页。

② 索波列夫，前引文，第20页。

③ A·F·舒尔戈夫斯基：“智利的武装部队，从‘不过问政治’到反革命”，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11—12月（第6期），第39—42页。

④ 佐林娜和卡里亚金，前引文，第141页。

⑤ 特卡钦科，见《国际生活》（莫斯科），1974年11月（第11期），第134—135页。

西班牙的作家胡安·E·加尔塞斯，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写得很清楚，阿连德曾预料到要有一场反动政变，但他“相信军队是阻止或挫败任何政变的最有效力量”。依照评论家V·特卡钦科的看法，阿连德的错误在于他低估了武装力量的阶级性，不了解谁是忠诚的，谁是不忠诚的。“别的姑且不谈，”这个评论家写道，“直到政变那一天为止，政变领导人、现任智利国家元首皮诺切特将军，是阿连德最亲密的伙伴之一，甚至还为总统制订阻止突然政变的计划。”由此吸取的主要教训是武装部队并不都是清一色的。关键性的发展出现在1973年夏，当时“阴谋者几乎能够毫无阻碍地撤掉所有忠于政府的军官的指挥职务。”加尔塞斯的结论是：

没有一支用社会主义精神培养的军队，没有为武装斗争而组织起来的群众，政府是无法用它自己的武装反击力量来对付反对派反宪法的武装进攻的。

特卡钦科虽然同意这种观点，并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好这种防御的准备，必要时还要掌握武器”，但评论说，尽管智利共产党也有这种观点，“这样的准备……始终未在智利做好过”，反过来，这就“注定了阿连德政府的命运”。

苏联评论员普遍认为，让智利军方和美国之间保持联系的政策是一项错误的政策。《红星报》上有一篇题为《是绞索，不是帮助》的文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

智利的悲剧再次证明，来自五角大楼的援助起了邪恶作用。军事交货总是使拉丁美洲国家的军队处于依附的地位，其目的在于使他们的军官美国化，向他们灌输无耻的反共思想并敌视国内一切进步事物。美国给拉丁美洲的军事援助，不是为了反对虚构出来的所谓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威胁”而进行斗争，而是为了支持寡头政权服务的。^①

《苏联军事评论》作出了甚至更为明确的结论：

实践表明，为了使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 and 目的得到军队支持，必须消除过去殖民时代的影响，并在军事专家、武器装备和训练军官等方面不再依赖帝国主义。^②

阿连德倒台后，莫斯科及其共产党追随者对是否需要建立一支反军队的力量的可能性，争论得愈来愈激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关于军人的专题讨论会宣称：“无产者武装得越快，……军队开始动摇得也越快。”^③然而，专题讨论会对这个问题并未作深入的探讨。索波列夫表示赞同地引用了刊登在法国共产党人的一家周刊上的一封信的内容，作者在信中这样写道：“谈论人民的武装……实在是不负责任的，”因为

① A·列奥恩季耶夫上校和V·别列津：《是绞索，不是帮助》，原载《红星报》，1974年3月8日。

② A·斯克列尔尼克：《革命一定能够进行自卫》，原载《苏联军事评论》，1973年10月（第10期），第6页。

③ “军队为谁服务？”，前引文，第57页。

面临着内战的幽灵，人民宁愿维持“现状”。诚然，索波列夫承认“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避免一场反动的军事叛乱，要具体并有充分根据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很困难的。”^①有一些苏联评论员，对自己的意图稍欠节制，并对阿连德政权也不宽容。例如，M·F·库达奇金在1974年5月写道：

我们不能以为共产党的领导和阿连德总统个人竟会没有觉察到危险来自反动军事机构。不管怎样，他们没有在适当的时候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用强大的武装来保卫革命。^②

麦达尼克认为，他们至少早在1973年3月，本来就应该开始准备武装斗争，但他并没有讨论这一行动将会遇到怎么样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当时共产党的口号是，他们正在设法避免一场内战。^③加尔金在1974年7月的世界劳工运动协会的专题讨论会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今天人们要非难智利同志，说他们没有建立一支反击的武装力量，那是容易的。但这种企图，不是正好给旧式军队在暴乱初期找到了必需的借口吗？^④

① 索波列夫，前引文，第20页。

② 库达奇金：苏联《历史问题》，1974年5月（第5期），第74页。

③ 麦达尼克，前引文，第133页。

④ 卡拉马诺夫，前引文，第133页。

库达奇金象其他苏联分析家一样，声称智利革命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它没有真正的革命人民的武装力量（工人民兵，工人自卫队、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武装战斗小组和小分队）。”^① 麦达尼克说，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共产党街头活动的事例很多。他承认，这就可能引起无法无天的行为，但是，“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是以建立动员群众的机构为先决条件，这种机构几乎总是表示出要过渡到权力机构的倾向”。^② 然而，佐林娜和卡里亚金合编的阿连德政权大事记指出，智利共产党曾对极力主张创建这种机构的激进的左派团体进行过严厉的指责，理由是这样将暗示着对阿连德政府的不信任。^③

勃列日涅夫虽然出于宣传上的原因，悲叹智利军人政权“极其公开地褻渎了国家宪法”。^④ 苏联理论家加紧推行了使智利共产党人狠狠打击军人政权的路线。例如，索波列夫就严厉指责阿连德政府信奉宪法到了“迂腐”的程度。他写道，“显而易见，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如果群众组织和宪法发生冲突时，应该优先考虑革命力量。”^⑤ 麦达尼克在后来所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讲得更加透彻了：

群众的革命创造力——没有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不会被资产阶级立法机构审慎地加以“吸收”。带有“被剥削者和被

① 库达奇金：前引文，第73页。

② 麦达尼克：前引文，第129页。

③ 佐林娜和卡里亚金：前引文，第136页。

④ 苏联国内广播节目，1973年10月26日。

⑤ 索波列夫：前引文，第17页。

压迫者的节日”的气氛和心情的那一套复杂东西（“优胜的感情”，确信“从现在起，一切事情都将变样”，并确信“一无所有的人要做天下的主人”）是同要保存过去沿袭下来的准则、法律、常规、传统相抵触的。^①

有趣的是，一些苏联专家认为，这种过错不在于西方式民主所给予的自由，而是由于智利共产党不会运用这种自由所致。例如佐林娜和卡里亚金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制只是革命的绊脚石，这一教条必须予以彻底驳斥。”诚然，他们说，资产阶级法制已成了过时的历史性的东西，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它“不仅是资产阶级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巨大的历史战利品”，同时，人们更不应该“把自己无力驾驭的某种特定的手段说成毫无价值的东西。”^②

不管怎样，由于智利事件的影响，苏联对在“资产阶级”民主体系中能否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怀疑更加深重了。不仅在讨论到有可能使用武力这个问题时，而且在更多地注意到和平道路在实践中必然遇到的那些问题上，都反映出这种疑虑来。对莫斯科来说，智利坚信革命的根本问题即是夺取政权这一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在智利，这是一个有双重意义的问题：左派联合政府要夺取社会上其他阶层的权力，共产党人则要在联合政府中夺取同盟者的权力。西欧共产党人认为智利是共产党国家中实行政治多党制的比较好的典型，^③而苏联评

^① 表达尼克，前引文，第129页。

^② 佐林娜和卡里亚金，前引文，第149页。

^③ 参阅琼·巴思·厄本：《苏联和意大利对社会主义多党制的看法：智利的促进因素》，原载《环球》杂志，1974年夏，第18卷，第482—509页。

论员却认为智利的多党制仅仅是需待克服的一个障碍。

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 V·V·沃尔斯基，从他初次剖析智利时所选用的列宁语录暗示出对和平道路越发怀疑。^①显然，所选用的语录表明列宁对和平道路的愿望是赞赏的，而引用的结果却事与愿违。象大多数苏联理论家寻求列宁主义来支持和平革命理论一样，沃尔斯基引用列宁在 1917 年 9 月所提到有关革命的和平发展的一段话，说是在“历史上极为罕见，极为珍贵”的事。然而，沃尔斯基还找出列宁这么一段话（即列宁嘲笑过无产阶级能通过选票取得政权这种想法），以及列宁另一段话（即只要资本主义已在包括所有大国在内的九个国家崩溃，第十一个小国就有可能和平接管政权）。根据沃尔斯基的看法，1970 年阿连德政府上台时，力量对比已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变化，仿佛所有大国的资本主义都要被推翻似的。

阿连德倒台前后，苏联不断抱怨〔智利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完全掌权。苏联评论员特别指出，在立法机关、国家机器、司法部门和宣传部门，阿连德在哪一个部门都不能压倒右派势力的。这些剖析特别强调在将来必须把国家机器和宣传工具控制起来。例如，波诺马廖夫认为最要紧的是“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必须剥夺阶级敌人手中向群众进行新闻宣传的工具。”^②

① V·V·沃尔斯基：“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诸问题”，原载《拉丁美洲》，1974 年 9—10 月（第 5 期），第 42—44 页。

② 波诺马廖夫，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 年 6 月（第 6 期），第 11 页。

苏联评论文章承认,如果可能的话,阿连德政府是会这样做的,不过,这也反映出苏联更加意识到在象智利这样的地方,各种力量相互之间影响十分复杂,采取这样的行动必然会遇到困难。因此,有一个苏联评论员指出,“革命的和平道路比武装斗争道路更为错综复杂,”因为它要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及其他各种因素之间进行抉择,而这些因素不象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那么一目了然^①。另一苏联评论员则认为,和平革命必须是渐进的,这是实质所在,“它就使事态发展复杂化,同时反动派采取行动和抵抗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在革命和平发展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比掌握政权可能更容易些。”^②

苏联分析家们从智利的经验教训中看来越发敏锐地意识到,经济政策对一个仍在争取拥护者的左派政权要获得成功来说,该是何等重要。正如波诺马廖夫指出的那样,“政治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经济领域就成为争取革命胜利的主要战场。”^③苏联作者们一方面把阿连德政府的许多经济问题归咎于右派和美国公司的所谓经济破坏活动所造成,一方面又认为是阿连德犯了严重错误。他们还认为,其中涉及到微妙的选择重点问题。科萨列夫把它作为一个普遍问题提了出来:

全面指挥、组织执行和干部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否在于首先确保生产,其次才着手分配?或者说,既然革命的总目标是改进广大

① 科萨列夫,前引文,第93页。

② 索波列夫,前引文,第15页。

③ 波诺马廖夫,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6月(第6期)。

群众的社会地位,是否有必要首先考虑再分配,然后再考虑分配和对生产的需求?①

苏联分析家们自己作出了不同的回答。科萨列夫主张注重生产,认为“经济主义”是阿连德执政时期所犯的 error 之一。② 麦达尼克主张分配,说为了保持革命势头,阿连德政府别无他法。他争辩道,任何吸引右派拥护者的经济措施,都会有失去左派支持者的风险。凡是同基督教民主党搞联盟,必然都是暂时的。③

这种教训正特别着重运用于葡萄牙局势。在 1974 年 7 月的专题讨论会上,主办人 G·B·阿尔达耶夫声称,对“反动派”来说,智利事件的教训之一是,制造经济困难,这就是使左派革命信誉扫地的好办法。他说,这点至关重要,必须铭记在心:警惕“大资产阶级”过多地提高低工资,增加生产成本,目的在于使中小企业主破产,从而使后者反过来反对左派政权。④ 在专题讨论会上,有一个到会的葡萄牙共产党人也得出了那么多类似的结论。⑤ 因此,智利推行共产主义运动格外小心,唯恐速度太快,尤其是在扩大下层阶级的经济权益方面,虽然它所发出呼吁的主要对象就是下层阶级。

甚至在阿连德掌权期间,苏联分析家们已敏锐地意识到,

① 科萨列夫,前引文,第 108 页。

② 同上。

③ 麦达尼克,前引文,第 115—116 页。

④ 卡拉马诺夫,前引文,第 137—138 页。

⑤ 同上,第 132 页。

要维持一个广泛的人民阵线存在着许多难题。要使政治主张截然不同的集团组成联盟，并使之维持下去，这是很困难的。联合政府中的小资产阶级党派，要么不愿意越出宪法体制雷池一步，要么就相反，照共产党的观点看来，表现出一种不切实际的倾向暴力的激进主义，很有可能采取尚未成熟的和造成惨重损失的革命行动。苏联的拉丁美洲问题专家们指出，在智利执政的人民联盟要保持联盟关系是困难的，因为组成联盟的各党派在政治上既有右派观点，也有共产党左派观点。

从苏联的观点来看，阿连德政权的致命伤，用苏联两个评论员的话来讲，就是智利共产党“由于种种情况，未能在革命中充分地起到真正的先锋作用”。^①诚然，人民联盟和阿连德政府本身是受社会党及其更为激进的同盟者所支配的。因此，在1969年，虽然智利共产党得到的选票以及议会席位的百分比比社会党得到的要多（百分之十六比百分之十二，众议员席位二十二席比十五席），但在1973年的选举中，情况就倒过来了。社会党得到百分之十八点六的选票和二十八个众议员席位，共产党得到百分之十六点二的选票和二十五个众议员席位。共产党人在阿连德政府中也没有占据主要内阁部长的职位。然而，因为共产党人必须作为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阿连德政府中发挥作用，并从1973年9月以来一直渴望组织一个反对军人政权的共同阵线，因此无论莫斯科或者智利共产党人，都不会马上出来说他们竭力追求的就是这种先锋作用。

对智利事件事后的剖析，还特别强调在一个掌权的左派

① 佐林娜和卡里亚金，前引文，第148页。

联合政府中保持团结的问题。所有这些剖析都提到共产党与他们主要同盟者社会党之间、有时甚至相当严重的意见分歧。例如，佐林娜和卡里亚金所编的大事记，就记载了阿连德政府的三年里此类意见分歧的每个重大事例^①。库达奇金也提到，“由于政府是由几个政党所组成，根本不会赞成立即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政治经济问题。”他抱怨说，“各种观点必须经常进行协调，并就特殊问题交换意见。”^②同样，特脱尔鲍姆也抱怨说，执政的联合政府老是忙于讨论这个讨论那个，“结果无法作出大家都得必须遵循的决议来。”诚然，他这样写道：“在人民联盟内部并不是只有一条路线，而是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这自然而然地使政府的活动能力处于瘫痪状态，并削弱它同主要敌人——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力量”，^③结果“就得不到一个统一的、始终如一的战略战术以及一个赢得整个政权的明确的方案来。”索波列夫从这种情况得出结论：“提出这样的问题极为重要，即在一个许多政党相互平等的集团内，共产党利用它的理论武器和组织上的统一，总是需要起到一种创新和统一的作用的。”^④“创新”和“统一”这两个词，看来就是伊索寓言式的“先锋”意思。在1974年7月的专题讨论会上，有一些参加者甚至进而提出了共产党人确实需要的一些建议。库达奇金悲叹地说道，“智利共产党尽管有许多优点，

^① 同上，第132—147页。亦即大事记第一部分，原载《工人阶级和当代世界》，1974年7—8月（第4期），第142—160页。

^② 库达奇金，前引文，第68页。

^③ 特脱尔鲍姆，见《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74年5月（第5期），第31页；《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3月（第3期），第85页。

^④ 索波列夫，前引文，第22页。

但实际上不能理解这种先锋作用，当然也就不能考虑到联合政府内其他党派的利益了。而智利社会党从一开始就要求发挥这种作用，尽管它在组织上和在思想上都没作好充分准备。”^①一位到会的东德人在讨论同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统一战线的问题时声称，关于这个方面，“从政治、战略和纲领观点来看”，应该“特别重视共产党人能不能保持或拥有一种先锋作用。”^②至于共产党应如何诱使社会党加入他们的统一战线，一面又自称具有“先锋作用”，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说明。

为智利作进一步的斗争

智利共产党及其同盟者除了指控美国煽动军事政变，普遍呼吁智利所有民主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并为了在狱的智利共产党领袖路易斯·科尔巴兰而动员国际舆论以外，对于如何对付智利局势，有时看来思想上并不是很明确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73年9月14日所发表的声明，只是表明苏联同智利劳动人民和人民联盟的联合政府的“团结”，并且断言“无论报复行为也好，恐怖手段也好，都动摇不了智利人民的意志，也阻挡不了通往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道路。”^③相比之下，卡斯特罗对阿连德倒台的最初反应是，他毫不惊奇地声称：“除了革命武装斗争之外，别无其他选择。”^④不过，如今

① 卡拉马诺夫，前引文，第132页。

② 卡拉马诺夫，前引文，第133页。

③ 原载《真理报》，1973年9月14日。

④ 哈瓦那电台，1973年9月28日。

流亡在外的一些人民联盟领导人都是很悲观失望。因此，智利社会党领导人阿尔塔米拉诺在哈瓦那电台的三次讲话中，仅仅提到“任何形式的斗争都不会放弃”，其中包括武装斗争，并表明在作出指导如何继续前进的决议之前，必须和流亡的领导人和组织作进一步商讨。^①智利共产党发言人V·特脱尔鲍姆，在1973年11月就智利事件所写的第一篇剖析文章中断言：“我们反对政变和内战。我们不需要借暴力革命名义来搞暴力。但是，面对着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面对着残忍的冒险家，人民必须进行自卫。而且将来也应该这样做。”^②不过，特脱尔鲍姆在1974年3月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却持更为审慎的态度，说：“一些左派的同志已经提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未免为时过早。”^③

虽然，人民联盟的流亡领导人之间难免会出现某些指责与相互推诿责任，智利共产党在1973年10月1日还是发出要求团结的呼吁书，说这是“争取反对军事独裁统治的斗争胜利和共同解决工人阶级和人民所面临的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④呼吁书还极力主张：“凡是政府和人民联盟，或则组成该联盟的各政治党派所造成的错误，”应留待将来更适当

① 哈瓦那电台，1973年12月17日，1974年1月4日；拉丁美洲通讯社1974年1月23日电。

② 特脱尔鲍姆，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3年11月（第11期），第14页。

③ 特脱尔鲍姆，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3月（第3期），第84页。

④ 智利共产党的呼吁书，《告智利人民书》，原载《共产党人》，1973年10月（第15期），第95页。

的时候“加以讨论”。智利军人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特征，简言之，就是由一个“军事独裁统治”迅速变为一个“法西斯”政权，从而使左派进行分析和宣传就很简便了，同时也给莫斯科找到借口，要求人们继续保持警惕，同一再企图发动攻势，反对进步力量和国际缓和的所谓“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可是，不言而喻，需要团结，因为要发动和领导广大智利人民去反对军人政权，单靠一个政党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左派各团体于1973年9月和11月在罗马，1974年2月在巴黎分别开会，目的是对他们反对智利军人政权的战略战术方针进一步给以指导。1974年5月1日据说在圣地亚哥发表了一项宣言，声称：阿连德联合政府的最大缺点就是未能“引导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去支持它，”并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将军人政权的所有反对派联合起来，共同投入推翻该政权的斗争中去。这项宣言还巧妙地提到了武装斗争问题，这个宣言的签署者、比较激进的“革命左派卡斯特罗运动”(MIR)就是赞成武装斗争的，它曾经声称：“推翻独裁统治的斗争最终将是什么样的性质，在这个阶段还不能加以确定。”这个宣言还说：“我们断然拒绝采取恐怖和冒险的活动，”但是指望会出现“各种斗争形式都将是完全合法”的形势。^①

苏联采用多种形式支持反对智利军人政权的斗争。1973年11月22日，莫斯科电台新增一套“对智利广播”的半小时的新闻节目，每天共播四次，把“将军们要想隐瞒起来”的事

^① 《新闻公报》，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出版社，1974年7月30日（第13—14期），第115页。

件告诉智利人民。^①11月30日，莫斯科成立苏联与智利民主主义者团结委员会，发动了一场“联合智利人民对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国际运动。据宣布，该委员会要“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全国性委员会建立联系，共同采取行动，目的在于使智利军人政权彻底孤立。”^②这么一来就组织了一些国际性会议，其中，不仅有这类团结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而且还有世界工会代表大会，欧洲青年和学生与智利人民和青年团结会议，世界爱好和平力量代表大会等代表参加。^③1974年4月18日，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发表了自己的宣言。^④阿连德死后一周年，组织了一个世界性的抗议运动，^⑤苏联和东欧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讲坛上公开谴责智利军人政权。^⑥1974年8月26日，莫斯科的表面上是非官方的“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宣布，它将利用“麦哲伦电台”（曾是智利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安排每周两次的对智利的转播节目。作为力图“孤立”智利军人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莫斯科和流亡的人民联盟集团都发动了一场旨在阻止向智利出售武器的抗议运动。^⑦然而，在一片公开指责智利军人政权实行恐怖统治的喧哗声中，苏联共产党就1974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日所发布的

① 莫斯科电台，1973年11月22日。

② 莫斯科电台，1973年12月1日。

③ K·维耶斯卡：“苏联与智利民主主义者团结委员会”，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5—6月（第3期），第175—177页；莫斯科电台，1974年7月7日。

④ 莫斯科电台，1974年4月19日。

⑤ 莫斯科电台，1974年9月14日。

⑥ 莫斯科电台，1974年10月8日。

⑦ 参见莫斯科电台，1974年4月21日，1974年9月2日。

口号语调还是相当温和的。特别是提到智利的口号，向同军人政权“正在进行英勇斗争”的全体智利人民致意，号召“全世界人民”加强同智利的“爱国者”的团结，要求释放路易斯·科尔巴兰和“被法西斯军人政权监禁的所有囚犯”。^① 尽管如此，苏联评论文章继续坚持认为，苏联政府“正在千方百计支持智利爱国者反对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斗争”^②。

看来从这些会议和分析得出的战略和战术，重点是要使军人政权在国际上和智利国内都“孤立”起来，以便失去人民对它的支持，军人内部发生分裂，最终使它的“力量对比”转变为这样的结果：要么军政府被迫把统治权交出来，要么就会发生一场可望获得成功的起义。^③

从苏联的观点来看，它所发动的国际运动有这样的好处：即不仅能与针对美国的“反帝”的这个总斗争相呼应，而且还可以把世界上范围广泛的非共产党的力量、团体和人士都卷入这个特殊的斗争中去，莫斯科正是希望这样来加强它的总攻势，硬要人们接受它所理解的“和平共处”（亦即缓和），也就是说禁止西方的“反革命输出”。这么说来，一个国家让敌视“进步”的反动派上台掌权，将会落得个什么样的结果，智利就是一个“令人发指的实例”；与此同时，莫斯科还企图在世界舆论和国际“和平与进步”力量面前证明：智利反动派所作所为都将是徒劳的。

① 《消息报》，1974年10月18日。

② I·杰文：“团结与合作的路线”，原载《红星报》，1975年1月7日。

③ 特脱尔鲍姆，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3月（第3期），第87页。

智利国内战略的最重要的一着，就是将所有一切有可能反对军人政权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联盟，并把他们纳入统一的“反法西斯联合阵线”。这个阵线不仅包括人民联盟各党派，而且还包括所有一切“赞成国内恢复民主活动的力量”^①。因此就不遗余力把智利天主教会^②以及“整个”基督教民主党^③都列入了。按照特脱尔鲍姆的说法，“武装部队中的爱国力量将站在反法西斯阵线的人民一边。”^④他坚持主张，不应把这个斗争看作“平民与军队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武装部队中也有具备“民主性格”的人。他写道：

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必须防止武装部队最终变成帝国主义和寡头政治的奴仆。如果我们设法弥合由反叛者在军队与人民之间所造成的鸿沟的话，国家的安全必将得到保障。这不仅对人民运动，而且对军人中的民主分子来说，都是一种挑战。^⑤

显然，颠覆智利武装部队，是推翻军人政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许加强这种趋势的办法，就是世界各国应竭力阻止向智利出售武器，并进行旨在揭露军人集团正在把智利出卖给美国垄断集团的宣传。因此，人民联盟各党派在布达佩斯

① 莫斯科电台，1974年2月10日。

② 莫斯科电台，1974年6月27日。

③ 《团结报》，1974年6月15日，第15页；《迈阿密先驱论坛报》，1974年12月28日。并参阅特脱尔鲍姆文章，《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3月（第3期），第88页。

④ 特脱尔鲍姆，《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3月（第3期），第88页。

⑤ 特脱尔鲍姆，前引文，第89页。

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就抨击了军人政权向美国安那康达铜矿公司进行赔偿的决定，而这些铜矿原先是经智利议会一致议决之后由阿连德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指出：“这是玷污了智利的自尊心，有违我国人民的爱国心，同时也暴露了当前统治者背信弃义的真面目，他们就是帝国主义利益的公开代理人。”^①

据说，“反法西斯阵线从客观条件和现有力量对比出发，并根据人民群众反对反动军事独裁每个阶段的特定目标，将运用各式各样的形式进行斗争。”^②这就特别要求人民联盟（或者说至少是共产党人）重新获得“中间阶层”的支持或合作，因为前时失去了后者，对阿连德的垮台影响极大。^③在这方面，还很希望智利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当时，据说在智利散发的人民联盟的呼吁书的中心内容，就是要求废除戒严令，撤销军事法庭，释放全部政治犯，尊重人权，捍卫国家在领土、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主权，支持工人在经济方面的要求，反对使“中间阶层贫困化的政策”^④。

在“联合阵线”推翻智利军人政权的战略中，对将来取而代之的这个政权的目的地和特点，特别不作出明确的说明。特脱尔鲍姆在1974年3月所写的文章中，把这个政权说成是一个“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许多不同倾向的民族民主政府”，但

① 莫斯科电台，1974年9月2日。

② 莫斯科电台，1974年2月10日。

③ 特脱尔鲍姆，《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3年11月（第11期），第15页。

④ 《团结报》，1974年6月15日；奥尔兰多·米尔拉斯：“未来属于人民”，《真理报》，1974年9月4日；罗德里戈·罗哈斯：“在反法西斯恐怖主义斗争中人民的团结”，《真理报》，1974年9月10日。

它又是“能够完成国家所需要的革命建设”。^① 1974年5月1日发表的《人民联盟宣言》，谈到了“反法西斯阵线”的目标，其中包括：

……建设一个新的民主的、多民族的人民国家。这个国家将使我国人民已经取得的所有成果继续得到发展，肃清帝国主义、大垄断资本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势力，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建立一个确保我国独立自主的发展的新经济体系。^②

显然，这个目标不仅仅是恢复民主政体和沿袭从前智利宪制的形式，而是继续发展人民联盟的“革命”。1973年10月11日智利共产党的“呼吁书”，对这一点说得很透彻：

人民将重新掌握政权，当然不会强行恢复从前的所有组织制度。人民将通过一个新的宪法，制定新的法典和法律，发布新的法令，设立新的政府机构和组织制度，建立一个合法国家，它要比从前由于军事政变而受压制的那个国家更为高级。^③

同样，1974年5月1日的《人民联盟宣言》写道：

我们的目的不是仅仅恢复已在9月11日垮掉了的民主政体，也不是机械地照搬人民政府（即人民联盟政府）的经验。旧的国家

① 特脱尔鲍姆，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3月（第3期），第88页。

② 《团结报》，1974年6月15日。

③ 《共产党人》，1973年10月（第15期），第94—95页。

机构表明：它不能有效地进行自卫，反对法西斯侵略者，它也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智利绝大多数群众要求进行深刻社会变革的愿望。因此，一个新的国家必须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诞生……为了新的民主政体而进行斗争，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它将引导无产阶级及共同盟者在得到本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高水平和更为公正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①

根据智利共产党的“呼吁书”，这个新的国家将给予思想信仰自由，但是“将不主张有以下这样的法律，因为在这些法律的掩护之下，法西斯主义、经济破坏或颠覆活动都将可以进行的。”至于军事方面，将建立“新型”的武装部队及警察，或者说，至少要把全部“法西斯”分子清洗出去。对于智利民主政体的未来，“呼吁书”加上了这样的预言：

许多人深信无疑的一些机构，现已证明都是腐败不堪的。谁还会想到去支持现存的法律体系或议会呢，因为它们由于参与反政府的阴谋早已把自己葬送了。^②

① 《团结报》，1974年6月14日。

② 《共产党人》，1973年10月（第15期），第95页。

第五章

苏联在拉丁美洲加紧活动

苏联为利用它在拉丁美洲所见日益增长的机会，正在稳步展开攻势来直接扩大它在整个大陆的势力。莫斯科不仅假手古巴，而且运用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如果可能的话还运用军事力量，企图使自己成为影响拉丁美洲的重要因素。以前认为苏联对拉丁美洲地区比较不太重视，兴趣不浓，这种看法已不再有根据了。莫斯科已有好多办法，借这些办法，它认为能够利用古巴的情况以及本大陆形势的发展。由于不再受古巴好战分子从左的方面反对，也不受冷战时期敌对情绪从右的方面反对，只要有隙可乘，苏联就打算从外交、政治和经济方面进行渗透。

斯大林之后和赫鲁晓夫之后的学说，给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文化活动确定了很重要的任务。正如苏联经济援助计划的负责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谢尔盖·斯卡奇科夫所说的那样，“从民族解放斗争的长期根本任务来看，”苏联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交往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① 他和其他苏联评论员都阐明，从事这些活动的目的，不仅是为苏联博得好感，而且是为了树立这

^① S·斯卡奇科夫：“苏联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原载《共产党人》，1973年8月（第12期），第41页。

样一种形象，即苏联的实力即使不超过美国，也足以与之匹敌。作为一个更其重要的目标的是，苏联力图消除西方对这些国家经济和技术上的影响，从而帮助这些国家获得真正的“独立”，这样也就很有可能扩大苏联在它们中的影响。正如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所说的：

苏联并不隐瞒这一事实，即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联系削弱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贸易联系上的垄断，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作出让步，并承认这一事实，即它们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命令发展中国家按它们自己的意旨办事。^①

苏联分析家们还声称，“苏联政府对那些在进行解放斗争的国家和人民乐于扩大援助，可以促使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制订独立的外交政策方面产生有利的影响”。^②

但是，按照苏联关于把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发展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的学说（见第一章），苏联的经济和文化活动比起鼓励经济国有化来，其作用就更加显得野心勃勃了。正如斯卡奇科夫所说，“这种合作的作用不断扩大，是同现阶段民族解放运动的显著特征——民族独立斗争实际上已发展成为反对剥削关系的斗争——有极大关系的”。^③也就是说，苏联的活动不仅有其消极作用，而且还可能促使种种社会经济

① 《消息报》，1972年2月15日。

② B·I·格沃兹达列夫：“苏联对外政策和拉丁美洲”，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3—4月（第2期），第14页。

③ 斯卡奇科夫，前引文，第41页。

变化最终走向共产主义阶段。

这种努力至少包括三点。第一，正如斯卡奇科夫和其他一些苏联评论员所始终强调的，苏联大部分的援助都用于重工业部门，特别是用于“构成国民经济核心的关键项目”。^①这不仅在理论上符合苏联关于发展方面的见解，而且使苏联和受援国之间的长期关系得到保证。第二，“苏联同这些年轻国家之间的合作，目的在于优先发展这些国家的国营经济部门”。^②莫斯科把这看作是打击西方国家和私人企业利益的手段。最后，当前苏联在第三世界最强调的利益之一，就是训练一批新的技术人员、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公务员和专业人员，莫斯科希望他们将来能接管自己的国家。莫斯科所公开承认的目的，是要使这些干部同西方的传统和观念决裂，并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

尽管这种做法使莫斯科能同一大批政府打交道，但优先考虑的则是所谓“进步”的政府。这儿多少有些涉及到某种循环推理，因为一个“进步”政府的标准之一，是看它是否愿意按照上述这些方面去同苏联打交道。虽然这种做法意味着苏联不管这些政府对当地共产党的态度如何，愿意同它们建立关系，但是莫斯科也考虑到，自己同其他国家所建立的国与国间的关系固然给共产主义事业增加了威望，但也可能因此削弱当地共产党的地位。

在本章中，人们可以看到苏联政府在拉丁美洲全境的活动在逐步增加。

① 斯卡奇科夫：前引文，第46页。

② 同上，第43页。

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外交关系

在苏联看来,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莫斯科建立关系是“表明这些国家渴望真正的独立”,^①是向美国挑战的一种姿态,也是扩大苏联势力的机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气氛中,若干拉丁美洲国家同苏联建立或者恢复了外交关系,它们是古巴(1942年),墨西哥(1942年),哥伦比亚(1943年),乌拉圭(1943年),智利(1944年),哥斯达黎加(1944年),尼加拉瓜(1944年),委内瑞拉(1945年),玻利维亚(1945年),厄瓜多尔(1945年),巴西(1945年),多米尼加共和国(1945年),阿根廷(1946年)。然而,这些关系有很多都未得到发展,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在1945—1950年期间,大半不是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就是不再维持外交关系。^②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苏联只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乌拉圭有正式外交关系。无怪乎苏联宣传机构指责美国阻止拉丁美洲同苏联保持关系,并力图“孤立”这个地区,以便更轻而易举地进行掠夺。

^① V·鲍罗夫斯基:“马格达累纳岛上的‘伏尔加’”,原载《真理报》,1969年5月14日。

^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已经先后同墨西哥(1924年)、乌拉圭(1926年)和哥伦比亚(1935年)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苏联同墨西哥、乌拉圭的外交关系在三十年代破裂了。哥伦比亚到1943年才同苏联互派大使。见《苏联和拉丁美洲,1917—1967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67年版),第210—211页。另见斯蒂芬·克利索德:《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关系,1918—1968年,文件研究》(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73—156页。

古巴革命以后，莫斯科发动了一场新的攻势，目的在于加速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起初并未取得什么成就。冷战、苏联支持卡斯特罗、拉丁美洲国家担心苏联搞颠覆，以及它们无意将苏联作为市场、技术知识与援助的来源，这一切使得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对莫斯科的讨好表示冷淡。只有智利，在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总统执政后于1964年同苏联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1967年以后，苏联开始发现拉丁美洲较前易于接受了。能说明苏联发动这场攻势的动机的是勃列日涅夫在1969年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他说“我们正在扩大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正在加紧反抗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外国垄断集团的压迫。”^①《真理报》满意地指出，“不顾美帝国主义设置的一切障碍，拉丁美洲各族人民力求更加接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作的斗争，正变得愈益强烈起来。”^②因而，哥伦比亚在1968年，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在1969年，委内瑞拉和圭亚那在1970年，哥斯达黎加在1971年，相继同莫斯科重建外交关系。1974年6月6日，苏联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同意建交并互派大使。苏联和圭亚那直到1973年才互派常驻使团。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同苏联虽然也有外交关系，但并未互派使团。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承认，对许多欠发达国家来说，同苏联建立关系的问题是个政治上很敏感的问题。但他争辩说，经验教育了这些国家，“同苏联建立友谊便于他们击败帝国主义和

① 《真理报》，1969年6月8日。

② 《真理报》社论，1971年1月26日。

取得真正的独立。”他满意地指出，“最近，我们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合作已有很大的进展。”^①

莫斯科的东欧伙伴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有显著的增进(见表一)。例如,东德在1973年同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圭亚那、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等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4年1月又同巴拿马建立了关系。目前,经互会中所有六个东欧成员国在阿根廷、巴西、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都有驻节大使;同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都有外交关系,但并非全都驻有使节。阿根廷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和各个共产党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古巴、蒙古、北朝鲜、北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都有外交关系;它是拉丁美洲唯一具有这种特点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具有这种特点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在阿连德垮台以前,智利也具有这种特点,但从1974年年中起,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同发动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保持外交关系。

近几年,苏联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之所以迅速扩大,是有种种原因的。毋庸置疑,该地区的民族主义倾向,有时是左倾,使得他们有兴趣去扩大对外接触,显示拉丁美洲在对外关系方面已“摆脱”美国的影响。就智利、秘鲁和1971年以前的玻利维亚来说,出现左倾政权就容易同苏联建立关系,尤其是因为莫斯科已公开表示赞成这些政权把美国企业收归国有的政策。然而,就大多数国家来说,主要动机看来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就是希望扩大贸易,希望拉丁美洲的

^① 《真理报》,1972年12月22日。

表一 共产党国家的外交、领

	阿尔巴 尼 亚	保加利亚	古 巴	捷克斯 洛伐克	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
阿 根 廷②	NR*	R	R*	R,T	R*
巴巴多斯			NR*		
玻利维亚		NR		R	NR*
巴 西	NR	R,2T		R,C,2T	R*,2T
智 利③					
哥伦比亚		NR*,C,T		R,T,C	R*,T
哥斯达黎加	NR*	NR,T		NR*,C,T	R*
厄瓜多尔		NR,C		R,T	R*,T
圭 亚 那			NR*		R*
海 地					
洪都拉斯					
牙 买 加			NR*,C		
墨 西 哥	NR*		R,2C	R,T	R*,T
尼加拉瓜					
巴 拿 马		R*	R*	R*	R*
巴 拉 圭					
秘 鲁	R*	R,T*	R*	R,T*	R*,T*
特立尼达		NR*	NR*		
乌 拉 圭				R,T	R*,T
委 内 瑞 拉				R,T	R

说明：R——常驻外交官。T——常驻贸易机构。NR——无常驻外交官，或

① 引自美国国务院，INR《共产党在拉丁美洲的外交、领事和贸易代表

② 阿根廷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北越也有外交关系，但未派驻大使。

③ 柯连德垮台前，所有十四个共产党国家在智利都派驻外交使团，但蒙古

事使团和贸易——1974年①

匈 牙 利	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波 兰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罗 马 尼 亚	苏 联	南 斯 拉 夫
R, T	NR*	R, T	R*	R	R, T	R
			NR*		NR*	
R		R		NR	R, T	R
R, 2T		R, C	NR*	R, 2T	R, 2T	R, T
			R, T	R, T		
NR*, C, T		R, C, T		R*, T	R, T, C	R, T, C
NR		NR	T*	NR, T*	R, T	NR, C
NR		R, T		NR	R, T	NR, C
			R*, T*		R	NR
		NR, T				
NR*		NR		NR*		NR
		NR*	R*	NR*		NR
NR*, T		R, T	R*	R*, T	R, T	R
		NR				
		R, T		NR		NR
						NR
R, T*	T*	R, T*	R*, T	R	R, T	R
			NR*	NR*	NR*	
R, T		R, T		R	R, T	R
R, T	NR	R, T	NR	R	R	R

有交往,但未派驻使团。C——领事馆。(有*者系1972—1974年间所派遣)团>(1971年9月8日)一文,据最新材料增订。

和南斯拉夫在智利仅设贸易机构。

输出品能向苏联集团开放。

因此，派遣贸易或经济代表团就是苏联建立和扩大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某些国家中，建立这种关系要比建立外交关系早几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在九个拉丁美洲国家，东德和匈牙利在六个拉丁美洲国家，罗马尼亚在五个拉丁美洲国家，保加利亚在四个拉丁美洲国家，都分别设有这种办事处（见表一）。或者，就各个国家来看，苏联和所有东欧六国在哥伦比亚和秘鲁，苏联和东欧五国在巴西和墨西哥，苏联和东欧四国在乌拉圭，苏联和东欧三国在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都分别派驻贸易代表团。苏联在玻利维亚和圭亚那，波兰在海地和巴拿马，都有这种代表，而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则在委内瑞拉设有这种办事处。

拉丁美洲恐苏惧共的情绪似乎也在下降。正统的共产党提倡组成统一战线和走“和平道路”来取得政权，这比起倾向暴力的激进的新左派运动来就似乎保守了。此外，美苏关系的冷战状态表面上告一结束，华盛顿在企图同莫斯科就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谈判以及在扩大政治、经济接触方面采取的模范行动，也都促使拉丁美洲同苏联关系恢复。

不过，该地区对莫斯科的动机和行动所引起的猜疑，很可能死灰复燃。1970年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墨西哥发现了一支游击队，他们在到北朝鲜受训之前，是在苏联上的大学。墨西哥政府驱逐了五名苏联外交官以示报复，这一行动在拉丁美洲引起普遍注意，而且激起了对苏联干涉该地区国家内政的强烈谴责。1972年，玻利维亚从苏联大使馆驱逐了一大批人，恐苏情绪又冒了出来。阿根廷、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乌

拉美也发生了驱逐若干苏联外交官和贸易代表的事。然而，哪怕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件，但是与过去不同，它并未导致同苏联断绝关系。

尽管这些国家对苏联的猜疑仍然存在，但政府和议会代表团以及商务、专业、工会、军事和青年团体相互访问的次数和范围正在与日俱增。象哥斯达黎加这样一个坚定的亲美国家同苏联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可能促使其他一些中美国家群起效尤。例如，苏联在巴拿马与美国因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权发生的争端中支持巴拿马以后，巴拿马政府就暗示它准备同苏联集团各国，包括古巴在内，实现关系“正常化”。^①

苏联在拉丁美洲国家设立大型外交使团以及贸易、文化和科学代表团，1970年在拉丁美洲国家大约拥有三百名外交人员，这就大大扩大了苏联同这些国家的政府、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种组织接触的能力，扩大了影响其成员的能力。^②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在为苏联攫取利益和博得同情打下基础。由于苏联派往拉丁美洲的外交和情报人员老于世故，训练素质和语言方面的能力显著提高，展开这些活动就得心应手，更加便利了。

苏联经济援助的扩大

苏联一方面全力以赴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一

① 见巴拿马总统德梅特里奥·拉卡斯的讲话，原载《迈阿密先驱论坛报》，1971年7月22日。

② 《纽约时报》，1970年12月7日。

方面又竭力同这些国家签订贸易合同，并由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给它们以信贷。

苏联扩大同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这就提出了这样两个重要问题，即苏联在该地区作较大规模投资的愿望和能力究竟如何？美国对那里的援助和私人投资削减以后出现的某些真空，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能设法填补到什么程度？美国普遍持有这种见解，认为苏联由于不得不支持古巴的经济，接受了一次代价很大的教训，所以它既不希望也不可能负担“另一个古巴”。按照这种分析，苏联对拉丁美洲不可能承担大量的经济义务，也不可能成为技术援助的主要来源。苏联的这种形象似乎已为事实所证实：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和共产党集团国家对拉丁美洲的援助和贸易水平有限，增长较慢，而且在小心翼翼地避免承担那些规模大、成本高的工程项目。

苏联对其他国家能够或者愿意提供多少经济援助，这个问题还远未搞清楚。过去曾经预言，说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大规模援助的能力和诚意都有限度，这已有许多事例证明是错误的。苏联援助其他国家的经济能力虽有明显的限度，但下列两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苏联制订这方面的政策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凡是挑起经济重担看来已证明有希望在政治上得到很大好处的地方，莫斯科是能够挑起这些经济重担的。

苏联领导人从古巴经验中究竟吸取了什么“教训”，在苏联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上如何运用这些“教训”，也不清楚。根据书面数字判断，苏联集团过去十年在经济方面对古巴的交货和援助看来约计五十亿美元，古巴所欠的债务目

前也接近这个数目。要是考虑到交付古巴的货物的质量和优先权,莫斯科索取的价格,以及苏联输入古巴产品所获得的收益,那么,苏联的实际成本也许就相当小了。如果说支持古巴对苏联来说果然付出很大代价,那么,这也表明苏联有能力向一个遥远的国家提供大规模的援助,此外还表明苏联不顾古巴贸易赤字的增大,还是愿意逐年增加这种援助。而且,这一经验并没有妨碍莫斯科及其共产党盟国对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承担大大扩大的援助义务。

问题并不在于苏联是否愿意和能够对拉丁美洲担当提供援助和贸易来源的主要角色(无疑这是它力所不能及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会有选择地承担些重要经济义务来支持“进步”政权,或者取得政治影响。由于苏联的援助是注意这种机会的,由于莫斯科的援助政策是服从政治需要的,这样,早期苏联在拉丁美洲经济活动的水平低,看来就表明是它缺乏适当时机而不是不愿承担责任了。

柯西金总理在1966年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讲明了苏联对于同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的态度:

我们非常重视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发展经济关系。这些国家,人口约占全人类的一半,现在已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很剧烈的场所。^①

如上所述,莫斯科发言人坦白承认,莫斯科把它同第三世

^① 《真理报》,1966年4月6日。

界的经济关系主要看作是东西方斗争的一项武器。苏联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援助非常明显地反映出苏联在该地区的政治利益和目标,因为它购买那里生产的“战略”物资比较少,因而进口的也大都是目前苏联经济并不急需的东西。

苏联的信贷政策反映出拉丁美洲政治形势的变化。1966年以前只有阿根廷和巴西得到苏联的信贷——大部分都未曾动用。1967年,弗雷总统的“改良主义”政府得到苏联五千五百万美元的信贷。1968年,莫斯科给予哥伦比亚二百万美元的信贷,1969年,给予乌拉圭二千万美元。与此同时,其他东欧国家贷给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和乌拉圭共达三千六百万美元。共产党国家在1971—1972年的贷款表现出明显的增加,这正是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发生政治变化的结果(见表二)。智利和秘鲁仍然是共产党国家的特殊优惠对象,当然,前者在阿连德倒台以后情况就并非如此了。

1972年的数字表明,到该年年底,苏联对拉丁美洲(古巴除外)的信贷累积总数增加到四亿四千八百万美元左右;东欧国家的信贷大约增加到五亿九千万美元(见表二)。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1年贷给秘鲁四千二百万美元,贷给智利二百万美元;1972年贷给智利六千三百万美元,贷给圭亚那二千六百万美元(见表二)。因此,到1972年年底止,看来共产党国家对拉丁美洲(古巴除外)的援助总数已超过十亿美元。1973年实质上没有新的信贷,但1974年年初对阿根廷提供的大量援助(苏联提供六亿美元,东欧提供三亿五千万美元),即使不算苏联和东欧对智利信贷中尚未动用的部分,也使苏联集团对拉丁美洲提供的信贷接近二十亿美元的大关。

表二 共产党国家对拉丁美洲经济援助累积数

(单位:百万美元)

	1954—1973				1971				1972				1973	
	总 计	苏 联	东 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总 计	苏 联	东 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总 计	苏 联	东 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总 计	东 欧
拉丁美洲	1176	448	595	133	259	41	174	44	331	144	98	89	5	5
阿根廷	54	15	9	—	—	—	—	—	—	—	—	—	—	—
玻利维亚	61	30	31	—	27	2	25	—	—	—	—	—	5	5
巴西	312	85 ^a	227	—	—	—	—	—	—	—	—	—	—	—
智利	423	238 ^b	120	65	136	39	65	95	2	227	144	20	63	—
哥伦比亚	7	2	5	—	5	—	5	—	—	—	—	—	—	—
厄瓜多尔	15	—	15	—	5	—	5	—	—	—	—	—	—	—
圭亚那	26	—	—	26	—	—	—	—	26	—	—	26	—	—
秘鲁	223	28	153	42	86	—	44	42	78	—	78	—	—	—
乌拉圭	45	20	25	—	—	—	—	—	—	—	—	—	—	—
委内瑞拉	10	—	10	—	—	—	—	—	—	—	—	—	—	—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共产党国家同发展中国家:1973年的援助与贸易》,INR RS-20,1974年10月10日,表一。美国国务院:《共产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1972年的援助与贸易》,RECS-10,1973年6月15日,表一。

(a) 苏联公布的某些资料谈到,苏联贷给巴西一笔一亿美元的贷款是用来购买重工业设备的。见L·切尔诺鲁尔斯卡娅:“拉丁美洲与社会主义世界的经济联系”,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3年6月(第6期),第69页。

(b) 智利和苏联两国官方资料都把苏联给予智利的信贷总数定为二亿五千九百万美元。此外,1972年北朝鲜给予智利一笔五百万美元的信贷。这样,把一切短期贷款除外,到1972年底,共产党国家给予智利的信贷总计约四亿四千九百万美元。

就百分比增长的情况来看,如表三所示,在1967和1969这两年之间,苏联的信贷只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其后三年大约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1973年没有增加。从1967年到1972年,苏联集团对拉丁美洲的援助,情况与此相似,总数大约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苏联一看到拉丁美洲出现经济渗透的机会就作出反应的另一个迹象,是1968年接受苏联的信贷仅占该年苏联给与所有非共产党欠发达国家全部新信贷的百分之零点五,1969年占百分之三,而1970年拉丁美洲在苏联新信贷中占的份额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二,1971年为百分之三十,1972年为百分之二十五(全部给予智利)。1973年下降为零,但1974年由于给予阿根廷信贷而再次上升。^①

如上所述,苏联与共产党国家集团对拉丁美洲援助的扩大是同苏联对古巴援助的增加一致的。因此,看来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并未因卷入古巴所挑起重担而妨碍了它们去增加对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援助。苏联集团对拉丁美洲的信贷总额同美国在该地区的援助和投资相比虽然不算过分,但近几年共产党援助的增长率表明,莫斯科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是既愿意又能够在拉丁美洲发动一场经济攻势并承担大量经济援助义务的。此外,在估计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利益时,将援助古巴同援助该地区其他国家两者截然分开,可能会使人产生误解;尤其是苏联希望古巴能成为一个橱窗,让那个地区看看同苏联打交道的好处,情况就更其如此。假定共产党

^① 东欧国家相应的信贷数为:1968年6.2%;1969年1.7%;1970年26%;1971年37.2%;1972年15.1%;1973年1.0%。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 INR RS-20,同前引书,表三。

表三 苏联和东欧国家向拉丁美洲提供经济贷款的增长
1967—1973年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苏联		东欧		苏联+东欧	
	累积总数 (1954年起)	百分比 增长	累积总数 (1954年起)	百分比 增长	累积总数 (1954年起)	百分比 增长
1967	185	100	246	100	431	100
1968	187	101	256	104	443	103
1969	207	112	267	109	474	110
1970	263	142	318	129	581	135
1971	304	164	492	200	796	185
1972	448	242	590	240	1038	241
1973	448	242	595	242	1043	241

资料来源: 据美国国务院:《共产党国家同发展中国家: 1973年的援助与贸易》, INR RS-20, 1974年10月10日, 表三。

国家目前给予拉丁美洲的而且还在日益增长的信贷总额(包括古巴在内)看来约计六七十亿美元的话, 那么, 那种认为在苏联执行的政策中对该地区比较缺乏兴趣而又没有优先予以考虑的看法, 看来就没有根据了。事实上, 苏联在1959—1974年期间对拉丁美洲(包括古巴在内)的经济援助超过莫斯科从1954年以来已经给予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在内)经济方面的信贷数额。

自1969年以来, 拉丁美洲国家在利用苏联和东欧的信贷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69年以前, 这些信贷大都没有动用。1969年苏联在一次广播中抱怨说:

正是由于反动派的反对，使得苏联给予巴西和智利的机器设备的协议未能付诸实施。苏联同阿根廷就签订贸易协议进行的会谈，阿根廷向苏联订购工业设备的议定书，也由于这些反动派的阻挠而中止。^①

广播在结尾中预言：“在同苏联发展关系的道路上不管设置什么障碍，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必不可少的（上述关系）将最终获得成功。”

拉丁美洲不愿意使用苏联的信贷（通常用来购买机器），多半是因为怀疑苏联设备是否合适，备件可否得到；他们也不愿意训练使用苏联设备的技术人员。这些协定往往使拉丁美洲国家在同华盛顿或西方私人企业进行谈判时当作一种手段而已。莫斯科试图宣传它的科学技术成就以及在工业发展方面给予其他国家的援助，来消除这个地区不愿和它打交道的情绪。苏联着重宣传它克服早期落后状态以及发展成为一个在生产能力和尖端技术方面能同西方抗衡的现代化工业国的成就。

近几年来，愈来愈多的拉丁美洲国家已表明愈来愈有意使用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提供的信贷。结果，苏联集团就卷入了种种工程项目，而这些工程反过来也可能使受援国愈来愈依赖东欧的备件和技术援助。虽然如此，有很大一部分信贷仍然未予动用。分配给特定工程的信贷难免要进行长期谈判，要由东欧国家的技术人员研究是否可行，要决定苏联集团的设备是否适用，是否能够得到等。拉丁美洲国家并非个个

^① 莫斯科电台，1969年7月13日。

都一样愿意利用共产党国家的信贷。显然，那些难于从其他地方获得外国投资的国家，才准备转向苏联集团求援。

此外，莫斯科看来绝不急于挑起经济援助这副重担。相反，正如从信贷的相对数额（见表二）所表明的那样，大部分的援助苏联都是让其他东欧国家去提供的。一般说来，苏联集团的信贷看来并不根据共产党国家间协调一致的政策办事。诚然，一些东欧国家不象苏联，它们确实需要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原料和货物。然而，当这一点在政治上变得很重要时，例如阿连德执政时的智利，苏联集团也许会在莫斯科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共同努力，来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并以加速该国工业的发展为目的。对法国、西德、意大利之类的西欧国家以及日本在拉丁美洲增加投资，看来苏联并不反对，也许还表示赞成。在苏联看来，这种投资有助于取代美国的投资，同时也能使苏联避免在援助上挑起过重的担子。苏联可能并不认为这些国家是它在拉丁美洲政治影响方面竞争的对手，因此也不认为这些国家对苏联想在损害美国的情况下扩大在该地区的势力构成一种威胁。

如上所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信贷主要用于出售全套工厂设备和技术，还有少量的技术援助。使用这些信贷所进行的工程项目，各个国家并不相同，它取决于这些国家的需要以及苏联集团提供必要设备的能力。看来这些国家对苏联的电力设备，冶金机械，钻井，采矿，化工和农业设备以及全套工厂设备都感兴趣。此外，苏联还利用它在捕鱼工业方面著名的优越性，将帮助建造若干渔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希望国营经济部门得到援助，又希望对提炼工业和自然资源保持控制

和所有权，这也使共产党集团从中得到好处。共产党国家出售设备而且负责维修，不要求直接参与它所资助的工业，也不要求有一点所有权，这种做法对于力图减少外国占有和控制自然资源及主要出口的一些拉丁美洲政府是很有吸引力的。

还有迹象表明：西方普遍认为苏联不再愿意在欠发达国家中插手那些规模极大和费用极高的工程，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莫斯科已表明有兴趣参与开发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多国工程，这些工程涉及到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和阿根廷，其中包括建设一项费用可能超过埃及阿斯旺水坝的大型水坝和水力发电厂的综合企业。苏联已表明它乐意参与在巴西和巴拉圭边境上的塞特凯达斯和瓜伊拉瀑布工程，并特向乌拉圭提供了九千万美元来建设帕尔马尔水坝。^① 苏联还愈来愈卷入秘鲁的奥尔莫斯水力发电和灌溉工程，据估计，该项工程的费用为四亿五千万美元。^② 阿根廷商业部长赫尔伯特访苏回国后汇报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为费用达四十亿美元的萨尔托·格兰德大瀑布工程和阿根廷其他主要工程“准备提供不定期信贷”。^③

近年来，随着拉丁美洲大陆“左派”政权的出现，苏联在拉丁美洲的信贷政策也有了改变。苏联对亚非欠发达国家的信贷，通常定的利息是二厘半到三厘，规定十年到十五年偿还，

① 圣保罗《圣保罗州报》，1973年12月2日；里约热内卢《环球报》，1974年6月21日。

② 莫斯科电台，1972年4月28日；1974年5月24日。《消息报》，1974年7月28日。

③ 美洲通讯社，1974年5月22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而早期对拉丁美洲国家的信贷，除那些“进步”国家以外，利息为三厘半到四厘，有时为五厘，偿还期是八年。1967年苏联给予巴西和智利的信贷，1969年给予乌拉圭的信贷，正是这种情况。1974年苏联给予阿根廷的信贷要求年息四厘半，十年内偿还。保守的拉丁美洲国家在接受苏联援助时喜欢采用尽量减少共产党技术人员来到受援国这样的一种形式，苏联的这种做法，据认为是对这些国家作出的一种反应。^①给予“进步”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阿连德执政时的智利、秘鲁和以前的玻利维亚的优待，从这一事实中反映出来，向这些国家的国营经济部门提供的贷款，利息是两厘到三厘，而私人企业的借款，利息为三厘半，偿还期都在十到十二年以上。^②拉丁美洲人看来都不晓得苏联在提供援助方面这些区别对待的做法。苏联信贷协议特别诱人之处，一是通常用实物而不用货币偿还，二是它除了接受拉丁美洲传统的出口物以外，还经常同意这些国家以急于出售的半成品和成品来偿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给秘鲁、智利和圭亚那的贷款与众不同，据报道都是无息的，全是可兑换货币，偿还期为二十年。^③北

^① 罗伯特·S·沃尔特斯：《美国和苏联对外援助的比较分析》（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88页。一般说来，苏联的援助协议要求受援国为苏联的技术人员和顾问支付交通费，供养费和薪金。关于建造派塔渔业综合企业的苏—秘协议就是一个例子。可参阅T·斯蒂芬·切斯顿和伯纳德·利奥弗卡：《苏联对拉丁美洲政策的面面观》（纽约，社会科学资料公司，1974年），第115—119页。

^② 莫斯科电台，塔斯社国际节目，1971年5月28日；莫斯科《对外贸易》，1971年1月（第1期），第60页。

^③ 利马《快报》周刊，1971年11月30日；伦敦《拉丁美洲》，1972年4月26日；《纽约时报》，1972年6月11日。

京作为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另一来源(虽说有限)而介入拉丁美洲事务,该地区的许多国家表示有兴趣同中国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这既可能迫使莫斯科对秘鲁之类的国家增加援助,也可能因而说服莫斯科同意参与奥尔莫斯工程。这项工程当初在1968—1969年莫斯科是拒绝参与的。

智利 直到1974年与阿根廷达成一些大规模协议为止,苏联集团在拉丁美洲(古巴除外)最重大的经济活动是与智利的阿连德政权有关的。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见表二),提供给阿连德政权的发展援助信贷估计为三亿五千八百万美元(苏联提供二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东欧提供一亿二千万美元)。根据苏联和阿连德政权提供的资料,数字略微高些(苏联提供二亿五千九百万美元,东欧提供一亿三千二百万美元)。^①据报道,苏联也给予阿连德政权一亿零三百万美元的短期信贷,为购买急需进口的物资、特别是食品筹措资金,^②(这样,苏联给智利的信贷和借款总额很可能为三亿六千二百万美元)。根据智利的资料,东欧援助的分类细帐如下:

保加利亚	2500 万美元
匈牙利	2000 万美元
波兰	3500 万美元

^① 参见与埃尔内斯托·托尔雷阿尔巴·莫拉莱斯的谈话,原载圣地亚哥《埃尔西利亚》周刊,1973年2月28日—3月6日。收入联合出版调查处:《拉丁美洲》,1973年3月29日(第38期)。E·A·科萨列夫:“经济与革命的和平道路”,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9—10月(第5期),第106页。

^② 经济情报组:《经济报告季刊》,智利,1973年,第1期,第19页。《纽约时报》,1972年1月16日和27日。

罗马尼亚	1200 万美元
捷克斯洛伐克	1200 万美元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2000 万美元

另外,如上所述,中国给予六千五百万美元信贷,北朝鲜给予五百万美元信贷。

苏联给予阿连德政府的信贷始于1971年5月。当时智利外交部长和苏联政府缔结了一项协议,续借弗雷政府没有使用的早期低利信贷,并提供购买机器和全套工厂设备用的附加信贷。苏联同意建立一家生产住房预制件的工厂和一片润滑油厂。双方要进行共同研究,探索“智利提出建设特种化工工程”^①的可能性。1971年6月,苏联的报道说:“苏联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帮助智利建立二十多个大型工业企业,总价值超过一亿美元”。^②此后,苏联同意帮助智利至少建设一个渔港,借给智利拖网渔船。^③据智利官方估计,该港口的建造费用为五千万美元。到1971年底,苏联的一支捕鱼队开始为智利的市场需求而捕鱼。^④苏联还同意提供给智利价值共一千一百五十万美元的拖拉机五千台,^⑤并建议就出售电气火车举行谈判。^⑥

① 《真理报》,1971年5月30日。

② 莫斯科电台,1971年6月24日。

③ 《迈阿密先驱论坛报》,1971年9月9日;圣地亚哥《埃尔西利亚》周刊,1971年11月24—30日;莫斯科电台,1971年11月30日,1972年1月26日。

④ 伦敦《拉丁美洲》,1971年12月17日。

⑤ 《华尔街日报》,1972年3月13日;《迈阿密先驱论坛报》,1972年4月2日;《国际生活》(莫斯科),1973年3月3日,第77页。

⑥ 莫斯科《对外贸易》,1972年1月(第1期),第42页。

1972年1月，苏联高级经济代表团到达智利，就工业合作和贸易讨论签订新的协议。会谈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规定在1972—1975年这段时期内智利增加传统和非传统商品的出口，并购买“智利认为必须在1972—1975年间进口的”苏联商品和资本货物。此外，智利还向苏联代表团提出一份“同苏联进行技术和经济合作所可能实现的投资工程表”，其中包括1971年5月议定书上未计及的新工程。最后，智利“表示有兴趣在短期（就是立即）内扩大同苏联的经济与技术合作，以便发展某些工业部门，特别是动力、石油提炼工业、轻工业、食品和农业；同样还扩大地质勘探方面的技术援助。”^①

1972年6月，以智利社会党领导人阿尔托米拉诺为首的贸易代表团去莫斯科时，苏联明显玩弄政治上以退为进的手段，采取重大步骤来履行上述协议。使苏联大为恼火的是，阿尔托米拉诺在那年三月访问过中国，根据阿连德死后苏联公布的编年资料看，他回国后对中国“所发生的事还作了辩护性的评价”。^②智利外交部（也是社会党人领导的）在1972年7月3日宣布，苏联给予智利的信贷已大量增加，特别是用于购买铜业机器设备的。^③智利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铜，阿连德政府对于能否增加铜的生产特别有兴趣。阿连德好几次公开提到，智利在这方面需要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④1971年春，

① 智利外交新闻处，圣地亚哥，1972年2月15日。

② I·N·佐林娜和Iu·F·卡里亚金：“智利革命政事记”，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9—10月（第5期），第133页。

③ 布宜诺斯艾利斯政策研究所，1972年7月4日。

④ 莫斯科电台，1971年2月28日。

苏联铜的开采和冶炼专家一行到智利进行考察访问。苏联在一次广播中就这一问题提出了重要建议，即由于智利完全依赖“美国国际财团的技术和备件”，苏联专家“已经着手调查建立一个专门工厂的可能性来向那些铜矿和铜厂提供所有必需的备件和以前从美国进口的一些设备”。^①然而在铜的开采和加工技术方面，苏联不如美国先进，用苏联的设备来替换美国的设备会给智利的铜业生产造成极大困难并大拖其后腿。总之，1973年6月，苏联的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科斯京同智利铜业公司就技术援助和在丘基卡马塔建立一个制氧厂签署了协议。^②

1972年12月9日，阿连德访苏结束后发表的苏—智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已就苏联帮助智利建设工业企业、发展电力生产和农业、渔业等方面的问题达成协议；虽然阿连德得到苏联“准备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给予支持”的保证，但公报中并没有提到新的信贷。^③事实上，仅仅隔了几个月，苏联驻智利大使巴索夫显然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了回答，他告诉新闻记者，由于1972年给的信贷尚未用完，就毋需新的信贷了。^④这种情况在1973年开始有了改变。还在巴索夫发表声明之前就已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由苏联援助捕鱼工业，其中包括

① 莫斯科电台，1971年6月5日。

②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3年6月16日电。

③ 塔斯社1972年12月9日电；《真理报》，1972年12月10日。据1972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报道，智利外交部长阿耳梅达1972年12月20日宣布，苏联同意给予智利一笔三千万美元的贷款，用以购买食品和棉花。

④ 《迈阿密先驱论坛报》，1973年4月8日。

出售调查船一艘,在科洛拉建立一个渔业学院和渔港。^①同年4月,苏联给予智利生产发展公司的信贷增加到四千万美元。^②6月,苏联借款一千九百万美元,用以扩建为丘基卡马塔铜矿供应电力的托科皮利亚发电厂。^③7月,为在瓦尔帕来索建造一片费用超过四千八百万美元的面粉加工厂达成协议。^④

智利同东欧国家也签订了许多信贷和贸易协议,为建设各种工业企业提供财政和技术合作。捷克斯洛伐克帮助智利的矿业和林业,还帮助建造空压机制造厂和摩托车制造厂。保加利亚提供信贷和技术援助,用以建造一个起重机制造厂,一个采矿设备厂和一个水果罐头厂,并用以建造桥梁和发展香料工业。匈牙利提供资金援助铝加工工业和制药工业。波兰的信贷要用来建造一个仪器制造厂和一个硫酸制造厂。罗马尼亚帮助建造一个氨水厂,勘探矿藏和发展林业。东德提供的信贷用于医药和废物处理。罗马尼亚、匈牙利、东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要合作建造一个铜矿选矿厂和铜银合金电缆厂。^⑤

苏联同智利经济关系的政治实质由下述事实可见一斑,即在1971年以前,苏联和智利的贸易额从未有过一年超出一

①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3年2月9日电。

② 埃非通讯社1973年4月13日马德里电。

③ 同上,1973年6月28日。

④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3年7月10日电。

⑤ Iu·V·戈顿斯基:“阿连德政府的外交政策”,原载《拉丁美洲》,1972年3—4月(第2期),第7页。

百万美元；苏联也不买智利的主要出口品——铜。1971年以后贸易成交额有了显著增长：1971年为七百八十万卢布，1972年为一千八百九十万卢布，1973年头八个月为二千八百六十万卢布。大概是为了帮助智利偿付苏联的出口货，莫斯科在1972年开始进口智利的铜（八千公吨），1973年又增加到六千公吨铜和一万九千吨精炼铜。^① 尽管苏联的信贷着重在帮助发展经济，但莫斯科对智利的出口却反映了智利愈益需要进口食品，这正是急需苏联给予帮助的。^② 这样，1971年在苏联的出口总值七百万卢布中，就有六百五十万卢布用于小麦（十二万四千六百公吨），另有二十一万四千卢布用于炼乳。而在1973年，则有四百四十万卢布用于小麦（将近七万五千吨），三百万卢布用于冻肉（六千零十八吨），十三万四千卢布用于炼乳，也就是说在苏联出口总值一千六百万卢布中约有七百五十万卢布是食品。^③ 这些数字都不太大，但是，苏联插手智利经济的情况在明显增强，要是阿连德继续当政无

① 《1973年苏联对外贸易》，第312—313页。苏联答应从1973年起，在三年内购买十三万吨的智利铜。L·切尔诺鲁茨卡娅：“拉丁美洲和社会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3年6月（第6期），第70页。

② 1971年，在苏联对智利的出口总值七百万卢布中，机器和运输设备仅值十万零三千卢布；1972年，在苏联的出口总值一千一百六十万卢布中，机器和运输设备的价值为一千万卢布，而在1973年，苏联的出口总值为一千六百万卢布，其中机器和运输设备的价值为三百三十万卢布。见《1971年、1972年、1973年苏联对外贸易》。

③ 见《1971年、1972年、1973年苏联对外贸易》。1972年苏联不向智利出口小麦，却出口了价值二十三万三千卢布的炼乳，大概是因为那年苏联国内遭到谷物严重歉收，迫使它向美国购买大量小麦。

疑会有更加惊人的增强。

苏联同智利关系的加强，在苏联给予某些特别优惠方面表现得也很明显，如苏联派遣青年志愿队前往智利参加建设工程——使智利享有同古巴一样的待遇，1972年又建立了苏联开往智利的定期海运与空运业务。

阿根廷 由于智利阿连德的垮台，阿根廷总统庇隆对内政问题的态度虽在左右两派之间摇摆，但莫斯科对他在对外贸易关系多样化方面所作的努力立即欣然作出反应。1973年8月，阿根廷给予古巴一笔二亿美元的信贷用于购买阿根廷出售的卡车、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其中有一些包括美国的部件；庇隆对美国的挑战给莫斯科印象极深，这是可以理解的。阿连德死后，阿根廷同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关系的步伐大大加快，1974年5月由阿根廷经济部长赫尔瓦尔德访问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而达到高潮，他既批准了先前同这些国家所达成的一些协议，又接受了一些新的条约。赫尔瓦尔德在那次访问中，总共签订了十五项协议。

赫尔瓦尔德访问苏联，再次肯定了1974年2月所达成的三项协议，即贸易和经济协议，科学技术协议，以及关于苏联向阿根廷交付机器和设备的协议。苏联给予阿根廷六亿美元的信贷，用以支付一些开发动力资源工程所需的费用，特别是给萨尔托·格兰德水坝的设备，苏联在1974年1月就提出了这些设备的最低标价。用这笔信贷来支付的其他工程有：门多萨省乔孔-塞罗斯、科洛拉多斯以及阿莱库拉的水力发电厂，还有在拉普拉塔与罗萨里奥的两座火力发电站。赫尔瓦尔德在回国途中还透露，苏联将在布兰卡港和巴拉那·梅迪

奥附近帮助建造脱盐厂。①

赫尔巴特由苏联去波兰,得到波兰一亿美元的信贷,用于开发里奥·图尔比奥煤矿以及制造采矿机械和设备等工业项目。②他又从波兰到达布拉格,得到了两亿美元的信贷,用于购买阿瓜德尔托罗水力发电站的涡轮机和制造萨尔托·格兰德水坝所需的涡轮机,并用于制造机车。③从布拉格到达布达佩斯,在布达佩斯得到五千万美元的信贷,而不是他所指望的一亿美元,用来购买铁路设备。④同时,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在1974年3月访问了阿根廷,临行时提供了一亿美元的罗马尼亚信贷。⑤

由于特别注意动力资源的开发,在1974年余下的日子里,从各个方面贯彻执行了这些协议。7月30日,阿根廷同全苏电器出口联合公司签订了协议,由该公司为用于萨尔托·格兰德水坝的十二台水力发电涡轮机提供设计、制造、供应、运输、安装、操作以及工艺方面需要的帮助。⑥第一台涡轮机将于1978年年中开始安装,1979年4月开始运转。此后,每

① 《真理报》,1974年5月11日。G·捷列霍夫:“苏联—阿根廷的贸易关系”,原载莫斯科《对外贸易》,1974年6月(第6期),第14—15页。同上杂志,“苏联—阿根廷联合公报”第16—18页。美洲通讯社1974年5月22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② 波兰通讯社1974年5月9日华沙电。

③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1974年5月12日布拉格电。

④ 布达佩斯对国内广播,1974年5月13日,14日。

⑤ 罗马尼亚通讯社1974年3月8日布加勒斯特电;《火花报》,1974年3月9日;伦敦《苏联分析》,1974年5月9日,第3页。

⑥ 美洲通讯社1974年7月3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两个月安装一台涡轮机，直到1980年末或1981年初十二台涡轮机全部运转。这一合同的全部费用估计为六千六百万美元，要十年筹足。苏阿贸易、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九月份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了阿根廷为圣尼古拉斯火力发电厂以及馈电系统购置设备问题。^① 阿根廷又同全苏技术设备出口联合公司达成了一份议定书，由苏联帮助对在巴拉那河中游建立水力发电厂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② 关于萨尔托·格兰德水坝，莫斯科电台援引了阿根廷工会一名官员的讲话，大意说，该坝“将使我国重工业能够建立起来，从而帮助我们克服对大垄断集团和帝国主义的依赖，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依赖”。^③

在此期间，苏联同阿根廷也缔结了渔业和航海协议。渔业协议是一个草案，在苏联渔业部的两名高级官员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于1974年7月3日签订。协议要求：(1)共同开发渔业资源；(2)苏联培训阿根廷渔业人员；(3)提供技术经济援助，在南纬四十二度沿海处建造或改建一座现代化渔港；(4)最终建立联合捕鱼企业。^④ 同年十月，波兰与阿根廷缔结了以德塞多港建立联合捕鱼企业的协定。^⑤ 虽然波兰自己从事大规模捕鱼，但同意购买该企业的产品作为它“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在经营的第一年里，就购买了两万到两万五千吨

① 塔斯社1974年9月12日电。

② 美洲通讯社1974年11月1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③ 莫斯科电台西班牙语广播，1974年9月21日。

④ 美洲通讯社1974年7月3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⑤ 同上，1974年10月8日和17日。

以上的水产。1974年8月24日,苏联海运部长 T·B·格鲁任科同阿根廷签订了五年海运协议,规定两国平等分享商业运输吨位,而按年予以补偿,定期商谈相互间的海运优惠和方法。^①九月,阿根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签订了海运协议。^②

秘鲁 据苏联报道,秘鲁接受了苏联集团一笔总额为二亿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信贷,其中三千万美元来自苏联,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元来自东欧。^③虽然绝大部分信贷都是在1970年到1972年提出申请的,但看来只是在阿连德垮台以后才加速付诸实施。秘鲁把苏联的这笔信贷用于在派塔建设大型渔港和鱼类加工厂,还用来购买渔船。按照协议,苏联将为港口设备提供百分之六十的费用,整个建设费估计达六千到七千五百万美元。^④前些时候据说,苏联为在巴约瓦尔建港提供了六千万美元的信贷。^⑤秘鲁渔业部长坦塔莱安1973年7月访问莫斯科期间达成一项对派塔提供设备的协议,并为苏联在秘鲁丛林地区联合开发渔业打下了基础。^⑥作为对阿连德倒

① 美洲通讯社1974年8月24日; T·B·格鲁任科:“发展中的合作”,原载《消息报》,1974年8月31日。

② 同上,1974年9月17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③ A·I·奥尔尚内:“秘鲁与经互会国家”,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3—4月(第2期),第83页。据美国国务院提供的数据则稍低:苏联为二千八百万美元,东欧为一亿五千三百万美元(见表二)。

④ 奥尔尚内,前引文,第85页。亦见切斯顿和利奥费卡,前引文,第103—122页。

⑤ 利马《奥依加》,1971年6月25日。

⑥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3年7月18日电。

台后的智利提出指责的答复，1974年苏联报刊否认派塔将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甚至缩小莫斯科在该项建设中所起的作用。^①因此《真理报》援引秘鲁官员的话说，苏联的援助到1974年10月才达到一百八十万美元，即占该项工程总费用的百分之四。^②

同时，苏联同秘鲁的经济技术协议于1971年12月10日在莫斯科签字，协议规定既在动力工程、采矿和石油工业方面，也在农业方面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1972年6月14日和12月29日分别签署了各有关领域进行合作的议定书。按照上述协议和1973年12月28日交换的信件，苏联有关部门要对奥尔莫斯的水力发电和灌溉综合工程的最初阶段进行认真研究。苏联专家还对马腊尼翁河流域建立水电工程系统的可能性作了探讨。依据1973年9月20日签订的合同，苏联对外贸易单位重工业品出口公司还就在纳斯卡河地区建造一座冶金厂问题进行的研究帮助指导。^③1974年1月，根据1971年条约的条文签署的一项苏—秘协议，规定苏联参与对乌卡亚利河流域和瓦扬卡河水力发电资源的估计。^④奥尔莫斯工程曾经是苏联用来夸口和引人注目的资本。据苏联《拉丁美洲》杂志称，莫斯科派出了高级技术人员同秘鲁合作进行该项工程，其中有一个人是阿斯旺水坝设计者之一。工程完工以后可“灌溉十一万一千公顷土地，包括建立两个二十五万千瓦的

① V·列斯托夫：“山海之间”，原载《真理报》，1974年10月2日。

② 《真理报》，1974年10月2日。

③ 奥尔尚内，前引文，第85页。

④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4年1月18日电。

发电站和几个工业企业”。^① 这些协议表明，在未来的几年里，苏联将增加对秘鲁的信贷。

匈牙利 1972 年提供了二千万和四千五百万美元两笔信贷，是苏联集团中秘鲁最大的施主。据匈牙利贸易部长比罗说，其中三千三百五十万美元在 1973 年初已经用完。^② 1972 年 6 月签署的协议，要求匈牙利为秘鲁国营铁路网的设备和现代化提供援助。^③ 1974 年 6 月同匈牙利厂商达成了一项有关在秘鲁装配汽车的协议。^④ 匈牙利还提供了很多的医疗和教育设备。1974 年 11 月，秘—匈联合委员会开会后宣布，匈牙利将给予秘鲁九百七十万美元的信贷，用以完成瓦扬卡河的电力中心工程，五百三十万美元用以购买医疗设备，二千万美元用以购买资本货物。^⑤ 这笔贷款合计起来比原先给予的信贷多三百五十万美元，但这到底是算法上的问题呢，还是一笔新的贷款，不能肯定。

在向秘鲁提供信贷方面，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并不落在匈牙利后面。波兰大约有五千万美元的信贷用于发展秘鲁的煤炭和钢铁工业、勘探石油资源，以及发展渔业和木材工业。^⑥ 关于用波兰信贷在塔克纳建立渔港^⑦ 和在普卡尔帕建

① 奥尔尚内：“论苏联和秘鲁的经济技术合作(奥尔莫斯工程)”，原载《拉丁美洲》，1973 年 9—10 月(第 5 期)，第 82—83 页。莫斯科电台，1974 年 5 月 24 日。D·库兹涅佐夫：“秘鲁的社会经济变革”，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4 年 7 月(第 7 期)，第 129—130 页。

② 安莎通讯社 1973 年 2 月 15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③ 奥尔尚内，前引文，第 88 页。

④ 利马《邮报》，1974 年 6 月 23 日。

⑤ 拉丁美洲通讯社 1974 年 11 月 30 日电。

⑥ 奥尔尚内，前引文，第 89 页。

⑦ 利马外交新闻处，1974 年 8 月 27 日。

立木材企业^①的两个具体协议，已于1974年8月和11月先后签字。还据说波兰已决定对秘鲁亚马孙河流域石油勘探的基础工程投资四千五百万美元。^②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也据说积极响应了秘鲁提出由东欧集团在开发石油资源、发展电力和矿业方面给予援助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于1971—1975年期间承包秘鲁十二个城市现代化电气系统的安装工程，费用为七千二百万美元；^③已有一笔三千五百万美元的信贷，既用于伊基托斯和普卡尔帕两个林区城市的电气化，也用于上述十二个城市的电气化工程。^④就捷克为阿雷基帕和钦博特两个大型机器制造联合企业提供援助的可能性也正在进行会谈。^⑤1974年3月达成了捷—秘双方在特鲁希略联合建立摩托车工厂的协议。^⑥

1974年9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问秘鲁期间，罗马尼亚给了秘鲁一笔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信贷，用于开发它的铅、锌和铜矿。^⑦在这一方面，1974年8月达成了一项为开发安塔米纳铜矿建立联合公司的协议。^⑧保加利亚已给秘鲁两笔总额为一千万美元的贷款，而且正在秘鲁建造两个现代化

① 安莎通讯社1974年11月2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②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3年7月9日电。

③ 利马《快报》，1971年8月14日。

④ 同上。

⑤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2年2月15日电；奥尔尚内，前引文，第87页、第91页。

⑥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4年3月22日电。

⑦ 奥尔尚内，前引文，第90页。

⑧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4年8月12日电。

的屠宰场。^①

巴西 在一九六六年以前，苏联和东欧已给巴西三亿多美元的信贷（见表二）。问题在于如何使用。1972年1月苏联代表团访问巴西，就履行1966年的议定书，扩大经济关系进行了会谈，该议定书规定“总额为一亿美元”的苏联信贷，可用于购买机器和设备。^② 不过，苏联商会头子鲍里索夫1973年访问巴西期间仍在抱怨这笔信贷只用了一百万美元。^③ 虽然如此，莫斯科还是继续敦促巴西利用苏联提供的贷款，特别是购买电力设备和建造发电厂的贷款。一些报道声称，苏联自1970年以来已向卡皮瓦里水力发电厂出售了二千到三千万美元的设备，^④ 而且莫斯科自己在1971年宣布，它将为卡皮瓦里水力发电厂提供价值为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的十六万千瓦涡轮机发电机组以及其他设备，还将提供技术人员训练巴西人掌握操作。^⑤ 不过，苏联的贸易数字表明，到1973年才对巴西出口一些重要的发电站设备（价值约四百万卢布）。^⑥ 1974年10月11日，圣保罗电力公司得到官方许可，为卡皮瓦里厂向苏联购买涡轮机。^⑦ 同时，莫斯科还迫使巴西接受其他工程。据报道，巴西拒绝了关于在阿瓜韦尔梅尔阿和伊尔拉索

① 奥尔尚内，前引文，第87页。

② 法新社1972年1月15日巴黎电。

③ 里约热内卢《环球报》，1973年5月25日。

④ 伦敦《拉丁美洲》，1970年10月20日；亚松森《阿贝赛彩色报》，1974年5月24日。

⑤ 莫斯科电台，1971年11月8日。

⑥ 《1973年苏联对外贸易》，第296页。

⑦ 圣保罗《圣保罗州报》，1974年10月12日。

尔特拉建立水力发电工程这样的建议。^① 莫斯科曾经一再坚持出价，在巴西—巴拉圭边境承建有关伊泰普工程。一些报道坚持认为，主要由于巴拉圭的反对，巴西已拒绝这一建议。^② 但是，巴西矿业部长乌埃基 1974 年 8 月否认上述报道，并声称，巴西仍然可能决定购买苏联设备，不仅用于伊泰普，而且用于其他工程。^③ 至于东欧国家提供的信贷，大概在几年前就已使用，近几年来没有什么活动的迹象。

玻利维亚 苏联同玻利维亚 1971 年达成的协议规定，苏联购买锡和精炼锡，并出售机器和设备，包括成套工厂设备，都是根据苏联的二千七百五十万美元信贷进行的。1973 年 11 月，苏联大使在其中一个工厂的开幕式上宣布，在这笔贷款中，玻利维亚已用去一千九百万美元。^④ 意味深长的是，托雷斯将军政权的垮台并没有影响苏联给这个信贷协议兑现的意愿。1971 年 10 月，苏联同意提供一笔六百八十万美元的信贷，用来建造一个生产锡用的蒸气炉中心；类似这样的中心，预计还有四个要靠苏联的援助来兴建，信贷总额达二千二百七十万美元。^⑤ 1973 年初，当苏联的全苏机器出口公司因美元贬值要求增加百分之十五的预算时，工程的进展受阻，需

① 亚松森《阿贝赛彩色报》，1974 年 5 月 24 日。

② 安莎通讯社 1973 年 9 月 1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里约热内卢《环球报》，1974 年 8 月 9 日。

③ 里约热内卢《环球报》，1974 年 8 月 21 日。

④ 拉巴斯《现状报》，1974 年 11 月 28 日。

⑤ 法新社 1970 年 10 月 15 日巴黎电。埃菲通讯社 1972 年 1 月 15 日马德里电。

要进一步进行谈判,结果显然由苏联给该工程增加信贷。^①苏联和玻利维亚还签订了联合勘探安第斯石油和天然气以及苏联帮助玻利维亚发展锌和锡工业的协议。^②

1971年以来,东欧国家已单方面向玻利维亚提供了若干信贷,有些就是根据一般性的双边协议,但很少就具体工程签订合同。^③1972年,波兰提出建造一个矿山机械制造厂,并以五百万美元的信贷用于购买采矿机器。^④它还提议建造一个费用在一千七百到二千万美元之间的锌厂,而且确实作了一番切实的研究。^⑤但最可靠的是波兰在1973年投标成功,承包一个生产玻璃板的工厂,同年七月为此签订了一项五百万美元的合同。^⑥1971年,捷克表示对筹建一片锑提炼厂,一片铸造厂以及提供其他形式的援助感兴趣。^⑦1972年,他们提供了技术和财政援助,为玻利维亚建造一个陶瓷工厂。^⑧1973年,他们提供了一笔四千万美元的信贷,用于购买小型工业的设备和机器。^⑨对比之下,匈牙利是在1972年才签署了一项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政策研究所,1973年3月27日。法新社1973年4月29日巴黎电。

② 莫斯科电台,1971年6月18日;《迈阿密先驱论坛报》,1971年6月20日。

③ 拉巴斯《每日新闻报》,1974年10月11日。

④ 同上,1972年1月21日。

⑤ 拉巴斯《新闻报》,1972年9月5日。

⑥ 同上,1973年1月16日;1973年7月14日。

⑦ 伦敦《拉丁美洲》,1971年2月12日;拉巴斯《每日新闻报》,1971年12月17日。

⑧ 拉巴斯《每日新闻》,1972年5月5日。

⑨ 安莎通讯社1973年4月6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协议,协议要求为建造生产瓷器、制造氯气、工具和碳酸钠的工厂提供金融援助。^① 匈牙利还以信贷方式拨款六百万美元给玻利维亚,用以购买医疗器械。^② 保加利亚和玻利维亚在1973年4月30日签订一项协议,要求为一些未具体指明的农业工业工程提供技术和金融援助。这项协议的履行要视原先在1972年6月签署的协议是否批准而定,那个协议仍旧原封未动,具体细节上的安排有待进一步研究。^③

其他 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接受苏联和东欧提供的信贷为数很少,二十多年来总额才七千七百万美元(见表二)。1971年春,一个乌拉圭代表团访问苏联,讨论苏联原先给予他们二千万美元信贷的使用问题。^④ 谈判的结果,签订了购买苏联的复印机,石油产品容器和发电设备的合同。哥伦比亚进口了苏联汽车。此外,他们还进行谈判,研究在开发磷矿,生产磷和过磷酸盐方面由波兰提供金融、技术援助,以及就建造拖拉机和农机装配厂波兰可能提供的援助,还有向波兰订购船舶、钢轨、机车和其他车辆等等。^⑤ 匈牙利给厄瓜多尔的企业家提供的信贷,用于电气和金属加工工程,但下一步行动尚未见诸报道。^⑥

① 拉巴斯《每日新闻》,1972年6月19日。

② 拉巴斯《新闻报》,1972年9月5日。

③ 拉巴斯《每日新闻》,1973年5月1日。又见拉巴斯《每日新闻》,1972年12月19日。

④ 蒙得维的亚《每日新闻报》,1971年5月14日;莫斯科电台,1971年3月6日。

⑤ 波哥大《旁观者》周刊,1971年11月19日。

⑥ 基多电台,1973年6月26日。

同拉丁美洲的贸易

目前,除古巴以外,十四个拉丁美洲国家都同苏联进行贸易。这些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智利、玻利维亚、乌拉圭、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圭亚那、牙买加和萨尔瓦多。这个数字已超过十年前同苏联进行贸易的拉丁美洲国家数目的两倍。该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如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也同苏联进行一些个别项目的交易。在某些场合,协议在贸易和其他特殊利益方面相互提供了最惠国待遇。苏联同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和乌拉圭就已签署这类协议。苏联同其他欠发达地区的贸易,总是苏联的出口大大超过进口,而在拉丁美洲则大不相同,苏联经常遇到贸易赤字。

苏联同这一地区(除古巴以外)的年贸易值虽然比较小,但在1973年和1974年有着惊人的增长,要是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情况就会改观。自从1961年以来,贸易模式一直是起伏不定的(见表四、表五和表六)。然而,经过几年波动以后,1972年的贸易额设法恢复到了以前1966年所达到的水平,而1973年的贸易额又比1972年高一倍。^①这样,从1972

^①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共产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69年的援助和贸易》,1970年7月9日,RECS—5,第15—21页。《共产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0年的援助和贸易》,1971年9月22日,RECS—15,第28、第31—32页。《共产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2年的援助和贸易》,1973年6月15日,RECS—10,表十二。《共产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3年的援助和贸易》,1974年10月10日,INR—RS—20,表十一。

表四 苏联同拉丁美洲的贸易(1961—1965年)
(百万卢布)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贸易额	出口	进口	贸易额	出口	进口	贸易额	出口	进口	贸易额	出口	进口	贸易额	出口	进口
阿根廷	27.4	9.5	17.9	16.0	7.2	8.8	17.4	0.8	16.6	21.9	4.0	17.9	83.1	18.3	64.8
巴西	33.1	16.5	21.6	59.3	27.1	32.2	65.6	26.5	39.1	55.0	21.6	33.4	51.4	24.9	29.5
哥伦比亚													0.7	0.3	0.4
墨西哥	0.4	0.1	0.3	6.7	0.1	6.6	7.5	0.1	7.4	2.2	0.3	1.9	1.0	0.7	0.3
秘鲁	2.2	0.0	2.2	5.2	0.0	5.2	0.2	0.0	0.2						
乌拉圭	4.2	0.5	3.7	14.0	0.2	13.8	4.9	0.2	4.7	1.1	0.2	0.9	3.1	0.4	2.7
牙买加							0.1	0.0	0.1	2.6	0.0	2.6			
总计	72.3	26.6	45.7	101.2	34.6	66.6	95.7	27.6	68.1	82.8	26.1	56.7	142.3	44.6	97.7

资料来源:《苏联对外贸易》1961、1962、1963、1964、1965年各卷(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出版)。

表五 苏联同拉丁美洲的贸易(1966—1969年)
(百万卢布)

	1966			1967			1968			1969		
	贸易额	出口	进口	贸易额	出口	进口	贸易额	出口	进口	贸易额	出口	进口
阿根廷	103.3	6.7	96.6	25.1	4.3	20.8	28.7	2.9	25.8	29.1	6.1	23.0
巴西	52.4	24.9	27.5	42.0	10.8	31.2	37.5	12.4	25.1	54.8	10.9	43.9
智利	0.3	0.1	0.2	0.3	0.1	0.2	0.1	0.1	0.0	0.3	0.2	0.1
哥伦比亚	3.1	1.0	2.1	2.1	1.4	0.7	5.0	1.9	3.1	6.1	2.3	3.8
哥斯达黎加										4.7	0.0	4.7
厄瓜多尔							11.2	0.0	11.2	12.7	0.2	12.5
墨西哥	9.9	0.6	9.3	9.0	0.7	8.3	10.0	2.4	7.6	5.8	0.8	5.0
秘鲁										1.3	1.3	0.0
乌拉圭	8.8	0.5	8.3	3.7	0.4	3.3	2.0	0.6	1.4	1.7	0.8	0.9
总计	177.8	33.8	144.0	82.2	17.7	64.5	94.5	20.3	74.2	116.5	22.6	93.9

资料来源:《1969年苏联对外贸易》。

表六 苏联同拉丁美洲的贸易(1970—1973年)

(百万卢布)

	1970			1971			1972			1973		
	贸易额	出口	进口	贸易额	出口	进口	贸易额	出口	进口	贸易额	出口	进口
阿根廷	29.9	1.7	28.2	32.3	1.9	30.4	24.7	1.8	22.9	76.7	4.5	72.2
玻利维亚	3.1	0.0	3.1	9.0	0.0	9.0	3.3	0.8	2.5	16.2	4.0	12.2
巴西	23.2	2.4	20.8	43.7	2.0	41.7	72.9	7.1	65.8	125.8	9.3	116.5
智利	0.8	0.5	0.3	7.8	7.0	0.8	18.9	11.6	7.3	28.6	16.0	12.6
哥伦比亚	10.9	1.5	9.4	5.4	1.1	4.3	3.9	2.7	1.2	10.1	0.8	9.3
哥斯达黎加	6.2	0.0	6.2	2.2	0.0	2.2	2.8	0.0	2.8	5.3	0.2	5.1
多米尼加共和国							2.8	0.0	2.8	15.6	0.0	15.6
厄瓜多尔	0.8	0.1	0.7	3.3	0.0	3.3	2.4	0.1	2.3	0.9	0.2	0.7
萨尔瓦多							2.8	0.0	2.8	3.7	0.0	3.7
圭亚那										6.9	0.0	6.9
牙买加	0.7	0.0	0.7	2.3	0.0	2.3	1.0	0.0	1.0	3.9	0.0	3.9
墨西哥	1.0	0.7	0.3	9.5	0.3	9.2	8.4	0.6	7.8	0.6	0.5	0.1
秘鲁	0.3	0.1	0.2	0.2	0.0	0.2	2.0	0.2	1.8	19.7	4.3	15.4
特立尼达							8.4	0.0	8.4			
乌拉圭	1.8	0.8	1.0	2.2	0.9	1.2	3.4	1.2	2.2	6.1	0.8	5.3
委内瑞拉							4.2	0.1	4.1	1.2	0.6	0.6
总计	78.7	7.8	70.9	117.9	13.2	104.7	161.9	26.2	135.7	325.6	41.2	281.4

资料来源:《苏联对外贸易》1970、1971、1972、1973年各卷。

年到1973年，贸易总额便从一亿九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四亿四千二百四十万美元，据报道，1974年贸易总额超过了六亿三千万美元。^①除古巴以外，东欧同拉丁美洲的贸易量逐年增长，从1967年的二亿八千零七十万美元增加到1972年的四亿三千四百一十万美元。^②因此，苏联集团同拉丁美洲大陆的全部贸易额1972年总共八亿五千一百三十万美元，1973年超过了十亿美元。仅就阿根廷的情况来说，“阿—苏商会”估计，1974年的贸易额将达二亿二千六百万美元，而1972年约计是二千九百七十万美元，1973年是一亿美元。^③

尽管苏联同愈来愈多的拉丁美洲国家扩大经济联系，但这种贸易中有很大大一部分还仅限于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国家。大多数东欧国家除了同这两个国家贸易外，还同秘鲁进行贸易。苏联和东欧对拉丁美洲的贸易都有严重的赤字。除了1970年下降一次以外，苏联的贸易赤字从1968年的五千九百八十万美元逐步上升到1973年的三亿三千零四十万美元。1972年共产党世界对拉丁美洲的全部贸易逆差共计达四亿八千六百一十万美元。^④

照苏联的分析，苏联同拉丁美洲国家长期贸易逆差是抑

① 《1973年苏联对外贸易》；I·杰文：“团结和合作的道路”，原载《红星报》，1975年1月7日。

②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前引书。

③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4年12月1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美洲通讯社，1974年12月12日。

④ 这个数据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中国的出口额总计六百八十万美元，进口额总计一亿九千零九十万美元，主要是从巴西、智利和秘鲁买进的。

制苏联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因为它使苏联向这一地区增加采购受到限制。^① 这些分析断言，由于在拉丁美洲“人们对苏联的产品很不了解”，使得拉丁美洲国家购买苏联货的“范围很窄”，并且主张苏联的贸易机构必须同这一地区根深蒂固的西方公司竞争。可是，经常发现这种情况，苏联提供销售的设备总是供非所求，或者规格不合拉丁美洲买主的要求。苏联的一份资料承认：

个别拉丁美洲国家在对苏贸易问题上持有保留态度，而且看法也不一致。他们设置人为的障碍，来对付那些以商谈贸易为目的而访问这些国家的苏联对外贸易机构的代表们，而且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拒绝购买苏联的设备，纵然提供这种设备所讲的条件，比西方国家提供这种设备所讲的更加有利。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要想利用他们同苏联的贸易关系以便在购买其他国家货物时获得更多的有利条件，而把苏联的报价仅仅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根据。^②

同一份资料还抱怨，“当地的反动派和外国垄断集团”曾利用苏联卖给哥伦比亚的车辆“备件暂时短缺”，“在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展开了一场全面抵制苏联机器的广泛攻势”。在有些情况下苏联出现贸易逆差，是因为它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购买

^① N·格拉德科夫的文章，原载圣地亚哥《埃尔西利亚》周刊，1970年10月28日—11月3日，收入联合出版调查处：《拉丁美洲译丛》1970年11月18日（第416期），第1—4页。

^② N·格拉德科夫：“苏联与拉丁美洲的贸易关系”，原载《对外贸易》（莫斯科），1972年3月（第3期），第14页。亦见N·格拉德科夫的评论，莫斯科电台，1973年6月15日。

它看来并不需要的货物,例如1969年苏联买进哥斯达黎加的过剩咖啡,导致两国外交和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并允许莫斯科利用哥斯达黎加的“感恩”表现向拉丁美洲进行宣传。^①可是,从1970年到1973年,在同智利的贸易中,苏联是顺差。在个别年份,苏联同哥伦比亚(1972)、墨西哥(1970和1973)的贸易也都是顺差。^②

苏联向拉丁美洲出口的商品有:机床、成套工厂设备、石油钻井设备、发电设备、印刷机、熔铁炉、起重机、制图机、汽车、无轨电车、拖拉机、农业机械、电视机、车辆、筑路设备、铸铁、钢材、石棉、化学制品、柴油、石油制品以及小麦。在苏联出售的商品中,机械占优势,而大部分苏联信贷是用来购买这些东西的。在未来的岁月里,贸易逆差问题可能得到缓和,因为苏联设备已开始抵达(这是过去几年苏联给一些工程所提供的信贷),而且苏联的出口单上又加进了新项目。据1972年报道,苏联在同哥斯达黎加、秘鲁和智利谈判向它们供应原油的问题,但看来没有什么结果。^③在六十年代,莫斯科曾向巴西出售过石油,但在1970年取消了该项交易。然而在1974年7月26日,巴西石油公司签订了从苏联购买五十万吨(三百六十五万桶)原油的一项协议。^④这些原油是用巴西石油公司的船只装运的,又据报道,价格按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世界价格计

① 莫斯科电台,1971年2月6日。

② 1971年、1972年、1973年的苏联《对外贸易》。

③ 波哥大《宇宙报》,1972年1月11日。

④ 里约热内卢《巴西日报》,1974年7月27日;法新社1974年7月26日巴黎电。

算。^①

看来，苏联还企图在拉丁美洲发展它出售民用飞机的市场。1972年初，在该地区的一些国家中，出现雅克—40型喷气式客机，而且据苏联的消息说，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一些商行发出了购买这种飞机的订单。^② 1974年也透露了这样的消息，阿根廷的阿埃罗查乔航空公司1973年8月3日已签发一封意欲购买三架雅克—40型喷气式飞机的函件。^③ 然而，1974年12月购买这种飞机的谈判中止了。

1972年3月，宣布由苏联的伊尔—62型客机在莫斯科与智利的圣地亚哥之间定期飞行，从而开辟了第一条苏联到拉丁美洲的航线。^④ 莫斯科—利马航线于1974年6月通航。^⑤ 关于苏联—阿根廷之间航空联系一事，也开始谈判。虽然在莫斯科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已设立航空公司的办事处，但到1974年年底显然还没有飞机直达飞行。^⑥

莫斯科更广泛地采取其他措施，力图对拉丁美洲增加出口。墨西哥是最恰当的例子。1974年8月，苏联在墨西哥城

① 法新社1974年7月26日巴黎电。

② 《真理报》，1972年2月3日；A·I·阿列克桑德罗夫：“雅克—40型飞机在拉丁美洲上空”，原载《拉丁美洲》，1973年3—4月（第2期），第159—165页。雅克—40型飞机载客27名，时速每小时342英里，航程1240英里，并能在跑道短和简易机场上起飞降落。

③ 美洲通讯社1974年7月3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④ 莫斯科电台，1972年3月6日。

⑤ 塔斯社，1975年6月28日。

⑥ 《真理报》，1974年5月11日；美洲通讯社1974年10月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举行经济贸易展览会，在展览会上商定出售了价值约二百万美元的苏联产品，几乎占苏联1973年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①同年10月，墨西哥的一个代表团前往苏联探索贸易的可能性。^②1974年12月，两国同意设立经常交换经济贸易情报的机构。^③苏联和阿根廷打算在1975年交换贸易展品。^④

苏联购买该地区一些国家的传统出口货，诸如咖啡，香蕉以及其他水果，大米，羊毛，各种兽皮和皮革，棉花，可可，亚麻子油和蓖麻油，锡和精炼锡。拉丁美洲（包括古巴）的糖几乎要占苏联进口糖的百分之一百，咖啡要占它所进口的咖啡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可可豆占百分之二十五，亚麻子油占百分之一百，桐油占百分之六十，牛皮占百分之三十。1973年苏联从拉丁美洲进口二亿八千四百四十万卢布的货物，其中将近一半，即一亿二千四百二十万卢布，是用于向拉丁美洲八个国家购买食糖的。同时，许多苏联贸易协议规定，成品和半成品（如鞋、纺织品以及家用电器等）要占苏联进口货的百分之三十。要是这些贸易协议实现的话，这对那些试图发展自己的工业并为之寻找市场的许多国家特别有利，只要美国不愿购买拉丁美洲的非传统出口商品，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由于拉丁美洲国家渐渐变得无力同得到欧洲共同市场优待的亚非国家竞争，而且越来越怕日益增长的美国保护主义，所以进一步

① 埃菲通讯社1974年8月21日马德里电；墨西哥城《太阳报》，1974年8月30日。

② 墨西哥城《至上报》，1974年10月30日。

③ 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1974年12月10日。

④ 美洲通讯社1974年12月12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提高了同共产党国家贸易的兴趣。巴西鞋子事件是对上述第二个原因所作的最好说明。由于美国限制购买这些鞋子，巴西人就转向苏联大力推销。一名巴西部长甚至建议这样一笔交易，用巴西的鞋子去换取苏联的涡轮机。^①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苏联显然已经同意购买巴西的鞋子，不过，到1974年年底并没有达成一项最终协议。^②同时苏联贸易代表告知巴西，要苏联扩大其购买巴西咖啡和制成品贸易的先决条件是巴西要买更多的苏联货。类似的手法也用于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例如哥伦比亚，苏联首席代表敦促哥伦比亚购买更多的苏联电器设备，并坚持说，苏联极端重视向拉丁美洲国家出售它的产品，作为保证苏联大量购买拉丁美洲产品的一种办法。^③

1973年末，苏联的两个拉丁美洲问题专家(L·Z·泽文和V·A·捷佩尔曼)经过广泛调查，对苏联和拉丁美洲未来经济关系的期望，发表了一篇非常客观的文章。^④虽然作者对苏联和拉丁美洲贸易绝对数字的增长显得有点满意的样子，但仍然带着失望的语气写道，“在经互会国家的对外贸易中，拉丁美洲国家所占的份额正在减少”，这是因为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和非洲)的贸易增长得较快之故。作者还说，“在拉丁美洲的对外贸易中，社会主义国家所占的份额也增长得慢”。此外，尽管同苏联集团进行贸易的拉丁美洲国家增加了，

① 里约热内卢《巴西日报》，1974年6月16日。

② 里约热内卢《环球报》，1974年8月16日；圣保罗电台，1974年11月14日。

③ 例如，参看埃菲通讯社1973年7月6日马德里电。

④ L·Z·泽文和V·A·捷佩尔曼：“经互会国家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原载《拉丁美洲》，1973年9—10月(第5期)，第31—45页。

但贸易仍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除了贸易平衡问题，作者还举出了一个新困难，即一些比较发达的拉丁美洲国家正在限制成套企业的进口，而宁愿进口一些零件和个别的部件。

然而，作者看到一些有利的前景。他们谈到路程问题时指出，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的航运机构开辟了“波罗的海—美洲”航线，情况正在好转。他们又谈到，1971年苏联开辟了通往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智利的诸航线。他们看到有可能为苏联的轻工业进口原料以及进口有色金属矿物，也看到渔业方面的良好前景，还强调指出苏联的技术援助增加的情况。他们还谈到苏联集团把专利权和许可证转让给拉丁美洲，以及向拉丁美洲的教育部门所给予的援助。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看到苏联和东欧同拉丁美洲经济关系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合作机构已经制度化，并使其组织形式不断完善”。他们至今还哀叹，“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同许多亚非国家建立了牢固的经济关系，但同拉丁美洲的关系仍然变化不定”。目前他们看到了使之改变的种种方法。

首先关于贸易项目方面，他们设想了两种可能的趋势。“一种是，在亚非有关国家中已开始实践，建立一些企业，以这些企业的部分产品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由于在美国和西欧寻找市场有困难，他们建议，拉丁美洲国家可以和苏联集团在食品和轻工业，一些有色金属精炼矿石和钢材方面作一些交易。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正在乌拉圭参与一项以

成品来替代原材料出口的计划。另一种倾向是“建立一些企业,以其产品预定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出口”。他们举出墨西哥—捷克合办的一家生产滚珠轴承企业为例,这个企业打算将其百分之二十的产品出售给拉丁美洲。

其次,他们看到两个地区经济关系更加固定的一些形式有了发展。他们特别指出联合公司的发展,在这样的公司里,苏联集团国家一般获取百分之四十九的利益,当地政府或机构得到百分之五十一。作者断言,这些做法虽然仍在试验之中,但相信它们可能是加强苏联集团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一个有效办法。他们举了下面一些例子:捷克同乌拉圭,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三国同秘鲁,罗马尼亚同智利,匈牙利同墨西哥,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同委内瑞拉都是采取这种办法。新近签订的一些协议表明,波兰和匈牙利在阿根廷,匈牙利在厄瓜多尔,罗马尼亚在哥伦比亚都即将发展这种新型公司。

另一个重要的新发展是不断组成联合的政府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准备在继续发展的基础上寻求扩大贸易的可能性。苏联同秘鲁、墨西哥、巴西都有这样的委员会,1974年赫尔巴特率领代表团访苏后,苏联同阿根廷也建立了这样的组织。其他如罗马尼亚同秘鲁、巴西、哥伦比亚和智利,波兰同厄瓜多尔,匈牙利同秘鲁,捷克斯洛伐克同阿根廷,也都有这种委员会。1974年末,波兰、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分别同巴西建立了类似的委员会。这里所举的也不可能非常详尽。

最后,有迹象表明拉丁美洲国家同“经互会”之间有着更正式的关系。当“经互会国际投资银行”设立了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有关经济和技术援助贷款的特别基金时，泽文和捷佩尔曼看到了这种特别基金在拉丁美洲所产生的新的前景。这种基金在1974年1月开始发挥作用。其他一些苏联评论员指出，在1973年4月，陪同埃切维里亚到莫斯科去的一些墨西哥官员和苏联讨论了同“经互会”建立关系的问题。1974年11月21日，墨西哥政府官员公布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要求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探索合作的范围。^① 某一评论员也断言，1973年夏召开的“安第斯集团”外长会议的参加者都赞成进一步发展同“经互会”成员国的关系。^② 在赫尔巴特访苏后发表的苏阿公报指出，阿根廷表达了它对“同这个组织〔经互会〕建立直接关系以及同‘经互会’国家预先商定联合行动”感到兴趣。“苏联方面对朝着这样的前景发展表示了积极的态度。”^③

东欧同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在发展，虽然速度比苏联的缓慢，但它的起点较高（见表七）。贸易额从1969年的三亿零五百五十万美元增加到1973年的四亿三千二百四十万美元。东欧跟苏联一样，在这个地区也有贸易赤字问题，而且数字一直在逐步上升。例如，从1969年到1973年，东欧从拉丁美洲国家购买的商品比它向这个地区出售的商品多六亿三千八百万美元。到1973年，这个差额确实高到二亿一千四百六十万美元的新水平。^④ 一些东欧国家同个别拉丁美洲国

① 《真理报》，1974年5月11日。

② K·米库尔斯基：“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国际意义”，原载《共产党人》，1973年8月（第8期），第46页。

③ 莫斯科《对外贸易》，1974年6月（第6期），第18页。

④ 《贸易指南年刊》，1969—1973年，第52—53页。

表七 东欧国家同拉丁美洲的贸易

(百万美元)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保加利亚						
	出口	9.8	2.3	4.6	7.0	6.9
	进口	19.4	10.8	12.9	18.9	29.2
	共计	29.2	13.1	17.5	25.9	36.1
捷克斯洛伐克						
	出口	26.5	30.7	36.3	40.6	37.5
	进口	28.8	46.5	36.4	36.9	44.5
	共计	55.3	77.2	72.7	77.5	82.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出口	22.9	30.1	30.1	22.7	14.6
	进口	51.0	60.7	53.2	63.6	59.5
	共计	73.9	90.8	83.3	86.3	74.1
匈牙利						
	出口	5.8	8.0	8.0	8.9	10.2
	进口	28.6	40.2	31.4	36.2	40.9
	共计	34.4	48.2	39.4	45.1	51.1
波兰						
	出口	38.7	33.8	64.9	48.2	30.9
	进口	60.9	70.0	66.1	85.6	128.6
	共计	99.6	103.8	131.0	133.8	159.5
罗马尼亚						
	出口	3.7	9.0	7.1	7.9	8.8
	进口	9.4	19.6	22.2	21.7	20.8
	共计	13.1	28.6	29.3	29.6	29.6
总共						
	出口	107.4	113.9	151.0	135.3	108.9
	进口	198.1	247.8	222.2	262.9	323.5
	共计	305.5	361.7	373.2	398.2	432.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指南年刊》，1969—1973年，第52—53页。

家的贸易量要比苏联同这些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量大得多，虽然这种贸易量随年份和国家的不同而有变动。这样，从1970年到1973年，波兰同秘鲁的贸易额每年都比较大。东欧国家的对外贸易公司在企图向拉丁美洲国家出售商品时，经常同苏联的公司竞争。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的商品一向比苏联的畅销，譬如他们三国在巴西、秘鲁就是如此，波兰的商品在阿根廷也是这样。^①

苏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极不可能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虽然它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可能对一些经过挑选的国家增加经济上的支持。但是，苏联同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有增长的希望。苏联发言人告诉该地区的国家，“苏联作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可以给拉丁美洲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又可以提供一长单子的机器装备，而这些机器装备正是发展这些国家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苏联评论员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在拉丁美洲一些共和国对外贸易中占的份额仍然很小”。但是他们断言，共产党集团的市场对该地区的贸易开放，“正给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带来有益的影响”。因为它的结果是，“减少拉丁美洲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依赖，并对这些国家的外贸差额正在产生积极影响。”^②新上任的东德驻巴西大使以当前形势和意识形态为理由，竭力要求开展贸易，他对巴西的新闻记者说，东欧国家没有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什么影响，因此能“在金融方面向巴西提供宝贵的帮助”。^③

① 《贸易指南年刊》，1969—1973年，第166页。

② B·格沃兹达列夫：“拉丁美洲与当代世界”，原载《新时代》，1971年8月13日（第33期），第23页。

③ 里约热内卢《环球报》，1974年10月4日。

共产党国家不象他们在其他欠发达地区所做的那样在拉丁美洲保持大量的经济技术人员。原因之一是，该地区(除古巴外)在过去对苏联集团的信贷和援助计划使用得比较少。另一个原因是，拉丁美洲国家怀疑共产党国家的技术人员有可能是搞颠覆阴谋的代理人。美国国务院的一项研究估计，在1968—1969年，苏联集团在非共产党欠发达国家工作的技术人员总计为一万七千名，在拉丁美洲大陆的只有七十名(苏联二十名，东欧五十名)。如果不看百分比，这方面的数字在以后三年中上升得并不快。1970年，苏联集团在非共产党欠发达国家工作的技术人员总数为一万五千九百名，而在拉丁美洲的人数则上升到一百七十五名。1971年，上述数字分别为一万六千四百五十名和二百二十五名。1972年，分别为三万七千一百三十名和三百二十名。1973年，又分别为二万零四百二十名和三百五十名。^① 同时有几千名苏联集团的技术人员驻在古巴。

由于大量使用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接受共产党国家援助的项目不断增加，共产党国家在拉丁美洲(不包括古巴)的技术人员数字可望增长。特别是在阿根廷和秘鲁，这一点将完全成为事实。巴西还利用苏联的技术人员装配苏联制造的发电机，训练巴西人掌握使用方法。中国的技术人员可能帮助秘鲁发展铜矿业，同时已有几人到达圭亚那(1973年中国派往拉丁美洲的经济技术人员大约有五十名)。

^① 引自美国国务院，1969年，RECS—15，前引著作，第10页；1973年RECS—10，前引著作；1974年INR—RS—26，表六。

文 化 交 流

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尤其是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签署了一些文化、科学和技术合作协议(见表八)。例如,苏联—玻利维亚协议重在交换科学技术情报,共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并将其成果应用到工矿方面去。^①捷克斯洛伐克同智利在1971年11月4日签订一项协议,要求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促进科学和技术合作,并规定由捷克为智利学生建立奖学金制度。^②据报道,捷克同秘鲁1974年10月签署同一类型的文化协议。^③苏联“科学代表团”曾为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些“专题研究”进行指导。比如在智利,他们勘探石油,分析研究智利铜业有何要求。^④苏联的考察船在秘鲁和智利沿海作了调查,确定这些国家有可能大规模发展渔业。^⑤苏联同智利还订有共同研究天文学的计划,并由苏联的天文学家使用智利的天文台。^⑥至于哥斯达黎加,据说有“一大批”苏联医学博士正在当地的医学院工作。^⑦同样,一批苏联医生前往智利,“为边远地区和难以到达的地

① A·P·卡拉巴伊耶夫：“苏联远东和拉丁美洲在太平洋区域的协作问题”，原载《拉丁美洲》，1971年1月（第1期），第6页。

②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1年11月4日电。

③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4年10月15日电。

④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2年1月21日电。

⑤ 利马《七天报》，1972年11月12日；莫斯科电台，1972年1月26日。

⑥ 圣地亚哥《现在报》，1971年8月30日。

⑦ 危地马拉《自由新闻报》，1971年12月21日。

区的居民提供医疗援助。”^①

文化合作协定为拉丁美洲在苏联和东欧大专院校和技术学校学习和受训的学生、专家提供奖学金。还把一些奖学金非正式地提供给那些同共产党国家没有正式签订文化协定的国家。1970年，非共产党的欠发达国家在苏联集团国家大专学校的学生共计有二万一千四百一十五人，其中有二千四百二十五人来自拉丁美洲，大约有一千三百人在苏联学习。据报道，在这些国家学习的学生1973年为三千零二十人，其中在苏联的就有二千零四十五人。据估计，从1956年到1973年，曾经到苏联集团去学习的学生有六千二百九十人，其中到苏联的有三千九百九十五人，到东欧的有二千二百九十五人。^②莫斯科的卢蒙巴大学，以拉丁美洲学生人数为最多（1970年在总数三千零九十二名外国留学生中有九百六十四人是拉丁美洲的）。此外，在1965年到1970年期间，据说约有六百名拉丁美洲“专家”在苏联的学校培训。^③据卢蒙巴大学副校长说，约有五百名秘鲁留苏学生已在秘鲁从事本专业工作，其中五名在秘鲁国立工业大学任教。^④虽然苏联同厄瓜多尔没有签署文化协定，据说这个国家的学生对于得到卢蒙巴大学的奖学金已日益感到兴趣。据报道，1971年提出申请书请求批

① 莫斯科电台，1972年1月28日。

② 引自美国国务院、RECS—IS，前引著作，第13页和第15页；INR—RS—20，前引著作，表七十。1969年在苏联学习的有1,450人，在其他东欧国家学习的有525人。

③ A·I·西佐涅科：“1970年度苏联和拉丁美洲关系的成就和展望”，原载《拉丁美洲》，1971年1—2月（第1期），第108页。

④ 同上。

准的已有一百多人，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的人数。^①

苏联和东欧同拉丁美洲国家文化交流的扩大，可能导致拉丁美洲学生到苏联集团就学的人数进一步增加。随着苏联集团援助计划的不断增加，拉丁美洲也可能更加需要在东欧受过培训的技术人员。不过，这些计划对于受援国并不全都有利。一个问题是苏联的教育制度过分倾向专业，培养的学生技术范围很窄。尽管他们能适应象苏联那样复杂、先进的工业制度，但这样一种基础还是不适合拉丁美洲国家的需要，他们需要的是受过广泛技术训练的人。而且卢蒙巴大学的教学质量要比苏联其他大学的低。这倒不仅是它的学制比其他学校短，而且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卢蒙巴大学还接受那些未曾受完中等教育或已受中等教育但质量比较差的学生。可是苏联正规大学的学习计划却要求外国学生至少要花一年时间学习俄文。

1972年3月，在莫斯科开会的智—苏文化合作联合委员会的智利成员，要求苏联改变有关奖学金的协议。^②智利明确拒绝苏联向智利提供二十个进入卢蒙巴大学学习的奖学金名额（这不包括二十九个进入苏联其他高等院校的奖学金名额）。它还要求所有奖学金应设在苏联各大学所承认的院校，而选定这些院校应根据训练智利高标准的合格人员的需要，而不应受预先决定的、限制的政策束缚。同时智利提出，如果把学习期限从四年缩短到两年，看来这是不太切合实际的。因为应给学生时间学习俄文，而且苏联的大学和技术学院又

^① 利马《团结》半月刊，1971年3月11日。

^② 圣地亚哥《最后一点钟报》，1972年3月2日。

表八 同共产党国家签订的文化等有关协定^①

阿根廷	保加利亚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东德	匈牙利	波兰	中国	罗马尼亚	苏联
			C, F, ST ^{a*}		C*, ST ^{a*}	ST ^{a*}		C, ST ^{a*}	ST ^{a*} , F
玻利维亚			C, ST ^{a*}		C, ST				C, ST, U
巴西			C, ST ^b		C, ST				C*, F, U
智利 ^a	C*	U, F*, ST	U, C*, F*	U, C*	U, ST, C*	C*		C*, U	C ^b
哥伦比亚						C		C, ST ^{a*}	
哥斯达黎加			ST ^{a*}					C*, ST ^{a*} , U	
厄瓜多尔					ST	ST	ST	C*	
圭亚那									
墨西哥	C ^b		C			C*, ST ^{a*}	ST	U	C, F ^b
巴拿马								ST ^{a*}	
秘鲁		C*, ST ^{a*}	C*, ST ^{a*}		C*, ST ^{a*}	ST ^{a*}		U*, C*	
乌拉圭 ^a									U
委内瑞拉							C*	C, ST ^{a*}	

符号说明: C——一般文化协定。 F——影片交流协定。

ST——科技合作协定。 U——大学交流协定。

(有*者系美国国务院1971年后所公布的协定)

① 引自 INR 中关于《1971年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教育和文化交流》。

a 智利和乌拉圭的一些大学和非政府组织,同一些东欧国家的相应组织,也有文化交流协定。除罗马尼亚以外,智利同所有国家签署的协定,自从1973年阿连德垮台、智利同这些国家的关系破裂以后,都未付诸实施。

b 范围有限的非正式协定,或未付诸实施的协定。

都有四年课程。

拉丁美洲的企业主容易怀疑苏联集团国家颁发的文凭，不愿雇佣持有这类文凭的人。这也有损东欧国家培养的学生声誉。语言上必须具备的条件，共产党国家的气候以及那很少令人向往的生活水平，这些对拉丁美洲学生前往东欧就学也都是障碍。此外，一些政治上比较激进的学生对正统的共产主义和苏联持批评态度，他们并不想利用苏联集团的奖学金。这样，尽管拉丁美洲到苏联集团学校就学的人数可能增加，但还是可以预料，登记选择到美国和西欧大专院校就学的现象将继续下去。另一方面，一些拉丁美洲政府也许考虑到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即苏联集团培养的学生和技术人员比到非共产党国家留学的人在美国或西欧找到职业的可能性大概还要少。

军事援助

到此刻为止，古巴是接受苏联各种名目的军事援助的唯一的拉丁美洲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要求苏联在1969年内提供十五亿美元的军事援助。^①自那时以来，古巴又接受了飞机、军舰及其他军用物资。这样，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现在正好超过二十亿美元。^②结果使古巴武装部队成为拉

① 《格拉玛报》，1970年5月3日。

② L·戈雷和J·韦恩克莱：“日渐一体化的苏—古关系”，原载J·苏奇利基编《古巴、卡斯特罗与革命》（佛罗里达，科拉尔盖布尔斯：迈阿密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80—187页。

拉丁美洲最强大和最现代化的部队之一。

随着秘鲁和玻利维亚出现左派政权以及1969年苏古关系改善,苏联海军开始在加勒比海出现。在1970—1971年间,苏联舰队(包括潜艇)访问古巴的次数增加了。1970年秋,苏联公然要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开辟海军基地,古巴为苏联核潜艇提供方便的想法由于美国的反对可能已成泡影。虽然如此,看来苏联正在试图表明,加勒比海再也不是美国的内湖了;如今,莫斯科有能力把它的军事势力伸展到遥远地区,为它在西半球的朋友和仆从提供保护。

拉丁美洲往往把苏联海军的这些活动看作主要是同美国有关的事。但是,这种情况也很可能发生,即苏联海军在加勒比地区存在,最终将对拉丁美洲在对待美国的态度和政策方面多少有点不利的影响。如果莫斯科在该地区确实能保护它的仆从国不受美国或其他强大邻国的压力,那么,上述情况就可能成为事实。

然而至今除了古巴以外,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中,秘鲁是唯一接受苏联军事援助的国家,这种情况将来也有可能改变。美国国会作出决定,限制向拉丁美洲出售武器和提供军事援助,尤其是出售现代化的高级飞机和其他重型武器。美国坚持拉丁美洲国家军队的装备和训练主要从保证国内安全的使命与公民的活动来考虑。这就导致拉丁美洲势必增购西欧国家的武器。特别是法国和英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军用飞机,而西德和瑞典提供了军舰和其他装备。

苏联已使古巴成了它军事援助的橱窗,近几年来,苏联一直表示愿为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提供武器。苏联是欠发达国家

所需军事援助的主要供应者。从1955年到1972年，估计莫斯科向第三世界中非共产党国家提供了九十二亿美元的军事装备。^①

上面已经谈到提供援助的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此外，苏联希望通过提供这样的军事援助，使欠发达国家的军队依靠苏联提供零件和技术指导，或者至少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苏联为拉丁美洲培训年轻的军官和技术人员，使苏联有机会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这个地区的军队在政治上倾向于保守，苏联通过其军事援助，希望分化他们。并且经常在空军中寻找机会扩大影响，空军不象陆军和海军，他们往往是资历较浅和没有势力的，因而也较少保守。苏联企图通过给这些国家的空军提供现代化飞机和培训驾驶人员与技术人员等途径，从而在这些空军人员中扩大影响，同时还帮助空军建立威望。莫斯科对拉丁美洲军队的政治意义的评价有了变化，目前的评价显然使它更加优先考虑在拉丁美洲执行一项军事援助计划。

当苏联表示同情拉丁美洲军界的愿望时，苏联一直在发动宣传攻势来反对美国在该地区设置军事基地，并指责美国军事基地已成为美国控制和侵犯拉丁美洲国家主权的另一种形式。苏联的宣传家们除了谴责美国继续把持古巴的关塔那摩以外，还指责美国在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以及前不久还在智利和秘鲁保持许多军事基地。如上所述，莫斯科在巴拿马同美国关于运河问题的争端中，还公开站在巴拿马一方。

直到1973年为止，除危地马拉和古巴外，苏联还只是试

^① 美国国务院，INR—RS—20，前引著作，第13页。

探性地试图向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出售武器。向厄瓜多尔提供巡逻快艇的一项建议，已被厄瓜多尔政府所拒绝。智利看来是最有可能接受苏联军事援助的对象。阿连德政府对它同智利武装部队的关系以及如何使武装部队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或者争取他们的支持等问题都是非常敏感的。阿连德总统答应给军队以现代化武器并大大增加军饷。因此，显而易见，要是苏联成了智利的军援供应国，那就可能加强阿连德的地位，还可能影响三军，或者至少要影响其中某一军种的政治态度。

智利的武装部队从西欧获得新式装备，特别是海军，1972年买了一艘瑞典造的巡洋舰，并力图从英国得到其他战舰。不过，1971年10月，美国报刊报道，苏联已给智利五千万美元用于购买武器与装备，并提出所供应的装备价格要比西方的同等装备还便宜。^① 智利的武装部队后来否认他们在购买苏联武器，显然是因为智利高级军官的反对。一些智利的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据说进行礼节性访问。可是，在1972年1月，宣布了一个以军需物资局局长阿拉亚·卡斯特罗将军为首、由十二名陆军代表、八名空军代表和四名海军代表组成的智利军事代表团到古巴研究技术性问题。^② 据古巴报道，该代表团会见了古巴和苏联的军事代表，观看了苏联武器和装备的表演，包括的范围很广；据说，一些智利的飞行员试飞了米

^① 《纽约时报》，1971年10月13日。据某些报道，苏联1971年提出向智利供应三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詹姆斯·D·西伯奇：《苏联出现在拉丁美洲》（纽约，国家战略情报中心社，以及克兰和拉萨克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80页。

^② 圣地亚哥《助手报》，1972年1月6日；圣地亚哥智利广播电台，1972年1月6日。

格—21型飞机。苏联空军总司令库塔霍夫元帅在1972年9月作为苏联代表团团长到智利参加庆祝智利独立的活动。

1973年年底，秘鲁向苏联购买数量不明的T—55中型坦克时，苏联获得了惊人的进展，但也并不过分。报道指出，数量在一百五十辆到三百二十辆之间，估计最可能是二百辆。据说，秘鲁还打算向苏联订购小型SA—7型防空导弹。^①关于购买武器一事，秘鲁人在公开场合是吞吞吐吐的，而美国国务院报道秘鲁购买了价值为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武器。1973年12月，秘鲁领导人贝拉斯科将军在回答问题时承认，“苏联向秘鲁出售军需物资确有其事。”^②秘鲁驻智利大使1974年3月坚持说，购买这些武器包括坦克在内，“只不过是按照替换陈旧装备的常规政策办事”。他还声明，“我们可以接受苏联派教官来指导如何掌握新式武器，但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接受苏联军事代表团或军事顾问。”^③后来引用秘鲁人的话简略地讲就是，苏联教官已经来过又回去了。^④大概为了表明苏联不怂恿互相残杀的战争，莫斯科很快同意贝拉斯科在购买武器之后提出在拉丁美洲停止扩军的建议。不过，秘鲁购买武器引起了智利的担忧，因为智利害怕秘鲁为收复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战争中丧失的领土而向它进攻。苏联宣传工具反咬一口，说什么正是智利威胁了秘鲁，所谓威胁秘鲁的理由之一，正如一家广

① 《华盛顿邮报》，1973年12月18日；《华盛顿明星晚报》，1974年2月25日；1974年7月，五十四辆坦克在利马参加独立节的检阅，见《迈阿密先驱论坛报》，1974年10月4日。

② 美洲通讯社1973年12月2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③ 安莎通讯社1974年3月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④ 《华尔街日报》，1974年5月28日。

播电台所暗示的，只是由于“秘鲁在庆祝独立节的时候，在利马举行的阅兵式中炫耀苏制军火”而已。^① 苏联的宣传工具没有报道智利接受了贝拉斯科的在拉丁美洲停止扩军的建议。

现在，莫斯科刚跨进拉丁美洲的大门，巴不得自己直接动手或者假手盟国将大门撬得更大些。1973年6月，一个秘鲁军事代表团到西欧和波兰考察访问，他们不是去购买武器，而是去学习关于军事上的最新成就，“作为进一步参考”。^② 1974年11月，东德国防部长对秘鲁作了正式访问。据报道，他回国后声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算加紧进行军事合作，特别是加紧对秘鲁士兵的教学法和心理学方面的训练”。^③ 1974年11月，一名秘鲁的空军将领出席了古巴的军事演习。^④ 军事演习后，秘鲁陆军参谋长来到古巴，据说是参加评论这次军事演习的。^⑤ 这次评论将涉及古巴利用苏联武器的问题。可是，根本不谈秘鲁继续购买武器的事情。同时，1974年5月，到苏联和东欧去的赫尔巴特代表团中包括了阿根廷武装部队的陆海空三军。空军将领卡贝拉在归途中坚称，没有签定购买武器的协议，但是阿根廷的技术人员已准备去苏联学习反火箭突袭的防御系统。^⑥

正如在中东所证实的，由于苏联逐渐愿意用更现代化和

① 莫斯科广播电台西班牙语广播，1974年9月6日。还可参阅V·利斯托夫：“火炬”，《真理报》，1975年1月7日。

②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3年6月11日电。

③ 圣地亚哥《信使报》，1974年11月19日。

④ 哈瓦那电台，1974年11月23日。

⑤ 哈瓦那电台，1974年11月25日。

⑥ 美洲通讯社1974年5月22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尖端武器供给受援国，而且能够交付得比美国更迅速，这也许提高了拉丁美洲各国武装部队对获得苏联武器和装备的兴趣。

共产党集团的宣传活动

美国新闻署通过五年的对比指出，共产党在拉丁美洲的宣传活动剧烈上升。除了设立通讯社分社和举行运动会外，在1967年到1972年间，举办电影节、发行西班牙语版的苏联书籍、举行艺术展览会和设立苏联文化中心等活动，在拉丁美洲都有了惊人的增长。无线电广播和共产党国家主办的文化中心也有了显著增加(表九)。①

这种宣传活动的主要特征如下：(1)所有共产党国家对拉丁美洲的无线电广播，每周超过七百小时，其中古巴占二百七十小时，苏联占一百三十九小时多一点。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非共产党国家电台每周用西班牙语广播二百二十三小时，用葡萄牙语广播九十三小时。其中美国之音用西班牙语广播四十九小时，用葡萄牙语广播二十一小时(见表十)。(2)苏联集团及其追随者在拉丁美洲拥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的通讯、出版和文化中心点网(表十一到表十四)。西班牙语版的苏联书籍增加得格外惊人。1970年和1972年，正好在两年里增加了一倍以上。拉丁美洲大学显然成了苏联和古巴大学教科书倾销的重点对象。(3)以苏联和古巴为首的

① 表九到表十五是根据美国新闻署研究处国外情报科的非保密性资料制订的。

表九 共产党在拉丁美洲的文化活动

	1967年 计数	1971年 计数	1972年 计数	1967-1972年 百分比增减数
对拉丁美洲的 无线电厂播	580:30 小时/周	707 小时/周	708:30 小时/周	22%
派驻的通讯分社	58	62	62	7%
电影节(电影周)	11	8	26	136%
当地的报刊 和期刊	72	132	146	103%
西班牙语版的 苏联书籍(本)	2,033,000	4,626,000	5,825,600	187%①
艺术展览会	32	37	103	222%
艺术表演②	11	23	22	100%
体育表演②	18	25	13	-28%
苏联的文化 中心一协会	28	48	53	89%
所有共产党国家 的文化中心一协会	69	85	93	35%
在共产党国家的 拉丁美洲学生	1,410	2,650	3,005	113%
苏联派驻的 外交使团	5	11	11	120%
所有共产党国家 派驻的外交使团	37	64	73	97%
估计共产党 党员人数	174,650	349,680	388,375	119%

① 系1965年以来的数据,关于这一方面,1967年的数据缺。

② 这组数字包括个人或集体表演,1971年派出的体育代表队比1967年的多百分之三十九。

表十 共产党国家对拉丁美洲每周广播的时间
(表中所用的语言均系1971年底和1972年统计所得)

对拉丁美洲广播使用的语言	古巴		巴		东欧①		北朝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联		共计	
	1971	1972	1971	1972	1971	1972	1971	1972	1971	1972	1971	1972	1971	1972
阿尔巴尼亚语	…②	…	14:00	14:00	…	…	…	…	…	…	…	…	14:00	14:00
亚美尼亚语	…	…	…	…	…	…	…	…	…	…	1:40	1:40	1:40	1:40
保加利亚语	…	…	17:30	17:30	…	…	…	…	…	…	…	…	17:30	17:30
广东语	…	…	…	…	…	…	…	…	14:00	14:00	…	…	14:00	14:00
克里奥耳语③	11:00	11:00	…	…	…	…	…	…	…	…	3:30	3:30	14:30	14:30
捷克斯洛伐克语	…	…	3:30	3:30	…	…	…	…	…	…	…	…	3:30	3:30
英语	58:20	58:40	…	…	…	…	…	…	…	…	4:20	4:20	62:40	58:00
法语	6:30	6:30	…	…	…	…	…	…	…	…	…	…	6:30	6:30
德语	…	…	5:15	5:15	…	…	…	…	…	…	…	…	5:15	5:15
瓜拉尼语④	7:00	7:00	…	…	…	…	…	…	…	…	3:30	3:30	10:30	10:30

(续表)

对拉丁美洲广播使用的语言	古 巴		东 欧①		北 朝 鲜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苏 联		共 计	
	1971	1972	1971	1972	1971	1972	1971	1972	1971	1972	1971	1972
匈牙利语	5:30	7:15	5:30	7:15
朝鲜语	7:00	7:00	7:00	7:00
汉语	14:00	14:00	14:00	14:00
葡萄牙语③	14:00	14:00	52:30	56:00	14:00	14:00	17:30	17:30	93:00	101:30
奇楚亚语③	14:00	14:00	7:00	7:00	21:00	21:00
西班牙语③	163:20④	163:20④	87:30	87:30	14:00	14:00	44:30	44:30	73:30	73:30	382:50	382:50
乌克兰语	14:30	14:30	14:30	14:30
各种苏联民族语言(苏维埃祖国之音)	14:00	14:00	14:00	14:00
对拉丁美洲广播时间总数	274:10	269:30	185:45	192:00	21:00	21:00	86:30	86:30	139:30	139:30	706:55	708:30
1971年与1972年百分比的变化	-1.6%		+3%		0	0	0	0	0	0	+0.2%	

① 波兰除外,因其未向拉丁美洲广播。

② 三连点表示没有广播。

③ 在拉丁美洲使用的国语和当地土话。

④ 包括“古巴之声”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夜间的中波广播时间三十八:三十。

表十一 共产党的通讯社(1972年)

注: C—记者或 D—发讯员 驻在国	德意志通讯社	罗马尼亚通讯社	苏新闻联社	保加利亚通讯社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	匈牙利通讯社	中国新华通讯社	波兰通讯社	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	南斯拉夫通讯社	苏塔斯联社	按国家总计
阿根廷	D		D	D	D	D	D	D		D	D	9
巴巴多斯	D											1
巴西		D	CD							C	C	4
智利	CD		CD				CD		CD	CD	CD	6
哥伦比亚			CD				CD		D		CD	4
哥斯达黎加			D								D	2
多米尼加共和国									CD			1
厄瓜多尔①	D		CD				D		D		CD	5
萨尔瓦多②									D	D	D	3
圭亚那	CD						CD		CD		CD	4

(续表)

注: C—记者或 通讯员发出电 D—发出国 驻在国	德意志社	罗马尼亚社	苏新闻联社	保加利亚社	捷克斯洛伐社	匈牙利利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华社	波兰社	古巴拉丁美洲 通讯社	南斯拉夫社	苏塔斯 联社	按国家总计
洪都拉斯											C	1
牙买加							D					1
墨西哥			CD		C			C	C	C	CD	6
巴拿马									CD		CD	2
秘鲁			CD						CD		CD	3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D			1
乌拉圭	CD		CD	C	CD		CD				CD	6
委内瑞拉			CD						CD		CD	3
以通讯社总计	6	1	10	2	3	1	7	2	11	5	14	62

① 拉丁美洲通讯社在该国新设的办事处于6月份关闭,因其记者被指控干涉内政而被逮捕后驱逐出境。据信拉丁美洲通讯社的材料通过航空邮递继续到达。

② 1972年7月大学关闭后,在学生报纸上不再刊登共产党报刊的材料,但继续刊登在一些当地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工会出版物上。

表十二 在拉丁美洲的外国共产党报纸和期刊
(1972年)

主要共产党国家发行者	出版的主要报刊	主要发行地区
古巴	流浪者 美国之家 国际古巴 格拉玛报	秘鲁, 乌拉圭 乌拉圭 乌拉圭 智利, 哥伦比亚, 牙买加, 墨西哥, 乌拉圭
捷克斯洛伐克	今日捷克斯洛伐克	秘鲁, 乌拉圭
东德	新闻公报 桥	智利, 秘鲁 秘鲁, 乌拉圭
匈牙利	匈牙利	乌拉圭
北朝鲜	今日朝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 平壤时报	乌拉圭, 圭亚那 圭亚那, 洪都拉斯, 乌拉圭 洪都拉斯, 圭亚那
波兰	波兰	厄瓜多尔, 乌拉圭, 秘鲁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电影(西班牙语版) 人民画报(西班牙语版) 中国建设(西班牙语版) 北京周报(西班牙语版) 北京周报(英文版)	乌拉圭 智利, 哥伦比亚, 乌拉圭 智利, 哥伦比亚, 秘鲁, 乌 拉圭, 洪都拉斯 智利, 哥伦比亚, 秘鲁, 乌 拉圭 洪都拉斯
罗马尼亚	今日罗马尼亚	乌拉圭, 秘鲁

(续表)

主要共产党 国家发行者	出版的主要报刊	主要发行地区
苏联	苏联通报 社会科学 对外贸易 文化生活 苏联体育 国际研究 苏联电影 苏联文学 苏联妇女 莫斯科新闻 苏联新闻 国际评论 红星报 苏联军事 卫星 新时代 二十世纪与和平 苏联 国际生活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	阿根廷, 巴西,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墨 西哥, 秘鲁, 乌拉圭 智利, 哥伦比亚, 乌拉圭 智利, 哥伦比亚, 乌拉圭 秘鲁, 乌拉圭, 智利, 哥伦 比亚 智利, 哥伦比亚, 乌拉圭 智利, 哥伦比亚, 秘鲁 智利, 哥伦比亚, 乌拉圭 秘鲁, 乌拉圭, 智利, 哥伦 比亚 秘鲁, 乌拉圭, 智利, 哥伦 比亚 秘鲁, 乌拉圭, 智利, 哥伦 比亚 阿根廷(印数 15,000 份) 秘鲁(发行额 5,000 份) 秘鲁 智利, 哥伦比亚, 秘鲁 哥伦比亚 智利, 哥伦比亚, 乌拉圭 哥伦比亚 墨西哥, 乌拉圭, 智利, 哥 伦比亚, 秘鲁 哥伦比亚 巴西

表十三 1972年共产党国家在拉丁美洲的文化中心以及两国协会

拉丁美洲国家	保加利亚	古巴	捷洛 克伐 克斯克	东 德	匈 牙 利	北 朝 鲜	北 越	波 兰	中 华 人 民 国	罗 马 尼 亚	苏 联	南 斯 拉 夫	以 国 家 总 计 拉 丁 美 洲
阿 根 廷											1		1
巴 西											4		4
智 利*	1	5	1	1	1	1	1	1	5	1	21	1	40
哥 伦 比 亚		1	1	1							1		4
厄 瓜 多 尔					1						3		4
墨 西 哥		4	1								3		8
秘 鲁		1		1					1		12		15
马 拉 圭	1	1		1		1		2	1	1	6		14
委 内 瑞 拉		1									2		3
按共产党国家总计	2	13	3	4	2	2	1	3	7	2	53	1	93

* 智利政府文化团体中,经官方注册的对外文化协会只有二十九个。

表十四 拉丁美洲同共产党国家的友好与文化流协会

阿根廷	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东德	匈牙利	北朝鲜	北越	波兰	中华人民共和国	罗马尼亚	苏联	南斯拉夫
		△	△	△	△	△	△	△	△	△	△	△	△
智利			△	△	△	△							
哥伦比亚			△	△	△	△							
厄瓜多尔					△	△						△	
圭亚那					△			△				△	
墨西哥			△	△	△		△	△		△		△	
秘鲁	△		△				△			△		△	
乌拉圭		△	△		△		△		△	△	△	△	
委内瑞拉			△									△	

表十五 1972年共产党国家在拉丁美洲举办的文化和技术展览会以及参加的贸易展览会

国 家	数量，类型和主办展览会的共产党国家
阿 根 廷	文化展览会三次：捷克斯洛伐克现代绘画展览会，捷克斯洛伐克儿童艺术展览会和捷克斯洛伐克雕刻展览会。 技术展览会一次：匈牙利贸易和工业展览会。
玻利维亚	文化展览会一次：苏联绘画雕刻艺术展览会。
巴 西	文化展览会二次：一次是波兰的戏剧，另一次是南斯拉夫的雕刻展览会。 技术展览会一次：苏联常设的机械展览馆。
智 利	文化展览会二十二次：古巴六次，苏联五次，捷克斯洛伐克二次，北越二次，北朝鲜二次，罗马尼亚二次，保加利亚一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次，波兰一次。 技术展览会十九次：在圣地亚哥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八次（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北朝鲜，罗马尼亚，苏联，南斯拉夫）。 在圣地亚哥的房屋建筑展览会十次（保加利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北朝鲜，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南斯拉夫）。 保加利亚技术展览会一次。
哥伦比亚	技术展览会一次：据苏联商务专员的说法，在第九次国际贸易博览会上，苏联的展出“是十分糟糕的”。 文化展览会二次：一次苏联摄影展览会和一次波兰的“教具”与绘画雕刻展览会。
萨尔瓦多	技术展览会二次：在圣·萨尔瓦多的第五届国际贸易博览会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主要是农业机械）各举办一次。
圭 亚 那	文化展览会四次：全是古巴举办的，在加勒比海艺术节中展出，包括艺术、书籍、摄影和广告四方面的内容。
牙 买 加	文化展览会一次：古巴艺术品展览会。

(续表)

国 家	数量, 类型和主办展览会的共产党国家
墨 西 哥	文化展览会七次: 一次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摄影展览会, 一次是波兰绘画雕刻艺术展览, 五次是苏联书籍、平版印刷和文化展览会。
巴 拿 马	文化展览会二次: 一次是古巴的政治宣传画, 一次是古巴的书籍。 技术展览会一次: 南斯拉夫工业展览会一次, 在船上。
秘 鲁	文化展览会四次: 一次是苏联图书, 二次是保加利亚艺术、摄影, 一次是古巴艺术。 技术展览会四次: 二次是苏联在太平洋博览会上展出的科学考察船和宇宙飞船, 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展览, 一次是南斯拉夫工业, 在船上。
乌 拉 圭	文化展览会五十二次: 保加利亚五次, 古巴十三次, 捷克斯洛伐克二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次, 匈牙利四次, 北朝鲜二次, 波兰四次, 罗马尼亚五次, 苏联十次, 南斯拉夫二次。
委 内 瑞 拉	文化展览会三次: 一次是古巴图书, 一次是苏联文化, 一次是苏联图书。
合 计	文化展览会一百零三次: 古巴二十八次, 苏联二十五次, 保加利亚八次, 捷克斯洛伐克八次, 波兰八次, 罗马尼亚七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六次, 匈牙利四次, 北朝鲜四次, 南斯拉夫三次, 北越二次。 技术展览会二十九次: 苏联六次, 保加利亚四次, 南斯拉夫四次, 匈牙利三次, 罗马尼亚三次, 捷克斯洛伐克二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二次, 北朝鲜二次, 古巴一次, 波兰一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次。
总 计	展览会一百三十二次: 苏联三十一次, 古巴二十九次, 保加利亚十二次, 捷克斯洛伐克十次, 罗马尼亚十次, 波兰九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八次, 匈牙利七次, 南斯拉夫七次, 北朝鲜六次, 北越二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次。

共产党国家举办的文化展览会和贸易商品展览会逐步增加（见表十五）。(4)这种增长大多是共产党国家在阿连德的智利进行活动所引起的。因而，在1972年，苏联的五十三文化中心中，有二十一个设在智利。阿连德的倒台，显然使这些活动停止了，但可以预料在秘鲁以至可能在阿根廷这样一些国家，会将这种松散现象重新收紧。

第六章

问题与前景

苏联评论员所说，拉丁美洲象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一样，正经历着大动荡和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深刻变化，那是明摆着的事。对于这些变化的重大意义及其长远结局可能有意见分歧，然而毫无疑问，这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多方面的因素。从苏联全球观点的长远利益来看，在苏美两个相互竞争的力量体系之间的无情斗争中，它是能够对现在和将来的“力量对比”产生深刻影响的因素。的确，在莫斯科称之为美国的“战略后方”的地区发生这场斗争，而苏联能在这一如此遥远而对于美国最基本的传统政策又是如此重要的地区发挥积极的、不断增长的作用，这一事实证明了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东西方均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也证明了苏联已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强国出现。由于苏联领导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倾向于期望和促进这种变化，它相信尽管道路曲折，这种变化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黄金时代的实现，所以，它显然把拉丁美洲的发展看作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预言的一个重要迹象和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苏联公开认为，拉丁美洲对美国的利益和势力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对于美国在那个地区长期以来所处的统治地位发生变化的情况也具有特殊意义。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独

一无二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得到苏联领导人的承认。美国被认为有能力执行“不许干涉西半球”的政策，直到最近，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还谈到“地理宿命论”，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与美国紧邻的地区不可能取得左派革命的成功或扩大苏联的重要影响。因此，就美国的利益以及它排斥其他大国而能对拉丁美洲施加强大影响和控制的能力来说，拉丁美洲在苏联的心目中，看来可以同作为苏联重要势力范围的东欧相提并论。从苏联的观点来看，在这样一些重要地区所发生的变化，不仅能极大地损伤这个占优势的国家的实力地位，而且也是造成后者的力量或运用这种力量的能力削弱的原因。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重要势力范围，只有在它们面临无法作有效抵抗的压力下才会这样做，这是苏联对国际关系看法的一条原则。

只要有迹象表明东欧国家松弛它们同莫斯科的关系和扩大它们同敌对的西方集团的联系，对这样的迹象苏联都显得非常敏感。苏联对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态发展的反应以及勃列日涅夫主义的问世，都是这种敏感和莫斯科决心对其卫星国保持有力控制的证明。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在拉丁美洲也有类似捷克斯洛伐克之类的国家，例如古巴，但是美国不象苏联，并没有再度强行控制它，自1965年多米尼加共和国事件以来，美国再也没有对拉丁美洲搞类似勃列日涅夫主义那一套玩意儿。在苏联看来，这并不反映出美国想统治和控制这个地区的意愿已大为锐减（因为这种意愿是被假定为始终不变的），而是反映美国要把它的意志强加于拉丁美洲并保护它在那里的利益的能力有所削弱。在美国这种优势衰落

的同时，它对原料（包括来自拉丁美洲的）进口的依赖却不断增长，这一事实突出地显示并肯定了莫斯科关于“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的变化有利于苏联的这一认识。

苏联领导人对拉丁美洲形势的看法很可能不符合事实。但是，就政策和具体行动来说，力量的形象往往比力量的实质更为重要。苏联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以力图突出和利用苏联与日俱增的力量，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力量日益衰落的这些形象作为基础的。因此，如果说苏联领导人认为拉丁美洲对于美国极为重要，他们显然期望在那个地区苏联获益而美国失利，这样一来，同美国相比，苏联力量形象的可靠性就会增大了。

当然，由于拉丁美洲在地理上远离苏联而邻近美国，由于美国在这一地区长期占优势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由于这一地区各国在社会政治制度、传统、发展速度方面的复杂性和差异，也由于苏联还是在不久以前才能够在拉丁美洲进行渗透和获得势力，所以拉丁美洲作为两种对抗体系斗争的舞台，对莫斯科来说，不仅提供了特殊的机会，却也提出了不少难题。因此，尽管苏联发言人往往以极为乐观和得意洋洋的辞藻欢呼这一地区的所谓为“独立与进步”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的新“胜利”——的确如此，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1971年10月也声称，拉丁美洲的革命进程以比第三世界任何地方更快的速度正在向前发展——不过，他们还呈现出一些证据，说明至少在近期，对胜利的前景没有把握，而是准备应付暂时的挫折。苏联领导人自夸为“现实主义者”，假如他们用斗争政治的思想方法来看待阶级关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每一次攻

势引起对方进行反击的企图，自然在他们意料之中。而且，正如勃列日涅夫所指出的那样：“过去的经验和当前的事件，同样证明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的社会政治冲突可以导致种种曲折和反复。这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①所以，不能指望所谓革命进程的发展都是一帆风顺的。

莫斯科和拉丁美洲共产党对于智利阿连德政权垮台的含意所作的评价就是一个很好的、适当的例子。卡斯特罗在1973年9月把它看作是“与巴西共同密谋的”反动“战略攻势”的一部分，并得到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在玻利维亚和乌拉圭早已获得成功——下次目标是秘鲁和阿根廷。^②实质上，苏联领导人和分析家们如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等，都有这种观点，他们断言：“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势力正利用每一个机会进行反扑。他们在智利暂时占了上风。”^③另外，据莫斯科电台1974年8月23日广播说：“智利法西斯政变，已起到了刺激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反革命活动的作用。”

智利事件加深了苏联长期以来对军人的怀疑。《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关于军人作用的专题讨论会声称：“即使有一个赞成改革的军人政权，对军队中革命精神的深度也不应当

① 《真理报》，1972年12月22日。

② 哈瓦那国内广播节目，1973年9月28日。

③ 莫斯科电台1973年11月6日广播，又见V·特脱尔鲍姆：“未来胜利的序幕”，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3月（第3期），第89页；国际讨论会：“拉丁美洲：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5月（第5期），第102—103页。“乌拉圭共产党人的勇气”，原载《在国外》，1974年11月29日—12月5日（第49期），第7页。

估计过高。”^① 有一位苏联分析家强调指出：“当这种(革命)进程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时，当这个国家的社会力量两极分化达到顶峰时，军官团(它的大多数)就成了革命最危险和最残酷的敌人。”^②

毫不奇怪，苏联由于智利的经验而产生的忧虑也扩展到了对西半球以外的国家，特别是葡萄牙，虽然那里的形势在某些方面更近似于秘鲁而不似智利。葡萄牙共产党代表1974年7月在国际劳工运动协会的专题讨论会上警告说，对葡萄牙来说，智利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军队中的反动分子有可能采取“旨在迫使它(象在智利那样)背叛革命利益的行动”。^③

对智利事件的初步反应，似乎在拉丁美洲共产党人中也引起了一阵悲观的浪潮，也许更为悲观的就是因为搞这次军事政变一点儿不费劲儿，而阿连德政府以及支持它进行一些有效抵抗的各政党已彻底遭到失败。因此，流亡在外的智利最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 V·特脱尔鲍姆在他1974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有必要驳斥一些匿名的人提出的“悲观主张”，即“应该让帝国主义在我们这部分世界中(即拉丁美洲)再呆上十年、二十年”。^④ 一位经常评论拉丁美洲事务的苏联

① “军队为谁服务?”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4月(第4期)，第57页。

② K·麦达尼克：“智利的教训”，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9月(第5期)，第125页。又见A·特列彼托夫对乌拉圭军事政变的反应所写的文章：“拉丁美洲：革命进程和武装力量”，原载《共产党人》，1974年1月(第2期)，第126页。

③ 卡拉马曼夫：“智利的经验与革命进程”，原载《工人阶级和当代世界》，1974年11—12月(第6期)，第132页。

④ 特脱尔鲍姆，前引杂志。

作家V·布舒耶夫承认，“毫无疑问”，智利事件不仅在“拉丁美洲部分公众中”，而且在那些“自命为革命者”中，已产生了某种沮丧情绪”。^① 悲观的论调不仅出现在苏联对拉丁美洲的评论中，而且还出现在对智利政变的全球意义的评论中。尽管1974年初葡萄牙和希腊右翼政权的垮台使莫斯科怀着较大的乐观情绪来估量前景中更有利的趋势，但是波诺马廖夫警告说：“智利人民今天的悲剧，证明了法西斯的危险确实存在。”^② 这个论点反映在苏联的许多其他议论中，特别是有关西欧事态可能的发展。

然而，根据理论上的分析，更进一步从实际政策上来说，苏联已在几条战线上采取行动，表明它不管智利的挫败决心进行反击。勃列日涅夫的古巴之行尽管是在阿连德垮台之前安排好的，却已成为向整个拉丁美洲炫耀苏联旗帜，并对全地区的未来趋势继续充满信心的一种标志。勃列日涅夫在他的重要讲话中宣称，智利的教训不会被忘记，拉丁美洲争取“自由、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是同全人类的发展分不开的”。他继续号召“拉丁美洲国家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使人们“在世界舞台上更有信心地听到它们独立的声音”。^③

的确，拉丁美洲形势的几次发展，使莫斯科对整个拉丁美洲的形势很快就恢复了某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其中之一是阿

① V·布舒耶夫：“拉丁美洲的革命和反革命”，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4年5月（第5期），第32页。

② B·波诺马廖夫：“世界形势和革命进程”，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6月，第9页。

③ 《真理报》，1974年1月31日。

根廷庇隆政府提供的机会,加强了苏联同该国的联系,从而加强了它的“独立”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是以阿根廷同古巴恢复经济关系和给予该国大量信贷而非常顺利地开始的。1974年初,苏联同阿根廷签订一些重大的新的经济信贷协定,莫斯科认为这些协定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这从阿根廷经济部长J·盖尔巴德于1974年5月访问苏联期间所受到的待遇中就反映出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分别接见了她,这通常仅仅是给予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荣誉。莫斯科电台在评论这次访问期间达成的重大经济协定时说:

许多拉丁美洲观察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对老牌帝国主义的思想界限理论的一次沉重打击,阿根廷给南美洲其他国家显示了如何强化它们的独立和怎样摆脱跨国公司对它们的束缚。^①

当时还商定由阿根廷总统庇隆访问苏联。1974年6月14日,勃列日涅夫在他参加最高苏维埃选举的演说中特地提出这件事。不久以后庇隆的去世或许导致需要暂时进行重新估计,但是,整个事件反映出苏联的如下信念,那就是在一个国家里遭到的挫折可以用在其他国家里所获得的机会来弥补。

当人们回想起莫斯科对庇隆第一次执政(1946—1955年)深恶痛绝,并经常称这个政权为法西斯时,它现在对庇隆的注意就特别显得戏剧性了。苏联的态度转变得相当快。直到1972年10月,苏联专述拉丁美洲的杂志刊登了一个阿根廷共产党

^① 莫斯科电台,1974年5月13日。

人所写的一篇文章，抨击庇隆和庇隆主义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盟友，特别具有反苏反共的特点。^① 一个月后，苏联外交政策杂志《新时代》暗示态度正在变化。它虽然指出庇隆在第一次执政时期曾“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但把继庇隆之后的军人政权说得“更加残酷”。^② 使苏联态度发生这一变化和进一步变化的决定性行动是，庇隆在1972年11月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举行的协商会议中包括了阿根廷共产党人。从1973年5月至9月执政的埃克特尔·坎波拉的庇隆主义政权所采取的两次行动，加速了这个过程，使进行地下活动将近三十年之久的阿根廷共产党合法化，并同古巴、北朝鲜、北越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关系。到了1973年9月，莫斯科和阿根廷共产党都支持庇隆竞选总统。《消息报》在关于他取得胜利的评论中，甚至赞扬庇隆的“正义运动”，说它“由于所提口号符合人民需要和民族利益，所以得到群众的支持，在劳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③

在苏联看来，阿连德失败后在阿根廷出现的一些新的机会是值得欢迎的，它们不仅减轻了智利事件所给予的打击，而且似乎表明了形势有所扭转。在智利，军人政权代替了文官政权，而在阿根廷，埃波拉—庇隆政府（尽管庇隆具有军人身分）却决定排斥右派军人的统治。当然对莫斯科来说，最重要

① 鲁道夫·吉奥迪：“庇隆主义者和进步力量为组成统一战线而斗争的问题”，原载《拉丁美洲》，1972年11—12月（第6期），第66—79页。

② 胡安·科沃：“倒退的行动”，原载《新时代》，1972年12月（第49期），第24页。

③ L·卡米宁：“阿根廷的选举”，原载《消息报》，1973年9月26日。

的是这一政权所采取的新方针。同时，苏联对庇隆主义，特别是对于庇隆夫人为首的政府的未来仍不放心。这时，阿根廷共产党看来已自命为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的“正义运动”的竞争者。^①作为一种策略，它一直在谋求同这个运动的左翼建立联系而孤立其右翼。然而，阿根廷共产党重新全力支持庇隆夫人，号召成立民族民主阵线，协同一致同右派军事政变危险作斗争，谴责诸如人民革命军之类的极左派集团的恐怖行动，他们指责这些人造成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据说，阿根廷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旨在“建立一个以广泛的民主、反帝为基础的政府，它至少会得到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的的支持”。^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共产党人吸取了智利的教训，力求得到“中间阶层”的支持和缓和极左派集团的“冒险主义行动”，同时也极力主张进行改革，特别是在土地所有制方面的改革，以便“加强工人阶级同人民大众中非无产阶级阶层的联盟”。^③

尽管在胡安·庇隆总统去世后的几个月里没有象许多阿根廷人所担心的那样，^④立即发生内战或军事政变，但阿根廷

① R·伊斯卡罗：“工人阶级的先锋，群众的组织者”，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7月（第7期），第41—42页。

② Y·谢廖金：“阿根廷：民主力量与反动力量的对抗”，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4年11月（第11期），第84页。

③ 同上，第85页；与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A·法瓦的谈话，“堵塞反动的道路”，原载《真理报》，1974年9月17日；J·阿内多·阿尔瓦雷斯：“十月革命和目前的革命实践”，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4年11月（第11期），第26页。

④ 莫斯科电台，1974年8月2日。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A·法瓦声称：“我们认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并听其支配的，不是阻止反革命进攻，而是给予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的机会。”^① 然而人们看到阿根廷继续处于政治和经济危机的状态中，它的未来仍然捉摸不定。法瓦承认“阿根廷的形势是复杂而矛盾的”，甚至在那些同共产党“保持经常联系，并在许多根本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政党中”，^② 共产党在组织“民主力量”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方面的努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理解”。一位苏联分析家的见解更能说明问题，流露出莫斯科的不安和它牢记智利事件的教训。

历史的经验表明，在阿根廷的对抗中，要获得有利于进步和民主力量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得取决于进步力量成功地把在目前的政局中还没采取明确立场的那部分军人争取过来，因为这些军人倒向这边或那边，就能够决定阿根廷将来发展的性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③

然而，尽管莫斯科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承认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进程中，曲折是不可避免的，^④ 他们却发现了若干有希望的迹象。苏联的注意力继续集中在秘鲁和巴拿马的“进步的”军人政权上，据苏联声称，现已扩大到了厄瓜多尔

① 《真理报》，1974年9月17日。

② 同上。

③ 谢廖金，前引杂志，第85页。

④ 例如，见勃列日涅夫在哈瓦那的讲话，原载《真理报》，1974年1月31日。

和洪都拉斯。秘鲁共产党竟然走得那么远，以致把军政府的所谓“印加计划”说成是“反帝、反寡头统治的纲领，旨在建立社会主义”，^① 鉴于秘鲁共产党早些时候断言军人政权不能领导本国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十分异乎寻常的评价。但是，人们看到，这种做法在秘鲁仍然也有重大的障碍。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出，它“担心地注视着危险的分裂主义倾向，其目的是要把某些理论上的分歧上升到具体对抗的水平，并且正在助长革命队伍的分裂。”^②

洪都拉斯共产党的调子唱得特别乐观。它的一位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书记在苏联《党的生活》杂志 1974 年 11 月那一期中写道：

洪都拉斯共产党相信，正在我国发展的民主进程，民族解放运动，不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的現象；它是在拉丁美洲劳动群众运动高潮突出的形势下产生的。^③

他继续声称，尽管智利和乌拉圭的左派力量“暂时”遭到挫败，秘鲁、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的民族解放和革命的潮流正在向前推进。

苏联评论员也欢呼中美洲反帝斗争的新迹象。1974 年，

① V·利斯托夫：“为了激进的社会改革”，原载《真理报》，1974 年 9 月 5 日。

② 同上。

③ R·P·鲁斯：“为了民主、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原载《党的生活》，1974 年 11 月（第 21 期），第 80 页。

那里的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巴拿马以及其他国家，竭力迫使外国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同意它们提高原料和农产品的价格，特别是香蕉的价格。据说：“拉丁美洲国家香蕉种植园中约有十万多工人的一支队伍，站在反对新殖民主义者斗争的前列。”^①

许多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将美国公司收归国有的趋势在持续不断发展中，以及拉丁美洲各国日益准备同古巴恢复关系，两者都促使莫斯科相信，该地区的所谓反帝斗争和许多国家争取经济和政治独立的运动，不仅会坚持下去，而且速度还会加快。所以，苏联不仅欢迎在美洲国家组织中同美国的对抗日益增长，而且苏联的宣传工具把十二个国家在1974年11月基多会议上投票撤销对古巴的制裁这一事实，解释为美国的一次失败。^②此外，莫斯科似乎相信，它有相当的信心，可以指望至少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不远的将来会撤销对古巴的制裁，并可指望古巴在拉丁美洲各种组织和会议中的作用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委内瑞拉的政策变化暗示这个关键性国家正在采取一种立场，苏联可以把它理解为日益对其利益有利。因此，委内瑞拉在基多会议上的关键作用，佩雷斯总统于1974年9月接见北越记者以及他有意于同北越发展关系的声明，^③委内瑞拉于1974年10月28日与北朝鲜建立关系并于1975

① B·拉奇科夫：“挫败‘香蕉’新殖民主义”，原载《经济报》，1974年7月7日(第36期)，第22页。又莫斯科电台，1974年7月7日；P·加夫林申科：“圭亚那宣言”，原载《消息报》，1974年12月19日。

② 例如见V·利斯托夫和S·库德里亚夫斯基：“重大的胜利”，原载《真理报》，1974年11月7日。

③ 拉丁美洲通讯社1974年9月2日电。

年1月与古巴建立关系，这一切都说明加拉加斯接受同共产主义世界改善关系。因此，委内瑞拉外交部副部长约翰·拉斐尔应苏联邀请，于1974年9月间访问苏联一星期，在结束访问时，他说莫斯科“对扩大同委内瑞拉的联系方面特别感到兴趣”。^① 委内瑞拉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它在石油方面进一步给美国制造麻烦，其中包括它打算对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以及它对美国拥有的铁矿开采工业实行国有化，也都引起了莫斯科的强烈的兴趣，并且加以赞赏。11月份的《真理报》密切注意着委内瑞拉共产党代表大会，莫斯科派遣马列主义学院院长A·G·叶戈罗夫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第一副部长Ie·I·库斯科夫参加了大会。苏联宣传工具报道了大会关于“在委内瑞拉人民群众中增强反帝情绪”和“加紧进行反对外国垄断资本，争取真正独立的斗争”的声明。^②

莫斯科似乎看到了苏联同墨西哥加强关系的前景。《真理报》颇为满意地提到，在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于1973年春天访问莫斯科期间，“会谈进一步证实两国对当前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或者相似的”。^③

在1974年中，苏联的分析家们甚至看到了巴西出现有希望的迹象。1974年末，《拉丁美洲》的一篇书评中写道，人们不应该把巴西军人看得毫无希望而予以一笔抹杀。这位评论员既特别强调缓和、古巴的成功和“秘鲁、巴拿马、厄瓜多尔、

① 法新社1974年9月2日巴黎电；安莎社1974年9月9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电。

② 《真理报》，1974年11月6日；莫斯科电台，1974年11月7日。

③ K·库里亚：“为了友谊与和平”，原载《真理报》，1974年8月4日。

洪都拉斯的爱国军政府”^①的行动，可能对巴西产生影响，也特别强调葡萄牙发生的事态可能对巴西产生影响。1974年7月，苏联新任大使莅任时，携带苏联波德戈尔内主席给巴西总统盖泽尔的私人信件，表示苏联希望“在所有领域中扩大和加深同巴西的接触和关系”。^②十月份，盖泽尔就在经济领域“扩大共同的机会”作出答复，苏联宣传工具于是对此报道了相互之间的往来。^③苏联的分析家们似乎也认识到巴西目前的制度对西方的全面经济危机和巴西必须用高价进口石油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有其潜在的脆弱性。巴西对阿拉伯国家友好的政治态度，至少是莫斯科力图孤立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一笔资产。

尽管在智利和乌拉圭遭到挫折，莫斯科对这两个国家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虽然它不敢贸然预言这两个国家的不利形势到什么时候会好转。这两个国家的情况都是执政的军人缺乏群众基础，或者无法解决本国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苏联和各国共产党在这两个国家中似乎采取同样的战略，即在国内外从政治上孤立军人政权；组成反对军人政权的各政党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扶植“中间阶层”并力图扰乱武装部队的军心。^④早在1974年8月，莫斯科电台虽已承认民族解放力

① S·M·亨金和 Iu·A·安东诺夫：“巴西：军队与政治（历史随笔）”，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11—12月（第6期），第204页。

② 《圣保罗州报》，1974年8月10日。

③ 里约热内卢《巴西日报》，1974年10月13日；塔斯社1974年10月11日电；莫斯科电台，1974年10月12日。

④ 例如，见“乌拉圭共产党人的勇气”，原载《在国外》，1974年12月（第49期），第7页；E·罗德里格斯：“为人民利益而斗争”，原载《真理报》，1974年12月1日。

量和反帝力量在前一年遭到挫折，但仍声称：

当前大陆上的形势毫无疑问是不利于反革命势力的，即使它们在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中已经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由于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大陆范围内的政治气候已经发生一些质变。对古巴的封锁已经开始崩溃。遵循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一批国家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家不问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正在同所有国家改善关系，与此同时，为了捍卫它们的主权和民族资源，反对外国垄断资本的操纵，已经开始大胆地说话了。^①

这次广播把形势逆转说成是反动派和外国势力妄图挽救它们“摇摇欲坠的地位”的一种垂死挣扎。把它同“解放进程”对照时，广播说：“解放进程仍处于相对的新阶段——在反帝基础上取得拉丁美洲团结的阶段。正是这种团结，将保证解放斗争的胜利。”

由于美国控制拉丁美洲国家政策的能力正在下降，国际组织中支持美国政策的拉丁美洲投票集团形成分裂，这是苏联认为有重大收获的一个领域。按照苏联一篇评论：

反对美国统治的斗争已经越出拉丁美洲的界限，目前甚至正在许多国际组织中进行着，这首先在联合国中反映出来，拉丁美洲国家在那里已经不只是一度顺利运转的美国“表决机器”上的齿轮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常常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行动，特别是在

① M·克列苗夫的评论，莫斯科电台，1974年8月23日。

停止武器竞赛,禁止核武器,谴责侵略行动和使用武力等这些问题上。^①

近年来,随着拉丁美洲国家和所谓不结盟国家日益站在一起并参加不结盟国家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这种趋势甚至已经更加明朗化了。^②在苏联看来,因为拉丁美洲比其他第三世界地区较为发达,它的参预将意味着把反帝斗争更大地扩展到反资本主义的方向去。^③在目前的情况下,苏联认为在“爱国的”、“民主的”、“进步的”运动和政党广泛合作的基础上的统一战线策略,最适宜于利用和加强拉丁美洲极大部分国家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的民族主义,也最适宜于导致反动政权的垮台。这种统一战线的共同基础包括反美民族主义,表现在对美国控制的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实行国有化,限制美国投资和奉行更为独立的对外政策等方面。这样的做法,不仅反映出一种比激进的左派集团更为现实的观点,即理解拉丁美洲在这一阶段,假使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左派力量还是相当软弱,那么哪些事情才是行得通的,而且还反映出莫斯科优先考虑的是损害美国利益和地位的所谓“反帝”斗争,它是和苏联直接扩大对某些国家的影响和控制有所不同的。

假定是这种策略,而苏联和当地各共产党都认识到取得

① S·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为争取‘第二次解放’而斗争”,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2年11月(第11期),第39页。

② R·A·图兹穆哈麦多夫:“不结盟:拉丁美洲情况”,原载《拉丁美洲》,1972年1—2月(第1期),第44—63页。

③ 同上,第46页。

“中间阶层”支持的重要性，那么，统一战线才可能包括范围很广的政治党派。苏联和当地各共产党在中间派的改良主义政党中寻求盟友，比在明显地更激进的左派中寻求盟友看来甚至更有兴趣，因为后者如同右派对手相比，往往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分裂性和政治上、思想上的危险性方面，两者相差无几。尽管各国的条件和机会有所不同，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普遍地表示愿意在统一战线中不仅包括社会党和激进的军人，而且包括基督教民主党人士，甚至同号召进行“激进的革命改革”的天主教会进行合作。诚然，在许多国家中，天主教会现在似乎已是席卷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领导和发起者，也是它的灵魂。这不单纯是政策上或者甚至在方向上所发生的一种变化。反之，它是天主教会自我形象和理解到自己的新作用方面已发生的一种根本性变化，这种新作用将影响到其神学基础。^① 莫斯科没有忽视这些情况，它“欢迎天主教徒投身到革命进程之中”，并且认为“在为工人的社会解放和为社会主义的光辉灿烂的理想而进行的斗争中，一切进步力量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②

但是，这种温和的姿态，对于共产党人努力谋求青年人（特别是学生）和国内比较贫困的民众的支持，产生了问题。这些人往往已经受到更加激进的左派的运动和思想意识的影响

① 见弗洛里迪和斯蒂夫博尔德：“靠不住的联合：拉丁美洲天主教会与工人”（迈阿密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事务专题论文集，1973年版）。

② I·格里古列维奇：“拉丁美洲的教会和革命：一些新事实和新趋向”，原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73年2月（第6期），第79页；以及“‘造反的’教会与民族解放运动”，原载《列宁主义与拉丁美洲》，第252—256页。

而且深表拥护，对于一些正统共产党的比较谨慎小心和官僚主义的纲领和行为，即使不加以轻视，也会感到不耐烦。因此，对于两代人之间（不是两个阶级之间）冲突的各种思想，以及对于苏联代表着已经失去了革命热情并已被更新的、更朝气蓬勃的革命力量所取代的“老左派”这种概念，莫斯科不得不经常进行斗争，表示反对。诸如智利的左派革命运动、乌拉圭的民族解放运动、阿根廷的民族解放军等组织以及其他地区的毛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都是这种“左倾”的代表，苏联和当地共产党要同这些“左倾”势力进行斗争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证明它们对那方面极为敏感。

同时，共产党人不仅由于普遍地不能把有效的统一战线组织起来，而且由于同那些必然会背叛革命运动并反对以任何形式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和向社会主义进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结成联盟，因而容易受到指责。这些政党也将反对共产党人努力在统一战线中取得决定性发言权的任何行动。因此，这种策略在眼前或许是有效的，但从长远来看，它有严重的局限性，使共产党人和苏联对其后果有很大的疑问。

莫斯科甚至在那些它描述为“革命人民民主”的国家，即可能已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例如叙利亚和伊拉克），已经见到过这种统一战线策略的局限性。共产党的评论承认，执政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往往拒绝同当地共产党合作，并承认“非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必然”通向社会主义。^① 苏联

^① 例如见卡西姆·姆鲁埃：“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3年2月（第2期），第67页；“再论非资本主义道路”，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0年6月（第6期），第83页。

的一个第三世界问题专家、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R·A·乌里扬诺夫斯基一再抱怨说，“革命民主主义”政权继续从较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寻求投资；由于国家部门的发展，官僚政治出现了，反对继续沿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进的“新的”官僚和城市资产阶级也形成了；土地改革往往会产生一个保守的“富裕”农民阶级；民族主义和宗教在这些国家的世界观方面仍旧有着消极影响，因为它关系到这些国家参加全球性共产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分工”。^① 乌里扬诺夫斯基在一篇坦率的声明中承认，苏联的分析家和战略家们未能设计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唯一的公式，使当地共产党同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政权保持最理想的关系。乌里扬诺夫斯基写道：“关于在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国家中的民族民主政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即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小组）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践还没有提供最后的答案。”^② 他警告说，发展中国家是“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汪洋大海”。^③

有人可能会争辩，正象苏联发言人所说的那样，由于较久

① R·A·乌里扬诺夫斯基：“‘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原载《国际生活》（莫斯科），1971年9月（第9期），第30页；“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1年9月（第9期），第122页；“阿拉伯东方：一个团结进步的阵线的问题”，原载《新时代》，1972年10月（第41期），第18页；又见K·勃鲁登斯：“执政的革命民主政体：政治活动中的某些情况”，原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72年12月（第12期），第129页。

② 乌里扬诺夫斯基，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0年6月（第6期），第89页。

③ 乌里扬诺夫斯基，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71年（第9期），第119页。

的革命传统,较大的无产阶级和较强的共产党,拉丁美洲存在着击败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抵抗而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有利的条件。然而,苏联评论员常常抱怨说,在拉丁美洲,甚至无产阶级也倾向于抵制共产主义思想:

缺乏了解,猜疑,没有政治经验——这一切都阻碍着新事物的道路。切身的经历,生活的逻辑,阶级本能,推动工人们走向社会主义。过去的传统,文化的落后,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养成的驯服性——这些都是使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形成过程迟缓下来的势力。^①

在为现代化和进步而斗争的过程中,拉丁美洲出现的社会政治两极分化的进程可能是有利于莫斯科和共产党人对前景比较乐观的一个因素。苏联的分析家们声称,不仅要看到狭隘的改良主义的失败,而且要看日益增长的社会激进化,因为不摧毁旧的统治阶级及其国内外的“反动”盟友,就不可能作出有意义的改革,这一点变得更明显了。所以,旧的统治阶级及其国内外“反动”盟友所作的反抗,适足以更进一步促进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激进化。因此,智利共产党在1973年9月军事政变后发表的声明表明,共产党人期望由于执政的军政府的高压和“反动”的政策,智利社会的政治分化加强,从而预料政治的钟摆在军政府垮台之后将更进一步摆向左派,使继承的政府能够比在阿连德统治下更大幅度地推进“革命进程”。

^① B·I·科瓦尔:“世界社会主义对于提高拉丁美洲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影响”,原载《拉丁美洲》,1974年3—4月(第2期),第33页。

虽然根据共产党的学说，军人政权不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不过是过渡性的，最终必然要让位于“民主的”和“革命的”进程，但是，莫斯科却被拉丁美洲的军人在政治上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的某些局面和不断出现军人政府的趋势所困扰。在苏联的分析中，承认军人在这一地区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并认为军人能够决定哪些政权能够上台或不能上台，这对苏联和当地共产党的战略和战术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苏联的分析家们虽然明显地强调，为了争取军心而在军界中赢得影响的重要性，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怎样着手去干，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虽然军人政权的民族主义，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导致它们采取莫斯科所认为的反帝政策，但是即使“进步的”军人政权，对于共产党仍旧怀有戒心，并且拒绝同苏联的政策保持密切的一致性。经验表明，苏联出售军火，虽然使军方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但并不会自动导致苏联影响的相应增强以及军方政治态度 and 政策的激进化。由于存在着以巴西为代表的军人统治高度成功的“反动”典型（它同秘鲁“进步”典型搞得很差劲的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拉丁美洲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即使莫斯科露出种种迹象，表示可能愿意签署更多的合同，给秘鲁提供大量的经济信贷和援助，但对拉丁美洲的军人来说，秘鲁这个典型未必会象巴西那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苏联确信，第三世界的所谓民族解放进程，必需是，并且一定会导致各国摆脱同西方，特别是摆脱同美国的关系，相应地发展和加强同苏联的关系，这是苏联政策的另一个因素。按照苏联的世界两极观，这种转变是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

根本因素和表现。正象已经说过的那样，莫斯科断言，真正的不结盟是不可能的，并且认为那些自称为实行这样一种政策的国家在客观上是倾向于两个对立的体系和势力集团的这一方或另一方的。在这一方面，苏联同北京的论点有着激烈的争论，北京把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等同起来，把它们对第三世界的利益相提并论。与此相反，苏联的评论员们却争辩说：“不结盟在客观上是针对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侵略的；它必然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一起出现。”^① 据勃列日涅夫说，在苏联看来，不发达国家迟早必然会认识到，“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促进反帝斗争的胜利，巩固已获得解放的国家的真正独立。”^②

因此，苏联认为，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可以加强它们反对美国统治的斗争，也是在它们方面对美国进行深谋远虑的对抗行为。由于苏联对拉丁美洲来说是一个新来者，在世界的那一部分没有“帝国主义”的记录，它支持这个地区渴望变革的愿望，并在某些方面代替美国，从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占了便宜。但是，这个地区的国家仍然认为它们自己正在为摆脱美国以取得更大的独立而进行斗争，它们显然并不期望苏联取代美国而成为他们生活中的统治力量，也不愿为了经济上的生存和国家的安全而依赖莫斯科。然而，从苏联的观点来看，只要拉丁美洲目前还是一个活跃的、日益加剧的反美斗争的舞台，只要苏联同这个地区的关系使这个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有所减少，莫

^① 图兹穆哈麦多夫，前引杂志，第46页。

^② 《真理报》，1972年12月22日。

斯科对它自己的影响和作用即使没有立即得到相应增长，目前似已感到满足，因为苏联相信，美国力量因此之故而日益缩小，是同它谋求“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有利于自己的转变这一基本战略相一致的。

当然，此外还有苏联领导非常重视的“客观现实”的情况。苏联承认，它在进一步发展它同拉丁美洲的关系和直接参与拉丁美洲的事务方面，面临着不少问题。就是这个民族主义，莫斯科企图利用它来作为这个地区反美斗争的一种工具，却给苏联想获得重要的（即使不是决定性的）影响，造成了一个重大的障碍。苏联的影响，即使是对于左派政权的影响，很可能仍然是有限的，因为拉丁美洲国家不大可能会象古巴那样在经济上依赖苏联集团。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苏联也没有能力取代西方，成为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国家在经济上的支柱。而且，在食物和原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不少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使它们从比较贫穷和受剥削的国家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它们对于拉丁美洲未来的发展以及外部强国在那里所起的作用，都有它们自己的看法。同西欧和日本扩大经济关系，为拉丁美洲寻求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投资和技术提供了重要的选择余地，而它们认为同美国和苏联的这种关系却必须承担这种政治条件。由于长期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形势可能会倒过来，给苏联以新的可乘之机，但就目前来说，许多国家的情况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些，能够渡过它们的经济难关。尽管有着各种限制，外国资金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个地区。

如果拉丁美洲这个或那个国家，由于它同美国发生了重大争端或者受到邻国的威胁而在军事上依赖苏联，那么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冒着同美国发生对抗和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疏远的危险，莫斯科可能会在这个国家获得重要的影响和产生重要的作用。这样的发展将大大促进苏联成为一个拉丁美洲强国，正如同它努力使自己成为中东的强国一样。但在目前，莫斯科仅不过在它同古巴的关系上扮演了这个角色，它一直小心翼翼地否认它在这个地区其他地方的活动（特别是秘鲁）有任何军事上的意义或利益。尽管如此，不能排除苏联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特别不能排除当左派或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受到威胁时，苏联予以支持，如果莫斯科一旦认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和地位的削弱和由此而引起的有利于苏联“力量对比”的变化，将会减少美苏在这个地区发生对抗的危险的话，那就更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了。

不论怎样，当前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战略是努力促进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团结”，把它看作是“保证”从美国的统治下“胜利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斗争”的必不可少的步骤。按照这个战略，莫斯科一直在极力鼓励建立一些把美国排斥在外的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组织和体系。苏联的分析家们在描述目前趋势时指出，无论进步的还是右翼的政府，在发展拉丁美洲的对外经济和政治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方向，是使这个洲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的这种努力日益得到加强”。^①苏联的

^① S·米高扬：“重要的变化”，原载《在国外》，1974年10月（第39期），第8页。

官方评论表示坚决支持安第斯条约，支持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所采取的步骤，支持保护拉丁美洲的自然资源不受外国掠夺的拉丁美洲特别合作委员会。同样，莫斯科表示赞成并且鼓励许多国家为了抬高各种商品的出口价格而组织生产国的卡特尔。苏联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尽管有许多障碍，政府之间互相合作的趋势克服了离心因素，并具有意义重大的反帝潜力。”^①

再说，这种趋势一面能促进苏联削弱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影响这个眼前目的，一面无疑地将对苏联在这个地区进行直接渗透造成阻力。地区性组织和合作不仅能减少苏联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得重大影响的能力，而且有迹象表明，象巴西这样的大国，可能在那些共同持有强烈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态度的政府，比如玻利维亚、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等政府之间，组成一个联盟或互相支持的体系。的确，这样一种集团的出现，结果可能就是共产党想早日推翻乌拉圭和智利的军政府的重大障碍，也可能导致秘鲁的“进步”政权日益孤立。因此，有力的反美姿态的最好前景可能在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团结”，但是，苏联要在拉丁美洲一些主要国家获得莫斯科确实向往的优势并控制它们，其前景更可能取决于各个关键国家，尤其是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互相竞争所可能提供的机会。

实际上，有许多方面的问题使苏联与拉丁美洲个别国家之间已经发生争吵，或者可能发生争吵。例如，苏联对待拉美

^① K·S·塔拉索夫：《美国与拉丁美洲》（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无核区的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态度，显然就是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于1973年4月访问苏联期间的一个有些微妙的问题。这个具体问题涉及遵守第二号议定书，它正式要求核大国尊重拉丁美洲无核区。^①刚在埃切维里亚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北京表示支持第二号议定书，这不仅是为了讨好拉丁美洲，而且是将了苏联一军。

只有苏联这个核大国不愿遵守第二号议定书，这可能出于许多原因。原因之一是由于古巴反对这个条约。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尽管人们把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评价为一个积极的行动，不过必须看到它的矛盾和妥协的性质，这给那些梦想获得自己的核武器的拉丁美洲国家中的那些反动势力以许多可乘之机。”^②这一声明的作者K·S·塔拉索夫，特地把阿根廷作为一个危险地点加以引证。塔拉索夫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引证了巴西。在这方面，他问道：

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出现强大的原子反应堆，必然会引起完全合乎逻辑的一个问题：难道它们不会被用来制造这些国家自己的原子武器，因而使这种武器扩散到整个拉丁美洲大陆？^③

还有一系列问题同海洋法有关。就苏联是个海上军事大国这个范围来说，它同那些谋求二百海里领海权的拉丁美洲国家发生了冲突。当秘鲁总统贝拉斯科在1974年6月加拉

① 《真理报》，1973年4月13日。

② K·S·塔拉索夫，前引杂志，第63页。

③ 同上。

加斯海洋法会议上就提案的表决对苏联和美国都加以攻击时，从苏联的意识形态立场看来，这种攻击使它特别感到头痛。

这样，一方面固然要看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区迅猛的并且还在加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的变化，给苏联的渗透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是，也很清楚，苏联在这个地区要取得重大影响，会遇到许多障碍，更不用说要取得占优势的影响了。确切地说，苏联在拉丁美洲的事务和活动中仍然只起着很小的作用，即使这个作用在逐渐增加。从外国的势力影响的角度来看，以及从这个地区的实力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巨人，尽管近年来它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因此，将来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性质以及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特点，对拉丁美洲的发展，其意义将远远超过苏联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所能做到的。

然而，这并不表示莫斯科不再继续设法利用机会以造成拉丁美洲不利于美国的态度和发展，不再继续任意利用国与国之间的和共产党的许多渠道来加强它对这个地区的渗透了。1975年1月7日的《红星报》上有一篇文章写道：“始终如一地保卫和支持解放斗争的原则是苏联对待拉丁美洲大陆政策的基础。”^①拉丁美洲想摆脱美国保护的那种日益增长的倾向，是莫斯科和哈瓦那不能不企图使之加强的一种倾向。不论苏联本身的局限性如何，越来越多的其余拉丁美洲国家承认古巴，将使莫斯科得到在大陆上施加影响的一条有效的补充渠道。这正是莫斯科成功地努力加强它在古巴的地位的根本

① I·杰文：“团结合作的过程”，原载《红星报》，1975年1月7日。

目的之一，也是苏联对于它在拉丁美洲的最终希望具有信心的一个基本根源。无论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古巴的一个亲苏共产党政权的巩固是苏联在南半球继续发挥作用的保证。因此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1975年1月的一次苏联军队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把古巴说成是“为真正的民族独立，为劳动人民的利益”^①而开展的拉丁美洲运动中“最重要的因素和堡垒”，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美洲国家组织取消对古巴的制裁和古巴更加积极地参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会议和组织，预期会加强它们潜在的反美运动。由于卡斯特罗现在在战略和战术上与莫斯科看法相同，它们的努力互相加强了。

总的说来，尽管莫斯科认为，最近遭到的一些挫折仅仅是暂时的，尽管这个地区长远的前景和发展显然是难以肯定的，目前莫斯科对拉丁美洲的预测仍然是乐观的。虽然拉丁美洲存在着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复活，苏联的领导人和分析家们却声称他们看到了全世界向左转变的迹象，其中尤其包括拉丁美洲。这种转变被认为由于西方面临着经济危机而正在加速，预期经济危机反过来又会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它们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竞争尖锐化，并使某些特定国家和全球规模的阶级斗争更为剧烈。苏联对世界趋势的一个全面评述对拉丁美洲的前景，有如下的看法：

美洲大陆南部继续在沸腾，就在那里，巨大的左翼力量已经在这个舞台上起着作用。事实正在证明：要使拉丁美洲的革命和民

^① 《红星报》，1975年1月29日。

主进程停止是不可能的。智利的反革命并没有导致这一进程的结束，虽然这正是那些唆使这场反革命的人们的主要的和不可告人的目的所在。在把拉丁美洲改变成为皮诺切特之流的王国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孤立革命的古巴的政策正在失败。

拉丁美洲大陆上的斗争并不是在逐渐消失中。民主势力发动广泛的反攻的机会是存在着的。这不仅对北美、澳大利亚和大洋洲，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会产生影响。^①

巴拿马共产党首脑鲁文·达里奥·索萨在苏联理论杂志《共产党人》1975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也强烈地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因此，对爱国的与革命的力量以民族解放的名义继续发展战略攻势来说，有利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正在形成。这应当成为目前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拉丁美洲目前阶段的反帝斗争是进攻的、积极的斗争，同时它的动力加快得到成熟。正是这种世界形势和帝国主义危机的发展，使得这场斗争应运而生，并不断向前推进。^②

① 恩斯特·根里：“拉丁美洲正在向左转”，原载《文学报》，1974年11月6日。

② 鲁文·达里奥·索萨：“拉丁美洲的革命与反革命”，原载《共产党人》，1975年1月（第1期），第90页。

